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研究丛刊

李定国纪年

郭影秋 编著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研究丛刊

李定国纪年

郭影秋 编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李定国纪年/郭影秋编著.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研究丛刊）
ISBN 7-300-07035-3

Ⅰ.李…
Ⅱ.郭…
Ⅲ.李定国（1621～1662）-年谱
Ⅳ.K82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52179 号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研究丛刊
李定国纪年
郭影秋　编著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总编室）		010－62511239（出版部）
	010－82501766（邮购部）		010－62514148（门市部）
	010－62515195（发行公司）		010－62515275（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河北涿州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40 毫米 1/32	版　　次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印　　张	10.75 插页 2	印　　次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286 000	定　　价	22.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出版委员会

（按姓氏笔画排序）

马大正　于　沛　朱诚如　成崇德　李文海
陈　桦　邹爱莲　孟　超　徐兆仁　戴　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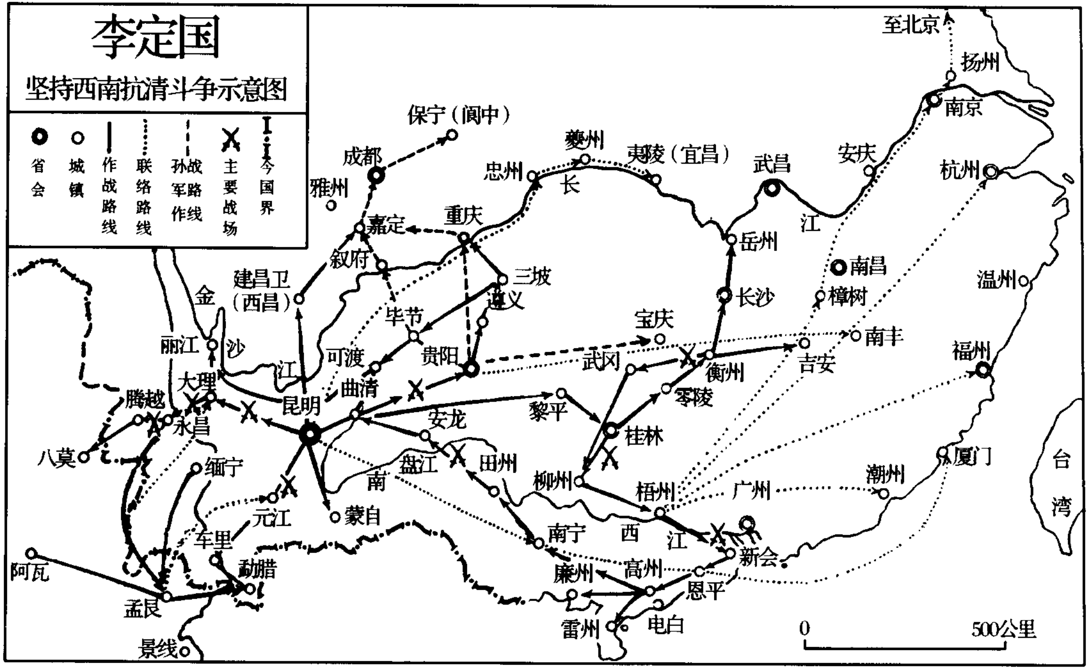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研究丛刊》编委会

主　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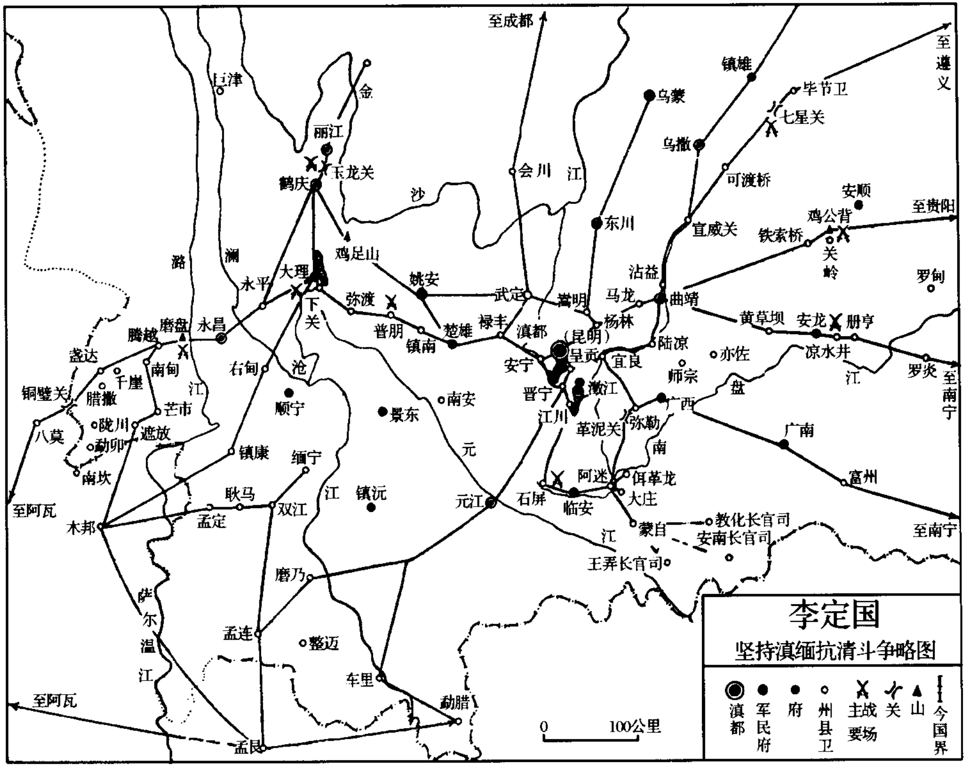
李文海

委　员

龚书铎　王思治　经君健　程　歗
杨　珍　夏明方



图一　李定国坚持西南抗清斗争示意图



图二　李定国坚持滇缅抗清斗争略图



大西、大顺通宝
（藏云南博物馆）



“四将军”兴朝通宝
（藏云南博物馆）

图三　张献忠、孙可望铸币拓片之一



“四将军”兴朝通宝

（藏云南博物馆）

图四　张献忠、孙可望铸币拓片之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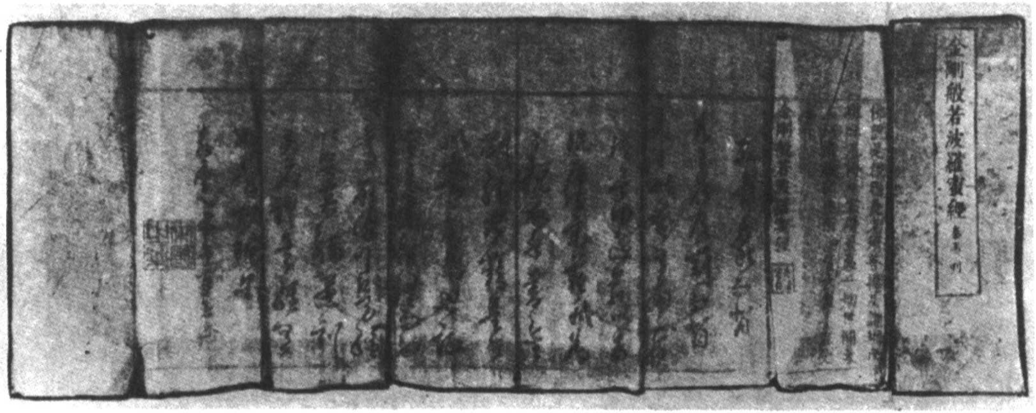


图五　明永历帝玉玺“敕命之宝”
（藏云南博物馆）



西藩李 室人劉氏同男李嗣興女海岳奉為答報
四恩發心命工印造
佛道經懺共五千六百二十四卷供奉各寺院特散布十
方頂禮以此經功祈保出師將吉人馬平安上祝
皇圖鞏固國運慶安境土清寧民安物阜法界有情俱圓
種智
永曆六年八月 初一 日造

图六　明永历六年(1652年)西宁王李定国印造《慈悲道场梁皇忏法》卷末所刻印造记



图七　明永历九年(1655 年)秦王孙可望刊朱印本
《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卷末孙可望跋语



图八　勐腊汉王庙遗址



图九　勐腊傣族房屋

总　序

李文海

《研究丛刊》是为完成清史编纂工程而出版的四种丛刊中的一种（其他三种是《文献丛刊》、《档案丛刊》和《编译丛刊》），其任务是及时编辑出版清史专题研究的最新学术成果。

修纂清史是新世纪一项规模宏大的文化工程。中央对新编的清史提出了明确的要求，那就是："编纂的清史质量要高，必须是精品，要注重科学性和可读性。确保编纂出一部能够反映当代中国学术水平的高质量、高标准的清史巨著，使之成为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传世之作。"（2003 年 1 月 28 日李岚清在清史编纂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这是一个极高的标准，要达到这个标准，需要有很多的条件，做艰苦的努力。其中最重要和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要始终不渝地把全部工作建筑在对清代历史的深入研究和不懈探索的基础之上。

专题性研究同综合性学术成果的关系，是任何一个学术工作者都十分清楚的。专题性研究是基础，综合性学术成果则是概括、提炼、深化和升华。一部优秀的综合性学术成果的产生，又为更加宽阔、更加深入的专题性研究提供契机，开辟道路。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上个世纪八十多年对清代历史的各个方面的专题研究，也不可能有今天提出清史编纂工程的成熟条件。《清史稿》的不尽如人意，除了其他种种原因之外，整个学术界缺乏对清史的前期研究，显然也是一个重要的先天不足。现在，清史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清史学术园地硕果累累，这正是历

史赐给我们的能够超越前人的重要保证。这里，还需要强调的是，要真正能够写出符合中央要求的“清史巨著”和“传世之作”，不但要正确吸收和充分反映已有的清史研究的学术成果，而且在修纂过程中，还要继续进行多方面和多角度的专题研究，使我们对清代历史的认识，不断扩展新的视野，做出新的概括，达到新的境界。

根据这样一些想法，我们希望《研究丛刊》的出版，能够起到这样的作用：一方面，为清史编纂工程不断提供新的研究成果、新的学术资源，使新编的清史真正站在学术前沿，具有较强的时代性特征；另一方面，在清史编纂工程不断前进的过程中，发现和提出新的研究课题，拓展和深化清史专题研究，发挥清史编纂工程对整个清史研究的带动作用和推动作用。另外，有些难以为新编的清史包含和容纳的重要研究成果，也可以通过《研究丛刊》单独发表。总之，我们希望《研究丛刊》成为清史编纂工程同史学界，扩大一点说同学术界、同社会联通和交流的一座学术桥梁，一个学术平台。

为了编好《研究丛刊》，我们将按照学术规律的要求，制定明确的工作规程。除此之外，我们仍然想强调几点，作为编委会和作者、读者共同努力的方向。

一是要尊重和提倡学术创新。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对于学术说来，也是学术发展的本质要求。因为学术的发展，从根本上来说，无非是对未知的探求。如果学术一味因袭前人，墨守成规，亦步亦趋，人云亦云，因循守旧，故步自封，那学术就没有了生命力，没有了活力，也就失去了存在的资格和权利。客观世界是千变万化的，人们对客观世界的了解和认识应该不断地发展变化；人的社会实践是永无止境的，我们的理论创新也就没有止境。即使是像历史学这样的学科，也应该在历史资料的发掘和掌握、历史现象的判断和分析、历史规律的认识和把握等方面，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才称得上是真正的、名副其实的学术工作。

当然，创新不是天马行空，随意臆测，不是无根据的空想瞎说。胡锦涛总书记在2003年“七一”重要讲话中指出：“理论创新必须以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前提，否则就会迷失方向，就会走上歧途。”历史学的创新，当然应该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同时，学术创新，一是必须符合客观实际，对于历史学来说，应该符合历史实际；二是应该正确地对待传统。对传统必须作辩证的、科学的分析，好的就坚持、就继承；坏的或者错的就否定、就摒弃，并用新的观点、新的结论取而代之，学术就在这种辩证对待的过程中得到发展，得到前进。

一是要坚持“在学术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研究丛刊》对书稿的取舍，除了坚持“二为”方向即“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方向的政治前提外，惟一的标准就是学术水平。除此之外，作者的职位高低、资历深浅、声望大小、辈分长幼以及与工作人员的关系亲疏、人情往来之类，一概都不应成为影响学术判断的因素。我们深知，此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有相当的难度。但我们必须这样做，才能体现学术的公平和公正，使已经受到某些污染的学术净土尽量保持自己的纯洁。所谓学术水平，当然不是抽象而不可捉摸的。我们希望，收入《研究丛刊》的著作，在选题上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在内容上有原创性的独立见解，在方法上能做到观点和资料的统一，在文字上清新流畅，尽量体现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这样的作品，我们是万分欢迎的。

还有一点，就是要坚持“双百”方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是一点不错的。就学术来说，没有不同学术观点之间的相互切磋，相互讨论，相互争辩，学术就不能进步，更谈不上学术的繁荣。梁启超就曾说过：“学问非一派可尽。凡属学问，其性质皆为有益无害，万不可求思想统一，如两千年来所谓‘表彰某某，罢黜某某’者。学问不厌辩难。然一面申自己所学，一面仍尊人所学，庶不至入主出奴，蹈前代学风之弊。”（《清代学

术概论》）在这里，梁启超不仅讲到了“学问不厌辩难”的道理，而且还讲了学术论辩应抱的态度。确实，在学术界，恐怕还不能说“双百”方针已经贯彻得很好了。过去，有政治上“左”的影响和干扰，但这个问题现在似乎已不是个问题，我们已经有了一个良好的学术大环境。

因此，有一个正确态度去对待学术争鸣，就显得尤其重要。如果在不同学术观点之间，能够怀着追求科学真理的目的，抱着相互尊重、相互学习的态度，采用平心静气、充分说理的方法，具有海纳百川、虚怀若谷的学者风度，那么，学术争论愈充分，学术气氛就愈活跃，学术研究就愈深入，学术队伍也就愈加团结。我们愿意为形成这样一种民主和谐、生动活泼的学术氛围尽自己的绵薄之力。

《研究丛刊》的成败，说到底，在于学术界乃至广大读者的关心和支持。我们热切地期待这一点，并且将用我们的工作来努力争取这一点。

2003年8月8日

再版前言

戴　逸

郭影秋校长已经离开我们二十年了，但在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工作的同志时刻怀念他崇高的品德、卓越的才能、渊博的学识以及实事求是、关心群众的工作作风。尤其在国家启动了清史工程，组织了机构，集中了人才，编纂工作正在紧张进行，每当遇到各种行政上、组织上、学术上的巨大困难的时候，我便会想到影秋校长。他的身影便会显现在我的脑海中，当年他对我耳提面命的教诲也不时重现，这鼓舞着我的信心，使我振作起精神，增加了我的力量。对影秋校长的人品、才能、学问的崇敬和思念，成为推动和鞭策我努力工作的动力。

编纂清史的工程是老一代共产党人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等的愿望，早在20世纪50年代即已提出，1965年秋被筹划付诸实施。党中央命周扬同志在中宣部部长会议上专门研究实施方案，决定成立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任命中国人民大学常务副校长、清史专家郭影秋为编纂委员会主任，关山复、刘导生、尹达、刘大年、佟冬、戴逸为编纂委员会委员，并在中国人民大学设清史研究所，开展筹备工作。当时全国正在进行“四清”运

动，影秋校长已率领教工学员到京郊苏家坨前沙涧西山农场领导搞运动，副校长孙泱同志参加了中宣部的会议，并亲到我的家中转达中央的决定，和我商议筹备工作。不料时隔不久，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出笼，掀起了“文化大革命”序幕，一场风暴席卷全国，干部被打倒，各级机构瘫痪，国家建设工作陷于停顿，计划中的清史编纂工程也就不幸夭折。影秋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蒙受了巨大的打击和灾难，长期被关押批斗，身心备受摧残，以致病魔缠身，辗转病榻，长期未能康复，终于1985年逝世。

影秋同志虽被任命为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但由于突然发生了“文化大革命”，机构没有成立，工作没有开始，所以毕其一生，他未能践履其职务。但他始终关怀清史编纂工作，竭力为修史工作做重要准备。他预见到国家发展不会从此停顿，正常工作迟早会恢复。所以中国人民大学虽然在1969年被解散，人员下乡劳动，但在影秋同志的建议下，学校教工均成建制地分到各个单位，避免了专业人员分散流失，这样就集中保存和保护了大批教师，特别是历史教员。也是在影秋校长的建议下，凡是中国历史教研室和世界历史教研室的教员都集中在一起，不可分散，他还从哲学系、法律系、档案系、语文系调进了一批教师，1973年我们从“五七干校”回到北京，建立了清史研究小组，附设在北京师范大学中开始研究清史，他还亲自担任清史研究小组组长。这一不寻常的举措表明影秋同志牢记党的嘱托，他认为一旦“文化大革命”过去，天朗气清，修纂清史的工作必将恢复，工作可以顺利进行，这可以看到影秋同志的深谋远虑和良苦用心。2003年当党中央再次决定启动清史工程以后，一支训练有素的专业人才队伍已经形成，立即可以投入工作。如果没有影秋同志当年的远见卓识和不凡举措，如果人才长期分散不能从事研究，这次清史工程的启动必定会举步维艰。

1978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校，清史研究所正式成立，作为校领导的影秋同志，又抱病参加清史研究所成立的会议。此后，所里的工作一直受到他的重视与指导。他常常听取所里的工作汇

报，并就研究方针、研究方向和研究规划，做出切合实际的指示，一些重点科研项目，如《简明清史》、《清史编年》，就是在他的倡议和帮助下编写的。他还就《清史编年》的体例和内容，多次与我们谈话，又亲自为该书写了序言。

从影秋同志建议设立清史研究小组到决定成立清史研究所，直至他病逝前的年月，尽管缠绵病榻，他一直在关心着清史研究所的工作与清史研究事业，曾多次约我面谈，谈话内容大多是有关清史研究的问题。通过多次交谈，我更加深入地了解了作为历史学家的影秋同志，深深感到他读书甚多，博闻强记，知识丰富，有深刻的洞察力，分析事件、评价人物时，独具卓识。他最熟悉明末清初的历史，和我谈过李自成、张献忠、崇祯帝、史可法、张煌言、郑成功、李定国、孙可望、多尔衮、范文程等人，谈到明朝何以失败，清朝何以兴起，谈到农民军的重大失误和归宿等等。他熟知历史上各个人物的经历、性格、才能、优缺点，做出许多很有见地的分析，娓娓而谈，如数家珍。他掌握的史料极为丰富，不少稀见的稿本、抄本，是我闻所未闻的。他给我介绍书籍的作者、卷数、版本、收藏单位、内容梗概以及自己的评论，使我深受教益，终身难忘。

影秋同志之所以能对历史典籍如数家珍，对许多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有独到的分析和见解，就在于他无论是在戎马倥偬的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岁月繁忙的党政领导工作中，都始终不废读书治学，写诗填词，撰写著述。《李定国纪年》就是影秋同志研究明清史的代表作，该书凡二十余万言，以丰富翔实的史实，记述了明末农民起义军领袖李定国一生的光辉业绩，是书正文自庚午年明崇祯三年（1630 年）（李定国十岁）起，至壬寅年清康熙元年（1662 年）李定国（四十二岁）逝世止，按年月汇集了李定国一生的资料。同时，又简要地记述了明末清初全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有关资料。凡引用资料，均注明出处，并对有些资料加“案”提出自己的看法。另外卷首刊有关于李定国事迹的地图、照片及文物拓片；书后又附录了关于李定国的多篇传记及评述。该书虽名《李定国纪年》，其内容实际上则

是大西军的编年体战史，是国内外第一部全面、系统的关于大西军及其领导人物的史料性专著，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此书的显著特色是：其一，坚持唯物史观评价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该书卷前冠有作者写的长篇序言，其中论述了他为什么要整理大西军和李定国的史料，怎样评价李定国这个人物，如何整理史料，在对这些问题的论述中处处闪烁着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方法。在论及史料整理时，作者也一再强调要从史料的表象中，弄清历史事变的内在的本质的联系，以揭示历史事件的规律。其二，搜罗宏富，考订精审。全书广征博采，搜罗各种文献典籍多达一百余种，诸凡正史、野获、稗史、文集、笔记、奏议、方志、揭帖、碑铭，一一涉猎，从中辑录的史料多至数千条，再经削繁就简，细致考订，去伪存真，审慎取舍。从中可以窥见作者深厚的学术造诣和扎实的考据学功底。其三，史论结合，勇于创新。该书虽然是一部史料性专著，但绝非仅仅停留在对史料的编排整理方面，对诸如怎样恰如其分、实事求是地评价大西军、大顺军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克服厚此薄彼的偏颇之见；对李定国这个杰出的历史人物的个人特点和历史作用，首次做出比较全面的评价；对明末农民军联明抗清的战略转变，以及李定国和郑成功的联合抗清等问题均做出深刻的揭示和论述，较之前人的研究多有创新，其中不少看法和见解为明清史学界接受与采纳。本书于1960年由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首次出版，至1961年11月前后印刷四次，反映了其甚受史学界欢迎。因其出版已久，目前，不少想阅读利用这部著作的读者都苦难觅求，因建议再版重印。

历史学研究像其他学科一样，伴随新史料的发现和研究视野的拓展，以及研究角度、研究方法的更新，总是不断地发展与前进，而清史研究的发展与繁荣又尤其突出。《李定国纪年》是一部杰出的著作，但毕竟是四十多年前的著作，加之，作者撰写此书时，又正处在频繁发生政治运动的环境中，这些带有极左倾向的政治运动，也势必在意识形态与学术研究中有所反映。影秋同志是一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学术研究中有着冷静的头脑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但受时代条件的限制和客观环境的影响，

这部著作也难免留有时代的烙印。对此，既毋庸讳言，也不应苛求。鉴于作者早已过世，书中的观点与史料上的某些不足，已难以修订纠正，再版时只能保持其原貌，读者在阅读中当会有自己的分析与评判。另需说明的是，影秋同志曾公开发表有《谈郑成功和李定国的关系》及《论李定国坚持西南抗清斗争的历史作用》，这两篇论文与此书主旨吻合，且相辅相成，故一并附录于后。

还需指出的是，影秋同志对明清史的贡献，不仅仅表现在他个人在这一领域的学术研究成就方面，还突出表现在其推动和组织清史研究，贯彻中央编纂清史的决定，积极组建清史研究机构，指导和确立清史研究项目，以及关心和爱护清史研究工作者，组织清史研究队伍，积蓄学术力量等方面。所以，我不久前在一次关于清史编纂体裁体例的学术会议上说过，影秋同志始终坚持搞清史，他对清史编纂功不可没。我们今天理应从影秋同志对清史研究的贡献中汲取力量，努力把清史的纂修工作做得更好！

序　言

这是一本不太完备的资料书。编者的用意是想为重新编写大西军杰出人物李定国的历史，提供一些资料。工作开始，也曾考虑到先做史料辑录工作，然后再根据主要史料进行分析整理。由于关于大西军和李定国的史料此较零碎繁复，究竟怎样辑录才能成为有用的东西还待研究，所以先把一些重要材料汇集起来，稍加编整，作为研究大西军及其杰出人物的初步提纲。这个方法比较简便，对于历史人物的研究工作也许会有一定作用。

书的名称叫做《李定国纪年》，它的主要内容却是大西军战史编年。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从一支农民起义军的成长看到它的杰出人物的成长；同时，也可以从一位杰出人物的艰苦斗争看出一支农民起义军的发生、发展及其败灭过程。即使是这样，对于一个历史人物的认识也还有一定的局限性；因为，历史事变的一般方向只能由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来决定，而不能由某一支突起异军或某一个杰出人物来决定。离开了生产力的发展以及依此种发展为转移的生产关系的状况，历代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一些根本性的问题，将无从得到解答。所以，光从一支农民起义军

和某些杰出人物的活动里找因果也还不够，重要的是透过他们的活动找出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及其普遍原因。

研究历史人物的第一步工作，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待史料。一般的史料整理工作很重要，两个朝代接替时期的史料整理工作更加重要。在那些时期里，生产斗争虽然是停滞的或者是暂时衰替的，但是阶级斗争或统治阶级间的内部斗争则是十分尖锐的。这种激烈的阶级斗争所反映出来的劳动人民的先进思想，经过概括和总结，在一定条件之下，便表现为推动历史发展的主要的、决定的因素。遗憾的是，这种史料保存得并不太多，在所谓“大变乱”的时代里，大部分材料埋没了，一部分列入帝王将相的“嘉言懿行”了，还有一部分散为稗史、野获或某些人的随笔和语录。古代的史籍尽管浩如烟海，但其中很少有比较完整的人民自己的斗争史料，当然也就难以正确反映人民历史的真实。

宋末、元末、明季、清季的几次农民大起义，都是广大劳动人民思想最活跃、斗争最勇敢的时期，也是人民群众创造历史有突出贡献的时期。把这几个时期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史料整理起来，不只对于研究“农民起义”这个专题有好处，而且对于研究古代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也有好处。这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虽然它不是当前历史研究中最最重要的工作。

在这篇序言里，想说明三个问题：第一，为什么要整理大西军和李定国的史料？第二，怎样评价李定国这个人物？第三，关于整理史料的一些意见。

一

李定国是明末农民起义军领袖，杰出的抗清民族英雄，他的史料应该受到重视。同时，他的史料只是大西军的史料的一部分，要弄清楚他的史料，必须同时弄清楚大西军的史料，这是一。其次，弄清楚大西军的战斗史迹还有一个副目的，那就是替

张献忠“翻案”。本来，带有根本性的大案是用不着翻的，张献忠是农民起义军的领袖，十七年间一直忠于农民军并为之献出了自己的生命，铁案如山，任何人也抹杀不了。值得注意的是：近来有些人编写明清之际的历史，往往只提大顺军、李自成的作用，不提大西军、张献忠的作用；即使提了出来也是为了接受教训，并不把它的积极作用放到应有的位置。这样，不只不能消除广大人民对于大西军的误解，而且无形中勾销了一支转战十六省、浴血十七年（前后三十二年）、一度达到百万农民参加的农民起义大军的雄伟力量。这对于维护历史的真实，用人民的历史教育人民来说，不会有什么好处。

明末农民起义军开始号称“十三家”、“二十四家”、“三十八家”，到后来却只有两大家：一家是李自成领导的大顺军；一家是张献忠领导的大西军。这两家劲旅，在崇祯八年（1635 年）以前，常常联合作战；自崇祯九年（1636 年）夏季高迎祥战死以后，则完全各自独立作战。大顺军的活动地区，基本是黄河流域以及川东和川北；大西军的活动地区，基本是长江流域以至川东和川南。这一家的胜利，有时挽救了另一家的危机；另一家牵制明军兵力多些，也恰恰支持了这一家的大发展。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张献忠一直是明军攻击的主要对象。明军最大的一次“剿局”，即所谓“四正、六隅、十面网”之策，基本上是被以张献忠为首的农民起义军彻底粉碎的。因此，只看到李自成进了北京，只看到李岩献策起了收拾人心的作用，而看不到或完全忽视大西军浴血苦战对整个战局所发生的影响，那是不妥当的。

“流贼嗜杀”，这是地主统治阶级诬蔑农民起义军的一种宣传口号，对张献忠如此，对所有的农民起义军莫不如此。李自成的“恶名”，本来位列张献忠之上（参见《明史·流寇传》），可是广大农民为什么会跟他一道进北京？这就大费解释。有了李岩献策，进北京的道理说得通了，李自成的名誉也大体上恢复了，而张献忠的一笔冤枉债，却直到现在似乎还没有还清。关于李岩献策的问题，一般有两种看法：一种是认为他是一个比较进步的文人，曾经秉承农民军的意旨编拟了几条宣传鼓动口号；另一种看

法，却把李岩捧得过高，认为他比农民军更能正确地反映广大农民的要求。后一种看法无疑是不恰当的，因非本文所及，不多讲。这里只就关于张献忠“嗜杀”的问题说几句话。

张献忠所领导的农民起义军为什么要杀人？这是不难理解的。地主统治阶级利用他们的统治特权，用各种各样的手段残酷地杀害劳动人民，这一笔血债，农民心里是有数的。当他们一旦挣脱了枷锁，掌握了武装和政权，必然要用自己的力量扫除旧制度，建立新制度，必然要遭到地主统治阶级的坚决反抗，于是也就必然形成异常激烈的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大西军在四川因为革新太急，它所遭到的反抗是严重的，为了巩固自己的胜利成果，对于地主统治阶级进行一些报复性的打击以至于出点岔子，很难完全避免。刽子手洪承畴“围剿”起义饥民，“四年斩首三万级”；清兵南下，只在扬州一城就杀人八十余万（参见《扬州十日记》），他们杀人不是比张献忠更凶吗？为什么不使人民牢记着那些血案，反而要把张献忠的“天性嗜杀”弄得深入人心呢？有人说张献忠杀人“太多、太乱”，不是农民起义军的本色，这种看法实际上是对于地主统治阶级的谎言过分迷信。农民军杀什么人，不杀什么人，界限本来是清楚的，下边引《续绥寇纪略》上的“除五蠹”一事为例。

崇祯十四年辛巳正月，彭县“豪民”王纲、王纪，倡议除衙蠹，鸣铜（锣）集众，尽毁衙役家，各州县闻风而起，曰“除五蠹”。一曰衙蠹，谓州县吏胥皂快也；二曰府蠹，谓投献王府、武断乡曲者也；三曰豪蠹，谓民间强悍者也；四曰官蠹，谓缙绅家豪奴恶婢也；五曰学蠹，谓生监包揽词讼、生事害人者也。或捶击立死，或糜烂鼎釜，或活埋于土窖者不可胜计。新繁等县，多蔓延不解，至发兵征讨乃罢。成都人亦效尤，院司慰谕不从，引兵击之，众溃乃就“抚”。

这段记载，把起义农民（统治阶级叫他们做“豪民”）打击的对象交代得很清楚。在有关张献忠的记载中，如“占武昌”、

“破重庆”、“里仁会”、“土暴子”等条，同样可以看出张献忠杀人也是有界限的。如果说这还不足以说明大西军的情况，那么刻在石头上的“大西驳骑营都督府刘禁约碑”碑文（见本书大西大顺二年条），已足够说明这一个问题。

“大顺二年三月”，正是史书所载张献忠从成都分军四出，“大肆杀人”的时候。依据《破山禅师语录》所说，在这一时期中，光在成都周围就杀了六亿四千余万人，川南、川西各地杀的还未计算在内。这个无稽的谎言，本来是不值一驳的，可是三百年来，士大夫阶级辗转传抄，以假为真，就连堂堂《明史》，也直书张献忠在四川“杀男女六万万有奇”。载之史书犹不足，还伪造了一通“七杀碑”，硬说张献忠“一日不杀人，则郁郁不乐”。地主阶级的文士们竟卑鄙到这般程度！

明清之际，经过清朝入侵，明军屠杀，天灾流行，农村破产，人口大大减少，这是事实。但是这笔债应当记在明清统治阶级的账上；不能记在、最低是不能统统记在农民起义军的账上。农民军在革命战争中间，因为没有先进的工人阶级的领导，对杀人的控制不够严，加以混入分子（如汪兆龄）的从中破坏，在对地主统治阶级的报复打击中，间亦波及平民和兵士的情况是有的，但那不是主要的。我们可用统治阶级自己的话来说明这个问题。明兵科给事中李永茂在《奏报察过沙南平广四县疏》中写道：

> 自戊寅至今，五载灾荒，士民之死于奴酋、土贼、疫饥、差徭者，已十分之九。即本年稍稍告熟，而东作无人，西成安望？其时亦有子衿十数人来见；率皆鸠形鹄面，百结鹑衣，臣周旋之际，不觉泪落沾襟，盖不意辇毂之下尚有此魍魉世界者也。

又于《奏报察过钜鹿任唐三县疏》中写道：

> 凡此以该县之地，皆冈卤沙茅，兼以四季蝗旱盗疫，民亡十九，其荒凉之状，不异沙河。（上二疏俱见李永茂：《邢襄题稿》）

上列几县，都是“辇毂之下”的重地，张献忠所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并没有在那里活动多久，可是士民之死于奴酋（清兵）、蝗、旱、盗、疫者也达“十分之九”，这不就找到杀人的真正凶手了吗？不能忘记，杀人最多的刽子手，还是明清豢养的所谓“官兵”，他们惯于“杀妇人首，谎报军功”，“入城之后，十日封刀”。这比之“‘贼’所到之处，饥民相率从”，真是不可同日语。

有人说，张献忠入川以前，杀人也许很少，入川称帝以后，杀人确是很多；当时身历其境的费密、沈荀蔚的记载，还是应该尊重。我以为这种看法也还值得研究。张献忠入川以后，确实杀了一些“民望”，其中包括私通朱明的“降官”，聚众为乱的“乡绅”，诋毁新朝的“诸生”，私藏明宗室的“僧道”等等。但是他所杀的毕竟只是少数人，而费密、沈荀蔚的记载里所能道出姓名的也只是那些少数人。不用说费、沈诸公跟大西军有深刻的阶级仇恨和杀父之仇，他们的笔底下不可能反映出真实情况；即使他们的记载也有几条是目睹的（绝大部分是道路传闻），那也不足以说明张献忠杀的人比地主武装杀的人更多。如果有人把当时地主阶级残杀饥民的情况记载下来，其篇幅一定会十倍于费氏的《荒书》和沈氏的《蜀难叙略》。

四川人死亡最多的时期是在清兵入川以后。从大西大顺三年（1646 年）到清康熙三年（1664 年）的十八年间，四川是一个犬牙交错的三角斗争局面：清兵据川北，农民军十三家据川东，明军残部据川南、川西（后为大西军所代替）；它们之间，有时据地自守，有时展开拉锯战；胜则“掠民为兵”，败则“驱残民以走，尽杀之”（清将梁一训）。农民一部分死于战争，一部分死于灾荒，一部分逃入湖广、滇、黔（见本书永历十三年条），再加以此后数年的吴三桂之乱，遂致四川人口一减再减。清朝统治阶级征服全川以后，为了逃避自己的杀人责任，把这一笔账索性都记在一个死人（张献忠）的头上，对于大西军的建树全部抹杀，对于大西军的作为肆口丑化，直至献忠死后的第九十七个年头，清朝皇帝的走狗们还忙着打碎他的诗碑及遗像（参见《陇蜀余闻》及《蜀辅日记》）。经过几十年以至上百年的努力，地主统治阶级

终于建成了自己的意识形态方面的上层建筑。这个上层建筑，直至今天还在某些人的脑子里发生作用，真是历史上的一个悲剧。

总之，张献忠所领导的农民战争是为了被压迫、被剥削者的利益而进行的。尽管张献忠的一生中，特别是称帝以后，因胜利冲昏头脑，在某些作为上有缺点、有错误，然而他的主要方面，即战争的正义性方面，是不容抹杀的。列宁曾经这样说过："历史上常有过这样的战争，它们虽然带来了必然伴随一切战争而产生的种种惨祸、暴行、灾难和痛苦，而终究是进步性的，即它们是有利于人类发展的，它们曾帮助破坏那些特别有害和反动的制度（如像专制制度或农奴制度），曾帮助破坏那欧洲最野蛮的暴君制度（土耳其的和俄国的）。"用这个观点来看张献忠所领导的大西军，那就会把根本性的是非弄得更清楚。

大西军这一支武装，在地主统治阶级的眼里是糟透了，但在农民群众的眼里却是好得很，张献忠的遗像能在梓潼保存九十七年，"李晋王庙"能在川中保留将近两百年，这都不是偶然的。《蜀典》卷一《李晋王庙》一条有云：

> 蜀中多有李晋王庙。澍宰兴文县，西门外龙王庙旁即晋王庙，土人祀之甚谨，咸以为李克用也。杨蓉裳员外修通志时，辨其决非鸦儿，仍不知晋王之果为谁。余谓明末封晋王之李定国也。定国与十八先生同谋可望，不幸谋泄，十八人者同死，而定国始终为桂王，百折不降，旁皇交趾境上，祈死以没。其人虽流寇出身，而其行乃卓荦，在蜀时必有保境惠民之政，故民德之，而立祠者多也。屈大均过李献武王祠诗曰："从来赐姓者，只有晋王贤！"即谓定国也。

这一段话，是清朝嘉庆年间，兴文县的一位县官张澍写的。张澍的论断是否完全正确，我们且不去管它，但却提出了一个问题：蜀中有很多李晋王庙，而这个"晋王"有人以为就是李定国。这说明李定国及其所领导的大西军，在劳动人民的眼中并不是那么可怕的。如果他们像地主统治阶级的史书上说的那么可

怕，人民就不会为他立庙存祀；即使有了“李晋王庙”，人们也决不会联想到“张献忠义子”李定国的身上去了。

还有一个问题需要提起研究。我们知道中国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历来都跟宗教会门有或多或少的联系，多次农民战争，都利用宗教会门作为掩护活动、组织力量以及鼓舞人心延续起义力量的工具。明末的农民大起义，去白莲教徒徐鸿儒所领导的农民起义为时不远，因此，农民起义军和宗教会门之间似乎应有一定的联系。李自成以“十八子，主神器”的谶语号召群众；四川广安“白莲妖人”何加起，号称老佛，聚众数万（参见《欧阳氏遗书》），应该说是这种联系的一种形式。可是在有关张献忠的记载中，这一类的材料比较少，相反，记载他忤天谩神的故事却有几处很突出。例如：张献忠破重庆，将杀明瑞王，会天大雷电，张献忠说：“我杀人与天何干?”架大炮击天，结果还是杀了瑞王。又如：张献忠在武昌及成都的时候，曾经杀过僧道（参见《荒书》、《天香阁随笔》）；北征保宁，也曾强迫过和尚（破山禅师）破戒吃狗肉。对于这些，有人说是出于张献忠“个人硬干”的性格，我们宁愿看做他所领导的大西军对于宗教会门的关系并不那么密切。当然，他这种做法，在当时很难得人谅解，孙可望、李定国等一人云南，就和佛教结了不解缘，大刻佛经，大修佛寺，大概是在“矫献忠之失”吧。我提出这个问题，并不是想论证张献忠是否信佛或信道，只是想说明在阶级矛盾尖锐化的时候，就是不采用宗教会门的形式，同样是可以组织千百万农民来对地主统治阶级进行较长时期的革命战争的。阶级冲突是农民起义的本质，宗教会门是农民起义常常采用、但有时也不采用的一种形式。大西军的觉悟虽然还未达到摆脱宗教迷信的程度，但在一定形势下，也可以在“扫除贪官污吏”或“霸占土田，查还小民”等口号下行动起来，这充分说明了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进程的基础和动力。

这个序言主要是论李定国的，对张献忠的问题本来不应该写得这样多，可是这关系着李定国前半生的历史，也关系着整个大西军的历史，不说清楚不好，阅者当能谅解。

二

李定国生于1620年，死难于1662年，在他生存的四十二年间，是一个伟大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时代。“时势造英雄”，“卑贱者最聪明”，他就是这个时代中，出身微贱的杰出的英雄人物之一。定国死难后二百九十七年来，私史为他作传的不少，“官书”为他作传的只有《清史稿》中的一篇（如算上《小腆纪年》及《腾越州志》的各一篇，共三篇）。所有的传都是毁誉参半，其间只有分量上的差别。毁他的说他是“起身群寇”，誉他的不外说他是“尽瘁明室”。不管是毁是誉，对于人民历史都有或多或少的歪曲。对于这样一位杰出的民族英雄，弄清楚他的历史发展的主要情节，是十分必要的。

李定国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同时也是大西军的一生。他追随和领导革命的大西军，战斗三十二年，转战秦、晋、豫、楚及川、滇、黔、粤等十五六省，在复明抗清的伟大斗争中，无数次地取得辉煌战果。直至兵败途穷、疫发病革的时候，还嘱咐他的儿子及部属说：“宁死荒外，勿降也!”他不只是一个坚持抗清的杰出英雄，而且是一个具有政治头脑的军事家、政治家。我们今天来议论历史人物，不只不应以成败论英雄，而且也不能专凭几篇文章来论英雄。当然，《满江红》和《正气歌》，可以代表一个民族英雄的豪迈气概，我们应当歌颂；可是对于一些出身卑贱、朴野无文、矢志抗敌、至死不屈、最后没有留下《满江红》和《正气歌》的英雄人物，也不能让他们泯没无闻。人类历史，毕竟是人民群众的历史，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毕竟是封建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不把农民领袖和民族英雄的史迹放到应有的地位，那是不公允的。在历史工作中已经注意了岳飞的历史，郑成功的历史，李自成的历史以及太平天国的历史，我认为还应该注意大西军和李定国的历史。表彰李定国的史迹并不是宣扬个人崇拜，因为李定国这个人物，始终代表着大西军的利益，代表着被压迫人民的利益。他是千百万革命农民的化

身，确实值得我们歌颂和崇敬。

历史上每一个杰出的英雄人物，都有他们自己的头脑和性格上的特点。这种特点，虽然只能改变事变的局部外貌而不能决定事变的一般方向，但它在人类历史的发展上终究起着一定的推动作用。它的直接作用，是使事变的某些局部后果改变样子；它的间接的深远的作用，是使后一辈的人的斗争智慧和斗争知识得以不断发展。我们评价历史人物，必须深刻分析他们的个性特点，这样做，“并不是说他能阻止或改变客观自然事变进程，而是说他的活动是这个必然和不自觉进程的自觉自由的表现”（普列汉诺夫：《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

李定国的个人特点很多，突出的有下列四点：

定国一生最大的特点是“大节无亏”。当阶级矛盾极为尖锐的时候，他能和广大农民一起，揭竿而起，武装自己，推翻地主统治阶级的统治。当清兵入关，民族矛盾较之阶级矛盾更为突出的时候，他能联明抗清，严辨中国和民族敌人的界限。当兵败势危，大局无可挽回的时候，他能像中国历代的“志士仁人”一样，见危授命，至死不屈。其中最艰苦的转折是由“推翻明室”到“联明抗清”。他和地主统治阶级战斗了二十年，打得明朝的小皇帝几乎没有一兵一卒，但在必要情况下，又能坚持“联合明室，恢复中原”的主张，没有坚定的意志，远大的战略眼光，是万万做不到的。我们且看他在平定“沙乱”之后，向孙可望说的一段话：

> 闯、献两帝，辛苦二十年……至今身死业隳，究无寸土，而□□（清人）坐享渔人之利，甚可悲也！吾辈本“大明臣民”，中国沦陷于外寇，则当严辨华“夷”之界，以中国为主，今举滇、黔、蜀“归就”明室，诚心辅佐，恢复旧京，廓清海内，将来……竹帛之垂名可图也。（刘彬：《晋王李定国列传》）

这一段话，出自一个农民将军之口，是很不简单的。尽管文

人的记载有不实不尽之处，但是李定国的一生行为，证明他是能够说出这段话并且能够用实际行动来兑现的。我们谈到历史上的民族英雄，对于“直捣黄龙与诸君痛饮耳”这句话很欣赏，但那只是一句豪语，并没有这段话这样沉痛、明确。后来他和孙可望的决裂，首先也就是在“联明”或“排明”政策上的决裂。孙可望原先是接受“联明抗清”的政策的，他在争取杨畏知、沐天波共同抗清，争取朱明承认“秦王”称号等问题上，确是做了很多的工作；及至东进贵州，全部占有滇、黔二省之后，竟自听信明臣马吉翔、任僎等的挑拨，想将明朝小皇帝一脚踢开，自谋禅位改号。在这一点上，定国是不能同意的。孙可望为了拔除眼中钉，想在沅州会议上来一个“伪游云梦”之计，于是孙、李之间的内部矛盾便发展成为对抗性的矛盾，只有用“交水之战”来作为解决冲突的方法了。

这里还应当补充说明一点，李定国坚持“联明”，并不是他对地主统治阶级有什么幻想和好感，不过想借明朝“三百年天子之名号”以收拾人心而已。这时蜷居粤西（后在安龙）的桂王，虽然已经势穷地蹙，无能作为了，然而以“拥戴明室”为名的旗帜还到处都是，远之如雄踞东南的郑成功、张煌言，出没郧、襄、巴西间的郝、李十三家；近之如在川、滇、粤西一带和“四将军”并肩作战的滇军赵印选、胡一青，明军宿将的“三马”和张光翠等等，都还拥有一定势力，联系着很多群众。如果不讲联合，四面出击，没有问题是会削弱抗清力量，增大敌人各个击破的空隙的。联明抗清，确实是当时的全国人民的最高利益，尽管农民军的英雄们对于腐败透顶的明室并不是那么满意。关于这个问题，在孙可望给清朝的揭帖里道出了他的看法：

> 嗣以救奉永历，不过念食先德，不忍视其颠沛，虚拥以循名分，私拟尚可比于桓、文。故历年收拾士民，训养士卒，不过期保所得之土地耳。（《明清史料》丙编第八本）

在孙可望看来，“救奉永历”，只是为了保有所得之土地，并

不是向朱明投降；而在李定国看来，除掉保有土地之外，还有中国和“外夷”的界限。这一点后面还要谈到。由于李定国坚持了“联明抗清”的政策，所以明朝的将领们都愿意俯首听命，为抵抗清兵而效力；明朝的士大夫们也欢欣鼓舞，趋赴滇都。足见“联明抗清”的政策，在当时曾经起过重大作用。三百年来，人们一直称赞李定国是一名大大的忠臣，其实他所忠实的倒不是朱明的桂王而是亿万农民和中国民族。

我们考察一位英雄人物的“大节”，不能光从他们的伟言奇行上着眼，还必须从他们和人民群众的关系上着眼，李定国在这方面的表现也是突出的。他不只平时“在军中独以宽慈著”，“不以威凌士类”；即使在战斗情况极为紧张的时候，他也处处关心士兵的利益和战地群众（难民）的利益。史载他冲锋陷阵，总是走在部队最前面，退兵的时候常常以身殿后；三洲之败，“难民从之者数十万”，过横州桥，“抚难民哭号失声”；特别是在滇都撤退的时候，发布布告让人民赶快逃难，并禁止烧毁储粮，免得清兵到时“重累我小民”（《残明纪事》）。可见他对劳动人民的利益是很关心的，人民对于他也是很拥护的，他和广大人民之间的共同利益是“联明抗清”。

定国一生的第二个特点是处处“顾全大局”。这不是由于他的“独以宽慈著”的性格，主要地还是他具有从全局着眼的先进思想。我们可以举出许多例子。

当大西军占有成都以后，张献忠曾令定国为前军都督，率部北取汉中，结果打了败仗，累得张献忠亲自北征，才算保住了保宁（今阆中）。依据冯甦《见闻随笔》所载：张献忠北征归来，定功罪，以“张定国出汉中，败绩先逃，杖之百，降千总”。其实这次失败的真相是怎样的呢？后来由定国的旧部张某说得很清楚：

> 道旁田家，其人张姓，自言荆州人，幼为张献忠掠入蜀，属其前军都督李定国。北“寇”汉中，居数日，李自成部将贺珍，自京师败溃，走栈道以争汉中，定国弃城遁。（《蜀道驿程记》）

这一段话是由一个亲眼目睹的老战士口中说出的，当然比较可信。当时贺珍是败兵，“部众三千人”，力量自然不会很大。定国在十七八岁的时候就率“所部将二万人，随献忠驰突豫、楚”，这时所部，决不会少于贺珍；而且大西军据有全川，其势方盛，为什么一箭不放就拱手让城呢？我以为与其说是“败绩”，倒不如说是定国不忍同室操戈来得符合情理。如果说这个例子近于揣测，不足为据，我们还可以举出更多的例证。

“四将军”据有云南以后，孙可望自大，诸将都很帖服，只有李定国“桀骜不驯”，可望借故打了他五十军棍。可是定国怎样呢？“顿首谢，愿擒沙定洲以赎罪”。其次，定国于桂林、衡州之役，两挫清兵，可望听信谗言，将诳至沅州杀他。定国怎样呢？上书“自明”，请顾全大局。可望不听，不得已，“率部避之广西”。再次，定国从两粤回到云南以后，对可望还是不愿最后决裂，曾使白文选、张虎等一再议和，并亲自派人把可望的家眷送还贵阳。再次，潞江兵败以后，定国听说桂王已奔缅甸，他立即明确自己应该怎么办：率兵深入少数民族地区，“联络诸土司，筹饷练兵，以图恢复”。最后，定国听说白文选逃跑了，立即叫李嗣兴带兵去追，看看要打起来，定国赶快要嗣兴收兵，说，我们共同起义的老同事，只剩这么几个了，不能自己再打自己了。（这时只是内部决裂，还未发现白文选投敌。）这一类的例子还有，举此数点已足以见其一般了。定国心目中的“大局”，究竟指的是什么？在他给孙可望的一封“自明”信中可以看出来：

> 今虽“大局”稍有转机，而敌势方张，成败尚未逆睹，正吾侪同心协力，共策兴复之秋，不宜妄听谗言，自相残害，以败坏国家，愿明公深长思之！耿耿寸衷，指天为誓。（刘彬：《晋王李定国列传》）

很显然，定国所指的“大局”，是整个国家民族的利益，而不是一己的利益或单纯的大西军集团的利益。至于定国是否有托

言“大局”而自谋己私的地方，我们不愿做没有根据的揣测，只看他丢开十多万军队，“率部五万人避之广西”，就可以看出他对于这场纠纷的处理是很识大体的。

那么，是不是可以说李定国处处隐忍迁就，不敢坚持斗争呢？不可以。在重大的原则问题上，他是非常明确果断，丝毫不肯退让的。例如，来宾擒冯双礼，田州突张明志，交水破孙可望，浑水塘诛张胜，永昌平王自奇，孟艮杖杀贺九仪等等。对于已经变质转化为敌人的老战友，经过一再争取无效以后，他就坚决斗争，绝不顾及任何情面和危险。他一面很“宽慈”，一面又很严肃；顾全大局，绝非无原则的姑息迁就。

定国一生的第三个特点是远大的战略眼光。突出的一点是他时时刻刻地期望着和郑成功合兵作战。理想虽未成为现实，然而他的想象是合理的、积极的。

定国和郑成功的联系，自永历六年（1652 年）秋开始，至永历十五年（1661 年）冬止，前后九年间经常有信使往来。先约会师五羊，共谋金陵；后约扫清官阙，会盟畿辅；为了表示信义，定国曾经倡议结为儿女姻亲。在这场有意义的交涉中，定国一直很主动，对于郑成功的一再误期，虽然也有过讽劝、责备，但最后仍然希望他“枕戈靡懈”，共讨清兵。由此，可以看出定国谋虑深长，始终不甘以偏处西南一隅而告终。

1652 年春，定国东出湖广以前，他和孙可望曾经有过“三股兵马”的打算：一股出陕西，一股出湖广，一股出江西趋南京。后因刘文秀入川（1652 年）不利，北出陕西的计划受阻；又因衡州之役可望不肯并力，东出江西的部队（高文贵）亦不得不忍痛撤回。这时所谓三股兵马，实际上只有定国一股还有独立作战能力，不争取强大的外援，是很难完成恢复南京的计划的，这就是定国联络郑成功的基本指导思想。

定国东联郑成功有很多媒介，最初的媒介是瞿式耜的儿子瞿昌文。桂林收复以后，昌文曾向定国陈说“东南恢剿大计”，定国很高兴，想“任以粤西方面官”。这次陈说，对于定国确立打通西南与海上的联系的战略思想，可能有很大启发。及后，定国

挺进粤东，跟熟悉东南沿海情况的王兴、陈奇策、郝尚久等部有了接触，进一步了解了郑成功的兵力及其活动情况，于是跟郑成功“会师五羊”、共谋南京的愿望更日益强烈。

1654年秋，定国孤军深入，东围新会。这时，汉奸尚可喜、耿继茂屯据广州，洪承畴进据长沙，湖南大部及广西北部已沦入敌手，而孙可望复令关有才等屯兵田州，断绝定国归路。定国在四面楚歌之中并无丝毫畏怯，特书知会郑成功，约于十月半以前攻下新会，然后合围广州。这种决心与勇气，有它一定的物质基础：一是粤东的水师义旅，声势很盛（号称二十万）；再是郑成功的水师不远，据说“只在潮、惠之间”。设想当时郑成功出兵早些，会师新会，把粤东与闽海连成一片，那么，清兵对两粤的军事，就决不会轻易得手。这样设想本来是合理的，定国的错误在于过高地估计和郑成功的合作关系，三个月过去了，郑成功的水师还是没有消息，三洲一败，竟致两粤大局无法收拾。

定国致郑成功的书信想来很多，杨英《从征实录》、《海上见闻录》、《赐姓始末》诸作都记载了这件事情。这些书信，有的中途遗失，有的文字不传，比较可信的最少有下面几封：

一、永历六年壬辰年（1652年）秋，定国收复广西，杀伪王孔有德，遣使会师。十一月，郑成功遣效用官李景往广西约会师期。事载杨英《从征实录》，书不传。

二、永历七年癸巳年（1653年）孟夏，定国东攻肇庆，书请郑成功水师速发，并希望他不再误期。书载杨英《从征实录》。

三、永历八年甲午年（1654年）七月间，定国师复东进，谋攻新会，复遣人致书郑成功，说明攻击新会的理由，请他无论如何要在十月半以前派水师到新会，否则就误了大事。为了取得郑成功的信任，且愿与郑成功联姻；末后对郑成功的一再误期，提出责备。书载杨英《从征实录》。

四、永历九年乙未年（1655年），定国已偕桂王至云南，复致书郑成功说明入滇经过，并希望郑成功“枕戈靡懈”，准备将来再行会师。其书有云：“公其整帆饬旅，布号宣威，待我于长洋，把臂击楫论心，不亦快哉。”成功亦复书辩白失误约期的原

因，许以“指日北向”，并约定国：“鼓行迅击，首尾交攻……扫清宫阙，□盟畿辅。”上二书，均载杨英《从征实录》。

由于定国与郑成功多次书信往还，有联盟抗清之约，故当永历十二年戊戌年（1658 年）十二月，清兵三路入云南时，他自前线奔回滇都，力劝桂王出楚，反对“幸蜀”或“奔缅”。他的看法是：“不如出楚之峒……安跸峒内，诸将设御于峒口，胜则六诏复为吾有，不胜则入交趾，召针罗诸船，航海至厦门，与延平王合师进讨。”

从定国致郑成功的书信中以及有关记载中，可以看出成功对于定国也是报馈殷勤的，直至永历入缅以后，他还经常派人探听“行在”的消息。最后的一次约师表到达缅甸时，已是永历十五年（1661 年）冬季，表落在白文选手中，定国始终没看到，这可能是李、郑之间最后的一次联络。

在将近十年的交涉中，定国对于郑成功的估价与期望一直是很高的。郑成功虽然也表示愿意合作，但在开始的一段时期里，出兵广东并不十分积极，及至清兵三路入滇，始乘虚入长江以捣清兵之后，无如时机已失，大势已去，对于西南以至东南的危局都无法挽救，这是一件很可惋惜的事情。

总之，定国东联郑成功的想法是正确的，并且一直是坚持的，虽然他在估计上不够准确，没有料想到郑成功正在跟清廷“议和”，“会师五羊”的想法不够很现实，以致在围攻新会的战役部署上有些毛病，受到某些“事后诸葛亮”（如李寄）的指责，然而他的远大的战略眼光，东进新会的壮举，仍应受到应有的重视。

定国一生的第四个特点是先进的政策思想。在这方面，我们还缺乏更多的材料，不过从零星的记载和他多次的战斗行动中，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首先是军事政策。在这方面有很多突出之点：第一，他善于团结少数民族的部队。在几次大的战役中，都是组织汉、彝兵联合作战，“象战”（少数民族部队的坦克）是他的特长。第二，善于团结抗清部队。他东出湘、赣、两粤的许多大战役，都是和明

军旧将、地方义师以及郑成功的水师互为声援的。第三，纪律严明，军行有五要："一不杀人，二不放火，三不奸淫，四不宰耕牛，五不抢财货。"以故大军所至，"军民相安"；战斗甫毕，敌方士卒即"欢呼迎晋王"。关于这个问题，各书记载很多，这里只举李寄《天香阁随笔》里的一段话，以见他在人民群众中留下的深刻影响：

> 明春，予至楚长沙，人皆言定国兵律极严，驻师半载，居民不知有兵，入市输买。定国所将半为猡、倮、猺、獠，虽其土官极难钤束，何定国御之有法也。

所谓"御之有法"，当然是士大夫们的皮相之见，这个"法"是什么？并不是定国有什么特殊的秘方妙诀，而是农民起义军的素质和传统。农民军的主干是"饥民"，他们都是不堪地主统治阶级的压迫、剥削而自愿参军的，他们忠于自己军队的程度，简直使统治阶级难以置信。明朝官僚颜继祖有一段形容农民军侦察人员（统治阶级叫他做"贼谍"）顽强不屈的话，十分生动：

> 是何含齿戴发之属，有凶暴残忍不畏朝廷，不惜性命，喜为贼用，甘为贼死，刀锯在前，略无恐怖，如此辈者乎！（《明末农民起义史料》）

定国部队的骨干，大多是这样一些坚决反抗地主阶级的农民英雄，至云南整训时，"秦人约有一万"（《永历纪年》），他们对于农民的切身痛苦是了解的，"不扰民"应当是他们的本质。（地主阶级大喊大叫，是因为损害了他们的利益。）再加以抗清教育与纪律约束，"御之"之"法"便这样产生了。

其次是民族政策。"四将军"到云南，是由少数民族头人龙在田等请去的。因此，他们和少数民族处得很好，这是很自然的。在入滇开始，虽然曾经和少数民族沙定洲部打过仗，但是，那不是汉族和少数民族的矛盾，而是农民的军队和少数民族头人

之间的矛盾。事实上，那一场战争，是有许多少数民族如龙在田、禄永命等部参加的。尔后，少数民族各部都和“四将军”合作，“输粮认饷，供械输兵”，直至云南大部陷落的时候，沅江一带的少数民族头人如那嵩、龙吉兆等，还和定国生死合作；孟连一带的土司，还向定国“耕田输粮，如郡县例”；车里一带的少数民族，还和定国“报馈殷勤，图谋共复云南”。这不能不说定国掌握少数民族政策的正确与运用的成功。

云南、贵州一带的少数民族，在明、清王朝的残酷统治之下，对于“汉人”并没有什么好感。自明朝中叶以来，差不多每隔十五年就跟汉族统治者发生一次较大的武装冲突。“四将军”带领的一支汉族农民武装，自1647年入滇至1662年最后失败，前后15年间，不只没有发生过大的民族纠纷，而且动员了大批的少数民族子弟跟随定国等北出川南，东下辰州，纵横两粤。特别是定国到了云南以后，虽然连年战争，人民负担已重，可是直到清兵大举进攻以前，境内还呈一片太平景象（参见《滇南纪略》），要说没有一定的政策作为各民族的团结基础，那是做不通的。对于这一点当然不能估计过高，但不作适当估计也是不对的。

再次是土地政策。土地问题是农民革命的根本问题，农民为了解决耕地和苛重的赋役问题才起来革命，作为农民自己的军队——大西军，对于这个问题，必须有相应的回答。可惜对于这一方面的史料是绝无仅有（当然也不是一点没有），现在把这方面的材料列举数点如下：

张献忠下湖南，发布檄文云：

> 所属州县士民，照常乐业，钱粮三年免征，军民人等，各宜投册归顺。（《平寇志》）

张献忠破武陵，下令籍刽子手杨嗣昌家，令云：

> 房屋风行烧毁，霸占土田，查还小民。（《骨董三记》）

“四将军”平定云南以后，定丁赋：

> 差人踏看田地所出，与百姓平分。田主十与一马。条编半征。人丁不论上中下，全征。(《滇南纪略》)

“四将军”在云南不断改进税法：

> 括近省田地及盐井之利，俱以官四民六分收。取各县工技，悉备其军，以备军资。(《滇考》)

从这里可以看出，大西军也和大顺军一样提出了土地及“免赋”的问题，虽然由于历史的限制，他们不能提出更多的东西，然而这仅有的几点已不能不对后来的农民起义发生深远的影响。“四将军”到了滇、黔以后，由于和地主统治阶级建立了“联明抗清”的统一战线，不能把“霸占土田，查还小民”的办法继续推广（即使他们战争完全胜利，也不会彻底采用这个办法）；又由于要出兵抗清，开支繁重的军饷，“免赋”的办法也未能认真执行。可是取之于民的税率仍是一再从轻的。以土地税而论，明初规定：“屯田，凡官给牛种者，十税五；自备者十税三。”(《明史·食货志》）后来民田实行“一条鞭法”，丁役“摊丁入地”，初行时还有便民之处，到了明朝末年就弄得摊派繁多，民不聊生了。定国采取“条编半征”，将“近省田地与盐井之利”由官民“对半分收”改为“四六分收”，可见他是在不断减轻农民的负担的。

最后说一下宗教政策。前面已经说过，大西军的前期和宗教会门的关系似乎不太密切，但至入滇以后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支农民军的领袖们几乎都和佛教有了关系。据现在已经掌握的资料，有秦王、晋王刻印的佛经（现存云南省图书馆），有蜀王（刘文秀）和鸡足山僧人的频繁往来（参见《鸡足山志补遗》），有孙可望部将王尚礼铸的大铜香炉（参见《鸡足山志补遗》）。他们奉佛的意图虽然有其个人打算，如：“上祈国主圣寿无疆，皇

图巩固；次冀文武曹僚品秩崇高，四海升平，民安物阜；伏愿自身康泰，福寿深长，子孙繁昌，吉祥如意者。”（王尚礼铸大铜香炉铭文）但是，这和当时云南人民的风习，特别是和有关少数民族（如傣族、白族）的风习不能毫无关系，尊重当地人民及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也许更易于和当地的少数民族和平相处。这样，对于佛寺的保护就成为必要的了。《鸡足山志补遗》卷四载悉檀寺藏李定国谕令云：

> 晋王李令谕：照得鸡足名山，滇西形胜。本藩西征既捷，便道进香，遵麓跻巅，游览已悉。惟是峰壑幽深，刹院不无倾圮，询之僧众，咸称近苦差役，因念其供奉香烛，出于常住，寺僧别无活计，什派宜与从宽，即或增加田赋，有司当为减豁。至于本山度牒，援纳已经通免，自后或有奸胥积棍，播害滋端，过往官兵，搜求践踏，许尔各寺僧人，指名启究，永为遵守，俱勿违，此谕。永历十二年六月十九日。

以时间论，这时正是清兵厉兵秣马、积极准备大举侵滇的时候，有人以为定国为此不急之务，似乎有些缺乏远虑，但是不注意宗教政策和搞好民族团结，往往会腹背受敌，危险更大，抓着这一点来说定国谋虑不周，似乎也有些过分。

李定国的缺点是有的，依据历史上各家的说法，如：“谋略策划不及可望”，“薄待可望旧部——新军”，“弛武备”，“不能杀一马吉翔”，“盘江之战失机不前”，等等。这些缺点可能是有的。但尽管有这些缺点或者更多一些的错误，他在一些重大关节上毕竟是正确的。古话说：“毋以一眚而掩大德。”李定国这个人物对于人民历史所起的积极作用，是应当肯定的。何腾蛟、张煌言之死，有些人称他们是“一代完人”，我以为把这个称号赠给李定国，也许更恰当一些。这是从比较来说的，当然李定国也不是那么完美无缺。至于说“不能杀一马吉翔”，且有时“出入二人家”（还有一个庞天寿），这也不是什么大毛病。马吉翔、庞天寿这两个人固然很坏，可是遍观明室诸臣，究竟又有那几个人更好一点

呢？马吉翔不好，倒是在缅甸殉难了。大学士张佐辰、尚书孙顺、将军马宝等人，可能算是“好人”了吧？清兵一陷昆明，张佐辰等一百五十九位卿相科道等官和马宝、马惟兴等将领都俯首就降。难道把大权交给他们反而会比马吉翔更好一些吗？郑成功对于定国的批评很中肯，说他“又不积粮储饷，以足民食”。但这是历史的限制，似亦不必据此以苛责于前人。李定国的失败，诚然是一个大悲局，但是他在这场失败中，始终没有动摇退缩，始终没有放松对于来自各方面的敌人的斗争。权臣压抑过他，清朝诱惑过他，部众责难过他，炎热、疫疠折磨着他，但他力排险阻，勇往直前，完全尽到了自己应尽的“人事”。这种勇敢无畏的精神，是永远值得称颂的。他所领导的大西军为什么跟中国历史上多次农民起义一样以失败告终？毛主席在关于中国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一段话里透辟地说明了这个问题。毛主席说：“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规模之大，是世界历史上所仅见的。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因为每一次较大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结果，都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因而也就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只是由于当时还没有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没有新的阶级力量，没有先进的政党，因而这种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得不到如同现在所有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正确领导，这样，就使当时的农民革命总是陷于失败，总是在革命中和革命后被地主和贵族利用了去，当作他们改朝换代的工具。”（《毛泽东选集》卷二，595 页，1952 年第 1 版）

根据毛主席的揭示，我们再来看看李定国的失败，问题就更清楚了。大顺军和大西军自清兵入关、战斗失利以后，明朝统治阶级无时无刻不想利用这支农民大军来作为他们保存腐朽统治的工具。大顺军的残部四十万人，跟他们混了几年，结果只剩“数万人”退回西山。大西军的这支力量虽然没被他们全部抓了去，也因受他们的挑拨离间，弄得元气大伤，终不免于失败。尽管如此，仍然不能抵消李定国领导的斗争对于历史发展的推动作用：第一，农民对于地主统治阶级、对于民族敌人的反抗是坚决的，

真正代表农民阶级利益的先进战士，是宁死不降的，在李定国身上体现了千百万农民的斗争精神；第二，李定国和大西军虽然失败了，但是李定国的后辈如少数民族女英雄陇氏，宁州的禄昌贤，昆明的张锜，大理的张义泰、梅阿四等等，还会继续起来和清朝统治阶级进行决死斗争；第三，由于广大劳动人民的前仆后继，反复打击，迫使地主统治阶级不得不对人民施行一些“善政”，这就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

三

下边我想简单说一下关于李定国的史料搜集与整理问题。

我所整理的资料，所得字数不多，可是先后参阅的史料却不算太少。我并不是对于“孤本秘籍”特别感觉兴趣，只是因为要弄清楚一个问题，就不能不掌握此较可靠的资料，所谓“第一手资料”。即在第一手资料中也有些是可信的，有些是一望而知其荒唐的。这就不能不做一些细致的分析此较工作：去芜芟杂，去伪存真，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当然真伪也是很难鉴别的，邓凯和定国是同时人，但他在《求野录》中对于定国每有微词；王夫之和定国虽然是同时但没有谋过面的人，他所写的《李定国传》，却是褒之者多而贬之者少。所以要找到有用的资料，光靠所谓“第一手资料”或“大量的史料”也还不够，重要的是要靠人们的治史观点。例如对于“十八先生”之死，就有种种不同的看法：一种看法认为孙可望是乱贼，“十八先生”是忠臣；另一种看法则认为“十八先生”做的坏事太多，从前搞垮过大顺军的旧部，现在又来挑拨孙、李之间的关系，这种人死不足惜。到这时候，我才懂得“观点与材料统一”、“观点统率材料”的意义及其重要性。如果没有正确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肯定不会找到有用的材料，即使能够搜集到一些资料，也将为芜杂的材料所淹没，而不能用以说明历史事变与历史发展的真相。我这里完全没有鄙弃史料的意思，只是说光有材料还不行，需要有正确的观点把材料统率起来。

史料经过挑选以后，如何处理这些史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我认为一个历史工作者，不只要善于挑选史料，在零散的史料中间穿起一条红线，而且要善于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彻底地分析批判、清理和改造这些史料，从芜杂的材料中抓住本质的东西，让它好好地为工农劳动人民服务。刘知几论史法，把“史识”提到一定的高度是有道理的。没有正确的“史识”，“史才”与“史学”都不会有像个样子的着落。尽管他看到了这一点，然而以前的史家由于历史及阶级地位的限制，不能把唯物主义运用到社会现象上去，因之在历史理论上必然产生两个主要缺点：一个是只会考察人们历史活动的思想动机，不能捉摸到社会关系体系中的客观规律性，没有认定物质生产发展程度是这种关系的根源；另一个是没有包括到人民群众的行动，没有用科学的历史眼光考察群众生活的社会条件，以及这些条件的变更。例如徐鼒编写《小腆纪年》，把明季以来的稗官野史和档案资料，分年分月地编排起来，用地主统治阶级的观点把它穿成一串，有的地方史料不足或过于接近真实显然对封建统治不利，便要加上几句“臣鼒曰”以引人入彀，这样，就使得大量零散资料系统地为统治阶级服务。正因为他的观点不正确，所以他的方法也有极大的片面性，这就使他编写出来的作品，只能看到零碎史料的表面联系，不能深入到历史事变内在的、本质的联系。只有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才能彻底地解决这个问题。

在史料方面，我的整理工作，显然有两大缺点：一则是限于客观条件及个人知识水平，有些材料没有见到，有些有用的材料，特别是有关李定国抗清的档案资料还没有搜集进来；再则是对于已有的史料，也因限于时间及审辨能力，没有进行细致的分析与恰当的安排，这就可能招来“以一概百”或“断章取义”之讥。我认为这都没有关系，在学术问题上可以百家争鸣，争鸣辩论的结果，往往会从一块烂砖上引出一大堆宝玉来。当然，任何人也不应对史料工作采取任意的态度。学术工作是严肃的，没有科学的严肃的态度是不会做到预期的结果的。我所搜辑的史料中，虽然不能说是“无一字无出处”，但愿努力做到所有问题，

所有情节，所有时间、地点及人物都有出处。我的用意是将三百年来一直被地主统治阶级所丑化、所歪曲的史实，从地下挖出来，从沙里淘出来，让它重新返回人民历史的本来面目。当然，要做到这一点是非常困难的，李定国行军作战三十二年，没有留下更多的碑碣和钟鼎，也没有留下革命战士们自己的行军日记；留下的只有野史、稗史和“官书”。“官书”固无论矣，即以最有正义感的野史来说，也还需要审慎采用。撰写史料的士大夫们，不少人有“抗清”的一面，但他们还有“剿贼”的一面；有民族气节的一面，但也还有地主统治阶级传统偏见的一面，不仔细选择，有时就会帮助地主阶级说话，那就失掉整理史料的意义了。我对于这个问题并没有完全处理好，本书所收集的材料，值得商榷的地方还是很多的。

地方志有些材料很好，可以补“官书”及稗史之不足。例如定国平定佴革龙之役，有些记载把佴革龙误为普洱，其实佴革龙是开远城东的一个山砦，不只距普洱路程很远，而且在明代还分隶两个府属，这个问题，在《阿迷州志》里得到了解答。又如定国抗击清兵的衡州之役、新会之役、盘江之役，各书所记时间、地点、阵势都比较混乱，但在《衡州府志》、《新会县志》、《安顺府志》里却找到不少材料，为整理当时的战役部署提供不少线索。自然也有很多府志、县志的材料很贫乏，对于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没有自己的记载、只从《明史》或某种“官书”上照抄一段了事。这在封建统治时代，也难完全避免。事情已经过去，那就让他去好了。最奇怪的是有些现代人，他们不用现代的观点去整理史料，却用古代的观点、古代的方法去复制一些歪曲历史的史料（为了保存史料而进行的复制工作除外），那就不能不用“人民的历史”这个标尺，对它们进行必要的测定了。

这里我想谈一下个人对于《新纂云南通志》的看法。这部皇皇巨著，刊印于 1939 年，全书一百九十余卷，洋洋百余万言。在材料搜辑上，较之原有的《云南通志》、《续云南通志》都要丰富得多，作为一个省的历史资料来说，并不是完全没有用处。问题是这部书作成于辛亥革命以后的二十八年，章太炎氏于 1902

年就大呼“愿吾滇人，无忘李定国”，可是，李定国在全书的人物传里面竟没有立传，所有提到的地方都还把他当做“流贼”，比清朝乾隆年间纂修的《腾越州志》还要落后二百年（《腾越州志》把李定国列入忠烈传），那么，这部书究竟是为谁服务的呢？这样的通志又何贵乎“新纂”呢？我对这部书看得并不仔细，上述意见也许不尽恰当，不管怎样说，我不同意一个人的身子进入了现代，头脑还留在古代。“身首异处”，是决不会拿出劳动人民所需要的东西来的。

全国解放以后，李定国的起义及抗清事迹，已经引起云南历史工作者的注意，有人对他的死难地点做了初步调查，有人把他的事迹列入史料整理计划，从这一个具体事件上，可以看出人们的历史观点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

下边再谈谈有关李定国死难地点的资料问题。

李定国死难的地点，向来有三种说法：一说死于勐腊，一说死于景线，一说死于交趾境上。葬地也有两说：一说葬于勐腊，据《普洱府志》云：

> 死后，原葬猛腊，因定国子嗣兴，自思茅举众来降，后乃改葬顺天芦沟桥胡家港。其猛腊葬所，遗址尚存，至今寸草不生，“夷”人过之，必拜而后去焉。

刘健《庭闻录》、庄士敏《滇事总录》，也是这个说法。不过《普洱府志》又加上个“其猛腊葬所，遗址尚存”。“猛腊”原属普洱府，其说似不为无据。一说原葬景线，据《新纂云南通志》金石考《李定国墓碣》条云：

> 在我旧普洱府管景线宣抚司，即古八百媳妇地。志载其墓至今寸草不生，土人过必稽颡拜。民国二年，裁缺维西协副将李学诗奉都督蔡锷命勘察边界，曾至孟艮、景线亲祭其墓，云有四尺石碣，题“晋王李墓”四字，字大约六七寸，建冢上。学诗并有《至景线祭晋王墓》七律一首，载《罗生山馆集》。

根据这段记载，定国墓址确实是在景线，各书卒于勐腊、葬于勐腊之说，好像要被全部推翻了。

我以为目前还不必完全推翻。景线的墓碣并不能证明定国就是死在景线或葬在景线。定国因闻清兵入缅，由景线东走，于康熙元年（1662年）的四五月间到达勐腊，当时他的兵力已经很少，在缅甸因为同异民族作战也尝过一些苦头，从定国的处境着想，似无再返回景线的可能，因之他的卒地仍应定为勐腊。至于景线的墓碣，似有两种可能：一是他的部属依照他的“宁死荒外，勿降也”的遗嘱，葬在离清朝统治更远一些的地方；或则是他的不愿降清的旧部为他经营的衣冠冢，好像史可法的衣冠葬在扬州梅花岭一样。

为了这个问题，我曾经请教于西双版纳的刀有良同志。根据他的初步调查及三次寄来的资料和照片，可以肯定与李定国死难的同时，有一位汉族将军死在那里，很受人民尊敬，其情景大体上和《普洱府志》所记定国葬地略同。现在把刀有良同志的三次来件整理如下：

一、勐腊城子附近的一座山头上，有一座土基砌的庙，称为“汉王庙”。这座汉王庙已坍塌，只有它附近的景物。

二、关于勐腊的“汉王庙”，有两种传说：一说两三百年前，有一个汉族天王来，死在那里，被尊为神灵。另一个说法，清朝杜文秀造反的时候，景东县的一位姓赵的将军死在那里。两种传说都没有文字记载，估计可能前者正确些。

三、关于时间的确定，还有一个旁证。据勐乌土司后裔召映中说，在老挝的勐乌城子附近，也有一个汉王庙，比勐腊的大，还有汉文碑文，内容不知道；建庙时间已有二十三代土司，估计二百多至三百年左右（一个土司在任时间，平均不会超过二十年，有的只有几个月）。

四、关于“汉王庙”的祭祀情况。据原来勐腊的一位大头人现任勐腊县副县长的召龙西里讲：“解放前，群众把汉王神敬奉为勐腊最大的神，每年春节祭祀一次，平时祭祀一口猪和一些鸡，祭祀前一天鸣炮三响，全勐禁忌生产三天。在祭时，原来住

在勐腊街上的汉人主祭，土司、头人陪祭。三天后再鸣炮，才解除禁忌。每三年大祭一次，要杀两口猪。解放初期，汉族还祭，以后慢慢的不祭了。”另在勐乌的“汉王庙”也是一年杀猪祭一次。

根据以上调查材料，我认为有三点可以认定：

第一，建庙在“两三百年前”，和李定国的死难年代适相符合。“汉王庙”所纪念的可以断定不是杜文秀的将领（杜文秀最后失败至今只九十七年），而是李定国时代的汉族将领。

第二，这个庙所纪念的人，一定是少数民族人民尊敬的人物。一个毫无关系的汉人，决不会被少数民族奉为神灵。

第三，这个“汉王庙”所纪念的，可能是大西军的死难将领。究竟哪一个“汉王庙”祀的是李定国，也许将来看到勐乌的汉文石刻可以认定。不过从定国由景线东走的路线来看，定国之死应该在勐腊一带（景线距勐腊，只有四程），而勐乌的“汉王庙”可能是另一位失败将军的祭地。

不管这位“汉王神”是谁，西双版纳的少数民族人民和汉族人民的友好关系是世世长青的！

最后要说明一下，我对于史料的搜集与整理工作，实在是一个外行，观点与方法都存在不少问题，所以要把它印出来，只是为了要接受读者的批评、指正，使这项工作能得到新的进展，使李定国和大西军的正义事业能得到应有的重视。自知这个期望，不是这一本不太完备的资料书所能做到的，但是我相信，经过大家讨论以后是会逐步做到的。在本书编辑过程中，承上海陈向平同志一再鼓励，昆明张子斋、徐家瑞、刘鼎铭同志遥寄资料和图版，西双版纳刀有良同志深入勐腊调查访问，并将资料、照片见寄，特致感谢！

郭影秋

1959 年 9 月于南京

凡　例

一、本书编选的资料，主要是叙述李定国和大西军的复明抗清战斗史迹。大西大顺元年（1644年）以前，李定国的名字不太显著，只能从大西军的活动里来看李定国的活动；大西大顺二年（1645年）以后，则完全以李定国的活动为主，故定名为《李定国纪年》。其与当时整个战争形势有关的史料，如明军的部署，清兵的动态，大顺军的活动等等，只扼要提及；而跟大西军有关的农民活动，则和大西军的活动连贯起来。

二、本书资料，取材于一百多种旧籍，材料的挑选是一件繁难的工作。取舍的标准是：第一，各书相同的，取其成书较早的；第二，事实相同而描述不同的，取文字易懂的；第三，事实出入太大的，尽量选用档案资料，或比较各家的说法选其较为合理的部分；第四，有些材料下加“按”语，提出编者的看法。

三、材料安排采用编年体，先叙述整个形势，再叙述李定国个人事迹。凡年月可以确定的，以年月为主，将史料分类安排；凡年月不能确定的，把相近的事实附在一定年月的下面；年月相差太远的，则按整个事态发展情况，选用较为合理的一说。

四、材料编辑完全使用文言文，主要是迁就旧的史料。引用的文字，完全是原文；经过编辑的文字，基本上用原文，只在某些突出字句上略加改易（如把“贼”字加引号或改为“农民军”），但力求不失原意。为了文字的衔接，有时在原材料的前面或后面略加数字；只有很少的地方，因原材料过分零碎，难于引用，才根据原材料加以重新组织。但在任何部分，绝没有杜撰的材料。

五、大西军从起义（1630 年）到结束（1662 年）的三十二年间，各个时期的称号不同，统一称谓也有困难。本书对这支农民起义大军，于张献忠称王以前统称“农民起义军”；自献忠称王至败死西充，统称“大西军”；自“四将军”入滇至确定“秦王”称号，统称“四将军部”；自可望称秦王至孙、李分裂，统称“秦王部”；之后则称“晋王部”或“定国部”。

六、明清之际，是一个复杂的三角斗争（农民军、明军、清兵）局面，各地建国称号的很多，各书使用的年号也不一致，但于年号下附以干支（或竟用干支），则是普遍的现象。为了便于查找资料，本书首列干支、公元，然后附列农民军政权、明、清的年号。

七、本书正文及附录均加标点。别字、脱字及别解，均用（　）号；按语用［　］号。材料出处均加注，但对习见的材料，不完全加注。

八、本书附录李定国传十三篇，李定国论十七则，有关李定国的诗歌十六首，李定国生平事业简表一份，《谈郑成功和李定国的关系》、《论李定国坚持西南抗清斗争的历史作用》两篇。卷首附有与李定国生平事业有关的地图、铸币、玉玺拓片、佛经及勐腊“汉王庙”遗址照片等共十三帧。

九、由于旧籍作者时地不同，见闻各异，长短互见，矛盾层出，“合众书而为一书”（吴殳语），确实存在着很多困难。对于选用的材料，有的摘引一段，有的只选摘一句，有的把一段材料分作几处使用，有的叙述一件事情引用好几家或好几段的材料，这在编辑上就难免有考虑不周之处，幸祈读者指正。

目　录

再版前言 …………………………………………… 戴　逸（1）
序　言 …………………………………………………（1）
凡　例 …………………………………………………（1）
李定国纪年 ……………………………………………（1）
庚午年（1630年）……………………………………（3）
辛未年（1631年）……………………………………（7）
壬申年（1632年）……………………………………（9）
癸酉年（1633年）……………………………………（11）
甲戌年（1634年）……………………………………（14）
乙亥年（1635年）……………………………………（17）
丙子年（1636年）……………………………………（21）
丁丑年（1637年）……………………………………（23）
戊寅年（1638年）……………………………………（27）
己卯年（1639年）……………………………………（29）
庚辰年（1640年）……………………………………（32）
辛巳年（1641年）……………………………………（38）

壬午年（1642年） …………………………………………………… (43)
癸未年（1643年） …………………………………………………… (47)
甲申年（1644年） …………………………………………………… (55)
乙酉年（1645年） …………………………………………………… (65)
丙戌年（1646年） …………………………………………………… (71)
丁亥年（1647年） …………………………………………………… (74)
戊子年（1648年） …………………………………………………… (80)
己丑年（1649年） …………………………………………………… (87)
庚寅年（1650年） …………………………………………………… (92)
辛卯年（1651年） …………………………………………………… (96)
壬辰年（1652年） …………………………………………………… (100)
癸巳年（1653年） …………………………………………………… (111)
甲午年（1654年） …………………………………………………… (120)
乙未年（1655年） …………………………………………………… (130)
丙申年（1656年） …………………………………………………… (135)
丁酉年（1657年） …………………………………………………… (142)
戊戌年（1658年） …………………………………………………… (147)
己亥年（1659年） …………………………………………………… (156)
庚子年（1660年） …………………………………………………… (165)
辛丑年（1661年）……………………………………………………… (167)
壬寅年（1662年）……………………………………………………… (174)

附录…………………………………………………………………… (179)
一、李定国传…………………………………………………………… (181)
二、李定国论…………………………………………………………… (246)
三、有关李定国的诗歌………………………………………………… (254)
四、李定国生平事业简表 ………………………… 郭影秋 (262)
五、谈郑成功和李定国的关系 …………………… 郭影秋 (265)
六、论李定国坚持西南抗清斗争的历史
作用 ………………………………………… 郭影秋 (275)

李定国纪年

庚午年（1630 年）

明崇祯三年

明自中叶以还，封建统治日趋腐朽，皇室、官僚广占民田，宣德、正德间（1426—1521 年），天下“官田”几占民田七之一[1]，只畿内“皇庄”一项，即占地三万七千五百九十五顷四十六亩。[2]而缙绅之家，复以田庐、奴仆相雄长，河南富室，“田多之者千余顷，少亦不下五七百顷”[3]；江南巨绅，有膏腴多达万顷者。[4]良田既归势家，农民多失本业。安徽怀宁地区，农民绝无一亩者居十之七八[5]；吴中之民，有田者仅什一，为人佃作者什九。[6]佃作不得者则沦为“长工”、“短工”、“忙工”、“脚夫”、“驿卒”，甚至被迫卖身而为“僮”，为“奴仆”。佃作之民，苦于租税繁重，如吴江、昆山民田，亩旧税五升，小民佃种富民田，亩收私租一石。[7]更苦者为无田之粮，无米之丁，田鬻富室，产去粮存，犹输丁赋。[8]此外捐税之繁，差役之苦，民心更伤痛入骨。其中虽有少数人改执技艺（手工业）或流为脚夫、水夫等就食他乡，而多数农民则仍依附土地，至骨髓敲尽时则起而“抗租”、“逃亡”，以至于“铤而走险”（起义）。加以边患连年，饷缺兵哗；驿卒裁汰，失业增多；天灾流行，饥馑洊臻；赋

役苛重，遂致民无以生。[9]崇祯（朱由检在位年号）元年（1628年），陕西大饥，斗米银四钱，人相食；官吏催科急，饥民大起：白水王二率众反，王左挂、苗美、飞山虎、大红狼等同时起宜川。固原兵以无饷，亦反，出没略阳、泾阳间。[10]于是“叛卒、逃卒、驿卒、饥民、响马、难民”汇为革命洪流，以饥民为主力，以“叛卒、逃卒”为先锋，到处爆发农民起义。为首者多边军之豪及良家子，不欲以姓名闻，恐为亲族累，相率立诨名。[11]

先是，崇祯元年（1628年），府谷农民王嘉胤与杨六、不沾泥等，集众散富户粮，以数千人起义。[12]至本年六月，连破黄甫川、清水、木瓜三堡，据府谷，下河曲，远近震动。张献忠以米脂十八砦应之（献忠起事，《绥寇纪略》作本年九月，《国榷》作己巳年〔1629年〕十一月），邑民从之者十之七。十月，献忠等以五六千人略靖边、安定、绥德、米脂，攻清涧，为明军洪承畴所败。他部奔安定，献忠以残众据双柳。[13]

张献忠，延安府人，世居肤施柳树涧，出身贫贱，父业屦，母织席（一说其父为小商贩，尝携献忠贩枣内江，因驴粪污乡绅石坊，遭毒打，且被迫以手除粪，故献忠深恨川中士绅。事虽不经，亦为献忠出身贫贱之一证），以万历丙午年（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生，与李自成同岁。自少读书，不售[14]；及长，充行伍（一作捕快），敢战，立功边境，后因事革役，闻农民军据府谷，遂率众起义。其人长身而瘦，面微黄，僄劲果侠，声若巨雷，人皆惮之，军中号为“黄虎”（一作黄虎为另一人），自号曰“八大王”（一作西营八大王）。尝与农民军神一魁为伍，遇战，倾红旗先驱，有力多智，知文而勇，同伙咸尊事之。[15]

时明三边总督杨鹤、陕西巡抚刘广生，以农民军势盛，不敢战，急议“抚”。[16]遣官持牌四出招义军，降者给牒免死。饥民或有“降”者，明官驱降众数千人，给其樵采，驱入山谷，以兵数千人围而杀之。起义饥民遂绝“望降之心”，且散且起，视总督令如儿戏。[17]

本年正月，清兵陷永平，寻陷滦州、遵化。五月，清兵回窜。十二月，明增田赋，充饷。

定国年十岁

李定国，字宁宇，榆林人，本农家子，年十岁从张献忠起义。献忠喜其貌度不恒，养以为己子。献忠有养子四：延长人孙可望，年长知书，数位第一；定国以能次之；延安人刘文秀，绥德人艾能奇（一作奇能、云枝）又次之。[18]

［按：定国里贯，或作陕西人、陕北人、延安人、绥德人、米脂人，要皆作陕西人。惟刘彬《晋王李定国列传》云定国“云南贫家子，幼失怙恃，无所依，关中贾人亦李姓者，携之入陕，居榆林”。近人李根源《曲石诗录》云：“定国乌蒙产，贩马走边墙，父死从张、李，作贼竟封王。”从刘说，情节又有出入。李天根《爝火录》云：“定国江西人，初名如靖，字一人。定国，永历王赐名也。”其事主屈大均《皇明四朝成仁录》，而里贯又有异。今从王夫之《永历实录》。定国字，或作一人、一纯、霖宇、鸿远、大绶，今从《永历实录》。定国从军年龄，《永历实录》作“十岁”，并云：“幼鞠于献忠。”定国参军时间，各书不载，今假定为本年，论据如次：（一）张献忠于本年九月举义，十月间在陕北各县活动，明年春即被迫转入山西。定国幼年从军，其时当在转入山西以前；（二）各书称张献忠养子者，均以可望、定国、文秀、能奇四人并列，定国从军当不太迟，非以后“献忠有养子十人”者可比；（三）《永历实录》称定国“所部将二万人，随献忠驰突豫、楚”。则献忠驰突豫、楚时，定国当已结束童年。此假定是否确切，尚待研究。］

【注释】

[1] 参见《明史》卷七七。

[2] 参见《续通典》卷三。

[3] 参见郑廉：《豫变纪略》卷二。

[4] 参见《民抄董宦事实》。

[5] 参见方都韩：《枞川榷稻议》。

[6] [7] 参见顾炎武：《日知录》卷十。

[8] 参见《明史》卷七八。

[9] 参见《明史》卷三〇九。

［10］参见毛奇龄：《后鉴录》卷五。

［11］参见戴笠：《怀陵流寇始终录》卷一、卷六；计六奇：《明季北略》卷四。

［12］参见彭孙贻：《平寇志》卷一。

［13］参见戴笠：《怀陵流寇始终录》卷三；吴伟业：《绥寇纪略》卷一，《明史》卷三〇九。

［14］参见叶梦珠：《续绥寇纪略》卷五。

［15］参见彭孙贻：《平寇志》卷一；珠江旧史：《劫灰录·张献忠传节略》；计六奇：《明季北略》卷七；《延绥镇志·李自成传》；阙名：《纪事略》。

［16］参见吴伟业：《绥寇纪略》卷一。

［17］参见费密：《荒书》；彭孙贻：《平寇志》卷一。

［18］参见王夫之：《永历实录》卷十四；邵廷寀：《西南纪事》卷十。

辛未年（1631年）

明崇祯四年

四月，陕西农民军王嘉胤败于明军曹文诏，乃率部二十四家，众一万四千人，由秦渡河，转战山西，晋、豫饥民附之，势大盛。六月，王嘉胤于阳城遇害，众共推其左丞相王自用（紫金梁）为领袖，聚众三十六营，数达二十万，与张献忠、高迎祥（闯王）、罗汝才（曹操）、马守应（老回回）等，并为农民军首领。李自成与兄子过来从高迎群，号“闯将”，与献忠合兵，领导农民军继续与明军作战。[1]十二月，战斗失利，献忠与罗汝才等率部一千九百余人，伪降于明三边总督洪承畴。[2]

是时，明军纪律废弛，乱杀良民，谎报军功。镇西将军杜文焕纵兵掳掠，部将李重荣杀延川良民曹孟孝等一百九十九人[3]；宜、雒副总兵赵大胤在韩城，去义军二十里，不敢邀击，士绅强之出，报斩五十级（一作五千级），验之则皆妇女首也。[4]先是，庚午年（1630年）六月，兵科给事中刘懋奏云：“其剿也，所斩获皆饥民也，而真贼饱掠以去矣。其抚也，非不称降，聚众无食，仍出劫掠，名降而实非降也。且今年麦苗尽枯，斗粟金三钱，营卒乏食三十余月，即慈母不能保其子，彼官且奈兵民何

哉！且迩来贪酷成风，民有三金，不能供纳赋之一金；至于捕一盗而破十数人之家，完一赎而倾人百金之产，奈何不驱民为盗耳!”[5]其说甚是。其势不能止，于是秦、晋、川、楚各地，巴蜀、江、淮之间，农民军纷起。

七月，明总督杨鹤以主“抚”不终，逮狱，遣戍。以刽子手洪承畴总督三边。洪承畴与曹文诏等，集中兵力进行围“剿”，农民军战斗日益艰苦。

八月，清兵围大凌城，明援师败于长山。

定国年十一岁

在张献忠军中。

【注释】

[1] 参见《明史》卷三〇九；戴笠：《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四。

[2] 参见吴伟业：《绥寇纪略》卷一。

[3] 参见戴笠：《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四。

[4] 参见文秉：《烈皇小识》卷三。

[5] 张岱：《石匮书后集》卷六二；彭孙贻：《平寇志》卷一。

壬申年（1632年）

明崇祯五年

正月，陕西农民军各部，为明军洪承畴、曹文诏、贺虎臣等夹击于西澳（《国榷》作初五日），大小十余战，皆败，伤坠无算；旋又败于槐安堡（《国榷》作二十日），农民军首领郝临庵、可天飞、独行狼战死，势大挫。[1]王自用、高迎祥等部被迫突围入山西。四月（一作三月），张献忠义旗复举，与王、高等部合，势复振。七月，连下大宁、隰州、泽州等城。八月抵阳城界，明军诱降，农民军诸部有就约者，王自用意未决，惟张献忠、闯塌天等五部不愿降。明军来袭，众怒，南下袭济源。[2]九月，农民军王之臣（豹五）等破临县，据其城；滚地狼（《国榷》作李自成）等南破修武，杀知县刘凤翔，旁及武陟、辉县，遂围怀庆；沿山州县，凡潞泽、河内、淇县、汲县、汤阴、安阳、林县、涉县、武安、磁州，“无得免者”。十一月，王自用从沁水、武乡转攻辽州，克之。十二月，分兵为三：献忠与扫地王西北入霍；王自用、邢红狼西南入垣曲；乱世王、破甲锥东北入长子。除夕，再克辽州，渐逼太原。[3]

秦、晋、豫各地，农民军发展甚速，名目不一。在秦有名目

者为紫金梁等二十四家；在晋、豫则有英王等三十二营（一作三十八家）。各拥众数万，少者万计，攻城略地无虚日，明军疲于奔命。是时绥德人冯双礼，吴堡人白文选，葭州人王自奇、王复臣，固原人王尚礼，徽州人窦名望等，各率部卒及眷属，往附献忠，接踵继至，献忠兵力大增，常雄长诸部，李自成不能与之相比拟。[4]

定国年十二岁

在张献忠军中。

【注释】

[1] 参见谈迁：《国榷》卷九十二；计六奇：《明季北略》卷八。

[2] 参见戴笠：《怀陵流寇始终录》卷五；彭孙贻：《平寇志》卷一；计六奇：《明季北略》卷八。

[3] 参见彭孙贻：《平寇志》卷一；文秉：《烈皇小识》卷三；戴笠：《怀陵流寇始终录》卷五。

[4] 参见彭孙贻：《平寇志》卷一；冯甦：《见闻随笔》卷上；计六奇：《明季北略》卷八；阙名：《纪事略》。

癸酉年（1633 年）

明崇祯六年

正月，王自用等部农民军，分为七大股，股万人，或五千人。张献忠自长一军，余为王自用、混天王、关锁、罗汝才、撞塌天、兴加哈利，北略忻州、定襄、五台；东北入畿南西山，距顺德百里；而河南沿山州县，无处不到。旋为明军左良玉、曹文诏败于涉县、孟县，势少挫。[1]二月，农民军据林县，山中饥民，相望而起，北败左良玉于武安，明河南兵七千人，先后失亡殆尽。二十日，献忠驻乐平、和顺间之马坊川，为曹文诏击走。三月，农民军败于沁水之芹池、刘村砦等地。明军张应昌部谎报战功，所斩级皆细弱，验系良民。[2]四月，农民军破平顺，杀知县徐明扬；复分兵略潞、泽、沁水。初八日，张献忠围岳阳（今安泽县），为明军贺人龙所败。王自用从榆社败北奔武乡，为明军曹文诏所杀（一云病死）。[3]

五月，农民军破涉县，兵复合，大队尽至磁，众十余万，长可五六十里。明军邓玘、左良玉会师彭城（磁县彭城镇），蹑农民军于林县之清池、柳泉，败之。六月，张献忠与罗汝才、高迎祥诸部，合营于济源、修武间。旋围怀庆，为明军所败。自是略

顺德、真定，河北三府游击殆遍。七月十四日，与明军曹文诏战于济源，败，危急中，有一人青袍骏马，手无寸刃，以马鞭东西指挥，虽炮矢丛中，然意气安闲，敛众而退，农民军中人物多英勇如此。八月，明京营副将王朴，以禁旅六千抵彰德。九月初一日，献忠合蝎子块、撞塌天、一盏灯，以众四千从高平、沁水攻平山，为明军击败，一盏灯被擒，时他部亦败于沙河、涉县等地，相率退保五台山显通寺。五台山周围数百里，东通畿辅，北枕大同，西接雁门，南连太原，农民军据守中台，其中薪粮庐舍皆备，险阻足恃，“官军”虽云夹击，其实未尝敢于夹击也。十月，献忠复会蝎子块、撞塌天出击元氏西山。是时，明陕兵、晋兵、京兵各路皆集，主客兵共二万二千余，皆劲旅，农民军处境极不利。因使张妙手、撞塌天、满天飞、邢红狼等十二人伪乞降，乘间以重货与兵民贸易裘靴，为渡河计。十一月天寒，垣曲、济源之间河身最狭，冰澌先合成桥，农民军乘间以门扇铺冰上，覆以土，二十四日，三道驰马渡河而南，明防河中军官袁大权仓卒战死，遂于二十六日破渑池南下。[4]十二月朔下伊阳，依矿工为导，取卢氏、汝州，至南阳，举凡维阳、新安、陕州、灵宝、永宁、鲁山、叶县、舞阳、遂平、确山、信阳、裕州、泌阳、淅川、新野、内乡等州县，农民军无不至者。寻分军：罗汝才入楚，邢红狼留豫，惠登相入秦，李自成趋汉中。献忠一军南走豫，攻河南府，不克；攻登封县，败于少林寺僧兵；破汝州，略新野，与明军左、祖二部战于竹菌关，杀伤相当；旋攻永宁；克商州、商南等处。[5]

晋、豫、畿南之战，农民军连摧劲敌，然自身伤亡亦重，知名首领如满天星、混天王、混天猴、新立一字王、杀尽王、飞天圣等均先后战死。[6]王自用死后，农民军各自为队，时分时合。其缴获最重骡马，妇女皆戎装乘马以从。遇“官军”则令数骑诱之，俟深入大队，两旁裹之。其攻城，里应外合，城中自乱，遂得人。多行金钱以布间谍，有信先知，“官军”出不意击之，必在四五十里外，即战胜亦不敢远追。[7]盖农民军人有副马，疲则易之，矫捷如飞。“官兵”用步卒追之，重趼而至，农民军又走

去；喘息未定，他警又告，故将士疲于奔命，而终无成功。[8]献忠多智，巧于攻击，遇险善走，去来如风，疾走数百里，“官兵”追之不能及。又日使人说《三国》、《水浒》诸书于军中，凡埋伏攻袭皆效之[9]，故所向辄胜。

本年五月（一作六月），明以“剿贼”诸将，一时功罪勤惰，应有监纪，特命太监陈大金、阎思印、谢文举、孙茂霖，分监曹文诏、张应昌、左良玉、邓玘军，记功过，催粮饷。内监所至之处，需索百倍，汾阳知县费甲镳，以供应不能给，投井死。[10]

同月，汉奸孔有德、耿仲明降清。七月，清兵陷旅顺。

定国年十三岁

在张献忠军中。

【注释】

[1] 参见吴伟业：《绥寇纪略》卷一；彭孙贻：《平寇志》卷一；计六奇：《明季北略》卷九；冯甦：《见闻随笔》卷上。

[2] 参见戴笠：《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六；吴伟业：《绥寇纪略》卷一；计六奇：《明季北略》卷九。

[3] 参见戴笠：《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六；吴伟业：《绥寇纪略》卷一。

[4] 参见谈迁：《国榷》卷九十二；毛奇龄：《后鉴录》卷六；彭孙贻：《平寇志》卷一；戴笠：《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六；邹漪流：《明季遗闻》卷一。

[5] 参见谈迁：《国榷》卷九十二；冯甦：《见闻随笔》卷上；阙名：《纪事略》；计六奇：《明季北略》卷九。

[6] 参见计六奇：《明季北略》卷九。

[7] 参见戴笠：《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六。

[8] 参见邹漪流：《明季遗闻》卷一。

[9] 参见刘銮：《五石瓠》；彭孙贻：《平寇志》卷十二。

[10] 参见文秉：《烈皇小织》卷三；彭孙贻：《平寇志》卷一。

甲戌年（1634 年）

明崇祯七年

正月，张献忠攻信阳、邓州，明兵科给事中史可镜，请调镇筸兵数千，控扼襄阳、德安，献忠退屯应山。二月为洪承畴所逼，西趋商、洛［按：商、洛山区，为农民军屯据地之一，又为出入陕、豫孔道。《国榷》云：“大盗马守应屯据商、洛山中……其地叠嶂重岩。”又云：“盖寇出陕西之道有二：曰商州、洛南，曰兴安、平利”］，出陕西蓝田等处，至黑水鱼，大败明左、祖军，遂克扶风、武功，西围平凉。明军贺疯子（疑即贺人龙）援兵突出，献忠解围走固原，攻克小河城，走秦州，破华亭、汧阳二县，败明军贺部万余。围陇州，二月未下，明军援至，献忠南走盩、鄠。[1]［按：献忠自二月入陕，七月与李自成会师盩、鄠，中隔五月，其事他书不载；《纪事略》载其事，但不书月日。今按《纪事略》所述行军作战路线，补系其事于此，确否俟考。］六月，李自成脱险于汉中之车箱峡，北走宝鸡、凤翔，与张献忠会于盩、鄠，势复振。[2]［按：李自成被困车箱峡，有二说：一作张献忠同被围，一作“围李自成大部”，不及献忠。从后说。］一时秦中北至庆阳，西至巩昌，西北至邠州、永寿，西南至盩

厔、郿县，遍地皆农民军，众殆二十余万，明军大震，洪承畴奏陈“剿贼四难”有云：“入陕猖獗之贼，大抵可十四五万，明知官军一二万，不能四驰，恃其势众，傍伏递进，则剿贼之难。贼多精骑，每跨双马；官军马三步七，则追逐之难。贼攻堡掠野，到处可资；官军待饷转运，则粮刍之难。贼入山负嵎，官兵相持一日，即坐误一日，则时日之难。”[3]难易之势既殊，“官兵”益穷于应付。七月十五日，农民军从郿县东趋盩厔、鄠县，扬言攻西安，洪承畴驰入西安应援，农民军经西安之东境而去。献忠与自成合兵，东破澄城，围郃阳旬余，联络百余里，闻洪承畴兵至，解围去，西略平凉、邠州。[4]冬，献忠会农民军诸部出潼关，活动于嵩县、汝州间。［按：献忠出陕，《纪事略》作走宝鸡，出栈道，经汉中，克汉阴、石泉，由石泉过汉江，抵郧阳、房县。不系月日。此与明年正月荥阳之会不符，今从《明史》。］其时献忠有二部，一部万三千余人，另部八千余人[5]，势最盛。(《怀陵流寇始终录》云：“朱阳连营贼张献忠等三人，皆有党数万。”)

本年二月，明以农民军蔓延秦、晋、豫、楚，流突无定，各镇事权不一，互相观望，宜以重臣开设督府，统摄诸道兵[6]，乃以陈奇瑜总督陕西、山西、河南、湖广、四川军务，随方“剿抚”。“官军”纪律败坏，到处扰民，民间有“官贼”及“贼兵如梳，官兵如栉”之谣，故“剿”、“抚”均不利。十一月以陈奇瑜“招抚”失策，削职论戍。十二月晋洪承畴兵部尚书，总督河南、山西、陕西、湖广、保定、真定军务，仍总督三边如故。当此之时，农民军各自为队，率无专主，遇“官军”人自为斗，胜则争进，败则走山谷不相顾。明军既部署统一作战，农民军亦不得不会商对策，明年遂有荥阳之会。[7]

是年正月，汉奸尚可喜降清。七月，清兵陷上方堡，扰宣府，旋陷保安、万全，未几退去。

定国年十四岁

在张献忠军中。

【注释】

[1] 参见彭孙贻:《平寇志》卷一;阙名:《纪事略》。

[2] 参见计六奇:《明季北略》卷十。

[3] 张岱:《石匮书后集》卷六十二。

[4] 参见文秉:《烈皇小识》卷四;谈迁:《国榷》卷九十三。

[5] 参见《明史》卷二六〇。

[6] 参见彭孙贻:《平寇志》卷一。

[7] 参见文秉:《烈皇小识》卷四;戴笠:《怀陵流寇始终录》卷七。

乙亥年（1635年）

明崇祯八年

正月，农民起义军高迎祥、张献忠、老回回、曹操、革里眼、左金王、改世王、射塌天、横天王、混十万、过天星、九条龙、顺天王等十三家七十二营大会于荥阳，议敌明军，未决。李自成倡言："一夫犹奋，况十万众乎？官兵无能为也，宜分兵定所向，利钝听之天。"复言："所破城邑，子女玉帛惟均。"众然其议，兵分四路：一为革里眼、左金王，当川湖兵［按：后入英、霍山中，为农民军主要屯据地之一］；二为横天王、混十万等，当川陕兵；三为曹操、过天星等，扼河上，当开封、归德明军；四为张献忠、高迎祥等，率兵略东方。老回回、九条龙等往来策应；以陕兵劲，益以射塌天、改世王。[1]此为农民军会商作战，分路出击之始。

是时，中原千里，北至大河，南至楚界，蔓延皆为农民军。而官兵之在中州者，南阳陈永福，新安、渑池左良玉，汝州陈治邦，兵皆数千，分地责成，坐甲自保，不能协同。农民军每营数万，更番迭进，所至皆因粮宿饱。"官军"数寡备多，樵苏后爨，士有菜色。[2]

献忠、迎祥南下略桐城。先是，桐城世家巨族，习为淫侈，其子弟僮仆，往往侵渔小民为不法，民不堪其苦，于壬申年(1632年)推黄文鼎、汪国华为首，起兵反，连胜“官军”[3]。献忠等依“变民”为导攻桐城，围三日，不克；前队受挫，愤甚，毁道旁神祠，大诟。[4]拔营而西，经霍丘、颍州抵凤阳。农民军先遣壮士三百人，伪为商贾车役，潜入凤阳，或鬻锦帨椒枣，或为僧道乞丐，分投各宿，随以重兵继之。时方元夕，士女如云，笙歌彻耳，忽火光四起，咸呼曰：“流贼至矣!”百姓狂奔。是时凤阳守兵仅二千余，无城可守，农民军至，“官军”无一人敌者，下之。焚明皇陵，杀守陵内监六十余人，纵高墙罪宗百余人。裂帛作旗，书“古元真龙皇帝”，合乐大饮。[5]既而迎祥、自成西去，献忠率部东攻庐州。自是，张、李所率农民军分为两路：一路发展成为李自成领导之大顺军，一路发展成为张献忠领导之大西军。

献忠抵庐州，围攻七昼夜，不克，二十六日破巢县；旋围庐江，庐江豪绅具币求免，献忠佯许之，夜攻城，破之；至无为，饥民汹汹，城不可守，亦破。二月益南趋，连克潜山、太湖、宿松诸城，为明应天巡抚张国维所扼，越英、霍而西。[6]时明陕、晋、川、湖间大包围攻势已基本破产，中原力弱，乃采取“分兵扼守”政策：左良玉一旅塞新渑，陈治邦等数营扼汝州，陈永福孤军堵南阳，以数千“官军”，东西堵拒，自保而已。而农民军则在关陕以东，黄河以南，襄阳以北，延袤数千里之地，所在驰突。明为确保腹心，乃发西北边兵及南兵，命洪承畴统率出关，节诸路抚镇，合力围“剿”农民军。[7]献忠闻洪承畴出关，遂取道麻城西入敌后。二月初六日，合马守应、邢红狼、九条龙等从商州入陕西。[8]明之围“剿”又扑空，农民军逐渐转入主动。

时，陕西诸部农民军，以高迎祥、张献忠为最强。五月，合兵围凤翔，不克。七月破澄城，八月破咸阳。[9]十月十九日(《平寇志》作十一月初八日，恐误。今从《怀陵流寇始终录》)，张献忠出潼关，屯朱阳之万川口。二十四日与混十万等攻灵宝，不克；二十七日破卢氏。农民军大队东行，尘埃弥天，阔四十

里，络绎百里，老弱居中，精骑在外，左良玉、祖宽两军相隔七十里，遥望山头，不敢邀击。农民军抄击诸路，截烧粮草，明军乏食。十一月初一日，献忠与九条龙会师，初八日攻洛阳，为卢象升、祖宽所乘，十五日败于汝州之屹料镇。献忠愤，复合自成等部声言攻洛，二十日与祖宽遇于龙门、白沙，大战复败，二十六日再败于汝州[10]，势稍弱。会祖宽部以边境告急，随洪承畴、卢象升北去[11]，献忠乃与自成分兵南走，会趋江北。十二月十七日，自光山、固始攻庐州，二十四日破巢县，二十五日占含山。二十六日至和州围之，二十八日农民军悉精锐，用梯攻城，城上发炮，死者百余人。复顶方桌掘城，城上掷薪焚毁。是夕三鼓，风雷渐急，农民军用大炮击西门，守者不能支，多溃走，遂克和州。[12]三十日，献忠自和州进击江浦（一作六合），围西门，又围南北两门，惟大东、小东二门不围，谍者入城，为守军所执，谋泄，攻不克，走和州，还屯含山。[13]

是岁，李自成随高迎祥入陕，破咸阳，败于渭南、临潼间。十一月，东出朱阳关，与献忠合兵破阌乡、陕州、光州；东趋占含山、和州。

明以洪承畴与高迎祥、李自成等相持关中，未遑东顾，乃命卢象升总理直隶、河南、山东、川、湖军务，统摄辽军，专治中原。明军自是分“关中”、“关东”两路，关中以洪承畴主之，关东以卢象升主之，对农民军分路“剿”击。[14]明军军纪废弛，军令不行，户部尚书侯恂致洪承畴书有云：“贼来兵去，兵去贼来；贼掠于前，兵掠于后；贼来如梳，兵来如剃；总督之令不能行于将帅，将帅之令不能行于士卒，今日之事，其何以济？”[15]农民军利用明军弱点，亦分路予以回击。

定国年十五岁

在张献忠军中。

【注释】

[1] 参见《明史》卷三〇九；吴伟业：《绥寇纪略》卷二。

［2］参见戴笠：《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八。

［3］参见戴名世：《孑遗录》。

［4］参见毛奇龄：《后鉴录》卷六。

［5］参见计六奇：《明季北略》卷十一；毛奇龄《后鉴录》卷五。

［6］参见戴笠：《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八；《明史》卷三〇九；计六奇：《明季北略》卷十一；沈国元：《流贼陷巢记》。

［7］参见计六奇：《明季北略》卷十一。

［8］参见戴笠：《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八。

［9］参见文秉：《烈皇小识》卷四；戴笠：《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八。

［10］参见戴笠：《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八；彭孙贻：《平寇志》卷二；冯甦：《见闻随笔》卷上。

［11］参见毛奇龄：《后鉴录》卷六。

［12］参见计六奇：《明季北略》卷十一；戴笠：《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八。

［13］参见彭孙贻：《平寇志》卷二；计六奇：《明季北略》卷十一。

［14］参见彭孙贻：《平寇志》卷二。

［15］戴笠：《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八。

丙子年（1636年）

明崇祯九年

正月初六日，张献忠、高迎祥会农民军各部众数十万，围攻滁州，环山为营，鳞次百里，树梯填濠，百道环攻，不下。适明卢象升以援军至，战于城东之五里桥，农民军大败，明军追逐五十里，达朱龙桥。[1]高迎祥、李自成率部北走，献忠则分兵游击豫、楚，散而复合。时豫楚宛、襄之间，饥荒异常，民间多剥树皮、嚼青草以度日，甚而人相食者，所在有之。[2]农民军所至，饥民相率从，胜则乘势长趋，败则散金钱于地，名曰“买路钱”。[3]明军多关中人，与农民军同乡里，临阵相劳苦，抛牲口，弃辎重，即纵之去，谓之“打活仗”。[4]故农民军得以驰骋如故。滁州败后，献忠合扫地王等至永城，屯于城外，旋分略夏邑、虞城、砀山、太康，败于归德。四月，入秦、楚山区息兵。十月（《怀陵流寇始终录》作六月）献忠自均州，马守应自新野，蝎子块自行唐，会攻襄阳，众二十余万，总兵秦翼明兵寡不能御，湖广震动。[5]十二月初六日，农民军抵应城，乡兵登陴守。献忠引众自东驰西，绕城而过，竟不攻围。守者大喜，谓农民军已去，甚轻之，不设备。献忠距西门十里驻营，休息士马，次日，寂然

不动。探骑至，守者登城詈之，而农民军如故，止闲西、南两门而虚其东、北。守者笑其无能，益骄且惰。越三日，有一僧勇而寡谋，率众千余，开城出战。农民军望其至，佯弃辎重走，乡兵嗜利，争取之。献忠度其离城数里，旋马突至，斩僧，纵骑大杀，长驱至城下，使勇士数人，用梯登城。守者见农民军猝上，悉惊溃，截断东、北两门锁钥而出，而农民军已自西南绕东北矣，遂克应城，时为初十日。居八日去，围云梦，农民军以牛皮自蔽，攻掘城下，城上炮石杂发，攻八日不克。[6]

是岁正月，李自成自朱龙桥北走凤阳，破怀远，折入归德、汴梁。二月败于七顶山，复入陕。七月，败于盩厔之黑水峪，高迎祥被俘，解至北京遇害，自成有其众，代之为“闯王”。

本年七月，清兵陷昌平、宝坻，连陷畿南诸州县，未几退去。

定国年十六岁

在张献忠军中。

【注释】

[1] 参见戴笠：《怀陵流寇始终录》卷九；谈迁：《国榷》卷九十五。

[2] 参见郑天挺：《明末农民起义史料·兵部为狡寇遁踞宛襄深山等事》。

[3] 参见戴名世：《孑遗录》。

[4] 参见《明史》卷二七三。

[5] 参见《明史》卷三〇九。

[6] 参见计六奇：《明季北略》卷十二。

丁丑年（1637 年）

明崇祯十年

正月十六日，张献忠、整齐王（马守应所部）等部略黄冈，为明军秦翼明、张天经所败，九营分为四：一走罗田，一向团风（黄冈属），一出蕲水，一趋岐亭。[1]献忠会罗汝才、马守应、撞塌天诸部，顺流东下，与江北贺一龙、贺锦等合，烽火达淮、扬。明南京兵部尚书范景文等分汛固守，安池道副使史可法率兵当要冲，农民军间道袭安庆，连营百里。巡抚张国维告警，左良玉、马炌、刘良佐合师来援，农民军败走潜山之天王古寨（一作天堂古砦）。左良玉不肯搜山，北去。农民军入英山，据险种田，为持久计。[2]［按：《怀陵流寇始终录》谓献忠于二月二十八日合众数十万破随州。其时在败走天王古砦后数日，不可据。］

是时，明军纪律败坏，左良玉屯舒匝月，拥妇竖数千，为营环数十里，所至排墙屋，污妇女，掠鸡豚，村集为墟。[3]已而，农民军乘机复出，游骑出太湖，连蕲、黄诸部，明军御之于酆家店（太湖属），农民军败走。明参将程龙、潘可大两营，合屯据守。四月二十七日（一作二十四日）农民军七营俱至，麾数万骑绕之。总兵许自强乘高举燎，使知救至，诸将溃围出，不得，程

龙及游击陈于王等四十余人被歼，一军六千人俱尽，安庆愈不支。按臣张煊乞援于总兵牟文绶，文绶偕刘良佐率马步九千人来援，闰四月十八日败农民军于挂车河，献忠南趋湖广。[4]时豫、楚农民军十五家［按：《绥寇纪略》谓豫、楚十五家为：张献忠、刘国能、马进忠、马光玉、李万庆、罗汝才、惠登相、贺一龙、蔺养成、左金王、顺天王、顺义王等。其后献忠、刘国能降，改称十三家。《后鉴录》只列十三家］，而罗汝才又分为郧、均九营；另有马士秀、杜应金者，不知其所从起，要之皆出自十三家也。各家以张献忠为最强，次则罗汝才。[5]

本年入春以来，农民军活动范围极广，北起商、固，南抵长江，东达淮、扬，西趋湖广。行踪飘忽，一昼夜驰三百里，如欲破远城，则近城过而不攻，及远城既破，始旋兵以取近城。盖远者谓近“贼”之城，尚未报破；必不越之而来，往往不为备；近者又谓“贼”众已过，可不严守，故农民军每乘人不意而两取之。所到之处，不妄杀人，城邑既破，见众持梃聚立，即言：“若遽释梃，当贷若死。”不听，则亦不敢近。有怒焉，驰马去耳。不与农民为敌。九月初二日，献忠东略仪真，扬州告急。十二月，合汝才入房、竹山中。[6]

房、竹、英、霍、潜、太诸山区，均为农民军屯据地。多购外人为间谍，或为医卜星相，或为紫衣黄冠，或卖械乞食，分布江、皖诸境，以觇虚实。“兵”多则走，少则迎敌；“官兵”搜山清野，则突出郊关；及列阵平原，则又负险深箐。“官兵”之入山砦者，掠牲粮，辱子女，民皆坚壁拒之。[7]

明军深惧入山。卢象升有疏云：“秦、豫、楚大山，绵亘千里，‘贼’出没无端，若奋击穷追，何地可歇？凡崇冈峻岭，密箐深林，扳木悬崖，日行三四十里，马不能进，人苦于登。此时折色银无所用，本色粮无所运，车驴无所施，势必以人负米二斗，随兵来往，日食一升，一供兵，一自赡，十日而二斗之粮尽。毋论此十日内遇‘贼’胜负，而以千兵入，须千人肩运；以万兵入，须万人肩运，即‘贼’不出，而俱归于尽矣。”[8]

又，明兵部尚书张凤翼等奏云：“而自襄、谷、均、郧，以

达房、保、二竹、汉、兴等处，绵亘数千里，丛林密箐，绝巘深沟，弓矢无所见长，匹马不能驰骤，粮料无从转输，夷汉兵丁，人人摩厉以需，不免望而却步……复接监军道臣苗胙土禀帖内言：‘职同总兵祖宽等官兵至丽阳、荆门等处，见其营马饥瘦脊穿，十病五六等因。’又据各监军、监纪等官屡番禀报，‘谓地方百姓与辽兵（祖宽兵——引者注）多不相安，皆望风逃避’。”[9]足见明兵民交恶，十分狼狈。

［按：《怀陵流寇始终录》本年记献忠事，不见他书者有如下各条：（一）二月二十八日，合众数十万破随州。其时在败走天王（堂）古砦以后数日；（二）四月十二日，破潜山、太湖，其时在败明军于酆家店前二日；（三）八月，驻南阳城外，为左良玉射中眉心（他书均系于戊寅年［1638年］正月）；（四）十月十五日，献忠与撞塌天、革里眼、老回回等十余万，屯黄州、麻城；（五）十二月初五日，献忠屯麻城之白果村，闻“官兵”至，伪乞降，左良玉击之于官渡。献忠冒雨雪，日夜驰七百余里，初九日至谷城，营于王家河，拥党数万。未知孰是。］

是岁春，李自成败明军于宝鸡，五月，为明军所迫，率部入川。十月，连破广元、剑州、金堂诸州县，围成都二十日，不克。

明为加强围“剿”力量，以熊文灿总理直隶、河南、四川、陕西、山西军务。复从杨嗣昌“四正、六隅、十面网”（以陕西、河南、湖广、江北四巡抚为四正，四巡抚分“剿”而专防；以延绥、山西、山东、江南、江西、四川为六隅，六巡抚分防而协“剿”）之议，部署中原大围“剿”，并限“剿”灭之期。十一月，令秦抚断商南、洛南，郧抚断郧西，楚抚断常德、黄州，安庆抚断英、六，凤抚断颍、亳，应抚截潜山、太和，江西抚截黄梅、广济，东抚截徐、宿，晋抚截陕州、灵宝，保定抚扼渡延津一带；总理熊文灿提边兵，太监刘元斌提禁旅，豫抚率左良玉、陈永福等兵，合“剿”中原。[10]以兵饷不足，改因粮（《明史·杨嗣昌传》云：“因粮者，因旧额之粮量为加派，亩输粮六合，石折银八钱，伤地不与”）为均输，加赋二百万。明季以来，“辽

饷”、“练饷”，计亩日增，自是又加赋，民间负担益重。[11]

本年四月，清兵陷皮岛。

定国年十七岁

定国既长，眉目修阔，身长八尺，躯干洪伟，每盥沐照水，心窃自负，推附者遂呼之为“小柴王”。举动有仪度，平时喜接文士，谦恭下人，有文儒气象。通兵法纬象，读《通鉴纲目》，略知大意。善马搠，乘善马曰“二斗金”，于侪辈间，与艾能奇尤以勇猛称；骁勇超逸，称“万人敌”。临阵陷坚逐北不置，往往与其军相失，军中名为“小尉迟”。于军中独以宽慈著，惟将一军破城砦，未尝妄杀。所部将二万人，随献忠驰突豫、楚，献忠以其有文武才，甚爱之。[12]

【注释】

[1] 参见彭孙贻：《平寇志》卷三；戴笠：《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十。

[2] 参见《明史》卷三〇九；徐鼒：《小腆纪年》卷二。

[3] 参见彭孙贻：《平寇志》卷三。

[4] 参见吴伟业：《绥寇纪略》卷五；徐鼒：《小腆纪年》卷二。

[5] 参见戴笠：《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十；吴伟业：《绥寇纪略》卷六；毛奇龄：《后鉴录》卷六；李天根：《爝火录》卷二。

[6] 参见吴伟业：《绥寇纪略》卷五；谈迁：《国榷》卷九十六；彭孙贻：《平寇志》卷三；计六奇：《明季北略》卷十三。

[7] 参见彭孙贻：《平寇志》卷三。

[8] 张岱：《石匮书后集》卷六二。

[9] 郑天挺：《明末农民起义史料·兵部为狡寇遁踞宛襄深山等事》。

[10] 参见张岱：《石匮书后集》卷六二；《明史》卷二五二。

[11] 参见彭孙贻：《平寇志》卷三

[12] 参见王夫之：《永历实录》卷十四；刘彬：《晋王李定国列传》；戴笠：《怀陵流寇始终录·甲申剩事》；李天根：《爝火录》卷七；冯甦：《见闻随笔》卷下。

戊寅年（1638年）

明崇祯十一年

正月，张献忠自房、竹复出，假“官军”旗号，进袭南阳，屯南关。明左良玉疑而召之，献忠走，良玉追射中其肩，孙可望突前，力斗救免，走麻城，九日破谷城。因见势不利，遣孙可望持重赂，因明总兵陈洪范贿总理熊文灿，乞降。［按：《蜀记》云：献忠入蜀，对其部将说：“后来杨嗣昌统天下兵马来剿，咱虽然在谷城招安，不过假借招安名色……咱眼里何曾有他那督师来。”谷城之降，伪降也。］文灿授以副总兵，居之谷城，命简精兵两万人给饷。献忠言部曲皆壮士，愿从军，请十万人饷，复请襄阳一郡（一作渑、陕、卢、灵、阌五州县）以屯兵，文灿无以应。迁延未就，至四月初八日，始降于谷城（从《国榷》）。文灿初抚海寇（郑芝龙），得重贿，袭故事行之，献忠笑谓其下曰：“此欲芝龙我也。”乃屯部众于四郊，自置家口于郧西，身率部曲数千居白沙界山，檄调不出。与谷城举人王秉真（一作贞）、诸生徐以显（一作敏）、邑绅方岳宗、明经敖某等相结纳；改距城十里之王家河（故纳“降”所驻兵处）为“太平镇”，曰：“吾欲与谷人同之也”，以释众疑。复使其将韩城人薛某者走京师，出

入首辅薛国观邸中，遍贿诸权贵，均以为献忠诚降矣。时有应城诸生潘独鳌者，与邑绅争田，不平，杀知县以反，来投，献忠倚以为谋士，文移皆其所撰。总兵左良玉谋于巡抚林鸣球、巡道王瑞旃，欲诱执之，献忠厚赂明官得免。[1]

十月（一作十一月），农民军罗汝才九营，因明军追“剿”急，亦就“抚”。熊文灿请授以游击将军，令诸将宴于迎恩官署，供亿甚备。汝才分屯其众于房、竹，保障四邑，自言“不愿受署为官，并不愿食饷，愿为百姓，耕田山中而已”。文灿檄汝才解散“胁从”诸众，简壮勇从征立功。汝才不听，与郧、均诸邑居民，分地错壤而居。[2]

是岁正月，李自成败于梓潼，北走潼关。二月，独骑入楚，奔献忠。（《小腆纪年》作己卯年［1639年］年事，谓献忠欲谋杀之。今从《国榷》。）罗汝才资以兵，北路阌乡。十月，复为洪承畴所败，自成独与刘宗敏、田见秀等十八骑遁商、洛山中。明户部主事张缙彦上疏云：“贼得势在流，失势在止，长技在分，穷技在合，乘时在秋夏，失时在冬春。是宜乘其所短，尽仆其锋。”[3]此种皮相之见，终无补于明军失败之颓局。

明以洪承畴“剿”办不力，四月削其职。十月，以清兵逼北京，调入京师扈卫。一应“剿抚”军务，专依总理熊文灿。

本年九月，清兵入墙子岭，京师戒严。

定国年十八岁

在张献忠军中。

【注释】

［1］参见戴笠：《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十一；吴伟业：《绥寇纪略》卷十；彭孙贻：《平寇志》卷三；计六奇：《明季北略》卷十五；李天根：《爝火录》卷二。

［2］参见张岱：《石匮书后集》卷六二；计六奇：《明季北略》卷十四。

［3］查继佐：《罪惟录》卷十七；谈迁：《国榷》卷九十六。

己卯年（1639 年）

明崇祯十二年

明熊文灿军纪败坏，至麻城，民不堪淫掠，欲焚其署；在蕲水，其兵杀乡民报捷，居民环哭，竟不敢治一兵。[1]且饱受献忠贿，不为备，农民军乘机复起。

五月，张献忠复起谷城，原已受“抚”之罗汝才九营，纷起响应。初，献忠养锐谷城，不放一兵，不应调，不入见制府，日与谋士潘独鳌、徐以显等密谋造仗练兵。结营城外，将几案叠起，献忠日率士卒，自上而下，循环不已，如教猱升木，无一息停。徐以显进献忠以孙吴兵法，造三眼枪、狼牙棒、埋伏连弩、团营方阵、左右营诸法，献忠颇用其谋。谷城下有河，为汉、沔所汇处，立关榷税，月入数千金，遣人各处兴贩，广行收籴。复阴联罗汝才为犄角，反形渐露。左良玉将图之，献忠觉，尽运兵器、刍粮入房山，杀知县阮之钿，合汝才兵趋房县。先是，献忠差义子张可望，密赂滇镇龙在田，求在田于交锋时网开一面。在田亦遣标下副将许名臣，易服至营，与献忠约。故献忠于谷城突围时，在田按兵不御。[2]献忠行前，不甚残杀，书壁以告楚人，言反由总理酷取其货所致，具书上官姓名，并列取贿之多寡、月

日于其下，且曰："不受献忠金者，襄阳道王瑞旃一人耳"。闻者愧焉。[3]五月二十五日，农民军大队抵房县，献忠兵白帜，汝才兵赤帜，俄白与赤交马语，白乃麾其众分之，一从北绕而西，攻西城；一从东绕而南，攻南城。围五日，农民军负板穴城，城将崩，守者爇镬油灌之毙，击伤献忠左足及其所爱马；复遣间入献忠营，阴识其所卧帐，将夜袭擒之。适明郧阳卫指挥张三锡，宿与汝才通，守北门，汝才之旧屯在其外，二十九日，汝才遣人扬徽而噪曰："南城陷矣!"守者惊溃，三锡开门迎农民军入，城遂破，杀知县郝景春。[4]献忠仍还房县。

献忠据房县窥襄，声言走兴安、汉中，逼秦、蜀。明熊文灿急檄楚抚、郧抚、秦抚、蜀抚严兵于其境，以秦督郑崇俭主提师合击。七月，崇俭率秦师抵兴安，献忠为争取主动，以七月二十二日弃房县。二十六日，左良玉偕豫将罗岱追之，抵房县以西八十里之罗猴山（一作罗猴山）。明军乏食，摘树叶为粮，农民军伏兵山岨中以待，罗岱先至，中伏死，良玉大败奔还，军符印信俱失，弃军资十余万，士卒死者万人。献忠既胜，谋入秦，秦督郑崇俭扼之于兴安，献忠乃入蜀之兴山、太平等县，屯于永宁关、大巴山分水岭秦、蜀之交境。又从义溪走马家洞、沙子岭，以窥合江；从鹿耳坡、高竹坪，以窥大宁。蜀抚邵捷春遣其兵两千人，同副将王之纶、方国安分地拒险。八月，蜀军败绩于汤家坝，王之纶力战不支，都司何□明殁于阵，裨将多伤。九月，农民军败于三尖峰，又败于黑水河。汝才、献忠分其军，自白水之碧鱼口入秦，合江之萧家坡入楚。[5]献忠入楚，歼郧属防兵五千余众，至地名曰"白土关"，又遇"官兵"万余，四路堵御。是时献忠势日蹙，岌岌不可为，于是与众誓曰："我自谷城突围，转战千里，身经数十战，未尝少挫，今至此，彼众我寡，彼锐我疲，若非沉船破釜，大决死战，则尽为虏耳！且死于墨吏，不如死于锋镝!"众咸应曰："愿致死命!"献忠于是亲冒矢石，率众将奋死血战，勇气百倍，不逾时而万余"官兵"尽归乌有。[6]十二月，豫、楚农民军分为三：东则革、左四营，奔突随、应、麻、黄；南则汝才、过天星，息兵漳、房、兴远；西则献忠，据

湖广、四川界，谋西进。[7]

明以谷城之变，责在熊文灿，诏令革其职，左良玉降级戴罪立功。明之“抚”局自是又破产。八月，以杨嗣昌为兵部尚书，对农民军积极部署“围剿”。嗣昌规形势，以襄阳为根本，浚壕列戍，晋左良玉为平贼将军。在军事上采取“圆盘”部署，拟先行“剿”献忠，然后次第剪灭农民军诸部。[8]嗣昌首倡聚敛，一议加“剿饷”三百万两，又加“练饷”七百三十余万两，合旧派每年加两千三百万两[9]，以致民穷财困，农村经济日趋崩溃。

本年正月，清兵陷济南，执明德王由枢。清兵入侵，历时五阅月，深入二千里，陷“畿”内、山东七十余城。明刘宗亮、孙传庭会师十八万于晋州，不敢进。“剿贼”重于防清，其悖如此。

定国年十九岁

在张献忠军中。

【注释】

[1] 参见《明史》卷二六〇。

[2] 参见阙名：《纪事略》。

[3] 参见吴伟业：《绥寇纪略》卷六、卷十；戴笠：《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十一、卷十二；计六奇：《明季北略》卷十五。

[4] 参见吴伟业：《绥寇纪略》卷六；徐鼒：《小腆纪年》卷二。

[5] 参见吴伟业：《绥寇纪略》卷六、卷七；夏燮：《明通鉴》卷八六。

[6] 参见阙名：《纪事略》。

[7] 参见吴伟业：《绥寇纪略》卷七；《明史》卷三〇九；夏燮：《明通鉴》卷八六。

[8] 参见冯甦：《见闻随笔》卷上；吴伟业：《绥寇纪略》卷七。

[9] 参见计六奇：《明季北略》卷十五。

庚辰年（1640 年）

明崇祯十三年

正月，明杨嗣昌大计兵食于襄阳，觇农民军各部以献忠为重，必先讨之。闰正月，督各路进兵。时罗汝才略郧阳；张献忠出紫阳瓦房沟，与左良玉战于高头坝，败之。[1]二十四日，复与左良玉（一作马进忠）战于枸坪关，失利，遂营于太平县之大竹河，规取其邑，以休士马。俟闻左兵、秦兵两道俱至，乃移营九滚坪，以待明兵；见玛瑙山险峻，将据之以决胜。二月七日，与明军战于玛瑙山，大败，阵失金印一，镂金棒一，“天赐飞刀”（献忠大刀）一，令旗、令箭各八，卜卦金钱二，马、骡千余头，甲仗军资以数千计，死将领扫地王等十六名，谋士潘独鳌等被俘，精锐略尽。十六日，败于水右坝；十九日，复败于岔溪、千江河。二十七日，困明悍将张令于柯家坪；三月初八日明援兵至，围始解。九日，败于寒溪寺；十日，再败于盐井；已而，明秦、楚、蜀之师皆会，与战于木瓜渡、黄墩，复大败，敝甚，率千余人奔兴、归山中。[2]日伏箐中，重贿山民，市盐米刍酪，山中人安之，反为农民军耳目。因之得以收散亡，养痍伤，气稍振。

玛瑙山之败，献忠谋士潘独鳌等被俘，杨嗣昌亲身讯问，独

鳌自称“难生刘若愚，系黄冈县生员”。其人昂视阔步，疏诞自若，自称有平治天下之略。于其囊中搜出《白土关阻雨》一律云：“秋风白雨声，战客听偏惊，漠漠山云合，漫漫涧水平。前筹频共划，借箸待专争，为问彼苍者，明朝可是晴?”又《过清禅寺》一绝云：“三过禅林未开禅，纷纷羽檄促征鞭，劳臣岁月皆王路，历尽风霜又改年。”合观二诗，足见其对献忠向义称臣，争先借箸之忱。嗣昌责其代献忠草飞檄，“逆天骂国，死有余罪”，与献忠眷属高氏、敖氏及养子惠二等同系襄阳狱。[3]

夏，献忠自兴、房走白羊山（巫山深险处），出阳平三坝，拟与罗汝才会师。初，汝才与过天星等九股［按：《石匮书后集》云：罗汝才入川九股为：整十万、扫地王、小秦王、金翅鹏、托天王、过天星、关索等］西出，二月二十四日窥渡大昌，不成；三月十一日略巫山，扼于明军秦良玉；四月初四日缚筏巴雾河，复败，不得渡。西入川东各股，亦先后败或“降”。汝才潜求附于献忠，献忠率部而西以迎之。闻川兵渐集，益入深箐中，掩旗鼓，谷中杳然，巫山人得农民军贿，不告所在。六月二十日，献忠以二十骑测巴雾河深浅，遇山民贸财米者，携以去。明军以二百骑侦之，凭高四望，并无烟火，山民自刈燕麦，侦骑无所得而还。献忠转入转西，于七月初会汝才，汝才分士马与之，语次，颇忧江险为难渡。献忠曰“不然!”及立马江岸，令有不前者斩之。其下多死斗，明军刘贵等皆退，遂由鱼住溪渡江，结营万顷山、苦桃湾，别部阵于红茨崖、青平砦，归、巫大震。是时，明杨嗣昌方屯师彝陵，天暑疫作，士卒死者十二三；京兵、云兵、楚兵，久屯思归，多夜亡去。不得已，规以便宜招抚，为谕帖万纸，散之农民军中，他部或有受“抚”者，献忠、汝才不之应。八月，嗣昌复命降将黑旋风入汝才营招之，汝才意未决，献忠日说汝才“毋为‘官兵’所惑”，汝才降意遂绝。[4]

八月二十日，献忠大败明军于土地岭，杀楚将汪云凤（一作之凤）。先是，明监军万元吉集川将守巫、巴诸隘，令秦将贺人龙、李国奇，楚将张应元、汪云凤、张奏凯等专事“剿”击。楚

师三千新募，川兵二千未经行阵，营于土地岭，待贺人龙兵，久不至。献忠知明军无继，悉锐来攻，明军迎战，日中未决，献忠分兵绕后山而下，突人营中，守营皆新兵，阵先乱，农民军乘之，前后合围，张应元中流矢，突围逃，汪云凤重伤死，兵多溃亡。农民军退屯圆渡坪，规划入川。[5]

是时，四川明军虽陈兵边境，而其内部则十分空虚。农民起义军纷起，以姚、黄十三家为最。先是，甲戌年（1634年）二月，献忠自陕西平利谋入川，因见山川险阻，乃自达州仪陇县出白水川，复回陕。其部下汉中人姚（一作摇）天动、黄龙等留川未归［按：姚、黄出处，其说各异，有说姚、黄为本地人，《蜀破镜》谓姚、黄皆汉中人，初为李自成部下。今从《客滇述》］，与当地“无聊”穷人及“背主”僮仆气味相投；一般饥寒劳苦之户，乘此机会投靠农民军，农民军亦利用其作内应，两相结合，其势渐众。农民军中称为首者曰“掌盘子”，其次曰“领哨”，民曰“毛狗”，民妇曰“婆姨”，锁人曰“带线”，分财曰“携获”，埋伏曰“卞子”，扎营曰“度乐”，巡走曰“落草”，此类隐语，不胜尽述。为首者十三人，号“姚、黄十三家”，出没于川东、北山谷间，众至十余万。凡川东之北岸，任其出没，播种时领兵暂退，收成后卷土重来；初不攻城劫砦，亦不妄杀，因土人强悍，“乡兵”大起，相约“杀贼”，而农民军遂予还击。若遇平日济人饥寒之家，善“御”奴仆之主，此时掳入营中，还有人代为方便；若平日准人子女，谋人田产，不恤僮仆饥寒劳苦之恶主，则砦硐一破，悉遭严厉处置。声势浩大，“官兵”无如之何。[6]姚、黄十三家，虽未与献忠合兵，然其牵制明军后方，亦为献忠入川之一助。

明杨嗣昌策：“在豫、楚取蜀为阱，在蜀又取徼外为壑。”乃调蜀精锐万余人麾下，驱农民军西上，意在聚于蜀而歼之。[7]时夔隘虽设守兵，然旧习不改，虚名冒粮，不发侦探，或将领不在戍所，故农民军得乘隙入川。[8]九月九日，献忠过水口，十二日突观音岩、三黄岭，窥上马渡无备，破之。明石砫土司秦良玉偕悍将张令扼竹菌坪，败绩，张令战死，良玉所部两万人略尽。[9]

十五日献忠从竹菌坪突过净壁，遂破大昌，进屯开县。所至关隘，防兵多远遁，长驱而过。复西趋，从白马渡过江，壁达州之西关。已而，嗣昌亦率其兵至，有数万人，相守旬日未交绥，献忠伪为阁部之旗帜，穿其营西走。[10]

献忠入川，以走致敌，日驰二百里，行则发哨远探，止则息马抄粮，明军尾其后，莫敢截击。[11]自是连破剑州、广元，大破明军于梓潼，将从间道入汉中，为明军所阻，乃逾昭化走巴西，下绵州，逼内江，围成都不克，十一月二十六日东走安岳。先后破绵竹、什邡、安县、德阳、金堂诸州县，至川南，分兵为三。仁寿、宁川卫、荣县皆破，隆昌、南溪令望风遁，十二月初五日（一作初四）破泸州。时明督师杨嗣昌次重庆，下令赦罗汝才罪，惟献忠不赦，有擒斩者赏万金，爵通侯。次日，自堂皇至庖湢遍题："有能斩阁部杨嗣昌头而来献者，赏银三钱。"［按：《滟滪囊》云：嗣昌绘图悬赏以购献忠，又榜书"能擒张献忠者赏万金、爵封侯"。献忠得图笑曰："营中有获杨嗣昌者，赏银三钱。"其说似更可信。］嗣昌瞠视咄叱，疑左右皆贼，勒令三日进兵。[12]无如猛如虎所将固原兵止余六百骑，贺人龙已噪归秦，屡檄左良玉入夷、夔堵守，使者什九返不应。[13]明之"剿局"遂完全破产。

"官兵"追至泸州，农民军乘夜燃火筏上，顺流而东，"官兵"追之[14]，献忠乘间西走南溪，十七日北抵成都。明成都副将某统千余骑袭之，农民军预取土象数百置帐中，四围悬灯而潜伏暗处。千骑望灯而趋，大呼直入，所劫者皆土象也，急退，而农民军四合，歼戮无孑遗。自是成都专意固守，不敢复言追矣。[15]农民军越成都北走汉州、德阳，二十日渡绵阳河，略盐亭、南部、仪陇诸邑。十二月晦，抵巴州，欲裹生员陈世达从军，其母代为之请，农民军义而舍之。释狱囚，散库金[16]，民甚德之。

农民军入川以来，倏东倏西，晨南暮北，"官兵"四面追击，转战数千里，献忠死而复苏者再。麾众依山附谷，使"官兵"无处跟追，终于以少胜多，粉碎明军之"圆盘围剿"战术。[17]

是岁，李自成自巴西鱼腹山突围，奔河南，会杞县举人李岩等。时河南大旱，斛谷万钱，自成从李岩议，以战斗所获，散布饥民，饥民从者数万，势复振[18]，连破宜阳、偃师。

是年，两京、山东、河南、山西、陕西、浙江大旱蝗，至冬大饥，人相食，草木俱尽。饥荒虽因天灾，而究由人事。诚如明给事中戴明说所言："荒极盗起，蠢动迭告，畿辅、维阳、陕西、中州，所在不一，皆缘抚按有司，素不休养，饥荒不恤，招徕无策，迨盗起议剿，死于锋镝者皆百姓也。"[19]

定国年二十岁

在张献忠军中。

【注释】

[1] 参见李馥荣：《滟滪囊》卷一；戴笠：《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十三。

[2] 参见吴伟业：《绥寇纪略》卷七；李馥荣：《滟滪囊》卷一。

[3] 参见李馥荣：《滟滪囊》卷一；吴伟业：《绥寇纪略》卷十。

[4] 参见吴伟业：《绥寇纪略》卷七；彭孙贻：《平寇志》卷三；《明史》卷二六〇。

[5] 参见吴伟业：《绥寇纪略》卷七；谈迁：《国榷》卷九十九；彭孙贻：《平寇志》卷三。

[6] 参见顾山贞：《客滇述》；孙錤：《蜀破镜》卷二；李馥荣：《滟滪囊》卷一。

[7] 参见吴伟业：《绥寇纪略》卷七；夏燮：《明通鉴》卷八十七。

[8] 参见戴笠：《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十三。

[9] 参见吴伟业：《绥寇纪略》卷七；戴笠：《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十三。

[10] 参见吴伟业：《绥寇纪略》卷七；彭孙贻：《平寇志》卷三，戴笠：《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十三。

[11] 参见戴笠：《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十三。

[12] 参见李馥荣：《滟滪囊》卷一；阙名：《纪事略》；谈迁：《国榷》卷九十七；孙錤：《蜀破镜》卷二；《明史》卷二五二；吴伟业：《绥寇纪略》卷七。

[13] 参见毛奇龄：《后鉴录》卷六。

［14］参见费密：《荒书》。

［15］参见文秉：《烈皇小识》卷六；戴笠：《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十三。

［16］参见李馥荣：《滟滪囊》卷一；戴笠：《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十三。

［17］参见阙名：《纪事略》。

［18］参见计六奇：《明季北略》卷十六。

［19］参见张岱：《石匮书后集》卷六二。

辛巳年（1641年）
明崇祯十四年

正月，献忠败明军于开县之黄陵城。初，明监军万元吉虑农民军东突，劝嗣昌分军出梓潼，扼其归路，不听。既诸将从泸州蹑农民军后，农民军果折而东返，归路尽空，不可复遏，自巴抵达，及于新、开。三日（《怀陵流寇始终录》作十三日），抵开县之黄陵城，明军猛如虎、刘士杰追及之。日晡雨作，诸将请以诘朝战，士杰不听，擐甲而前，猛如虎鼓其众继之，战于山谷。献忠登高望明师，见无秦人旗帜，而左兵亦携阻不前，士杰孤军跳荡，后无继者。乃密抽壮骑，潜行箐谷中，乘高大呼驰下，左兵先溃，士杰及游击郭开、如虎之子猛先捷皆战死，如虎溃围出，旗纛军符俱失。献忠乃由净壁趋夔门，过白帝城，行山谷间，明军逡巡其后，无一人敢御之者。献忠教营中饮酒鼓掌而歌，以诋嗣昌曰："前有邵巡抚，常来团传（转）舞；后有廖参军，不战随我行；好个杨阁部，离我三天路。"明军无知之何。出夔门一日夜行驰三四百里，攻巫山不克，出川，从房、竹走远安、当阳。明郧抚袁继咸邀击不止，献忠留罗汝才堵郧师，自率精骑下宜城，杀督师军侠于道，取其符验，令李定国等伪为使者，夜叩

襄阳城门，守者纳之，大队继至，二月五日破襄阳，杀明襄王。[1]出玛瑙山被俘妻孥及谋士等于狱，发银十五万（一作五十万）赈饥民。（《鹿樵纪闻》云："嗣昌所储军资、器械数十万悉为'贼'有。"《绥寇纪略》云："[献忠] 因全队未至，惧良王之议其后也，张伯鲸饷银数十万在城中，不及问。"未知孰是。）自是分军破樊城、当阳、郊县，招汝才之兵东下，二月十九日占光州。明杨嗣昌以"剿"局破产，福、襄两王罹难，三月初一日，畏罪自杀（从《国榷》）。明廷不知嗣昌败状，遣使致祭，语多诞妄，献忠闻之，拊掌大笑。[2]

襄阳之破，传说异辞，兹录较著者数说于次：

李馥荣云："献'贼'抵襄阳，以'贼'三千诈为督标叛兵先行，嘱之曰：'尔等前将近襄阳城，若我兵与尔等战，尔等即佯败，此陷城计也。'复伪造督师阁部兵符令牌，遣'贼'将刘兴秀领千余人，诈称阁部调官兵。叛兵前至襄阳城外，次日兴秀至，乃即与叛兵交战，叛兵佯走，兴秀逐之，旋抵城下，发人递兵符令牌入城，城门启，兴秀入为内应。"[3]

余瑞紫云："十三年五月二十八日陷襄阳府……且遍搜觅襄王，少顷执王。王年七旬外，须发尽白，体貌修伟，跪叩'八贼'曰：'求千岁爷爷饶命！''八贼'说：'你是千岁，倒叫我千岁，我不要你别的，只借你的头用。'王曰：'宫中金银宝玩，任千岁爷搬用。''八贼'曰：'你有何法禁我不搬哩？只有一件事，你不给我头，那杨嗣昌不得死。'于是杀王。"[4]

明兵部奏《为襄阳残破恳乞圣恩垂怜等事》云："大抵襄阳之变，起火出于猝然，而奸细伏于平日，祸根在献'贼'爱妾高氏等六口并叛党潘独鳌，久羁府监，不曾正法，狡'贼'线索勾引，匪朝伊夕。迨安排已就，突然于二月初四夜三鼓，遍地举火，满城从睡梦中惊突奔窜，民与兵与'贼'，搅混狂哗于烟火熏灼之中，而城中逐大乱矣。平时分

杂既莫可究诘，而降丁之安插樊城者盈千盈百，往来城中，不知是‘贼’是兵；况临时埋伏使人不疑者，则又有假充阁部差官，安置公署，防守吕堰一带武弁吴国玺，不先不后，随带家丁二十余入城，以领饷为名，无何城陷，而国玺忽失所在，且挈妻偕遁，其家丁敢与居民战于阳春坊，则国玺之通‘贼’不问可知……迨天明城内一空。死‘贼’大队巳时方至，襄王被执西城楼上，屡胁不屈，已而骂‘贼’，‘贼’怒，手刃三刀，而襄王遂遇害矣。”[5]

[按：刘兴秀以千余人混入襄阳城事，兵部行稿不及，系传误。余瑞紫自称“得之献忠口述”，其事可信；月日则当以兵部行稿为准。《平寇志》所载月日与兵部行稿同。]

四月初一日，献忠以众三万攻应山，不克，北走随、枣，入豫境，破商城、信阳，围固始，占光山，进逼麻城。二十五日破随州，杀知州徐世淳。六月，与左良玉战于南阳之西山，不胜，走裕州。旋破信阳，获左（一作官）兵旗帜，命其下假以趋泌阳，夜雨，乘以入，杀知县。明日左军始至，献忠已走。良玉不戢士，民遇“官军”无噍类。献忠围唐县，攻应城、应山，不克。七月四日围郧阳，守甚坚，撤围走，适明黄得功部卒一部起义来归，势大振。绕南阳至郧西，值郧西守军兵变，破之，饥民从者以万计。八月略地信阳，因屡胜而骄，为左良玉追及，大战，头领沙某败死，失马万余匹，部众数万散失殆尽。献忠中箭东走，郢抚邀其前，叛徒马进忠蹑其后，四战皆败。献忠负创不能驰。保其妇女小子日行三十里，二十五日至驴头店，去枣阳五十里，左良玉追兵又至，势甚危急。会大雨五日夜，江水暴涨，溪道断绝，明军将吏首尾离置者数十处，得脱险走商、固山中。罗汝才弃献忠，合于李自成。九月，献忠出商城之牛市畈（一作坂），取道向英山，大败于望云寨，众散且尽。借兵李自成，经罗汝才关说，始得五百骑。东奔，会当地起义军一斗谷、瓦罐子诸部，势稍振。时值李自成大破明军于项城，吸引明军北援汴，乃乘隙趋英、霍，与革、左诸营合。十月初九日，略桐城，为太

监卢九德，总兵周遇吉、黄得功等击败。十六日回攻舒城，十八日攻固始，均不克。十二月，潜山知县李令嘉催征严急，农民执之以献献忠，杀之。[6]

有桐城生员汪兆龄（麟）者，世家子也，以事入囹圄。闻献忠略江北，遂于桐城狱中，结死罪重囚百余人，杀狱卒，破狱逃出，奔降献忠，为之指画攻取之策，陈说图王定霸之谋。献忠喜得佳士，朝夕与俱，凡运筹帷幄，言听计从，其后，江北一带府、州、县地方，势成破竹者，兆龄与有力焉。[按：献忠得汪兆龄，一说得之桐城狱中，一说破蕲水得之狱中。《纪事略》记其事较详，不书月日。姑系此。]

献忠治军甚严，刀剑不离手。每安营，即发拨马，四路侦探，一里一拨，直至二百里外，有警即知。将攻袭郡邑，必前遣间谍，伪为僧道、游客、商贾入城，结纳市民为内应。若获名家大族，必质其父母妻子，遣士卒扮僮仆押行至城外，呼曰："我某也，被掳得脱至此。"守者知而纳之。计成厚遣之，以示信也。每战，必先出金帛、良马、美女，约战胜者赏之。乃选一人当前，名曰"领头子"，其余鱼贯而进，头子不过五六，有进无退。若受伤，游骑飞报重伤，呼换其人始退；次者序进，退步必斩，易三头子必鸣金收兵，率众奔矣。得胜，则尽以前物赏之，故兵不多而战常胜。[7]

是岁正月，李自成攻洛阳，得变兵一旅为导，克之，杀明福王。七月会罗汝才部，有众五十万，破叶县、项城、南阳，杀明唐王。十二月，连拔洧州、许州、长葛、鄢陵、禹州，杀明徽王。

是时，明军"剿"、"抚"，两俱破产。兵部屡陈"剿易抚难"，又陈"剿逆抚顺"，而"名抚实剿"则为主要打算。其说云："彼原窜伏于深谷大林中，兵至则潜身崖底，对面不见踪迹；兵去则明火冈上，半夜凭其窥掠。若非阳为招抚之名，阴行剿杀之策，有万万不能斩草除根者。"[8]朱明黔驴技穷，杀机愈炽，其如饥民受"赐"已多，不肯再吞其钓饵何！

是年四月，清兵攻锦州。

定国年二十一岁

二月初，定国（一作刘兴秀，从《鹿樵纪闻》）持所获明军符檄，以二十骑（一作二十八骑）夜叩襄阳城门，襄阳守道张克俭纳之，义军二十骑蹿蹿入，解鞍宿于承天寺。夜半火起，燔寺台并襄王府门，民望见火，以满城皆农民军也，弃城走，城中大乱；城外农民军大队驰至，遂克襄阳。嗣昌所储军资十余万，皆为农民军所有。[9]［按：据前引明兵部行稿所载，赚入襄阳城者似为吴国玺。未知孰是，录之以备一说。］

【注释】

［1］参见李馥荣：《滟滪囊》卷一；毛奇龄：《后鉴录》卷六；吴伟业：《绥寇纪略》卷七、卷十；徐鼒《小腆纪年》卷二。

［2］［3］参见李馥荣：《滟滪囊》卷一。

［4］佘村农夫：《野史无文》卷十五。

［5］郑天挺：《明末农民起义史料·兵部为襄阳残破恳乞圣恩垂怜等事》。

［6］参见彭孙贻：《平寇志》卷四；吴伟业：《绥寇纪略》卷十；戴笠：《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十四。

［7］参见戴笠：《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十四。

［8］郑天挺：《明末农民起义史料·兵部为汇报山西搜剿零级等事》。

［9］参见梅村野史：《鹿樵纪闻》卷下；毛奇龄：《后鉴录》卷六。

壬午年（1642年）

明崇祯十五年

正月，张献忠在英、霍收合各营，乘机复出，破潜山。二月下全椒（一作左、革事），十五日入亳州，官吏先遁，安行入城。三月围舒城，明参将孔庭训降，协攻城；城守材官李本高，辽东人，张虎、王显明、张明志，山东人，亦率众百余，缒城而下，降于献忠，四月初三日，克之。改舒城为得胜州。在舒，得医士胡立浦，其人孝心忠厚，广行方便，献忠甚重之，封为丞相。复设各官，吏、刑由献忠自领之。[1]自是，合革、左、袁、回诸部攻六安，屯于板山；守者川将覃世勋降，六日（一作十日）城破，献忠取其郊保莲花砦之民以益其军。二十日，攻霍丘，不克，走汪家集。五月，献忠屯舒城七里河、汪家滩，招土人刘麦，三河寨民刳羊豕以迎，献忠犒以牛八头，银五十两。[2]献忠将攻庐州，使侦者杂贸易入城觇虚实。五月初六日夜，乘守城者不备，以十三人自西城将军庙登城，守者溃走，打开大西门，放大队入，遂占庐州。［按：庐州之破，有说系某“奸细”引入，有说假充接送营兵，有说装学院承差暗进城来。据目击者余瑞紫说，皆非是。见余瑞紫：《流贼张献忠陷庐州纪》。］旁略含山、

巢县，破之，“变民”迎入无为。

献忠破庐州，杀人极少。七门各给银两招安，多被秀才与光棍领去。其部众对民人宣称：“你莫怕，咱不杀你，我老爷来安抚你们。”对士人则说：“天下大乱，我老爷应运而兴，相公可同我共成大事。”士民有称其头目为“王爷”者，其头目说：“你莫叫我爷，我等响马营生，都是兄弟相称。”到处搜集“头口”（牲口），进民房只收拾衣物，凡遇金银首饰皆掷之，只以绸衣放驴背上驮去，止树林中，以绸被铺草堆上休息。对所掳男女，均由献忠亲点，愿回家者另立一边；愿从军者，经媒人说合，由献忠批准择配。行军前，献忠下令搜银，凡带有金银者，投于桥下河水中，如违者杀之。军中甚重“官裁缝”，称文人为“相公”，呼医士为“大夫”，对于“商贩”及“球师”等技艺人员，亦颇尊重。读书人均由献忠亲自考试，愿从军者留用，行军时有“头口”骑。军令极严，对于俘来之虐民官员及本军之违法罪犯，均予严惩。打仗前，先掌号，许多人这一簇，那一攒，献忠马上奔驰，各处吩咐：“叫儿子们好生狠杀，杀败了黄闯子（得功——引者注），捉他的大马骑，我与你官上加官。”其大马营、厨房及不能作战之老弱，则另在一边。（据余瑞紫的《流贼张献忠陷庐州纪》、计六奇的《明季北略》卷十六编写。）

六月三日献忠破庐江，执知县刘思胜，旋纵之去。还屯舒城白马、金牛诸洞，游骑往来桐、英、含、巢诸境。时献忠连营数十里，止则布幕数千，庭庑堂室俱备；外植木为垣，以索系之，周以濠堑，马不得风逸。方圆数里如城郭。兵多而不精，长于袭取。七月复破六安，明卢九德以黄得功、刘良佐之兵救之，营于夹山，献忠击败之，势益盛。八月，献忠屯陶冲，分兵为三：一走六安，一趋庐州，一经庐江、三河，得双樯巨舟三百，大治舟舰于巢湖，习水师，复会回、革、左诸营于皖口，声言渡江出芜湖，攻南京。十五日再破六安（一作九月事），谋攻安庆、桐城。[3]九月七日，献忠抵枞阳。

献忠下枞阳，设四大营：一曰“中老营”，献忠居之，他曰“前营”、“中营”、“后营”，环护老营如鼎足。献忠尝戴尖毡帽，

服织锦胡桃花衣、软靴，布毯于地而坐，左右二十人佩刀随护，碗酒大肉，席地传饮。九月十日为献忠生日，各营头目及本营诸将，皆称觥上寿，优人侑觞，凡作三阕。三奏既毕，八音复举，欢饮移时，诸将辞出，献忠戒以晚间须慎，勿以纵饮误大事，诸将遵命，一揖而退。献忠夜尝不寐，裹甲微行，携刀巡视，虽左右仆御亦不知其所在，其深密如此。有入其老营者不得遽出，若见文士则询其策略，或当意者即授之职，赐以符合，使攻城取邑。对俘虏，逐人审问，如答应详明即留下，尝云："吾昔日在庐州，用一人即破一城，岂有文人无用之理。"故对文人多不杀。小卒掠得金银悉献主将，不得私匿，如藏银三两即受惩，恐其有金而逃也。（根据计六奇的《明季北略》卷十六编写。）

不日，献忠自枞阳夺巨贾舟百余入桐城境，觅善水人，备粮糗，谋西进。攻桐城，围久不克。城北有山名求雨顶，南麓曰杜鹃洼，献忠登求雨顶挥众填洼土城。闻明黄得功、刘良佐以重兵至，拔砦走潜山，营于古城、长岭二山。步骑九哨分为四大营，其左右二营皆腹心，前锋二新营莲花砦民参之。前阻大沟，后扼山险，为据险持久计。得功、良佐等卷甲疾进，夜半缘山后，噪而登，献忠与战，大败，丧马骡数万，腹心谋士妇孺俱尽。阵失闯世王马武、三鹞子王兴国。三鹞子，献忠义子，最号骁勇者也。[4]十月十日，便道攻桐城，复为黄得功所败，走蕲水。十一月，再围桐城，不克。值明军北击袁时中于颍州，闰十一月十二日，献忠乘虚出天堂（一作阴）山，拔营至三祖寺，以三百骑袭破太湖，杀知县杨春芳。十二月，左良玉避李自成于襄阳，从武昌东下，尽撤楚兵以从，蕲、黄诸城，集土团之不能胜甲者以守，献忠闻之，舍潜、太而攻黄梅，知县张联芳遁。[5]［按：各书此段记载很乱，《平寇志》舛误尤多。如云：十二月初十献忠破桐城，其时桐城固未破；又云：二十日"陷无为州……遂陷黄梅"。两地相去四百里，献忠当时兵力不多，安能同日攻破？今据《怀陵流寇始终录》及《绥寇纪略》所述月日及进军路向，略加编排改写。］

是岁，李自成围汴梁，不克，西破华州，饥民响应，睢州十

余郡县皆破。再围汴梁，“官军”决河灌之，自成觉，移营高阜，反决马家口以灌城。天大雨经旬，黄流骤涨，两口并决，声闻百里，汴梁漂没。[6]复破南阳，东下夷陵、荆门、荆州，焚明皇陵。

本年二月，清兵陷松山，汉奸洪承畴降清。十一月，清兵分道入塞，蹈蓟州。闰十一月，清兵南下，“畿”南郡邑多破。十二月，清兵趋曹、濮，山东州县相继陷，明鲁王以派自杀。十二月，明左良玉避李自成于武昌，大兵所过，奸淫剽掠，鸡犬不留，武昌城下，居民一空。[7]人民恨左兵已甚，见左兵来，皆潜伏女墙，浇水冻城，为农民军坚守。即粒粮根草，呼之不应，与价亦拒。[8]

定国年二十二岁

在张献忠军中。

【注释】

[1] 参见查继佐：《罪惟录》纪卷十七；阙名：《纪事略》，谈迁：《国榷》卷九十八；余瑞紫：《流贼张献忠陷庐州纪》；邓之诚：《骨董三记》卷六。

[2] 参见彭孙贻：《平寇志》卷五；戴笠：《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十五。

[3] 参见彭孙贻：《平寇志》卷五、卷十二；戴笠：《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十五；计六奇：《明季北略》卷十八。

[4] 参见彭孙贻：《平寇志》卷五；戴笠：《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十五；《明史》卷二六八。

[5] 参见吴伟业：《绥寇纪略》卷十；谈迁：《国榷》卷九十八；徐鼒：《小腆纪年》卷二。

[6] 参见徐鼒：《小腆纪年》卷一。

[7] 参见计六奇：《明季北略》卷十八。

[8] 参见郑天挺：《明末农民起义史料·兵部题为塘报南阳等处“贼”情事》。

癸未年（1643 年）
明崇祯十六年

正月，张献忠破广济。先是，有广济生员胡默，叩马纳款，前驱引导，至城下，果不烦一矢，倾城遂下。凡县辖独山、金子、凤凰等寨居民，不数日尽皆倒戈者，皆胡默为之也。二十一日破蕲州。夜，梯城而入，旦日，献忠入城，开各门放男子出，留妇女毁城。明下江防道副使许文岐微服出，被执，献忠颇礼之，后以谋叛被杀。蕲水乡官与农民军通，二月破蕲水，黄州豪绅闻风逃。三月，疾驰至黄州，州人张以泽集众迎附，乡宦欧阳玖、生员李时荣拜马首降。四月，略麻城，诸生周文江迎降。先是，楚士大夫仆隶之盛甲天下，麻城尤甲于全楚，梅、刘、田、李强宗右姓，家僮不下三四千人，雄长闾里，其泰已甚。农民军既起，思齐以尺伍为扞蔽，听其下纠率同党，坎牲为盟，曰“里仁会”。诸家竟饰衣冠以夸耀之，其人遂反刃相向，威逼故主。城内乱，城外地主武装围之，“里仁会”会众惧，以汤志为首，杀诸生六十人，共推周文江出迎农民军。麻城破，降者五万七千余人，乡宦洪正龙（武进士）亦率众千余人，诣献忠军前请降，献忠优礼相待。献忠将降者别立一营，号为“新营”，选勇士将

之。改麻城为州，以周文江知州事。寻破罗田。商州起义农民，请献忠设官，不许。[1]张以泽、李时荣等献策渡江，招星辰湖渔人具舟待济，逼汉阳甚急。[2]复遣间谍遍布武昌城中，时楚藩所募护卫新兵弁领张以敬者，原黄冈诸生，尝奉教楚藩，与献忠通，约为内应，李时荣之族居省城，亦愿效力，献忠遂决计攻武昌。[3]由樊江涉江而上，破汉阳。五月五日，从团风渡袭破武昌县，驻军樊口，明军退守洪山寺。二十三日从鸭蛋洲毕渡，二十九日薄城，"楚府兵"将领张其在降，开保安、文昌二门纳之。三十日占武昌，尽杀明宗室，沉楚王于江。录男子二十以下、十五以上为兵。六月初二日献忠入驻楚王府，称"大西王"。[按：《怀陵流寇始终录》云：二月二十三日，献忠破黄州，据府署称西王。《国榷》云：三月二十二日"张献忠复陷黄州及黄陂……自称西王。"献忠称西王，盖始于破黄州，至是称大西王。]初四日，铸"西王之宝"。改武昌为天授府，江夏为望江县。建两大旗于门曰"天与人归"、"招贤纳士"；九门俱树两旗曰"天下安静"、"威镇八方"[4]。

设六部尚书、五军都督府、五城兵马司。以周文江为兵部尚书，张其在为总兵前军都督，李时荣为巡按（一作抚），谢凤洲为守道，萧彦为巡道，陈驭六为学道，周综文、沈会霖、黄元凯等为知府。献忠题诗黄鹤楼以收人心。发楚府藏金赈济饥民：武昌五千，汉阳、六安五千。对于属城多不杀，于是蕲、黄二十一州县及兴国柯、陈二姓兵（柯、陈二姓兵，为元末陈友谅旧部，三百年间一直反对朱明统治）皆附。开科取士，取二十一人为进士，补詹龙翔、奚鼎铉、周谷植、徐良材等为州县官，给印，赏银数十百两有差。取四十八人为廪膳生，授府州县佐。其官，皆楚孝秀也。[5]另以汤志为游击，将骁勇四千守麻城，防凤、皖"官军"；以张以泽（一作其驿）为总督蕲、黄游击将军；以张以敬（一作其则）为黄州府通判。复令副将方子雄提塘二百屯江北，飞递军机，瞬息千里。六月初七日，献忠发银二百，修理黄冈；发银二千，令麻城守官修理公署。七月十三日，破祁阳。[6]

初，自成兵临汉阳，献忠先取之，自成颇不悦。及闻献忠定

武昌，遣人以书致贺，献忠遣三百骑，赍重货报礼于自成。[7]

献忠侦得明军将集武昌，二十日弃楚王府，移驻洪山，留张其在、谢凤洲守城，以养子四虎驻金沙洲，亲率大军为浮桥于金口，悉众西渡，谋湘、赣。已而，明军逼进，献忠率部南走咸宁、蒲圻，八月抵岳州，明沅抚李乾德及总兵孔希贵以两万人御却之。献忠怒，悉众二十万围岳州，百道俱攻，明军败走，五日占其城。自是分兵为二：一下长沙，一上荆州，以别将屯湘潭。将北渡，卜于洞庭君者三，不吉，大询洞庭君。十九日强渡，风发覆舟，遂陆走向长沙。围城三日，破之，明副将尹先民、何一德降。[8]献忠发布檄文云："孤提天兵临长沙，一日之内，两府三州归顺，副总兵尹先民、何一德带兵效顺，即愿前驱，进取江西，孤甚嘉之，封先民、一德世袭伯，所部将领，皆为总兵。升岳州府知府原任朱朝通判任维弼为分巡监军长岳道，升蒲圻知县吕凤起为知府。所属州县士民，照常乐业，钱粮三年免征，军民人等，各宜投册归顺，庶免屠戮，天兵临城，玉石俱焚，毋遗后悔!"[9]南趋破醴陵，追明湖南巡按刘熙祚，获其仪仗邮符，二十九日赚门破衡州，不戮一人。[10]一时民间争传"三年免征，一民不杀"[11]。献忠令其第四子进袭衡阳，八月二十九日破之，杀明将而夺其兵。其行军长达四十里，见马则擒，人多不杀。九月十九日南破永州，大西军先头仅五六百人，而明军溃兵四五万，望风奔逃，自相践踏，死者无算。[12]至是，湖南一省，除道州（一作辰州）外，皆破。

献忠自衡州分兵为三：一守永州，一入广西，一出江西袁州。献忠自归长沙，开科取士。（《衡州府志》云："九月，献忠入衡……开科，殿考授伪员，郡之劣衿，咸羶逐之。"）是时老回回屯荆州，献忠遣使修好，复与回合。[13]［按：《平寇志》载：献忠于九月初破荆州，杀惠府乐户琼枝。误。献忠取岳州后，北渡洞庭不得，遂南下长沙。此时驻荆州者为老回回。］荆州农民军亦试诸生，就试者九十人，取七名。首三名各赏三百金，余百金，不取者各十金。题为"三分天下有其二"，复试者甚众。[14]

大西军出江西，所至望风迎降。先是，明宗室之在江西者，

恣为非法，民间号之曰“鏖神”，闻农民军来，皆引领以望。九月二十五日，大西军至袁州插岭，守者降附。二十六日抵萍乡，士民牛酒相迎，路相属，次日入萍乡城。十月，张其在围万载，官吏空城窜，其在整队而进，以二千人屯城中，据县治，纵狱囚，招士民入城投顺，改万载为龙城县，于是瑞州、临江、新喻、分宜守吏皆逃。大西军部将高某以二百余人趋连州，未至，韶州兵备副使自刭，知州逾城遁，乐昌、乳源、仁化自溃，浔、桂、贺、全之间，蔑有固志。十一月，张其在以兵千人，自浏阳、万载分道抵袁州，袁州士民造册迎附，迫知府霍衡用印，知府逃，士民俱书“顺天救民”字于门，大西军白旆、鸣炮入袁州北门。左良玉使总兵吴学礼援袁州，十五日围城，大西军守将丘寰战死，失官兵二千四百余人。学礼兵淫杀，袁州、临江、吉安三郡民，屯结山险，以拒“官兵”。十六日（一作十九日）张其在破吉安，设官置守，改吉安为亲民（一作安）府，庐陵为顺民县，遣人持檄抵袁，复入袁州。二十三日，峡江农民执知县以待大西军，明军至，农民遮杀之，夺其马八匹。明军绐以“八大王兵至”，农民开门出迎，手持县印，口称千岁，备有大马二十五匹，粮草无数，新旧县官，俱已拿下，听候发落。[15]临武、星子风传免赋三年，农民欣欣向往。[16]吉安之破，大西军登城者止一人，全城皆下。大西军遣一骑飞至城下，城门固闭，守者登城望之，谓“止一‘贼’耳，亦何能为?”皆聚观于上，竟不设备。时有一树，生于城之半壁，骑士飞奔其下，手持铁钩钩树，一跃而上，大呼杀人，止杀一人，众皆惊溃；下城，复杀守门者一人，众遂狂奔。大队疾驰至城下，开门延入，须臾，城门复闭，不容出入，集城中士民，令之投降，凡二日乃定。始发铳三声，万人呐喊三声，四城鼓乐喧阗，门始洞开。吉安破日，永新、安福、泰和各县官，皆逃。[17]

献忠在长沙，拆桂邸殿材造宫殿。招当地起义农民增兵为九营，四营为老卒，五营为新附。复令马赐将步骑千人，取米、釜于临湘。十一月三日，献忠遣四将再夺岳州。步骑沿江设守，藏轻舟于港，以巨舰载辎重，顺流下。明副将王世泰、杨文富，以

兵三千邀击之，大西军逆流佯走，以诱明军。诸军争利，溯流上，尽夺其货入舟，舟重不能速行。大西军轻舟四出，围之，步骑夹岸邀击，“官军”死溺无算，丧师二千，舟二百艘。岳州军民空城走，大西军疾驰，复破之，武昌大震，抚按皆浮舟江上，图东下。献忠以有志入川，令降将尹先民守茶陵，别将守岳州，余众还长沙。二十三日，大西军逼常德，明将温察明弃城走，占其城。[18]先是，明常德守将周晋纳款于农民军，三月十日，李自成军至，明军扫空以待之。已而，农民军北走，明总兵温察明复据常德。原只溃卒四五十人，至常复招兵六千，其部五月不给粮，惟恃劫掠，人人恨之入骨。闻大西军至，望风先遁，追者只十六骑，而“官兵”四五千人，失魂丧魄，争前恐后，顷刻间，落崖坠涧死者，不计其数，辎重山积，皆弃不顾，其兵六千，降者殆半。溃兵沿途掳掠，所得妇女，号谓“兵眷”。大西军入常德，民间家供一牌以迎之，上书：“西府万万岁，顺民某人，左邻某人，右邻某人。”大西军退后，明侦者曾亲见之。[19]

破武陵（常德），献忠下令籍刽子手杨嗣昌家。令云：“房屋尽行烧毁，霸占土田，查还小民。”[20]又令票去西府平南先锋张云：“杨某调动天下兵马，与予为难，其子又到处团练乡兵，敢行抗拒。杨已中吾刃，令掘其坟墓，毁其房屋，有拿得杨族一人者，赏银十两；有拿得其亲子孙兄弟者，赏银一千两。”农民军在常之日，不妄杀人，惟宗室无得免者。[21]

十二月，大西军破建昌、抚州、南丰。献忠遣帅艾四下新堤，击明军马士秀于嘉鱼，败之，遂北屯嘉鱼。遣使与荆州老回回修好连兵［按：《荒书》云：献忠“十二月陷荆州，尽‘掠’荆州之民，剪发为‘贼’兵”。又《怀陵流寇始终录》云：十二月二十四日，献忠“大队自岳州渡江，与老回回合”。今从《平寇志》说］，势益盛。[22]十七日，艾四下三十六湾，转战锋锐甚，马进忠御之，败绩；再战蒲圻，复败绩，溃奔武昌。[23]献忠与众谋所向，有议先正位金陵，养威蓄锐，然后北伐者。汪兆龄进曰：“江南未可图也，若欲改号正位，养威蓄锐，莫如秦、蜀。然欲取秦，必先得蜀以为根本，根本既定，然后北伐，四征

天下，不足定也。”献忠遂决计入蜀。[24]

大西军所破湖南各城，仍置官守。守常德者为史可敬，长沙人，原仕明，由进士擢给事中，丁艰在家，降献忠为都宪，镇守常德地方，其称献忠曰“陛下”，曰“新朝”，曰“圣主”，皆见之于笺表。其守衡州者，为巡抚谭嘉瑞、知府吴之才、推官陶焕。献忠既去，守者多被明军执入狱。[25]

是岁，李自成自湖广北上，破河南五十余城，改襄阳为襄京，称奉天倡义大元帅，五月，改称新顺王。大败明军，杀督师孙传庭。十月，西入陕，破西安，北取榆林、平阳、庆阳、甘州，全部占有陕西。遣使通好于献忠，献忠卑词以答之。[26]而明军左良玉部号称数万，其部下子女玉帛充盈，老弱居其过半，元夕居武昌，方拟置酒大会，闻农民军已抵汉川，连夜遁去，下黄州，围城索饷；抵九江、安庆，饱掠客商，焚劫百姓，人皆以“叛兵”目之。明廷惮其拥重兵，专事姑息，加衔颁赏。及农民军远去，仍还武昌，以恢复为名，酒色太过，躄躠而行，民间畏之如虎。[27]明臣马世奇有云：“盖献人之所畏，闯人之所附，非附闯也，苦兵也……贼知人心之所苦，特借‘剿兵安民’为词，一时愚昧被欺，望风投降，而贼又散财赈贫，发粟赈饥，以结其志，遂至视贼如归，人忘忠义，其实贼何能破各州县，各州县自甘心从贼耳。”[28]

是年四月，清兵北归，战于螺山，明八镇兵皆溃。清兵去，明军“剿贼”益急。二月，兵部奉谕“勒限十日杀贼收功”。时因明兵残民以逞，兵民水火之势已成，左良玉奏称：“臣万不得已移驻武昌……讵期鄂人汹汹，嗔臣驻兵，借登�而发难，杀监纪于城头；又缘监司自臣舟晤回，竟从中道而群辱之。且地民动辄阻碍，不由当事主持，军需百无一应，同舟疾若寇仇。”[29]故“剿”令愈急而奏效愈少。

定国年二十三岁

献忠据武昌，义子十人咸赐姓张[30]，定国与可望等并赐姓称王。可望、定国于侪辈中最优异。长沙破，有武进士赵某者

降，与孙可望角而胜，献忠以其勇武，封之为二王，可望为三王，定国为四王。将士称赵二千岁，孙三千岁，李四千岁。后入川，赵某以罪被杀。[31]

【注释】

[1] 参见吴伟业：《绥寇纪略》卷十；阙名：《纪事略》；彭孙贻：《平寇志》卷六；谈迁：《国榷》卷九十九；计六奇：《明季北略》卷十九；徐鼒：《小腆纪年》卷二。

[2] 参见冯甦：《见闻随笔》卷上；吴伟业：《绥寇纪略》卷十。

[3] 参见刘继庄：《广阳杂记》；吴伟业：《绥寇纪略》卷十。

[4] 参见彭孙贻：《平寇志》卷六；吴伟业：《绥寇纪略》卷十；李天根：《爝火录》卷二。

[5] 参见吴伟业：《绥寇纪略》卷十；戴笠：《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十六；彭孙贻：《平寇志》卷六、卷七。

[6] 参见戴笠：《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六；冯甦：《见闻随笔》卷上；彭孙贻：《平寇志》卷六。

[7] 参见戴笠：《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十六。

[8] 参见戴笠：《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十六；毛奇龄：《后鉴录》卷六；吴伟业：《绥寇纪略》卷十。

[9] 谈迁：《国榷》卷九十九；彭孙贻：《平寇志》卷七。

[10] 参见刘继庄：《广阳杂记》。

[11] 参见彭孙贻：《平寇志》卷八。

[12] 参见顾炎武：《明季实录》。

[13] 参见彭孙贻：《平寇志》卷七。

[14] 参见顾炎武：《明季实录》。

[15] 参见谈迁：《国榷》卷九十九；戴笠：《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十六；邹漪流：《明季遗闻》卷一；彭孙贻：《平寇志》卷七；温睿临：《南疆逸史》卷四十一；徐鼒：《小腆纪年》卷二。

[16] 参见方震孺：《方孩未全集》卷十。

[17] 参见谈迁：《国榷》卷九十九；计六奇：《明季北略》卷十九。

[18] 参见彭孙贻：《平寇志》卷七；徐鼒：《小腆纪年》卷二。

[19] 参见顾炎武：《明季实录》。

[20] 邓之诚：《骨董三记》卷三。

[21] 参见顾炎武：《明季实录》。

[22] 参见彭孙贻：《平寇志》卷七；徐鼒：《小腆纪年》卷二。

[23] 参见彭孙贻：《平寇志》卷七。

[24] 参见阙名：《纪事略》。

[25] 参见计六奇：《明季北略》卷十九；《衡州府志》卷二十九。

[26] 参见彭孙贻：《平寇志》卷七、卷十二。

[27] 参见顾炎武：《明季实录》。

[28] 计六奇：《明季北略》卷十九。

[29] 郑天挺：《明末农民起义史料·援剿总兵左良玉奏为备述将士进止并近日维谷情综事》。

[30] 参见查继佐：《罪惟录》传卷三十一。

[31] 参见计六奇：《明季北略》卷十九。

甲申年（1644 年）

大西大顺元年（大顺永昌元年，明崇祯十七年，清顺治元年）

先是，庚辰年（1640 年）冬，四川彭县知县某，以民间未纳鞭银，为衙役工食，令自往索之。岁除索甚急，民皆怨。邑民（原作“豪民”）王纲、王纪倡议除衙蠹，集众入县，尽毁衙役之家，各州县闻风群起，名曰“除五蠹”：一曰“衙蠹”，谓州县吏胥皂快也；二曰“府蠹”，谓投献王府、武断乡曲者也；三曰“豪蠹”，谓民间强悍者也；四曰“官蠹”，谓缙绅家义男作威者也；五曰“学蠹”，谓生员之喜事害人者也。捶击死或糜烂鼎釜、活埋土中者无算。各县蔓延不解，成都亦揭竿拥众呼噪城下，院司多方抚慰不从，至发兵征讨乃罢。至本年，川势二急：在东北，则有姚、黄十三家，活动于顺庆、通江、巴州间；在北部，李自成部逼保宁，广元、昭化均降。献忠入川之时势已成。[1]

正月，献忠弃长沙，虚设官守于江南，造浮桥于三江口，自岳阳渡江，大队俱往江北。以一军过荆州，尽弃舟楫，步骑数十万趋夔州。[2]明军原在房、竹界上设十三隘兵（一作三十二隘），防止农民军东西奔突，十三年，杨嗣昌尽撤守隘之精锐入麾下，川东防御遂空。土司秦良玉上之巡抚陈士奇，请益兵守十三隘，

士奇不能用；复上巡按刘之勃，之勃许之而无兵可发。故大西军西上，并无一矢相加遗者。[3]正月（一作二月）下夔门，败明军曾英于巫山皮市隘，二月（一作三月）破万县，湖滩水涨不得上，留屯（《怀陵流寇始终录》云：留屯者三阅月）。水既落，选士卒健斗者十余万，负载者倍之，置横阵四十里，两岸步骑夹舟进。抵梁山，守将赵荣贵望风走。六月八日大败曾英于涪州，占其城。[4]自是，分舟溯流而上，献忠坐大船百余艘，鼓吹鱼贯而上，悬黄旗，书“澄清川狱”大字。重庆下流四十里曰铜锣峡，为江路所必经，明军宿重兵以守。献忠乃自黄葛渡登岸，自率步骑，登山疾驰一百五十里，抵一城［按：当即江津］，献忠乘马上，与众头目往来审视形势，遣人入城说降。守门军士纳之，各官问献忠复入四川，意欲何如？对曰：“暂取巴蜀为根，然后兴师平定天下，归诚则草木不动，抗拒即老弱不留。”各官令斩说降者，献忠遂破江津，夺其船。十七日克佛图关，铜锣峡反出其后，守兵惊扰不能支，遂围重庆。[5]［按：是年献忠由夔抵重庆一节，各书记载不一。《小腆纪年》将破夔州、万县、梁山，均系于正月，不书日以阙疑。《爝火录》则谓曾英扼农民军于瞿塘峡口，相持六阅月，因援兵不至，乃败。今从说之较多者。］四面攻城，多穿地道，发城外冢，取棺材板顶头上以御矢石，一人伤，即补一人以进。地道既通，灌以火药，火药发，城立溃。[6]二十一日克重庆，执明瑞王，将杀之，会天雷大震，献忠大呼曰：“天示雷霆，令我不杀瑞王耶？必剐王，天其奈我何！”以炮击天，竟磔瑞王。[7]

献忠令：凡敢据城砦顽抗者，劓其耳、鼻或断一手；但能杀王府官吏，封府库以待，则秋毫无犯。[8]各州县惟恐加兵，皆望风送款。献忠择其魁杰者授以知县之职，发兵送之。[9]七月初四日，献忠使刘廷举守重庆，自引兵趋成都，遣都督马元利、轶其名兵三万由简州进，温玉洁兵一万由泸州进，越三日，献忠起营赴江津，水路并进。温玉洁攻泸州不下，被擒死，献忠亲临破之。令兵北趋，一路州县，望风迎降，烽火百里不绝，成都大震。[10]八月初一日，兵抵顺庆，降之，献忠使张都督、殷承祚

驻兵守。初五日，骑兵从资阳，水兵从洪雅、新津薄成都，明总兵刘胤嘉战败，巡抚龙文光遣人往灌县决埝水注城壕，水未至，大西军填壕竟进，肉搏攻城。时成都尚有兵三万，援兵复四集，献忠乃遣兵士扮作乞丐医卜客商之流，混入城中为内应，然后穴地城北，实以火药，又取大木长数丈者刳之，两两相合，缠以缯帛，亦贮药向城楼，城上望之益惧。内外夹击，初九日破成都，杀明蜀王。献忠入驻蜀王府，称秦王［按：献忠入蜀称王，各书均作“大西王”，惟《蜀记》及《鹿樵纪闻》作秦王。观后孙可望上书永历称：“先秦王荡平中土”，《续绥寇纪略》云：“先秦王谓献忠也”。是献忠曾称秦王之证］，国号大西，改元大顺。造新历，更其名为“通天历”。铸“大顺通宝”钱，颁行全川四道，传示军民人等，每人各结一文于帽侧或领旁，以别顺逆。分兵攻崇庆、新津、彭县、刊郫、绵州、绵竹、仁寿诸县，十月占蒲江。川东农民军姚、黄兵五万来归。[11]

献忠既得蜀，汪兆龄、张可望合词劝进，内以汤武之征诛相劝奖。献忠谦让再四，竟日不出。可望等效陈桥故事，拥集蜀宫门外，排闼直入，以黄袍加献忠之身，内外齐呼万岁，献忠遂于十一月十六日登基，国号大西。［按：献忠即帝位，各书所记月日不一，《纪事略》作八月十五，《滟滪囊》作十月八日。今从《绥寇纪略》。］献忠改成都为西京，以藩府正殿为承天殿，以府门外屋为朝房，诏民间皆称己为“老万岁”，不拘良贱之家，令皆立“西朝皇帝万岁”牌位于大门，供以香花。是日，殿前赐各官朝服，令丞相以下，朝罢入朝房议事。事皆决于左丞相，然后上闻。[12]

汪兆龄条陈治安之策，略谓：“固蜀之策在先取汉中，治蜀民之策在革除旧任官员，用人之策在兴学校、选真才、黜冒滥、严幸进。”其余定赋役各项事宜，条目尽多，献忠纳之，一时设施如下：

置东阁、五府、六部官。以汪兆龄为东阁大学士（一作左丞相），以投降进士严锡命为内阁学士（一作右丞相），以胡默为吏部尚书，以投降知县彭县王国宁为户部尚书，成都吴继善为礼部

尚书，以随营李时英为刑部尚书，王应（龙）为工部尚书，齐之奂为京畿道御史。又设成都四门御史四员，四川东西南北道御史四员，学院四员。其侍郎、科道、大小九卿、府尹、州治、内外官制，一时全设。[13]

严门禁及保甲法。诸门各设一兵部、二都督，千人为门军，以讥诃出入。凡城内出者，先赴兵马司处，投递手本，上开某街第几铺或某坊，民某人出，到某处，左右邻某人，户首某人，保结某人，有无家口，约某日回城。如至期不回，则拘左右邻及户首问罪。其城外入者，兵马司盘问明白，填给入票，事毕出城，验缴原票，方行放出，如或有失落原票者，即留不放。如系本日往还者，则于左颊印一图书，至晚验明图书，方行放出。[14]

开科取士。八月乡试，旋会试。试一场，用经书文、策、论、表各一，判五，献忠自出题云："以兵胁蜀。"取龚济民等若干人，时应试者不下数千。[15]

辟街道。城内街道作十余丈宽，坦直如矢，可容五十骑并行。两旁有房屋相碍者，立时拆毁。[16]

设官置守。广元吴宇英、阆中周建鲁谒献忠求仕，献忠授宇英四川巡抚（一作吴宇英"不屈"死，盖以后事），建鲁监军，使赴保宁、巴中等地招降。后，巴州士民以献忠所设巴州官虐民，民间另举都归极者谒献忠，愿守州城，献忠授以副将，使守城。都归极屡败地主武装向贞亮等兵。[17]

分兵为一百二十营。虎威、豹韬、龙骧、鹰扬为宿卫，设都督总督领之。城外立大营十，小营十二。[18]以可望等为将军：可望平东，监十九营；定国安西，监十六营；文秀抚南，监十五营；能奇定北，监二十营。[19]（《续绥寇纪略》云："以养子张可望为平南监军，张文秀为平南先锋，张定国为前军都督，张能奇为平南将军。"）以王尚礼为中军府都督（一作提督），白文选为前军府都督，王自奇为后军府都督，以窦名望为提督皇城都指挥，以王复臣、王自羽为水军左右都督。各营知名者为：八卦营汝州王明，振武营麻城洪正龙，隆兴营泾阳郭嘉允，三奇营凤阳宋官，永定营合肥郭尚义，三才营山东娄文，干城营六安汪万

象，援剿营宝鸡彭心见，中厂营万县杜兴文，英勇营黄冈张其在（一说其在已死），天威营开封王见明（一作鸣），龙韬营麻城商元，决胜营汾州周尚贤，定远营六安张成，此外尚有志义、天讨、金戈、神策、虎贲、虎略诸营，各营均设总兵。[20]又配知府以游击，知州以都佥，知县以守备，皆以新科所取文武进士、举人为之。其卒，日发口粮银一钱，而蜀中米，每升值银八钱。如“掠”（缴获）得米二升，则粜一升，便食不尽矣。[21]

献忠传谕内外文武官吏衙门以及军民人等，凡一应地方事情，悉赴王尚礼处裁决处分，汇疏题奏，内外肃然。部署略定，积极开拓边境：以李定国领本部人马，略川北安岳、遂宁、射洪一带未附山砦；以刘文秀倾兵出镇广元，截御三秦；以孙可望率部出川西北（一作分巡川之东、南二道），可望克龙安（今平武），留部将王运行驻守，复引兵收茂州。艾能奇出兵雅州，明知州王国臣及杨之乔等降，献忠以国臣为茶马御史。[22]初，王国臣与川南道胡寅（一作恒）不睦，将执之以徇成都，寅逃入土司高克礼家，高与杨之铭世仇，乘乱相攻。已而，杨之铭之弟之乔，杀之铭而降献忠，并执寅家口数十人送献忠。献忠喜，声言“边郡新附，免其三年租赋”[23]。献忠追收全川文武印信，改铸七叠印文。遍招诸土司，铸金印以易其官，惟石砫土司秦良玉及黎州马金（一作坚）不受，至是，四川除遵义一郡外，全川皆下。[24]

献忠下保宁，将杀城守者，禅僧破山为之请。献忠以犬豕肉进曰：“啖此则从汝。”破山曰：“王毋食言。”遽尽数脔。献忠笑曰：“吾生平贵信，言杀则必杀，言免则必免，不似朱家以空言诱人也。”舍之去。[25]

献忠过新都，官吏偶失迎，至汉州，百姓匍伏道左，人赏一元宝。及回新都，人先期迎，献忠怒曰：“汝想要老子元宝耶?”折道旁树枝打之，“尽死”[26]。

献忠至苍溪，成都生员颜天汉因献忠将轶其名代进谏表，中有“请培养士子，抚恤百姓，宽刑罚以修帝业”等语。献忠可其奏。[27]（一云：颜天汉通表李自成，献忠伪为“试士”，杀之。）

献忠兵经酆都，部将驰报：有宿冥王殿者，兵立死。献忠至

殿，斫神像如碎粉，夷其庙。[28]

献忠北趋广元，道经“龙凤祠”，庞士元、诸葛孔明合庙也。大修殿宇，塑姜维像增其内，盖以自拟云。[29]

献忠北征梓潼，拜封梓潼神。重修七曲山神祠，又建关壮缪祠于其东，皆极华丽。献忠屯七曲山文昌祠，诗曰：“一线羊肠路，此地更无忧，人是人神是，同国与天休。”令从官严锡命等皆和。其诗，刻石于祠北八卦亭，石极高，久而不坏。留像于天尊阁上，绿袍金脸，貌颇“凶恶”。[30]［按：诗刻后为清知县王维坤所碎。像，直至乾隆七年（1742 年）始为邑令安得洪所碎。］

献忠甚勇武，单骑独行，大喝一声，四五十人即地就戮，不敢抗，人称其“醉柔而醒暴”[31]。

是岁正月，李自成称王西安，国号大顺，改元永昌，造甲申历，定军制，铸钱币，平物价，减赋税，设科取士。月末，东出潼关，二月占太原，三月攻占宁武关，长驱直入，直捣北京。令降官杜勋缒城说朱由检：请割西北一带，分国而王，并犒赏军银百万，退守河南；自成亦愿以劲兵助制“辽藩”（清兵），但不奉诏与觐。由检不从，十九日遂破北京。四月，自成率部东拒清兵于山海关，廿九日败还北京，称帝，改元大顺永昌元年。当夜西走，弃山西，守西安。献忠闻之，遣使与之结好。[32]

五月初三日，清兵入据北京。明福王由崧监国南京，十五日即帝位，以明年为弘光元年。是时，清兵仅十余万人，而明军则不下五十万，卒因明之士大夫以剿“贼”为重，以御“虏”为轻，引敌入关，使满洲贵族得长驱而有中国。

定国年二十四岁

成都破后，定国封安西将军，与可望俱称“千岁”。献忠于蜀王府邸内建东西二王府，可望居东府，定国居西府。[33]

献忠入成都，将杀城守者，定国流涕苦谏乃止（一作孙可望事）。列兵于道，过民其中，壮男少妇皆入营，巷市一空。[34]

十一月，献忠以定国为前军都督，北袭汉中。先是，保宁、顺庆一带已降李自成，置官设吏，献忠悉逐去之。[35]自成部将

来争，刘文秀溃于广元。七月，马科檄至保宁，提塘邯郸人李从彦以部众从之，占保宁；八月占顺庆，遂至绵州。九月，艾能奇与马科战于绵州之桃子园，能奇败，献忠自将与马科战，科败，以残卒千余人奔汉中府。十月，定国入保宁，先致一书，移自成部下诸将，书云："方今明运式微，江山分裂，所在群雄角逐，各思正号。但今争天下者，惟我主与尔主及大清耳。近闻尔主被清兵所伤，百万劲旅，一时瓦解，始信勇可恃，势不可久，惟在天与，自然人归。今我主自河南永宁与尔主分兵南北，江南八省，尽入版图，兵不血刃，正位西蜀，果然君圣臣贤，将勇兵强，从古未有之盛也。今欲以建瓴之势，收破竹之功，特先发先锋张□□，前军张□□，统貔貅五十余万，首取西安，接应麾下。况麾下及将兵人等，皆同功一体，何分吴越。且良禽择木，自古所重。愿麾下深思熟虑，早决从违，兵到之日，各率所部聚会军门，共图大举，慎勿徘徊歧路、坐昧先机可也。"书发不报。十一月，往攻汉中，献忠驻广元应之。时汉中为李自成所有，遣将韩文以四千人守之。自成溃，传言清兵入栈道，而献忠之兵又大至，文弃汉中入西乡县。定国不入汉中，引兵出褒城县鸡头关。大雾方炊，自成部将贺珍等自栈道奔汉中，见守兵，以骑突之，定国不战而还，贺珍遂据汉中府。定国还攻沔阴之圆山砦，月余不克；砦人求救于贺珍，珍救之，定国还守保宁。[36]献忠还成都，核功罪，以定国出汉中，"兵败先逃"，捆打一百，降千总，仍挂安西将军印。[37]以刘进忠入驻保宁。

又，李馥荣《滟滪囊》谓北争汉中为轶其名事。与《荒书》所载定国事略同，时间系于乙酉正月。兹录如次：

> 乙酉年（1645年）正月初三日，献忠宴伪官，酒酣，言于众曰："三国以来，汉中原属四川，今吾定都于川，不取汉中，能免他人得陇望蜀乎？闻闯王遣马炌守汉中，炌庸才耳，若不早取，他日易以能人，则难图也。吾计之熟矣：因蜀新定，士民尚须经理，故迁延未果。目今春和，需平东、虎威二将军北行，平定汉南；如川南杨展、王祥，何足

介意，惟川东曾英，宜速图之。况重庆乃楚蜀要冲，不可为人所扼，都督张广才，遐迩咸服，可早灭曾英，以便东下，咱无忧矣。”众应诺。饮至更阑而散。初八日，其名牌行汉中，广才牌行重庆。十五日，复宴饯各贼将。十六日，其名、广才两军齐发，献忠诣北门阅军，见人马精壮，器械鲜明，大悦，云：“有此劲兵，三千可当十万，况三万乎，马炌等当不战自降矣！”其名抵宁羌，未知自成以贺珍代炌。珍到宝鸡，闻汉中有警，即兼程至褒城，遣人通韩国公，以兵马侦探蜀兵消息，知已抵宁羌，珍等严兵拒守。次日，其名贼兵攻汉中，闻贺珍在褒城，遣虎威将军张能第以众一万拒珍。珍伏马步兵于堡舍村落，城门洞开，分左右翼以待，令百余人倏进倏退诱敌。能第轻敌驰前，未几，珍佯败，能第追至城，两翼伏发，左右掩杀，生擒能第，大败贼兵。其名走沔县，珍追战于园山砦，贼复败，其名走入广元……时献忠亦亲至苍溪，调其名还，其名请加丧师之罪，献忠释之……贺珍以三千人败三万，如摧枯拉朽，引兵入汉中，释放降人。

[按：大西军北略汉中，《绥寇纪略》作平东事，《续绥寇纪略》作刘文秀事，惟《荒书》及《蜀道驿程记》记为李定国事较详，《蜀道驿程记》得之定国部卒口述，当可信，从之。又，汉中之争，论者多认为系张、李间之武装冲突，其说似未足据，理由有三：一，献忠一生，未与农民军任何一部自相火并，当李自成败守西安时，献忠犹与之结好；二，献忠初至四川，征诛频繁，在保宁、广元间，虽与自成有置官设守之争，似亦未发展到用兵程度；三，《平寇志》称献忠“尽逐自成所置‘伪’官吏，自成不敢与争”。其说似更可信。且其时自成新溃，各部叛附未定，军行进止之间，发生误会，不无可能，《续绥寇纪略》云：“初，‘王师’败李自成于山海，自成有溃卒万人由褒城出，欲投献忠，刘文秀贪功，径出广元，将袭杀之，忽遇明将贺珍，统兵三千，设伏以待，文秀出不意，大败，兵士被擒甚众，故献忠

云：‘前年出师汉中，反为贺珍所败。’”可见大西军北出，仍为扫除明军余部及抗御清兵打算，决非大西军与大顺军之同室操戈。定国兵败受责事，言人人殊，姑志之以供参考。]

【注释】

[1] 参见费密：《荒书》；戴笠：《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十八。

[2] 参见彭孙贻：《平寇志》卷八。

[3] 参见计六奇：《明季南略》卷十二；《明史》卷二七〇。

[4] 参见顾山贞：《客滇述》；吴伟业：《绥寇纪略》卷十。

[5] 参见李馥荣：《滟滪囊》卷二；李天根：《爝火录》卷七；戴笠：《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十八。

[6] 参见顾山贞：《客滇述》。

[7] 参见彭孙贻：《平寇志》卷十一；谈迁：《国榷》卷一〇三；李天根：《爝火录》卷二。

[8] 参见计六奇：《明季南略》卷十二。

[9] 参见顾山贞：《客滇述》。

[10] 参见李馥荣：《滟滪囊》卷二；孙錤：《蜀破镜》；叶梦珠：《续绥寇纪略》卷一。

[11] 参见费密：《荒书》；沈荀蔚：《蜀难叙略》；顾山贞：《客滇述》，戴笠：《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十八；谈迁：《国榷》卷一〇二；阙名：《纪事略》；叶梦珠：《续绥寇纪略》卷一。

[12] 参见吴伟业：《绥寇纪略》卷十；孙錤：《蜀破镜》；阙名：《纪事略》。

[13] 参见阙名：《纪事略》。

[14] 参见李馥荣：《滟滪囊》卷三；阙名：《纪事略》。

[15] 参见珠江旧史：《劫灰录·张献忠传节略》。

[16] 参见佚名：《蜀记》。

[17] 参见李馥荣：《滟滪囊》卷三。

[18] 参见吴伟业：《绥寇纪略》卷十；李天根：《爝火录》卷七。

[19] 参见彭孙贻：《平寇志》卷十二。

[20] 参见毛奇龄：《后鉴录》卷六；阙名：《纪事略》；佚名：《蜀记》；计六奇：《明季南略》卷十七。

[21] 参见计六奇：《明季南略》卷十二；沈荀蔚：《蜀难叙略》。

[22] 参见阙名：《纪事略》；费密：《荒书》；李天根：《爝火录》卷七；

叶梦珠《续绥寇纪略》卷一。

[23] 参见戴笠：《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十七；吴伟业：《绥寇纪略》卷十。

[24] 参见吴伟业：《绥寇纪略》卷十；彭孙贻：《平寇志》卷十一；阙名：《纪事略》。

[25] 参见戴笠：《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十八；吴伟业：《绥寇纪略》卷十。

[26] 参见吴伟业：《绥寇纪略》卷十。

[27] 参见李馥荣：《滟滪囊》卷三。

[28] 参见李天根：《爝火录》卷七。

[29] 参见吴伟业：《绥寇纪略》卷十。

[30] 参见王士正：《陇蜀余闻》；陶澍：《蜀輶日记》。

[31] 参见李天根：《爝火录》卷七。

[32] 参见钱䎖：《甲申传信录》卷一；彭孙贻：《平寇志》卷十二。

[33] 参见陶澍：《蜀輶日记》。

[34] 参见戴笠：《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十八。

[35] 参见李天根：《爝火录》卷七。

[36] 参见费密：《荒书》；王士正：《蜀道驿程记》；阙名：《纪事略》；叶梦珠：《续绥寇纪略》卷五。

[37] 参见佚名：《蜀记》。

乙酉年（1645年）

大西大顺二年（大顺永昌二年，明弘光二年，清顺治二年）

春，大西军严整军纪，令各都督府制订禁约，立石广布。其驳骑营都督府刘禁约碑文云：

大西驳骑营都督府刘禁约：

（上缺）圈本府秉公奉法，号令森严，务期兵民守分相安，断不虚假，仰各驿铺（缺）约法数章，如有犯者，按约正法。特示。

一、不许未奉府部明文，擅自招兵，扰害地方者，许彼地方士民，锁解军前正法。如容隐不举，一体连坐。

一、不许往来差圄并闲散员役，擅动铺递马匹兵夫，查出捆打。

一、不许坐守地方武职，擅受民词，违者参处。

一、不许假借天兵名色，扰害地方，该管地方官，查实申报，以凭枭示。

一、不许无赖棍徒，投入营中，擅辄具词诈告，妄害良民，违者捆打。

一、不许守□文武官员，擅娶本土妇女为妻妾，如违参究。

大顺贰年叁月　　日[1]

大西军力谋扩大农民起义军影响，革除地主统治阶级传统陋习，锐意革新，著者如次：

献忠自为文讥评古帝王，谓之“御制万言策”，颁布学宫，复为圣谕刻石曰：“天以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鬼神明明，自思自量。”[2]

令古籍、碑记、牌坊、书梁、题柱，尽易大西年号。[3]禁其下勿触讳，凡郡邑、人物，犯必改。石碑有明朝年号及献忠字者，铲其字。[4]［按：王士正《道蜀驿程记》云：剑州府学所存宋碑，其年号均为农民军铲去，惟“绍兴”字犹存。］

献忠厌苦礼法，朝会已，掷冠于地，踏之，仍着大帽。[5]礼仪从简，“册封皇后”，废除繁琐仪注。[6]毁弃明朝典制，诸官奏对有引用《大明会典》者，责一百棍；有坚持“人君当正南面而立”等旧规者，杖一百二十。[7]

严锡命请诏书宜稍文，献忠以武官只须直话。乃上书“奉天承运”为诏书常格，其文则用白话。平日发敕书与属下，必须口述，不论鄙俚，悉照其口语书之。[8]

令地方官员及乡绅皆来朝见，有逃匿不来或百姓藏匿逃官者，凌迟处死。[9]搜求“朱姓”尤急，知蜀府宗室多在灌县，遣兵围而杀之。[10]太慈寺僧众，因匿蜀王宗室，悉杀之。[11]

令民间冠婚丧祭，不用乐，不饮酒，黄昏即闭门就卧，不得张灯。又禁不得私藏金银，凡各文武官员家有窖金者，许其家人首告，赏以官职，仍以本主妻妾马匹与之。过锦州（里），见严锡命屋壮丽，即斩之。[12]又拘绅袍富室大贾，罚饷银皆以万计，少亦数千，不问其力之足否。[13]其财帛金宝，官兵不敢私分毫，尽缴献忠贮库。[14]

对投降受职官员，责治尤严。礼部尚书江鼎镇，以郊天祝版不敬，杖之百；有某祭酒，以生日受诸生礼，仅值十钱，置之死[15]；降官有沿用故朝陋习，连名状迎迓上官者，杖杀之。[16]

四川缙绅，对大西军扞格最大者，则为“杀士”。先是，献忠求治心急，议开特科以取士，令严锡命草诏云：

朕以凉德，属当斯运，思隆治道，而明不远烛。实需贤能，匡其寡暗。然朕自莅极以来，乡、会两闱，竟未见登显誉罿，式备周行者，意或箕颍高人，以食玉炊桂，无因自达，将怀宝迷邦，咸思独善欤？何人材若斯之难也。朕是以申旦疑虑，景夜损怀，创前朝所未有，肇近代之新规，建设特科以罗致俊彦。尔所在官司，凡有前朝在籍乡绅，及未仕两榜举贡监生、新旧生员、童生、民间俊秀子弟，下至医卜僧道，与夫深山穷谷隐逸硕士，凡有抱一长，挟一技，堪为帝师王佐，鹰扬帷幄者，着地方官敦崇礼请，汇册起送来京，候朕临轩策试。不拘资格，量材酌用，俾其释梦袭衮，出野登朝。至尔多士，须知学而优则仕，乘机利见，不必以汤有惭德，武未尽善，徒洁其身，不降其志，有负朕侧席之怀。如所在官司，礼请不周，地方里甲，举报有遗，将里甲官司，以蒙蔽治罪。或礼请举报有名，而本人规避高蹈，将本人以观望重谴。於戏！人生一世，逢遇诚难，速宜去此幽谷，翔兹天路，趋铜驼以观国，望金马而来庭。朕当随其方圆，饬之矩矱。钦哉特敕。

敕下，各府州县应召来京者，主仆约算十万有奇（一作万二千余人）。试于成都以西之青羊宫。文士中有讥评献忠为“井底蛙”者；有欲为朱明复仇，效“博浪之一击”者；有“通书李自成”，挑拨张、李关系者；更有乘机图谋不轨，杀监兵数百，黉夜伙逃者。献忠怒，令王尚礼逮捕为首者一百五十九人正法，复令各地严缉逃犯归案法办。献忠传旨刑部云：

朕因两科无人，开设特科取士，以罗文武全才，故调集全川士子，到京面试。不意诸子狼子野心，多半观望，间有一二赴选者，又皆庸碌，非老即幼，且浮夸不实，无一真才。到京数日，即谋不轨，杀监兵数百，黉夜伙逃，幸督臣

王倚礼察觉，擒缚首逆一百五十九人正法外，方移诸逆入城内大慈寺居住，以俟考选。[17]

因革新太急，对杀人控制不严，先杀叛官，次及豪绅、诸生，间亦波及平民、部队，人心疑惧，地主统治阶级逐乘机蠢动。三月，献忠命定国、文秀等率部东讨重庆，为明军曾英、于大海等所扼，败于多功城。川东不守，川南、川西各地地主武装，纷起反抗：王祥起遵义，杨展起犍为，蛾眉万年寺僧众亦于甲申年（1644年）十一月，与地主武装联络，起而为梗。献忠数发兵往剿，不能胜，一时叙、嘉各地尽失。杨展兵至叙府，大西军上南道周士贞闻报，集众谓之曰："今'官兵'入叙，亦复抢掠，安忍见香国海棠，同归焦灼耶？吾当与尔等共逝矣。"因大开六门，使居民连夜远遁，全活者甚众。九月，大西军孙可望南征，败杨展于叙州，收复永宁卫乐英砦（今古蔺），降罗从义等五千人，然叛乱迄未终止。十一月，大西军上南道郝孟旋叛归明，邛、雅一带地主绅士皆归之。是时，四川各郡县之地主武装，其成军而知名者：曾英屯重庆，朱化龙屯茂州，曹勋据大渡河所，赵荣贵屯来归，总督樊一衡领副将侯天锡等驻泸州，巡抚马乾率兵三万人屯内江，卫副总兵屠龙率通巴五营李正闻等扎纳溪；其他拥众据城邑、保村落、驻山谷、凭险塞者不可胜数。[18]川北各地，俱将大顺年号用马粪涂抹，改弘光年号。对于大西军所置官吏，或刺于庭，或投之水火[19]，有到任两三日即被杀者，甚至有一县三四月内连杀十余县官者。[20]献忠怒，对于豪绅地主之反抗，采取严厉报复手段，下令云："凡尔处市镇俱顺民，勿恐；家给'大顺钱'，缀于首可不死，而山中作逆者当剿除之。"对于叛徒及"五蠹"，均予严厉镇压；搜求仕宦尤为严峻，濒于死者，日以数计。[21]时川民不堪豪绅压迫者，纷起响应，以打"衙蠹"为名，四出攻击，杀胥吏豪绅，脔食其肉；豪绅家奴仆，亦起而戕灭其故主，于深山大谷中树砦栅，标旗帜，人称为"土暴子"，川南、川北豪绅畏之甚于大西军。綦江、巴县间，饥民或数百成群，至富室团坐索食，谓之"吃大

户”，官不能禁。献忠每平一地，即下令抚民。通江平，遣史钻传为舍，黎廷甲为主簿，华处精为典史，使副将翟仙桂将兵守之，示谕停剿抚民。[22]

十月，清下诏招抚献忠，诏云：“明祚衰微，臣奸政舛，人心瓦解，国祚沦亡。今天下一统，率土臣民，皆朕赤子。张献忠前此扰乱，皆明朝之事，因远在一隅，未闻朕抚绥招徕之旨，是以归顺稽迟。朕洞见此情，故于遣发大军之前，特先遣官赍诏招谕。方今有志之士，皆欲争先归顺，建立功业，张献忠如审识天时，率众来归，自当优加擢叙，世世子孙，永享富贵；所部将领、头目、兵丁人等，各照次升赏。倘稽延观望，不早迎降，大军既至，悔之无及！兹特诏谕，想宜知悉。”[23]献忠置之不理。

是岁五月，李自成败死于湖北通城九宫山，其残部，众尚四十万，一部以郝摇旗（后改名永忠）为首，六大部，众十余万，往依明督师何腾蛟；一部以李锦（一作李绣，后改名赤心）为首，十八营，众三十余万，往依明湖北巡抚堵胤锡，联合明军，坚持抗清。李锦虽受官书，然疏简犹称自成为“先皇帝”，自成妻高氏为“太后”。堵胤锡隐忍听之。[24]

是年，清兵分三路南下：一路经山西、西安，追李自成于湖广；一路经河南趋江西，六月取九江、南昌，九月占皖南各地；一路经徐州趋淮、扬，四月屠扬州，五月陷南京，杀明福王由崧，六月取苏、杭，七月屠嘉定，十二月逼闽西，明唐王聿键出奔。因清兵屠戮残酷，各地农民及明室旧臣，纷起抗清。先是，明福王由崧于南京遇害，唐王聿键监国于福州，十六日即皇帝位，号称隆武。不久，鲁王以海又监国于绍兴，各主一方，互不相下。

定国年二十五岁

大西军刘廷举守重庆，为明军曾英攻陷。廷举求救于献忠，献忠命定国、刘文秀、王复臣等，以兵三万攻重庆。三月（一作二月），兵至合州，据多功城而垒。十八日，选精甲出浮图关陆路，大营由合州水路，夹攻重庆。曾英遣余（一作于）大海当水路，张天相当陆路，戒勿轻战，自以轻骑五百，间道袭多功城，

陷之，即引兵出大西军后，破之于重庆亭溪。定国败走，川东遂不守。[25]［按：多功城之役，他书作刘文秀事，《明季南略》则作定国，姑系于此。］

【注释】

［1］郑天挺：《明末农民起义史料·图版一》。

［2］毛奇龄：《后鉴录》卷六。

［3］参见李馥荣：《滟滪囊》卷三。

［4］参见徐鼒：《小腆纪年》卷八。

［5］参见戴笠：《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十八。

［6］参见计六奇：《明季南略》卷十二。

［7］参见顾山贞：《客滇述》；佚名：《蜀记》。

［8］参见吴伟业：《绥寇纪略》卷十；计六奇：《明季南略》卷十二。

［9］［10］参见叶梦珠：《续绥寇纪略》卷一。

［11］参见李馥荣：《滟滪囊》卷三。

［12］参见戴笠：《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十八；珠江旧史：《劫灰录》；叶梦珠：《续绥寇纪略》卷一。

［13］参见沈荀蔚：《蜀难叙略》。

［14］参见叶梦珠：《续绥寇纪略》卷一。

［15］参见李天根：《爝火录》卷七。

［16］参见吴伟业：《绥寇纪略》卷十。

［17］阙名：《纪事略》；佚名：《蜀记》；李馥荣：《滟滪囊》卷三；冯甦：《见闻随笔》卷上。

［18］参见叶梦珠：《续绥寇纪略》卷一；李馥荣：《滟滪囊》卷三；计六奇：《明季南略》卷十二；欧阳直公：《欧阳氏遗书》。

［19］参见徐鼒：《小腆纪年》卷九；佚名：《蜀记》。

［20］参见计六奇：《明季南略》卷十二。

［21］参见沈荀蔚：《蜀难叙略》。

［22］参见彭遵泗：《蜀碧》卷四；李馥荣：《滟滪囊》卷三；郑珍：《播雅》卷十五。

［23］《清世祖实录》卷二十一。

［24］参见李瑶：《南疆绎史》摭遗卷七。

［25］参见费密：《荒书》；计六奇：《明季南略》卷十二；叶梦珠：《续绥寇纪略》卷一。

丙戌年（1646年）

大西大顺三年（明隆武二年，清顺治三年）

大西军在四川，外受清军威胁，内受豪绅地主武装攻击，处境日艰。闻清兵主力追李自成南下，欲乘间走陕西以蹑敌后。[1]行前，献忠嘱可望曰："我亦一英雄，不可留幼子为人所擒，汝终为世子矣……我死，尔即归明，不可为不义。"[按：《小腆纪年》云："献忠乃尽杀其妻妾，一子尚幼亦扑杀之。"以后事嘱可望云云。杀妻子事不可信，"归明"之说，殆表示抗清决心耳。]七月（一作九月），献忠弃成都，令"四将军"各领兵十余万北走，驻西充之金山铺（一作金镇铺），当西充、盐亭二县之间。时尚有众五六十万，旌旗蔽野。十一月二十七日，叛徒刘进忠引清兵入西充，献忠方巾，被一支梅直裰，猝骑，遇敌凤凰山（一作坡），大战，献忠当先搏战，单骑突而前，举弓睨清兵左部，清兵右部亦睨射献忠，献忠与左部并倒。清将豪格分兵四出，大西军一百三十余营均破。[2]可望、定国收集残部数千，家口万余人，由顺庆南奔。所至杀马而食，马尽食，人尚日驰百余里。至渠河，遇曾英兵千余游徼，能奇出不意，奋击走之，追至重庆江。时可望将卒皆残悴，骑不满千，弓刀脱落，曾英意轻之，尽

移江中战舰于南岸出奇门，以待其弊。文秀望重庆车马辐辏，军人纵饮市肆，谓可望曰："彼易我，恃长江而不设备，可乘也。且我军绝粒既十余日，与其饿死孰若一战?"言讫即手弓矢、口衔利刃，跃入江，履水而行，徐湖等五人从之，至朝天门忽溺不见，南岸兵望见皆大笑，以为自沉水死。文秀等从水中断铁缆，穴舱而入，立杀数人，出不意，尽为文秀所歼，获一大舟而还。于是选壮士得百余人，披甲执长矛、钩牌、弓矢、火药登舟，绕江上下，冲突转战，南岸兵望风披靡。曾英驾大舸数十，绕围可望于江心，自持画弓立桅后，为王自奇射中，洞胸堕水死。军既失帅，遂大乱，英兵十万，顷刻瓦解。"四将军"克重庆，降曾英众，乘胜占綦江。[3]

"四将军"师次綦江，可望传谕云："皇上汗马血战二十余年，抚有西土，皆赖众将戮力同心所致也。方欲驰骋燕、赵，还定三秦，为天下除残去暴，开万世不拔之基，不意创业未半，中道崩殂……尔等各营大小将领，传谕兵丁人等，各宜同心协力，共扶'幼主'，克成大事，各人富贵功名，未可量也!"传谕之后，欢声满营。其有不服可望提调者，以军法责之，各营帖然。[按：此谕，《蜀记》原作晓谕"献忠生太子"事。一曰，"欢声满营"，再曰："不服可望提调者，以军法责之。"盖可望借此以统摄散众欤?]

重庆之战甫毕，左丞相汪兆龄适至，"四将军"杀之。先是，兆龄降献忠，年仅十九，献忠重用之，亲信威权，冠于他人。凡献忠所用酷刑，皆兆龄导为之，所杀以万计，军中久积恨。[4]献忠既死，"四将军"数其罪曰："若一囹圄死人，我等破蕲水城生若，以若为世家子，保若为相，不谓若一意杀人以固宠。我等戮力疆原，收获诸健儿，为若数四言，杀之殆尽；即川民效忠于我，主上拟赏金帛以固结之，若必欲取而尽杀之。今日之败，我辈从万死一生，幸复至于此者，皆若所致也，若之肉军中不足食也，今当诛若以谢三军!"能奇引弓射杀之。[5]

是年三月，清兵追明鲁王，战于钱塘江。六月，清兵渡江，鲁王遁入海。清兵屠金华，陷衢州、严州各地。八月，清兵经仙

霞取汀州，明唐王聿镈遇害。十月，明桂王由榔监国肇庆。十一月，明唐王聿镈称帝广州，改元绍武。未几，桂王由榔亦即帝位，号隆武二年，以明年为永历元年，发兵与唐王聿镈争广州，败于三山口。十二月清兵陷广州，执唐王聿镈。同月，明郑成功起兵海上，谋恢复。

定国年二十六岁

四川败后，定国每静念："有明天下，自秦州'煽乱'，'怙恶'不'抚'，决裂至是，吾辈胆义素不后人，何惜此筋力不以恢廓疆宇，归复明朝。"文秀亦以为然。[6]自是有联明抗清意。

【注释】

[1] 参见冯甦：《见闻随笔》卷上。

[2] 参见查继佐：《罪惟录》传卷三十一；彭孙贻：《平寇志》卷十二；叶梦珠：《续绥寇纪略》卷一；李馥荣：《滟滪囊》卷三；王先谦：《十朝东华录》卷二。

[3] 参见邵廷寀：《西南纪事》卷十二；珠江旧史：《劫灰录·张献忠传节略》。

[4] 参见戴笠：《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十八。

[5] 参见冯甦：《见闻随笔》卷上。

[6] 参见邵廷寀：《西南纪事》卷十。

丁亥年（1647 年）

明永历元年（清顺治四年）

正月三日，大西军发綦江，下令："自今非接斗，不得杀人！"初十抵遵义，守将王祥先逃，道府各官、生员、耆老，俱焚香，以猪酒粮草出城十里迎降。入城，秋毫无犯。[1]驻旬余，无所侵扰，第遣人往各乡村索刍粮。二十三日发遵义，抵乌江，文秀仍领水兵十余人泅水而渡，直抵南岸，击败守军杨吉，砍伐竹木等作浮桥夜渡。三月，连克贵阳、定番州、永宁州。[2]明巡抚范圹降（《南疆逸史·王祥传》谓圹降于庚寅年［1650 年］春），士民多望风送款。[3]

可望欲率众趋岭南，急则入海。定国力主联明，与可望争，引刀自刺，其将焦元、勃利夺其刀，裂旗裹创，众罗拜曰："吾辈唯安北（西）将军所命。"可望不得已，与诸将谋曰："盍相与'反正'扶明?""四将军"乃为坛而盟，复本姓，尊可望受约束。[4]联明抗清之势开始形成。

时云南内战方烈。先是，阿迷州土司沙定洲与其妻万氏，以兵攻黔国公沐天波于省城，败之。沐天波奔永昌。宁州土司禄永命败死。明副将龙在田（原石屏土司）亦败走大理。龙在田与许

名臣等，前于崇祯之世，曾奉总理卢象升檄援荆襄，十一年调至襄阳，隶总理熊文灿军前，识张献忠部将孙可望等于幕府，颇相得，后以熊文灿获罪，罢归石屏。及闻可望军入平越，使人间道告以乱，曰："假大义，滇可定也。"[5]"四将军"喜，诈称黔国焦夫人（焦夫人，《滇南纪略》作"沐公母族"。《续绥寇纪略》作天波"夫人焦氏"，《云南通志》说同。未知孰是）弟所借兵，为黔国公复仇。[6]复遣间者魏泗，先入滇南，扬言"复仇兵至"，故"四将军"所至，悉开门降，长驱而入，全无阻梗，势如破竹。三月二十八日破交水（《滇系》云："天启二年移沾益于交水。"后，沾益建新城，旧城今为交水村），越二日又破曲靖，明知府宋文旦、知县陈六奇死之，执巡按罗国瓛，降副总兵孙守约等。由越州（今越州镇，明时为越州卫）奔陆凉，扬言捣沙定洲老巢。定洲惧，弃昆明南走。"四将军"击败之于蛇花口（一作革泥关，《新纂云南通志》云：关在路南县东南），遂由陆凉、宜良趋省城。宜良知县方兴佐率众持羊酒迎附，可望喜，不入城。四月至省会，城门不闭，各民人户外俱设香案迎接，城中老幼拥巡抚吴兆元出城迎降。入城，出令招抚，人心稍安。[7]搜检现任文武官员及乡绅举贡，分别授职，宣称："共襄勤王，恢复大明天下。"[8]有令云："为黔国讨贼，民间安堵无与。"[9]又云："凡赴海内（滇人称滇池为滇海）、山内躲避者，限三日内回家复业，如不回者发兵剿洗，不论官绅士民，有小心者急速归家，免得离散。"凡犬，悉令打死不留，以绝夜吠之声。民间寡妇，拿去配人。铸"大顺"钱。[按：各书均作铸"兴朝"钱，惟《新纂云南通志》沿旧志说作"大顺"钱。疑"四将军"入滇之初，仍用"大顺"钱；后可望称国主，始改铸"兴朝"钱。]派军四出打粮，为一年之食。招抚外逃百姓回家复业，不足者借给牛、种，于是居民咸集。复令提督王尚礼访殷实富户，追逼饷银，日夕比较，喊叫之声达于城外，有致死者。[10]粮饷既足，遂分兵两路出剿。一路以李定国为主，徇迤东，而可望则自出迤西。

四月十六日（一作八月、十月，从《爝火录》），可望与刘文秀率部西出。破富民，杀知县陈昌裔。西拔广通，杀故浑源州知

州张朝纲，遂下武定、楚雄。遣将张虎下姚安，杀姚州知州何思、姚安举人席上珍、大姚举人金世鼎。（姚安之破《滇南纪略》作可望回师滇西时事。《新纂云南通志》作己丑年［1649年］六月事。）禄丰启明桥之战，明守臣杨畏知兵败，投水不死，被执，踞而骂可望为“贼”。可望以畏知为同乡，闻其在云南甚得士民心，欲降之以收人望。[11]婉言说畏知，与之相约三事，以期联合恢剿。当约：（一）不用大西年号；（二）不妄杀人；（三）不焚庐舍、淫妇女。[12]畏知降，可望待之厚，逐为之用。[13]

五月，可望至大理，明将龙在田、许名臣降。可望征诸土司钱粮、夫役，多负固守险不服。有昆明诸生金公趾者上书可望，言：“滇、黔土司，受沐氏恩威三百年，故凡有征调，朝呼夕至，今若早迎沐公回省，与之共事，此为上策。”[14]可望得书大喜。七月，遣刘文秀入永昌（今保山），悉返所获沐国世宝，以“共扶明室，恢复江山”为词，说沐天波共同御清。天波喜过望，从之。时守永昌者为别驾刘廷标、司理王运开，分护永昌府印及金腾道印。天波向之索印，不与；促郡士民哀请之，仍不与。士民汹汹，咸集府前，或哭或哗，或以理请，运开与之语，不应，哗益甚。运开、廷标自杀，遂占永昌。[15]永昌下，顺宁、蒙化、金齿一路皆受抚，各处安官管理，沿途设马塘，有事飞报，十日程途，马上公文一昼夜可到。可望回至大理，闻丽江梗阻，命兵讨之，破鹤庆、丽江，明土官木垚降（《南明野史》作八月十八日），约岁输银一万二千两，作四季解省。西出凡三月，迤西尽平。[16]可望留都督王复臣驻守干崖、陇川一带，率部东返。[17]

可望偕沐天波返省城（《爝火录》云：九月，天波被执还滇，可望以之为报门官），号召诸土司，出兵认饷。[18]由是，禄培以嶍峨降，禄永命［按：其时永命已死，应作昌贤］以宁州降，王扬祖以新兴降，各处土司，次第来归。云南十八府，除普洱、东川外，皆平。每府每州，安兵一营，以抚左营守安宁，天威营守晋宁，作两迤门户。[19]“四将军”联合诸“倮倮”部，有其军，众至二十余万。[20]

可望命艾能奇讨东川禄万钟，东川设备已久，且道路崎岖，

禄万钟选弓弩手伏路侧林密处，箭镞尽涂以毒药，能奇领兵人，将至东川，尚离三十余里，不防伏弩齐发，带伤者甚众，能奇中箭死，遂罢征。能奇之丧，可望发兵送，民间老幼，尽往吊焉。（他书均作能奇病死，今从《滇南纪略》。）

“四将军”置官，以沐天波提调土汉官兵，加云鹤服色，以杨畏知为华英殿学士兼都察院左都御史，任僎为副都御史，以严似祖为吏部兼礼部尚书，并署新兴雷跃龙，永昌龚鼎、龚彝，澂江吴宏业等数十人以官。八月，“四将军”具太牢，亲祀孔子于文庙，严似祖不至，可望怒，系至，发王尚礼审，赖众祈得释。随命严似祖考试省生员，以此一考为定，高下有差，取三十三人，观政选官。是岁，秋成有望，凡所顺州县，均加抚恤，开仓济寒生，每人谷一斗。有古额祭祀坛场，照旧举行。[21]

是年正月，清兵陷梧州，二月陷长沙，连陷湖广等地，明桂王退处粤西一隅。四月，明郑成功复海澄。六月，明陈子壮与张家玉等攻广州，为清兵击败。海上之师攻漳州、宁波均失利。

定国年二十七岁

四月，定国人昆明，住布政司署。[22]部署略定，于初八日率部略迤东，连破呈贡、南宁（曲靖）、晋宁、师宗、通海、河西诸地。时迤东地主武装纷起，知名者有晋宁举人段伯美，呈贡诸生余继善、耿希哲等，共推昆明人孔思程为首，据晋宁，抗拒定国军。十四日，定国破晋宁，孔思程泛舟走，段伯美与晋宁知州冷阳春、呈贡知县夏祖训等均败死，克晋宁（《云南府志》作定国还师阿迷以后六月间事）。明江川知县周柔强，拒定国于抚仙湖中之孤山，定国击败之，尽歼其军。定国逼河西，明四川巡抚耿廷录赴水死。[23]东徇阿迷、蒙自，克之，改阿迷州曰“开远”，蒙自曰“沐新”。是月下旬，师抵临安（今建水），沙定洲部目李阿楚拒战甚力，定国穴城置炮，炮发，城崩，李阿楚战死。迤东悉平。[24]

临安之役，沙部使兵守城上，定国连营围困，十日不下。定国于城北角视土稍软处可以挖窑，着各营挑选精健，掘冢取棺材

板以搪枪炮，相排在前，健卒持锹锄于后，挨近城墙将二箭之远，即以棺材板为墙。壮卒竭力向城挖去，每兵布袋一条，装土，即垒为城。不日，土城宽有十余丈，高丈余，卒运土如蚁，城上枪炮不能伤。挖四日，守城者不知，不为备，惟向民间索酒食而已。至第五日，挖者用麻绳丈量长短界，揆已至城下，乃抬火药五六桶，放于窑内，用白布数匹，内放火药，扭为“引线”，外以筒瓦相合，以避湿气。用土石自放火药处层层坚筑，如是筑至始挖洞门口，仍放火药数升，将“引线”头放于药中，火药发而城崩。始发号，步卒先爬所轰缺口而入，砍开城门，马兵始入，尽站城上，或把住街口，占有临安。[25]定国还自迤东，所部汉兵、倮兵达五万人。[26]

【注释】

[1] 参见邵廷宷：《西南纪事》卷十二；佚名：《蜀记》。

[2] 参见叶梦珠：《续绥寇纪略》卷二。

[3] 参见顾山贞：《客滇述》。

[4] 参见戴笠：《怀陵流寇始终录·甲申剩事》；温睿临：《南疆逸史》卷五二。

[5] 参见邵廷宷：《西南纪事》卷八；冯甦：《滇考》。

[6] 参见温睿临：《南疆逸史》卷五十二。

[7] 参见黄向坚：《寻亲纪程》；佚名：《滇南纪略》（北京图书馆藏抄本作《滇寇纪略》）；冯甦：《滇考》；计六奇：《明季南略》卷十七；《云南府志》卷五。

[8] 佚名：《滇南纪略》。

[9] 邵廷宷：《西南纪事》卷十二。

[10] 参见佚名：《滇南纪略》。

[11] 参见计六奇：《明季南略》卷十七；李天根：《爝火录》卷十七。

[12] 邵廷宷：《西南纪事》卷八。

[13] 参见计六奇：《明季南略》卷十七。

[14] 李天根：《爝火录》卷十七。

[15] 参见邵廷宷：《西南纪事》卷十二；冯甦：《三忠臣传》；佚名：《滇南纪略》。

[16] 参见佚名：《滇南纪略》。

[17] 参见曹树翘：《滇南杂志》。

[18] 参见计六奇：《明季南略》卷十七。

[19] 参见佚名：《滇南纪略》。

[20] 参见王夫之：《永历实录》卷十四。

[21] 参见佚名：《滇南纪略》；佚名：《滇南外史》；《云南府志》卷五。

[22] 参见佚名：《滇南纪略》。

[23] 参见冯甦：《滇考》；李天根：《爝火录》卷十七；徐鼒：《小腆纪年》卷十四。

[24] 参见黄宗羲：《沙定洲纪乱》；李天根：《爝火录》卷十七。

[25] 参见佚名：《滇南纪略》。

[26] 参见王夫之：《永历实录》卷十四。

戊子年（1648年）

明永历二年（清顺治五年）

“四将军”在云南，兵势大盛。当艾能奇未死时，四人同称王：可望称平东王，定国称安西王，文秀称抚南王，能奇称定北王。[1]明致仕御史任僎，滇人，倡议称可望为“国主”，设六部，以干支纪年。[2]内修政治，以任僎为礼、兵二部尚书；用王应龙为工部，丁序焜为户部，张虎为锦衣卫，马兆熙为学院；命王应龙行巡按事巡察两迤；罢去四城督捕，百姓皆归昆明县管理。众将以可望为主，凡事悉听其约束，彼此往来均称为“兄弟”，其下文武皆称之为“师主”（一作帅主）。每公事相会，四人并坐于上，然各营诸将赏罚，则一尊于可望。[3]丁亥年（1647年）八月，开始建置四王府，用黄瓦，撤呈贡、昆阳二城为之，墙脚宽六尺。[4]本年二月，复增修昆明城池，内设重城，作敌楼突门数十，又于南门外毁居民（民居）万余，作御教场，殿宇将台，穷极宏丽，一改昔日之规模。[5]

严保甲：户设一牌，书大小男妇姓氏，悬之门首，以备查核。严门禁，不许妇女出入。凡男人出入，各以腰牌为据，上书本身年貌住址。城外人城者，将腰牌进，挂于城门内月城右廊；

事毕出，仍取去，门上始放出。城内出者，持腰牌挂于城之左廊；事毕入，仍取去，有牌，守卒始放入。远来者，面上打印为号；有印，门卒始放出。[6]

定丁赋：差人踏看田地所出，与百姓平分。(《滇考》云："括近省田地及盐井之利，俱以官四民六分收。")田主什与一焉。条编半征，人丁不论上中下全征。[7]

榷盐税：黑、琅两井之盐归官，令商人在省完工本，领票赴盐井支盐，由是凡系盐商悉大富。命史文为盐统，司盐课，商税尽归史文收。[8]

铸钱币：滇俗用海肥，今皆毁去，于云南省城及下关设炉十八座，炼铜；铸"兴朝（通宝)"钱，每大者文抵一分，次者文抵五厘。(《爝火录》云："分大小四种：当银一两、一钱、一分、一厘。凡上纳钱粮，放给俸饷，以至民间一切贸易，皆通用之。")立法甚严，钱、盐之法，广行无阻。[9]

造兵器：安什造局四所，不论各行匠役，尽收入局中打造。(《滇考》云："收取各郡县工技，悉归营伍，以备军资。")凡兵弓箭、盔甲、交枪之类，有损坏者，送至局内，挂下营头、队伍、姓名，三日后即易以新。[10]

供什物：凡兵有家口者，每冬人给一袍；无家口者，一袍之外，人给鞋袜各一双，大帽各一顶。如是养兵，士饱马腾。[11]

广建置：丁亥年（1647 年）八月，在云南（昆明）建立太庙祀张献忠，称之曰"老万岁"。凡有大事，必先告庙而后行。后明桂王至滇，虽建立明太祖庙，遇朔望吉日祭祀毕，仍遣大臣至张庙行礼。[12]

"四将军"部都督王复臣，镇守干崖、陇川一带，劝谕诸土司谒贡方物，迟加之兵。盏达副使刀思韬降附。复发兵守四川之大渡河，贵州之镇远，中路之雪山关。凡入滇之路，悉扼守之。[13]

春，明四川巡抚钱邦芑修书致可望，可望以书报之。先是，丁亥年（1647 年）秋，邦芑乘"四将军"之西，率总兵王祥据遵义，至本年春，据有全川。闻可望兵行兵有纪律，不轻杀人，因修书草檄，差推官王显往招之。至滇，可望大喜，谓显曰：

“从来朝廷文官，与我辈为仇，绝不相通，今遣使通问，何敢自外？但我辈称王已久，求钱巡抚具疏，封我为王，我当举全滇归朝廷矣。”然邦芑无意联合，乘机挑拨其部将白文选曰：“忠义美名也，叛逆恶号也，孺子且辨之，丈夫可身陷不义乎！”文选惑之。[14]

明副将杨昆、金陵进士耿章光等，因阴通可望，事败被杀。先是，杨昆潜走云南，怀有空印敕数百道，密招各省使内应，入册者不胜数。过安庆，为关使所觉，昆与前副总兵汪硕德等被执，其妻急付册名于火，得全活者甚夥。二月至江上，事败，昆与硕德皆死，同难者有进士杨卓然、万日吉、耿章光等三十七人。由水陆踪迹因缘而至死者，为原任推官周世臣、原任词臣韩四维等四十四人。[15] [按：是时，“四将军”声威未及，“联明抗清”之局尚未形成，明室旧臣似未必立即响应，杨昆所怀者疑为永历印敕。惟《鲁春秋》云：“杨昆潜走云南。”时桂王固未至云南；又《广阳杂记》云：“金陵进士耿章光以通秦王被杀。”是耿章光确因通秦王致死也，故附此待考。]

是时，抗清明师，统分为“海上”及“粤西”两部。海上之师，郑成功（属唐王）、张名振（属鲁王）主之。四月，清兵攻福建，明军经营之七府一州二十七县多失，所存仅宁德、福安两邑。八月，郑成功遣使奉表肇庆，明封之为威远侯[16]，西南、海上自是始有联系。

两粤，由何腾蛟督师，其主力则为大顺军旧部郝永忠（摇旗）、李赤心（锦）等部。各部虽屡立战功，然皆以曾经为“贼”，不为明之士大夫所容。先是，郝永忠败归桂林，明兵拒其入城[17]；城外地主武装“团练兵”复与之交恶[18]，经何腾蛟出面调停，始允郝永忠在桂林以北之兴安、灵川间息兵。本年二月，永忠败绩灵川，复不谅于明官，致激永忠兵变，大掠桂林。四月，马进忠进复常德，忠贞营李赤心等亦克荆门、宜城，遣使告捷。进忠、赤心俱封公。明督师堵胤锡恶马进忠，招赤心兵至，使进忠让常德与之。进忠怒，焚常德而走，致李赤心部不得食。[19]十一月，李赤心败清将线国安于湘潭，连克益阳、湘潭、

湘乡、衡山等县[20]，势稍振。及会何腾蛟于湘潭，因与马进忠有旧隙，不并力；赤心被迫离湘潭，出援江西，致遭惨败。[21]粤西军事，遂不可为。

时明臣党争甚烈。先有四党：吏部侍郎洪天擢、大理卿潘曾纬等随李成栋反正广州者，为一党；阁部严起恒、吴贞毓等皆南宁随驾之臣，为一党；礼部尚书吴璟、左副都御史刘湘客等皆客路迎銮之臣，为一党；翰林陈世杰、验封司主事吴以连等皆广东本省人，为一党。[22]久之又分为吴、楚两局：主吴局者为阁臣朱天麟、督师堵胤锡等，以他方人为之魁，内结马吉翔，外结陈邦傅以自助；主楚局者为袁彭年、丁时魁等，大部皆楚人，少数外人为之辅，外结瞿式耜，内结李元允以自强，而实权皆归李元允。[23]袁彭年、丁时魁、蒙正发、金堡、刘湘客等相依为奸，人目为“五虎”。各党延揽势力，排除异己，全不以御清为念，内政日非，兵事亦日急。原大顺军、大西军将领，在民族颠危之际，虽矢志抗清，然以明臣不肯推诚相与，一面诱惑农民军“退伍归农”；一面又嗾使明军各部处处与农民军掣肘，而农民军内部又不和，故卒不免于败。

定国年二十八岁

定国南下开远［按：《小腆纪年》诸书，均作定国南下“普洱”。实则佴革龙为开远县地，定国是年未至普洱］，大败沙定洲于佴革龙，滇南悉平。

先是，“四将军”各领一军，不相下，而定国兵尤多，可望欲并之，兵独弱，恐不能得，谋于王尚礼。尚礼等议尊可望，约于四月一日，各营兵将同赴演武场，尊可望为主。及是日，定国先到营中，遂放炮，将帅字旗升起。可望后至，遂问曰：“我尚未至，谁升帅字旗?”众答曰：“西府老爷先至，众将不知，照往日例，遂将旗升起。”可望曰：“军中旧制，主将入营，方升帅旗，天下所同也。今日既以我为主，应候我入营，方升旗放炮，若西府入营，何升旗？目中无我明矣，我安能为众人主乎?”刘文秀曰：“此西府一时之误，望大哥姑容!”可望愤不已。尚礼请

责旗鼓官赎罪，可望亦不允。定国曰："我与汝兄弟耳，今日因无主，尊汝为首领，遂欲如是，异日可知矣！汝不做则已，我何必定靠你生活！"众人多方劝解。可望登座发落，怒曰："必欲我为主，必杖定国百棍乃可！"定国怒曰："谁敢打我？"可望曰："定国不受杖，则军法不能行，异日何以约束诸将？"众力劝不已，定国喧哄愈甚。可望怒，欲上马去。白文选从定国后抱持之，曰："请老爷勉强受责，以成好事，不然，从此一决裂，则我辈必至各散，皆为人所乘矣。"于是王尚礼、冯双礼等，同将定国按倒于地，持杖鞭之。杖至五十，定国不得已，呼曰："我今服矣。"众乃为求免，遂舍之。可望复抱其颈泣曰："吾以大义辱弟，幸同心无虑疑！"定国顿首谢，请擒沙定洲以赎罪。[24]［按：可望杖责定国，《明季南略》作本年四月初一日事，谓其时艾能奇尚未死。今从其事，而能奇之死，仍从《滇南纪略》。］

佴革龙有九山最险，峒名溪乌，其外围据点曰大庄（《阿迷州志》云：大庄砦在城南四十里），沙部悍将黑老虎守之，刘文秀围攻久不下。[25]八月（从《滇南纪略》），定国益兵佴革龙，诛黑老虎，守者多动摇。[26]是时，沙定洲据开远城东，地势险要，纵横百余里，大小三百余砦，参差有别，彝多汉少，其中佴革龙乃其巢穴。[27]定洲据老砦，与其妻万氏分险而守，其下汤嘉宾、陈长命各据一山立营，相去数十里，为掎角势，复私通交趾，借其援以固众心。一日，定洲等偶集于汤嘉宾营（《阿迷州志》云："定洲土目杨嘉，方迎定洲就其营宴"），定国侦得之，举兵遽至，围以木栅，困之三阅月，绝其水源。[28]凡沙砦下山取水之处，皆系龙泉（滇人称泉为"龙泉"），尽砍树木铺盖，以木填平，令兵士下营守之。沙部无水，计穷，发櫑木滚下，水上营盘不能立。定国又令兵士砍桩，于黑夜钉于四围，櫑木不能下，暗令兵士挖窑，轰其老砦一角，沙部不能守，缩入九龙峀。定国、文秀复发兵围峀，斯峀亦苦无水，所食之水，多用锡打为池，贮水以备急用。水绝计穷，出降者绪，遂破其砦，擒沙定洲及其妻万氏。定国焚其山砦，招抚附近地方，附逆者悉不究，各安农事。对于降者抚慰赏劳之，出令不许掳掠，违者立斩。迤东

全平。[29]定国逮定洲、万氏至昆明，诛之。沐天波叩首谢，滇人被沙氏害者，皆以为快。[30]

定国围佴革龙老砦时，粮不继。临安之米，仅供半月，粮几绝。乃起省城民夫，每户夫一名，每名领米二斗，至临安交米一斗五升，其五升给夫作口粮。省城每夫一名，脚价银二三两不等。彼时禁令甚严，惟百姓贸易，兵余一概不许，民以生意茂盛，乐于挽运，不知其苦。及粮由临安又运至老砦，遂至不绝食。[31]

佴革龙平，定国南通安南、交趾、缅甸、占城、罗甸等国。定国谓为："失却十省，收服五国。"[32]

镇雄土司，恃险不服，定国率兵讨之，土司慑服。索马立贡马，索鸟枪立铸造，输纳恐后。[33]

沙乱既平，定国说可望曰："闯、献两帝，辛苦二十年，'蹂躏'遍天下，至今身死业隳，究无寸土，而□□（清人）坐享渔人之利，甚可悲也！吾辈本大明臣民，中国沦陷于外寇，则当严辨夷夏之界，以中国为重，今挈滇、黔、蜀'归就'明室，诚心辅佐；恢复旧京，荡清海内……将来竹帛之垂名可图也。"刘文秀、白文选极赞同之。[34]

【注释】

[1] 参见计六奇：《明季南略》卷十四。

[2] 参见温睿临：《南疆逸史》卷五十二。

[3] 参见计六奇：《明季南略》卷十七；佚名：《滇南纪略》。

[4] 参见佚名：《滇南纪略》；李天根：《爝火录》卷十七。

[5] 参见黄向坚：《寻亲记程》；李天根：《爝火录》卷十八。

[6] [7] [8] 参见佚名：《滇南纪略》。

[9] 参见黄向坚：《寻亲记程》；佚名：《滇南纪略》；庄士敏：《滇事总录》卷上。

[10] 参见佚名：《滇南纪略》。

[11] 参见佚名：《滇南纪略》；李天根：《爝火录》卷十七。

[12] 参见李天根：《爝火录》卷十七。

[13] 参见曹树翘：《滇南什志》卷二八；佚名：《滇南纪略》。

[14] 参见计六奇:《明季南略》卷十四;徐鼒:《小腆纪传》卷三二。

[15] 参见查继佐:《鲁春秋》。

[16] 参见徐鼒:《小腆纪传》卷三八。

[17] 参见黄宗羲:《永历纪年》。

[18] 参见李瑶:《南疆绎史》摭遗卷七。

[19] 参见《明史》卷二八。

[20] 参见李瑶:《南疆绎史》纪略四。

[21] 参见珠江旧史:《劫灰录》卷二。

[22] 参见叶梦珠:《续绥寇纪略》卷三。

[23] 参见西亭凌雪:《南天痕》卷十三。

[24] 参见邵廷寀:《西南纪事》卷一〇;计六奇:《明季南略》卷十七。

[25] 参见邵廷寀:《西南纪事》卷一。

[26] 参见黄宗羲:《沙定洲乱纪》。

[27] 参见《阿迷州志》卷四。

[28] 参见冯甦:《滇考》。

[29] 参见佚名:《滇南纪略》。

[30] 参见冯甦:《滇考》;李天根:《爝火录》卷一八。

[31] 参见佚名:《滇南纪略》。

[32][33] 参见彭孙贻:《平寇志》卷十二。

[34] 参见刘彬:《晋王李定国列传》。

己丑年（1649 年）

明永历三年（清顺治六年）

正月，杨畏知间于可望曰："王与三将军比肩而起，不借虚名，无以詟众，昔曹孟德奉迎许都，挟天子以令诸侯，由是得志，今桂藩在肇庆，王其无意乎？"[1] 可望亦有意联明，四月遣畏知、龚彝等六人（一作龚鼎、杨可仕等六人。《爝火录》云："滇贼请封者，正使杨畏知，副使龚彝而外，可望差焦光启，定国差潘世荣护行"）携南金二十金、琥珀四块、马四匹，请联合抗清，并请明承认己为秦王。具书略云："先秦王荡平中土，剪除贪官污吏……孤守滇南，恪遵先志，合移知照，王绳父爵，国继先秦。"（《续绥寇纪略》云："先秦王谓献忠也。"）又云："今之奏请，为联合恢剿之意，原非有意以求封爵也。"下书己丑正月十五日，孙可望拜书，以方幅黄纸为之，不奉朔亦不建朔。[2]

明下廷臣议，金堡、严起恒等坚持不可。金堡疏云："夫本朝无所为异姓王也，开国则中山等，靖难则河间等，皆追封耳……可望方愤夷狄之横，为中华雪耻，且悔僭窃之非，而欲以正义扬名，彼将俨然自任昭代功宗，天朝男子，而以一字虚称，弃之'夷狄'，朝廷不忍也……彼与我为难已数十年矣，我与虏

为难，彼复与我为难；我能制虏，何忧于彼；我不能制虏，彼且为虏所制矣……可望公则不肯出兵，可望王则我又不愿其出兵也。”[3]争论多日，只封可望为景国公。畏知以为不可，为之请曰：“彼等已僭自王矣。今一旦降号公侯，复降为二字郡王，此纯臣之节，非所望于群盗也。不如姑饵之，破格明恩，犹几其用命于万一；且法有因革，今疆土已非祖宗之旧，则法宁不可以变通乎？权封之，加以大国，责以荡平，亦犹祖宗之志云尔。且臣已许之矣。臣为祖宗起见，非为贼也。”[4]卒不许。畏知言于制辅堵胤锡，胤锡为补疏，略云：“国家今日，于可望善收之，则复有滇、黔；不善收之，则增一敌国，利害无两立，得失不再图，不可不熟虑也。”[5]疏入，七月，封可望为平辽王（一作安东王，荆郡王）。赐之国姓曰朱朝宗，李定国曰李如靖，刘文秀曰刘若琦，位皆列侯。[6]（《皇明四朝成仁录》云：“李定国，本名如靖；刘文秀，本名若琦。”明“封可望为景国公，赐名朝宗；定国康侯，赐名如靖；若琦泰侯，赐名文秀；能奇信侯，赐名策勋。”未知孰是。）时庆国公陈邦傅驻南宁，畏李赤心、高必正势盛，恐为所并，欲借援可望，乃假铸“秦王之宝”，命其私人胡执恭往云南，封可望为秦王。矫诏所载：“崇之以监国，许之以九锡，推之以总揽朝政，节制天下兵马，事之以父师。”可望知其伪，均辞不受。[7]冬，明封黔镇皮熊黔国公，播镇王祥忠国公，以防云南。[8]

“四将军”在云南重廉吏，除贪酷，不时差人易服色暗访察，有廉者立加奖擢，贪者立拿斩首，传示各府州县，立登闻鼓。凡政有不便于民，许地方头人赴诉，立即除之；有可以便于民者，立即行之。访姚安知府谢仪贪酷，孙可望差官持令前去，立拿斩首，传示。全滇之官，无一人敢要钱者。

凡发兵出剿，所过大路，鸡犬不惊。百姓卖酒肉者，路旁不断，不论银之轻重，酒一壶即与银一块，市酒肉者日获银一升。如兵余小子有擅夺百姓一物者，立刻收斩。如该主不首，连坐；该管官失察，责八十棍。有抚右营兵马前往禄丰驮粮，回至华铺歇下，有一兵失手误伤百姓二岁小儿，主官杨总兵责兵四十棍，

断烧埋银四十两。事为刘文秀所知，责杨总兵不严，将失事兵枭首，传示华铺。立法若是之严，故民得安息，反富庶焉。兵马三日一小操，五日一大操，雨雪方止。每一下操，赏赉动以万计。

将各府州县田地分与各营头，即令彼处坐住就食。(《滇南外史》云："军民田地尽占为皇庄，各营设立'管庄'。"《云南府志》云："将云南府属军民田地，分为'营庄'，各设管庄一人，亩岁纳谷一石二斗。") 凡兵丁日支米一大升，家口月支米一大斗，生下儿女，未及一岁者月给半分，至三岁者如家口支。马分三号：头号者日支料三升，二号者日支料二升，三号者日支料一升。不时查验，瘦者责治有差。

凡金银铜铁等厂，听民自备工本开采，抽税，差官于永昌、临安监之。凡出布处所，采买布匹造甲。各铁厂打造器械什物胎子，运至省城局内装整。

对民人立法亦严。有太平巷内百姓，醉后以破明子铁斧劈死姑母，昆明县报知李定国，立刻枭示于本家门口。

凡孙可望等寿，士民往贺，百姓每人大馒头一枚，生员留酒饭，令传宣官陪。又令地方上，不论绅士居民，有为地方起见，即一得之愚，亦许进言，立引见，不许搁阻；即妄诞之言，亦不深究。奖节孝，复乡饮，浚海口，省耕省敛，凡有利于民者无不备举。(以上均见《滇南纪略》。)

是时，云南境内，外则土司敛迹，内则物阜民安，百姓插时(莳)恬熙，若不知有交兵者。其军中家人并住云南，缝造征衣。其士兵，各省人俱有，秦人约有一万。一年土产财富，足供养兵之需。其出疆入境，盘诘颇宽，贸易商人，俱给照验。其俗，兵不扰民，将不欺士，崇尚礼义，视民如子，往来有体，安置有方。[9]是年元宵，大放花灯。四门唱戏，大酺三日，金吾不禁，百姓男妇入城观玩者如赴市，迨有熙皞之风焉。[10]

四川自农民军南撤后，势极紊乱。先是，甲申年（1644年）以来，明军曾英、王祥、王启、冯朝官等，各集兵走忠、涪、合、永、遵、綦等处，凡所过所驻，皆抢劫而食，东南大扰，庐舍一空。丙戌年（1646年）清兵入川，进扰重庆，旋退保宁，

明军分据各要隘，漫无统属。至于无民之处，等于大漠；有民之地，皆聚众自守，强弱相兼。丁亥年（1647 年）岁大饥，藜藿雀鼠俱穷，人相食；守者互争雄长，全不以民为念，值冬至拜牌，因争座次竟勒兵相攻。戊子年（1648 年）明宗室朱容藩自称楚世子，置行台于夔府之下关城，旋为督师吕大器所败。己丑年（1649 年）李乾德、袁韬等诱杀杨展，遂与李占春等部相攻[11]，兵荒连年，民不堪命。

本年，粤西明军惨败。正月，清兵陷南昌，明守将金声桓战死。二月，清兵陷湘潭，明督师何腾蛟死难。未几，李成栋亦败死信丰。堵胤锡调李赤心出楚，时赤心入粤不久，因梧州之败，战马铠仗俱失，欲得高、雷二郡休息士马；胤锡不许，赤心不奉调，拔营而西。七月，阁部堵胤锡忧死浔州，西南形势益危。海上之师亦不振。张名振于六月复健跳所，郑成功于八月开始用永历年号。

定国年二十九岁

是岁，可望二使定国、一使白文选报聘贵州，会诸镇于龙里，共伸倡义“扶明逐清”之约。原云贵总督范鉱、黔南巡抚郭承汾等均赴约。[12] 鉱间于定国曰：“真天与公赐大明恢复宗社也！惟可望心怀叵测，未敢深信，一旦渝盟，奈何?”定国答以“恢复中原之责，有定国在，乞勿念”[13]。

【注释】

[1] 查东山：《东山国语·粤徼语》。

[2] 参见何是非：《风倒梧桐记》；刘湘客：《行在阳秋》卷下；王夫之：《永历实录》卷十四。

[3] 金堡：《岭海焚余录》。

[4] 屈大均：《皇明四朝成仁录》卷十一。

[5] 徐鼒：《小腆纪传》卷二十九。

[6] 参见黄宗羲：《永历纪年》；奈村农夫：《野史无文》卷五。

[7] 参见无名氏：《东明闻见录》；温睿临：《南疆逸史》。

[8] 参见温睿临：《南疆逸史》卷三。

[9] 参见丁大任：《永历纪事》；佚名：《滇南纪略》。

[10] 参见佚名：《滇南纪略》。

[11] 参见沈荀蔚：《蜀难叙略》；欧阳直公：《欧阳氏遗书》。

[12] 参见西亭凌雪：《南天痕》卷十三；刘彬：《晋王李定国列传》。

[13] 参见刘彬：《晋王李定国列传》。

庚寅年（1650年）

明永历四年（清顺治七年）

八月，“四将军”复遣使如梧州（桂王驻地），与明议秦王称号。可望书略云：“于某日接敕封臣秦王，于某日接敕封臣平辽王；莫知所从。”绝不及原敕所封二使臣矫诏事，意在必得“秦”也。明臣朱天麟曰：“许之便。我势日衰，彼力方壮，我以空名羁之，犹可号召。”不听。使者候命日久，马吉翔请封为澂江王。使者曰：“非秦不敢复命。”明臣又嗾使大顺军旧部高必正、党守素等出而阻挠，议遂寝。[1]［按：《天南逸史》“可望亦知封王非出自朝廷意，至是遣人入朝黄金一万两，良马一百匹，自上书请封，以黄金四万两贿朝贵”云云。以当时情势论，“胁封”或近似，行此重贿则未必。］任僎言于可望曰：“大丈夫当自王，何必朝廷乎?”（《东山国语》作李定国语。）可望然之。九月（《云南府志》作七月），称秦王，俨然亲藩体统。改云南省为云兴省，云南府为昆明府，昆明县为昆海县。凡诸军悉曰“行营”；设立卫护曰“驾前官（军)”；自称曰“孤”，曰“不谷”；文书下行曰“秦王令旨”；各官上书曰“启”；称李定国、刘文秀曰“弟安西李”、“弟抚南刘”；其下皆称之曰“国主”。每公会，定国、文秀

俱左右列坐。[2]

可望致书明黔镇皮熊，谋修好。书略云：“贵爵坐拥貔貅，战则可以摧坚，守则足资保障。独是不肖有司，罔知邦本，征派日繁。黔中乃兵出咽喉，宁无救灾恤邻之念，以为假道长发之举……若止以一盟了局，为燕雀处堂之计，非不谷所望于君子矣。”[3]熊不复。八月（《南疆逸史》作春），“四将军”东出贵州，并分兵规取川南。时明巡按郭承汾以平越知府黄（一作王）应运摄威清道事，驻安顺。值川将王祥兵溃，掠食遵义，居民诣滇求救，明抚按遣黄应运往抚之。可望闻应运东出，遣李定国袭安顺，克之。[4]复使前军都督白文选率军入黔。黔国公皮熊度不能支，遣使请盟，不许，走清浪卫，征土司兵三万，出平越，复为冯双礼所败，乃入乌罗司（《爝火录》云：熊与郭承汾走乌龙江、黑司坡）。文选追执之，夺其兵。于是贵州院司道等官请白文选入省城。可望留定国守云南，自往贵州，下教安定之。令所属文武呈缴滥札，文职之监军督饷部卿签宪、武职之总制参游各衔名概行革裁。明臣除郭承汾、黄应运、总兵姚某、刘某等六人不从致死外，无敢抗拒者。[5]

明忠国公王祥据遵义，可望使白文选将兵三千赴永宁，将攻之，永宁守将侯天锡迎降，诈以危言报祥曰：“滇兵二十万已渡江来矣！不如先期避之。”祥惧，乃裹其币帛金宝，作竹筴三十背，使牙将负之逃。将士多送款于可望，可望疾兵掩击之，祥败，自刎死。（《播雅》云：“白兵追至正安南五十里之罗杆台，兵大溃，走州之凤凰山、南岳寺，自刎。”）降其众，尽取遵义地。[6]

刘文秀率兵入川，遣别将卢名臣东取重庆，自引兵渡金沙江，攻建昌。明在籍前长沙知县高明，集众拒之于焦家屯，兵败自杀。自是连破越嶲卫、黎州、荣经、雅州，屯兵洪雅之天生城（在洪雅花溪口），杀地主武装首领余飞。[7]余飞集乡兵（地主武装）拒大西军数年，至是被戮。

明宝庆驻镇南阳侯张先壁、鄂国公马进忠等由湖南入黔，归依“四将军”。于是明军旧将王进才、张登贵、莫宗文之军尽为

“四将军”所有，势益强，地与粤西相接矣。[8]

是岁，明郑成功部四月克揭扬之新埠砦，六月围潮州，七月取厦门、金门，十月取铜山、南澳、闽安诸岛，旋粤东告急，奉诏于闰十一月率舟师南下援之，而粤西诸部仍互相水火。先是，清兵逼广州，桂王由肇庆奔梧州，调陈邦傅、高必正东援。五月，邦傅、必正至梧州。时李赤心已死，高必正代掌军政，其部张良畤、四虎（一作陈一虎）等暴卒，必正疑邦傅鸩之，邦傅亦憾必正等久“扰”其境，阴使其将姚春登等联结土司，以诛流贼为名，与忠贞营为梗；会李来亨（赤心养子）、马腾云等调兵土司，遂相仇杀。必正怒，归罪邦傅，率所部西回。[9]自是大顺军旧部与明军之间，裂痕益深，明势益孤。十一月，清兵破广州，陷桂林，明少师瞿式耜死难。大顺军旧部高必正、李来亨等部，原驻宾、横、南宁间，食且尽，畏清师之逼，率众自黔东北走，分据川、湖间；川中旧将王光兴、潭宏等附之，众犹数十万，耕田自给，联砦互援，坚持抗清斗争。[按：高、李等北走川、湖（巴、归），《永历实录·李来亨传》系于辛卯年（1651年），似可商榷。辛卯年秋，可望已使张虎入西山联络十三家矣。今从《南疆绎史》摭遗及《小腆纪年》。]

定国年三十岁

“四将军”初定滇、黔，因力主“联合恢剿”，与明臣多所接触。明臣罔识大体，在桂王与“四将军”间、可望与定国间，极尽挑拨离间之能事。杨畏知之说可望，范旷之说定国，钱邦芑之说白文选，均极恶毒。其著者则为黄应运之说李定国。

定国既取安顺，明威清道黄应运径诣定国说之曰：“将军有事于安顺，何不尺一相报，乃骚动贵部耶？”定国曰：“将出兵从，此武夫本色，勿怪也。”应运曰：“恨安顺狭陋耳，若可屯车骑，何不启闻天子，请此弹丸为牧地？天子方悬爵赏以网罗英雄，未有不许将军者。应运便当解职，以镇钥相付矣。”定国曰：“正欲与贵道商之。”应运因间之曰：“宿闻将军神勇，敌万人；又所部精锐，一当百；乃前此所据地旋得旋失，何邪？”定国曰：

"兵家得失无恒，不足论也。"应运曰："不然，当是名义不正，人人得睥睨之耳。若借三百年天子之名号，加以将军之神威，统率熊虎，扫荡不庭，而闻风义从者又络绎交助，天下谁敌将军者？他日分茅胙土，传之奕世，中山、开平不足比也。今将军舍万世不朽之功业而不王不霸，传舍州郡，非良图也。"定国曰："贵道言是，即当与平东议之。"应运曰："平东在滇，远未可期，应运当捧盘敦与将军订约耳。"定国许之，乃歃盟。及可望杀应运，孙、李之间，裂痕渐深。[10]

贵州平，定国仍回守云南，终日操练兵马，制造盔甲，一年练就精兵三万人[11]，准备东进。可望命马兆熙考试滇南生童，考试毕，率云、武二府生童赴定国府谢。定国赏钱三百串，面云"诸生用心读书，不日开复地方，就有你们官了"等语。诸生谢出，由是文教渐兴。[12]

【注释】

[1] 参见钱秉镫：《所知录》卷下；温睿临：《南疆逸史》卷二十二。

[2] 参见黄宗羲：《永历纪年》；计六奇：《明季南略》卷十四、卷十七；《云南府志》卷五。

[3] 邵廷寀：《西南纪事》卷十二。

[4] 参见徐鼒：《小腆纪年》卷十七。

[5] 参见温睿临：《南疆逸史》卷五十一；计六奇：《明季南略》卷十七；徐鼒：《小腆纪年》卷十七。

[6] 参见温睿临：《南疆逸史》卷五十一。

[7] 参见徐鼒：《小腆纪年》卷十七。

[8] 参见冯甦：《见闻随笔》卷下；王夫之：《永历实录》卷十四。

[9] 参见珠江旧史：《劫灰录》卷一。

[10] 参见徐鼒：《小腆纪年》卷十七。

[11] 参见计六奇：《明季南略》卷十七。

[12] 参见佚名：《滇南纪略》。

辛卯年（1651年）

明永历五年（清顺治八年）

三月，“四将军”遣贺九仪、张胜、张明志等将兵五千至南宁。先是（《爝火录》作庚寅十二月事），明桂王奔南宁，事势日急，遣编修刘菃封可望为冀王（一作澂王），可望仍不受。杨畏知曰：“秦、冀等耳，假何如真?”可望不听。李定国等劝可望遣畏知终其事，可望许之，因遣贺九仪等将兵至南宁，名为护卫，实则求沮秦封者而甘心焉。上书不称臣，署平东王（?）字样，以“合师北拒”为名。[1]九仪等至南宁，数明大学士严起恒等破坏联合罪，杀之，南宁鼎沸。说者谓桂王曰：“不若赐之玺书，直云‘赐书秦王’，则前此葛藤斩断，方可使之尽瘁。”[2]桂王可之。自是，明始承认可望为秦王（《爝火录》作三月初一日）。可望得敕大喜，遣中书杨惺光具表称谢。五月，设六部、翰林等官，以范矿、马兆义、任僎、万年策为吏、户、礼、兵部尚书，并加行营之号。后又以程源代万年策。而僎与方于宣屡劝进，可望令待桂王入黔议之。[3]

秦王可望疏请明桂王移驻云南，阁臣朱天麟力主其议，有云：“云南山川险阻，雄师百万，北通川、陕，南控荆、楚，亟

宜驻跸，以坚可望推戴之心，以慰中外臣民之望。”[4]十二月，南宁陷，明君臣仓皇出奔，危于濑湍（《野史无文》作濑滩），一时人心惶惶。桂王召诸臣议：有请走海滨就李元允者，有议入安南避难者，有议泛海抵闽依郑成功者，纷然盈廷。惟马吉翔、庞天寿结孙可望，坚主赴滇，吴贞毓等不敢决，贺九仪愤然曰："昔秦王为请移跸滇、黔，特命我扈驾，今诸臣既各疑贰，我岂能担此重任乎?”遂拔营去。[5]自是，桂王除扈从外，无一卒一民为明廷有矣。[6]

四月，秦王派洪将军、陈将军率步骑万余，抄铜仁小路，由细米溪、五郎溪而东，十五日骤至沅州，围城直入，克之，遂下怀化。[7]

八月，刘文秀从建昌入川，明武大定遣其将张林秀率众拒之，遇于荥经，相持十余日。林秀日选精骑挑战，文秀坚壁自守。一旦填壕拔栅而出，战于小坪山，良久，文秀驱象蹂之，武兵皆崩溃。文秀长驱破嘉定，执袁韬，降武大定，总督李乾德赴水死。川南、川西复归“四将军”[8]。[按：刘文秀下嘉定，他书多作庚寅年事，《欧阳氏遗书》及《蜀难叙略》则系于本年，从之。]

秋，秦王遣其将张虎入西山，联络十三家兵，共同御清。时十三家袁宗第、贺珍据大宁、大昌，刘体纯、拓天宝据巫山及湖广巴东，李来亨、马腾云、党守素据湖广竹山、房县、归州，王光兴据建始及湖广施州卫，虽受封爵，未尝出力，自耕自食，不与外接。张虎捧可望檄入西山，刘体纯辈以布为门数重，令虎进，体纯等皆前倨坐，谓虎曰：“昔我辈与张献忠同起事，约为兄弟，今汝秦王，献忠子，吾儿辈也。汝为使人，见吾叩头而已。”虎叩头阶下，答可望书皆甚倨。[9]

十月，刘文秀顺流东下，而前破遵义时，所遣别将卢明臣者入涪州，李占春逆战于群猪寺口而败。于大海在忠州闻之，知不支，遂放舟出夔门，入楚降于清，诸将尽散，无敢应敌者。“三谭”（谭宏、谭文、谭诣）见势不支，受可望联络。自是成、重、泸、永，土宇全归，设官置抚。[10]十二月（一作壬辰年正月），

文秀留白文选守嘉定，自率诸将班师还滇。[11]

文秀自称“南府”，其符首称“南府令”三字，以朱印刷；余俱墨书如常。[12]文秀莅嘉定，延揽诸幕宾，以文士欧阳直公等为中书。[13]

“四将军”经营贵州，其事之可述者有下列数端：

驭下极严，理民从宽：凡官员犯法；重则处死，轻则捆打数十，令复任管事。除去革、降、罚俸等罪，兵民亦如之，无流徒笞杖之法。盖事尚苟简，文案不繁，官绝贪污馈送之弊，民无盗贼掠夺之端，一时反以为便。立法极严，军民相安。[14]

整理街衢桥道：凡街衢桥道，务必修葺端整。令民家家植树于门，冬夏常蔚然可观。[15]

本年，二月，清兵陷梧州，三月陷高州。四月，郑成功还师粤东，复取厦门。七月，清兵逼舟山，张名振北捣吴淞，以牵制清兵。九月，郑成功攻漳浦，十二月下之。冬，成功遣使通好于日本。

定国年三十一岁

定国说可望勿杀杨畏知，不果。先是，三月，杨畏知至南宁，上书自劾，桂王留为大学士，与吴贞毓同辅政。畏知廷议贺九仪擅杀大臣，语多侵可望。可望怒，使人召至贵阳，面责之。畏知大愤，除项上冠击可望，可望将命縶出杀之。时定国、文秀皆在座，因谓可望曰：“我等欲图大事，如此人，还宜留之。”可望谕免其死，及宣谕，畏知已就戮。[16]

【注释】

[1] 参见珠江旧史：《劫灰录》卷一；查继佐：《罪惟录》纪卷二一；李天根：《爝火录》卷二〇。

[2] 黄宗羲：《永历纪年》。

[3] 参见李天根：《爝火录》卷二一。

[4] 刘湘客：《行在阳秋》卷上。

[5] 参见屈大均：《安龙逸史》；李瑶：《南疆绎史》纪略五；李天根：

《爝火录》卷二一。

[6] 参见王夫之：《永历实录》卷十四。

[7] 参见《明清史料》丙编第八本，“偏沅巡抚金廷献揭帖”。

[8] 参见沈荀蔚：《蜀难叙略》。

[9] 参见费密：《荒书》。

[10] 参见费密：《荒书》；徐鼒：《小腆纪年》卷十七。

[11] 参见欧阳直公：《欧阳氏遗书》；徐鼒：《小腆纪传》卷三七。

[12] 参见沈荀蔚：《蜀难叙略》。

[13] 参见欧阳直公：《欧阳氏遗书》。

[14] 参见佚名：《滇南纪略》；李天根：《爝火录》卷二一。

[15] 参见李天根：《爝火录》卷二一。

[16] 参见古滇罗谦本：《残明纪事》。此书原名《安龙逸史》，屈大均作，由王渔洋改窜而成。

壬辰年（1652年）

明永历六年（清顺治九年）

正月二十日，可望遣总兵王爱秀迎桂王入驻安隆[1]，表言："臣以行在孤露，再次迎请，未奉允行。然预虑圣驾必有移幸之日，故遣兵肃清道路。广南界临交趾，夷情叵测，惟安隆为滇、黔、粤三省会区，城郭坚固，行宫修葺，粮储完备，朝发夕至，莫此为宜。"[2]二月初六日，桂王抵安隆，宫室礼仪，一切草简，时廷臣扈随者，文武诸臣止五十余人。安隆，原名安隆所，初十日改为安龙府。〔按：王之春《安龙纪事》云"安龙"，原名"安笼所"，自是改为"安龙府"。《安顺府志》亦作"安笼所"。〕以范应旭知府事，以督捕张应科为总理提督，钱粮兵马悉秦王主之。桂王对可望曾有"大小战争，诛斩封奏，先行后奏"之令。[3]可望岁致银八千两、米百石（《爝火录》作六百石）供桂王用；随行文武俸赏，尽向秦府报销。[4]时有谓可望要挟者，可望上疏云："人或谓臣欲挟天子令诸侯，不知当时尚有诸侯，诸侯亦尚知有天子。今天子已不能自令，臣更挟天子之令以令于何地，令于何人？"[5]可望等救护桂王，并非忠于明室，只是"虚拥以循名分，私拟尚可仿于桓文"耳。[6]

大西军声威远播，时人谓："孙、李二将有五霸之假仁假义，有王莽之谦恭下士；而永历之为君，远过乎刘禅，近胜乎宏光，淹有云、贵并广西、四川、湖广各半省，五府六部三衙门，春秋两榜，隐然成一小朝廷。"[7]清人寝不安枕矣。

春，清命孔有德由桂林出河池，以与秦王争贵州；命吴三桂由嘉定出叙州，以与秦王争川南。三月，定国致书可望，欲出楚立功，可望乃部署两面作战。其致定国、文秀书有云："滇南乃公众之地，宜作根本之区，不可剥削。养兵何用？速当开拓土地，各守一方，相机而动。蜀地不远，且已得其五分之一，若我兵一至，不用杀伐，自归顺矣。"［按：是书，《滇南纪略》系于乙未年春间，误。定国、文秀出兵楚、蜀，各书均作本年，惟《滇南纪略》系于乙未年，故改系于此。］以李定国出湖广，步骑八万，冯双礼副之，由武冈、全州以趋桂林。以刘文秀出川南，步骑六万，王复臣（《野史无文》作张先璧）副之，由叙州、重庆以围成都。

清吴三桂在蜀，虐使蜀人，蜀人咸贰。刘文秀善抚士卒，蜀人闻其至，所在响应，诸郡邑为吴三桂所陷者，次第收复，杀清都统白含贞、白广生等。[8]文秀军次叙府，吴三桂移营嘉定，遣总兵蓝一魁领兵取叙府。文秀兵潜移营郊外，一魁畏文秀，遁入城。文秀同王复臣率马步兵攻城，城陷，一魁被执。三桂闻之，提兵往救，复臣以象冲其马前，步兵夹于左右，冲入队中，象吼马惊，兵心弗固，三桂败走保宁。[9]七月，文秀勒兵攻保宁，三桂将满兵、汉兵出城拒之。文秀列阵城东北教场，以象十三头领十三营，列阵四重，象居前，次挨牌、长枪，次匾刀，次乌铳，阵圆如月，坚不可犯。因屡败清兵，颇轻敌，不俟白文选兵至，谋急攻。王复臣以"兵骄不可当死寇"谏，又劝以"勿围城"，皆不纳。兵大败，王复臣战死。文秀退，三桂不敢追，曰："生平未见如此劲敌，特欠一着耳。"谓不听复臣谏也。[10]文秀败回贵州，可望罢其职，令回云南闲住，以狄三品等镇守嘉定。

秦王入川之师虽受挫，然定国东进之师则所向披靡。七月下桂林，九月破衡州，十一月大挫清兵于衡州城下，两蹶名王，天

下震动，时称为万历丙午年以来全盛天下所不能有。[11]白文选亦以“倮㑩”兵五万攻占辰州，声势大振。无如东线之捷方传，而明臣之党争又起，大局遂不堪闻问。

时，可望居贵州省城，大造宫殿，设立文武百官，凡四川、云南、贵州文武大臣数百余员，俱令刻期朝见，诸官趋附，惟四川巡抚钱邦芑，十三召不至。可望以吏部侍郎雷跃龙为宰相，贵州总督范圹为吏部尚书，御史任僎为礼部尚书，四川总督任源为兵部尚书，御史张重任为六科都给事，礼部主事方于宣为翰林院编修，一切文武，皆署“秦”衔。又铸新印为八叠文，尽易明朝旧印。随桂王蜷居安龙之明官，勾心斗角，共分两大派：一派以戎政马吉翔为首，阴联勇卫庞天寿等，依附孙可望。凡可望欲为者，辄先意为请。可望有札谕天寿、吉翔云：“凡朝廷内外机务，惟执事力为仔肩，若有不法臣工，一听戎政、勇卫两衙门参处，以息其纷嚣。”其初意或欲息内争以共御外侮，然竟因此而堕入明臣党争陷阱，深不可拔。方于宣谄事可望尤甚，为之定仪立制，太庙庙享三王：明太祖主于中，张献忠主于左，而右则可望祖父主也，拟改国号曰“后明”，日夜谋禅位，可望苦甚。一派以首辅吴贞毓为首，唆使徐极、林青阳、张镌、蔡缤等，疏参马吉翔“怙宠弄权，包藏祸心”，复与桂王密谋，令李定国率师回黔，举兵内向，以与孙可望争高下。桂王受可望等救护，得有立足地，仍不自足，一面对党附吴贞毓之蒋乾昌、李元开等十二人加秩升职；一面又差官阴赴定国师，挑拨孙、李关系。[12]一时谣言繁兴，有曰：“秦王下长沙即改年号，受禅让。”有曰：“定国不满现有封号，并称当亦如国主。”有曰：“可望废刘文秀太急，众皆怨望。”自是人心涣散，猜忌日多。[13]

时川、楚前线战事虽急，滇、黔内部秩序则甚稳定。其制，于边境伐木重围，树栅如城，空际悬一大钟，兵士立于层梯，讯问往来行人。入境，郡县卫所，开路广阔，每十里立塘，以次验票稽察，无票不得通过。其传递军令者，一卒执小红棍，夹一帖飞驰云：“军令来！”行人让道，坐者起立，张伞者收伞，有不敬军令者，以小棍击之。境内军队调动频繁，其行也，兵马云集，

旋岭而下，驾象者，乘骑者，旗帜炫耀，山谷震动；其驻军也，布帐漫山遍野，群马纵放，炮声如雷。各处兵马众多，群象塞路。粮械运送，多仰于民，时见山民运送火药军器，且有“苗子”成群，运送军粮。远方来人，经过府州县所，须凭票挂号，有关官员立即引见，留饭劳问。[14]时称“滇南天下饶乐土也，其人隔绝山海，今犹袭冠带以居”[15]。其说盖有由自云。

是岁，郑成功部正月取海澄。三月驳长泰，围漳州，后以众寡不敌，九月败于九龙江，十月败于古县。

定国年三十二岁

三月，金公趾诱定国尊孔。定国骑马入孔庙，堕马阶下，折二齿。舆归，金公趾往候之，因曰：“圣人如天，自古英雄，莫不尊之，陛下忠臣也，奈何与圣人抗礼乎?”明日，定国补祭，进退维恭，成礼而还。[16]

是月，定国率军东出，一面约马进忠由镇远出沅州，期会于武冈；[17]一面与部众约不得劫夺民间财物。其兵行有五要：“一不杀人，二不放火，三不奸淫，四不宰耕牛，五不抢财货。”有一于此，军法无赦。[按：《永历纪事》云：“可望略湖南，自宴衡州府城楼……兵行有五要。”实则驻衡州者为李定国部，可望固未至衡州。时外人称“四将军”兵为“孙兵”、“秦兵”，此五要实为定国部行军纪律。] 军中有象阵，马见之惊逸；用猡兵，能跳战，不畏矢，执标枪大刀，尝以少胜多。[18]三月（一作五月），下沅州、平遂卫及蓝田县；五月，抵靖州，清将张国柱迎战，定国急击大败之（《爝火录》云：“‘流寇’攻靖州，知州林尔张坚守两月，城陷，死之”），两日夜驰下武冈。清续顺公沈永忠弃宝庆走，定国自枫木岭渡军，取宝庆。[19]是役，清兵死伤及降俘者共士兵五千一百六十三名，家口一千五百十五名，马九百七十八匹，总兵官以下军官三十九名。[20]被击溃逃散者更多。

定国屯武冈，冯双礼屯宝庆，欲乘胜南下，虑孔有德蹑其后，于是尽起武冈、宝庆诸营出祁阳，合趋全州，命西胜营张

胜、铁骑右营郭有名率精兵便道趋严关，扼桂林要道，令曰："敌至传火，勿下关，须大军会战。"命冯双礼率前军都督高承恩、铁骑前营王会、武安营陈国能、天威营高文贵、坐营靳统武合兵四万先进，至驿湖（一作月湖），猝遇清兵万余，逆战，斩其骁将李四，遂薄全州。定国帅右军都督王之邦、金吾营刘之讲、左协营吴之圣、武英营廖鱼、骠骑北营卜宁，合兵六万继进。闻驿湖捷，传令全州薄城者毋急攻，惧其奔逸并力于桂林也。全州已下，定国至，令急过勿入，合双礼兵继进。[21]孔有德发兵迎战，辄解甲降，如是者三四次，调遣将尽，有德怒，六月二十九日自发兵来争严关。[22]时张胜已营严关，距清军十里。日且暮，清军引去，旦复至，张胜传炮，定国部蓐食而前，战于关下，象偾归，定国斩驭象者，诸军奋进，象突阵，清兵大败，天大雷雨，横尸被野，追及于大榕江，又告捷。孔有德急入桂林，闭城守。定国部三日而至，七月二日亥时攻城。有德部将二等阿思哈哈番王允成通马进忠，传箭射书城外，登陴示路。定国急攻，守陴者皆溃，援梯毕登，屯城上。孔有德登城御，为矢中额，又闻城北山岭已为定国部所据，举火自焚死，七月四日巳时克桂林。定国入城，抚百姓，禁焚掠，擒汉奸陈邦傅父子等，驰献贵阳。先是，孔有德使提督线国安略南宁，右翼总兵全节防柳州，左翼总兵马雄守梧州，重镇皆出，而桂林守兵援全州，三战皆尽，定国行疾，是以速克。[23]是役，定国部斩获甚多，一时清兵称黔、滇人为"蛮兵"，遇见即逃。湘、桂人亦以"蛮兵"呼之，以其善战也，即定国军中亦以"蛮兵"自诩。安龙来劳师者谓定国曰："自清兵入关以来所未有之创举也，公之功于国家大矣哉。"[24]

桂林之战，各家记述略异，《虞山集》卷十下载，据目击者瞿昌文所述当时情况如下：

> 壬辰夏，秦王孙朝宗承制分道出师，大举恢复。抚南刘文秀统十余万铁骑出蜀，安西李定国统十余万铁骑出楚。偠偠僰子，精悍绝伦，象骑云拥雷吼，其素练之旅，皆西北骁

健，久养初出，无不以一当百。六月，安西师次武冈，势如破竹，桂林震虩。有德遣李养性领精兵守全州，六月廿八日，王师入粤境，尽歼李养性之众，只蹄片甲不返。鄂国公马进忠、将军冯双礼等，间道衔枚，或从新宁小路出临川，或从八十里山出严关，或从开州竟至水东，期三日夜会于桂林。七月初一日，有德再挑精锐，逆于榕江，兵未交而象阵前列，劲卒山拥，尘沙蔽目，马闻象鸣皆颠蹶，有德众遂奔，掩杀大败，有德仅以身免，策马入城，而王师随至桂林，数十里之城，围之三匝矣。甲仗耀日，旌旗布野，钲鼓之声震天地，军容之盛，罕与为拟。有德设守具，尽驱城中居民登陴，而兵则守其要害，且征外援急救。时有德协镇，远守柳、梧、南浔，皆不能猝至。次日，王师毕力急攻，城上天（矢）炮亦雨下，两日夜无御，守虽坚而攻愈力，陴守之民皆威胁非心服者，困且懈，遂于初四日辰刻，王师从云梯先登，西北环山为城，环山皆汉帜矣，鄂国公从武胜门攻入矣。有德仓皇计穷，遁走无路，急还靖江旧邸，聚其宝玩于一室，手刃爱姬，遂闭户自焚死。王师入城，斩馘数千，下令无妄杀，抚安孑遗之黎庶。时昌文羁身城中，初七日谒见安西，接待甚殷，慰劳周至，府君旧日所用之将吏，皆访窍而补其职；府君旧日所行之政令，皆修举而继其事。即令布按有司，设立专祠祀府君，奉张公以配。故臣民无不以手加额曰："留守相公前劳未泯，今日得竟其未竟之业，崇德报功之典其可后乎！"桂林既复，安西即分发诸将克平乐，下梧州，敌镇败残之卒，遁走广东，左右两江旧旅义兵，同时响应，旬月之间，粤西全省大定。缚陈邦傅父子槛送云南，骈斩于市，朝野称快，益信报施之不爽云。八郡中节义大臣，避腥膻于深箐穷谷间，转徙困顿，全发以待时，始终不改其守者，皆府君素所荐拔之人士，至是威幸更生，而山薮野泽之哀鸿，亦莫不相庆复见汉宫威仪也。昌文谒见安西，论天下大计，东南恢剿机宜，安西益器之，即欲试以粤西方面官，昌文坚请护丧归葬。

又：专纪桂林五十年（自崇祯元年戊辰年至康熙十六年丁巳年）变迁之《桂林田海记》，记载定国入桂林事亦较详，其月日情节，虽少有出入，然民间观察，足补其他各记之不足，并录之：

> 壬辰年六月终旬，始闻云南起兵之信。不上十来日，是七月初一二，定南闻兵至近，令虾头李养性，带兵一枝到严关驻扎。怎奈当时安西之兵，来如风雨，一蹴而至，每一日夜来三百里，如从天而降、从地而涌的一般，遮天遍地。初四日到了严关，李养性分毫展动不得，就被他杀个绝种，连报信的也没有一个回来。因此，定南不知信息，未及预防。一时兵至城下，才叫闭门，而兵已围着，四面攻打，或扒城而入，或驱象坐开，把那守城之兵，杀得罄尽。定南令舅子白二，带兵出王城，杀到县前西街巷口，被云南之兵，杀得满地尸横。定南方才将王府城门紧闭，见外面城已破了，人被杀尽，知不能免，就于宫中放火，将自己与妻子登时焚死。还有儿子女儿不曾死得，儿子被兵拿了献与安西王，留在宫中，以听起解……却说安西王自壬辰七月初五日下了粤西城，定南自焚而死，兵马驻扎一月，赏了功，解了罪人陈邦傅等，升选文武官员，安顿明白，将一个省城付与一个总兵徐天祐，上了巡抚之任，一切事务，俱是他一人管理，方才起营，自家督兵望全州进发。

桂林下，定国分兵徇广西郡县，清柳州副将郑元勋等降。浔州、郁林等郡，兵尚未至，居民已乘胜驱除清兵净尽，广西除梧州外，全省皆复。定国整饬军政，于民一无所犯。招明兵部尚书刘远生、兵部员外郎朱昌时、中书舍人管嗣裘于山中，参赞军务，共议兴复。时明将之留粤西、屯山谷间者，如胡一青、赵印选、马宝等，闻定国军至，相率来归，民间响应者亦众。[25] 日者，定国置酒七星岩，酒酣，谓刘远生曰："君读史以曹操、司马懿为何如人，奸耶愚耶？"远生方踌躇间，定国曰："操、懿有勘乱之才，蹀血百战，摧大敌，扶弱主，以垂令名于后世如探囊

取物，而顾以此博万世笑骂，犹持黄金换锈铁，农夫樵竖之不为，而操、懿为之，非至愚而何！”又顾谓远生曰：“方今之世，一宋末之局也。君艳羡文文山、陆秀夫、张世杰诸前哲乎？”远生顾之微笑，定国曰：“文、陆、张诸公，其精忠浩气，固足以光昭青史，为天地生色，然吾侪之对于国家，窃不愿有此结果也。”[26]

清将马雄守梧州，定国遣马全怀、李彦台、赵元符等持票招之，许以侯位，并许解运数十万金犒士，随他要那处地方，即取与他。雄不从，执差官[27]，定国怒，将取之，马雄告急广东。线国安、全节及文武道府州县印官四十六人，皆逃于梧州。尚可喜遣副将强世爵，以舟师大炮奔救，定国猝至，清兵退，遂克梧州。[28]

定国行谕滇省府州县，各选民间通理识字老成之人，不论士庶，发往粤西作官受职。滇省府州县令保甲公举，内中有愿去者，亦有不愿去者。由是有保举之途，保举后俱各回家听调。[29]

八月，定国以巡抚徐天佑守桂林，自率部北取全州、永州。[30]九月，攻衡州。时清衡州镇将续顺公沈永忠，有兵三万，闻孔有德之死也，弃城宵遁。长沙抚院金廷献扁舟载其家属出洞庭，沿长江至郸州避焉。于是监司以下，遁走一空，兵锋未至，千里无人。[31]遂复衡州。安设官员，备办粮饷，器械有敝钝者修之，兵丁有疲弱者简之，驻扎两月，以谋北进。[32]

定国令马宝东取阳山、连州。八月十四日，马宝率广西降军数万，象四只，抵阳山，扎三大营围住县城；其河南一带，复扎有大小十营，俱系蓝白帐房。十七日复阳山，十九日破连山，二十二日，联合连山傜官房壮猷、沈大业等，率傜民万余人，生逼连州，克之。曹志建旧部亦复临武。[33]定国复遣马进忠、冯双礼北取长沙；召张光翠出宁乡，进复常德。十月，张胜次湘阴，马进忠略地岳州，所至披靡。别遣高文贵略江西，永新、安福、永宁、龙泉皆下，遂围吉安。兵出凡七月，复郡十六，州二，辟地将三千里，军声大振。[34]凡招抚所到，定国悉委州县官。远近向风，无不引领。[35]

先是，桂林败讯抵北京，清廷大为震动，谕尚可喜、耿精忠云："览王奏报，知定南王孔有德为国尽忠，捐躯殉难，朕不胜痛悼！故将敬谨亲王为定远大将军，挑选精锐官兵，使之统领兼程前进，不久可抵广西。王切勿愤恨轻赴广西，倘贼犯广东，尔等宜图万全为上计，俟大兵至日，尽付之定远大将军，慎勿轻举，以失事机。"[36]十月，令洪承畴经略湖广、云贵、两广，自江宁移赴长沙。尼堪（敬谨亲王）率三贝勒、八固山、众十万南下，时定国屯衡州，马进忠、冯双礼屯长沙，前军下岳州。定国知清兵至，与进忠、双礼谋，令弃长沙，诱敌渡湘江。进忠、双礼退伏白杲市，须敌过衡山，乃绕出敌后反蹑之；定国夹蒸水拒敌，俟蹑兵至夹击，当尽歼之。议定，可望忌之，密令双礼径退宝庆。双礼走湘乡，向宝庆，马进忠不知所为，亦随之而西。清兵薄衡州，定国夹蒸水而军，接战于城北之香水庵、草桥，转战至演武亭，凡数合，杀伤相当。[37]定国佯败走，尼堪自率军追之，伏起，斩尼堪于阵，时为十一月廿四日。定国收军，获尼堪七宝金兜、牟揭金顶、交龙绣纛等，遂图定南、敬谨二王象[按：《残明纪事》云：衡州之役，定国杀清乌金王于衡阳，"图乌金、敬谨二王象，露布告捷"。《云南府志》说同，误。据谈迁《北游录》谓：乌金王即清太祖季弟"狡儿兔哈赤"，王氏《东华录》作"济尔哈朗"，于顺治六年夏秋间曾攻陷湘潭、辰州、永兴等处，同年八月班师，十二年五月死于北京。《北游录》云：七月"己酉，朱太史奉命上故乌金王香"。综此，定国所图象，应为"定南、敬谨"]及铠甲器仗之形，露布告捷，且刊示遍布粤、楚，威名大震中外。清兵暴淫，楚人皆怨恨刻骨，乘其败衄，本可乘胜追杀，定国念马宝、双礼已走，可望不与并力，不得已，乃班师屯武冈。[按：衡州战后，清兵仍据守衡州，《晋王李定国列传》云："定国追至岳州而止。"误。]是时，清君臣闻警，上下震动，闻定国名，股栗战惧，一时有弃湘、粤、桂、赣、川、滇、黔七省，与明议和之议。其事虽无足征，亦足见桂林、衡州两役对清兵震撼之大。[38]

清兵主帅既死，纪律顿弛，樵苏四出，以牧马为名。衡之东

乡、零泉，衡阳慕道、新城、东阳、建兴各都，环百余里，居民四散，咸逃于安、耒、茶、攸诸邑，鸣吠无闻者半载，村落为墟。时严雪冱寒，有皲肤折趾者，有僵死涧壑者，未可指数。自十一月至次年二月朔旬，军政洽肃。[39]

定国军律极严，其部在长沙驻师半载，居民不知有兵，人市输买。其所部半为猡、倮、傜、佬，土官极难钤束，因定国“御”之有法，故能兵民相安。[40]

定国恢复广西，杀伪王孔有德后，遣使约郑成功会师，秦王孙可望亦移檄郑成功会师，两书均于十一月到达海上。郑成功遣效用官李景往广西，约师会期。[41]

十一月，吴贞毓与林青阳等密谋，使青阳以请假归葬为名，携“密敕”从间道驰出，赴定国师[42]，令定国率部还黔，以抵制可望。定国得敕彷徨，以兄事可望久，不敢轻举发。[43]

【注释】

[1] 参见温睿临：《南疆逸史》卷三；李天根：《爝火录》卷二十二。

[2] 参见徐鼒：《小腆纪年》卷十八。

[3] 参见查继佐：《罪惟录》纪卷二一；邵廷寀：《西南纪事》卷一；李天根：《爝火录》卷二十二。

[4] 参见查继佐：《罪惟录》纪卷二十一。

[5] 珠江旧史：《劫灰录》卷六。

[6] 参见《明清史料》丙编第十本，“义王孙可望密奏本”。

[7] 丁大任：《永历纪事》；《新纂云南通志》卷六。

[8] 参见彭孙贻：《平寇志》卷十二；佚名：《四王合传》；《云南府志》卷五。

[9] 参见李馥荣：《滟澦囊》卷四。

[10] 参见彭孙贻：《平寇志》卷十二；庄士敏：《滇事总录》卷上。

[11] 参见黄宗羲：《永历纪年》。

[12] 参见王之春：《安龙纪事》；计六奇：《明季南略》卷十四、卷十六。

[13] 参见黄宗羲：《永历纪年》。

[14] 参见黄向坚：《寻亲纪程》。

[15] 参见吴伟业：《梅村家藏稿》卷三十六。

[16] 参见李天根：《爝火录》卷二十二。

[17] 参见刘彬：《晋王李定国列传》。

[18] 参见丁大任：《永历纪事》。

[19] 刘彬：《晋王李定国列传》；徐鼒：《小腆纪年》卷十八；《衡州府志》卷二十九。

[20] 参见《明清史料》丙编第九本，“吏部题本”。

[21] 参见邵廷寀：《西南纪事》卷十。

[22] 参见《明清史料》丙编第九本，“广西左翼总兵马雄禀”；叶梦珠：《续绥寇纪略》卷三。

[23] 参见邵廷寀：《西南纪事》卷十；《明清史料》丙编第九本，“广西左翼总兵马雄禀”、“定南王下死难各官详情残揭帖”；清国史馆：《贰臣传》。

[24] 刘彬：《晋王李定国列传》。

[25] 参见冯甦：《见闻随笔》卷下；刘彬：《晋王李定国列传》；清国史馆：《贰臣传》。

[26] 王夫之：《永历实录》卷十四；刘彬：《晋王李定国列传》。

[27] 参见《明清史料》丙编第九本，“广西左翼总兵马雄禀”。

[28] 参见邵廷寀：《西南纪事》卷十。

[29] 参见佚名：《滇南纪略》。

[30] 参见雷亮功：《桂林田海记》。

[31] 参见李寄：《天香阁随笔》卷一。

[32] 参见雷亮功：《桂林田海记》。

[33] 参见《明清史料》丙编第九本，“广东巡抚李棲凤揭帖”。

[34] 参见王夫之：《永历实录》卷十四；《衡州府志》卷二九。

[35] 参见计六奇：《明季南略》卷十七；查东山：《东山国语・粤徼语》。

[36]《明清史料》丙编第九本，《靖平南王揭帖》。

[37] 参见王夫之：《永历实录》卷十四；《新纂云南通志》卷六。

[38] 参见刘彬：《晋王李定国列传》；古滇罗谦本：《残明纪事》；《衡州府志》卷二十九。

[39] 参见《衡州府志》卷二十九。

[40] 参见李寄：《天香阁随笔》卷一。

[41] 参见杨英：《延平王户官杨英从征实录》。

[42] 参见王之奉：《安龙纪事》。

[43] 参见冯甦：《见闻随笔》卷下。

癸巳年（1653年）

明永历七年（清顺治十年）

先是，壬辰年（1652年）七月，定国捷报至贵阳，军民称庆，大宴三日，可望请封李定国为西宁王，刘文秀为南安王。（《劫灰录》以李、刘封王在壬辰年春出兵以前，南安王作“南康王”。）时有媒孽定国者，谓桂林之役，缴获甚丰，定国只送来金册、金印及人参数捆，疑有贰心。可望亦因定国屡立大功，恐威重难制，颇拟夺其兵。密令冯双礼往统其军，另遣都督关有才等率兵蹑其后，令相机擒杀定国。将犒定国师银，由八万损至六万，再损至四万。其封定国者，诏使已出黔境，复止还之。[1]

正月，可望率“驾前军”东进，二月至沅州，约定国议事，将图之。定国为顾全大局，率部避之广西，可望欲止军东下，然师已在道。“驾前军”因定国屡胜，以为清兵易与，颇轻敌，三月二十七日，为清兵败于宝庆之花街子，可望退保峒口。是役，可望念定国既走，虑军中有图己者，不敢严督诸军作战。诸将亦以“驾前军”奋欲立功，不愿与并力，卒致大败。[2]已而，白文选亦败于辰州，凡所得州县，俱为清兵所复取。

可望驻峒口，使杨中书以王师印授定国，招之还，不应。

[按：《小腆纪叙》云："定国怒曰：'可望安得擅行封爵？当日兄弟四人，受命先王，共扶明室，今置永历帝于何地?'挞杨中书而毁其印。"观后定国致书郑成功，仍自称西宁王，毁印之说不可信。]

八月，有言招还定国者，可望终忌定国，乃与其下谋起刘文秀。文秀闻之，单骑入见可望，自言己无才，不愿图富贵。可望强之，拟任之以大招讨；复使文秀作书招定国，盖欲羁縻之也。定国得书漫应之。[3]

是时，定国、可望虽不合，然矢志抗清则一。可望据滇、黔，十三家在西山，李定国在广西，相互呼应，仍为清兵一大威胁。清兵为实施"剿抚并用"、"以贼攻贼"毒计，以汉奸洪承畴为经略湖广、江西、云南、贵州内院大学士，总督两粤、云贵军务，便宜行事。十一月，承畴疏言："湖广有孙可望，抗拒于南；郝摇旗、一只虎等肆毒于北；彼或由澧州而犯常德，或截岳州以犯湘潭，则我腹背受敌。广西有李定国，眈眈思逞，距桂林二百里，惟附郭之临桂县，与灵川、兴安二县及全州未为所踞，我兵若由桂林进剿，而彼自靖、沅乘虚潜袭，则我首尾难顾，宜防守严密，乃可随机援剿。"[4]承畴一面加强防地，一面伺机挑拨孙、李关系。孙、李之水火益深。

时川南一带，仍为秦王部将狄三品等驻守。壬辰年（1652年）冬，洪雅之常隆吉、王学祐，峨嵋之罗矮子等屡起为乱，三品均击平之。未几，黎州马土司截杀秦王部于大渡河，三品决计还击。正月十五日，狄三品与贺天云率精骑数千，突袭黎州，擒土官马亭，杀之。至是西南接壤之所，始有开垦者。然田皆膏腴，芜久益肥沃，用力少而成功多，且无赋税，力之所及，即为永业，由是川南之民，皆健羡之，非安土重迁者，往往相率去，久之渡江渐达西北。至是，诸州县始设正佐官，后又令查报民数，视其损益而殿最之，官日益抚摩之不暇矣。[5]

狄三品等经营川南，筹饷征兵。更古制经历为税官，安拨收税。委设靳洪玉坐守炉中，截断土司历来抚赏茶包，以古径为新路，认抚赏为私茶，大改明朝制度，复设官毛某者，占据天全六

番招讨使司属下五乡天台山、白岩等处地亩抚番茶斤[6]，以裕军饷。

是岁三月，明鲁王自去监国号，漂泊岛屿。同月，张名振与郑成功合师北上，逆流入长江，破京口，驻营崇明岛。五月，大败清兵于海澄。是月，成功受封为延平王。[按：成功封延平王，《清史稿》、《小腆纪传》均系于顺治十五年（1658年）戊子，疑误。《闽海纪要》云："永历九年二月延平王成功承制设六官。"成功封延平王当在永历九年（1655年）以前。又《海上见闻录》云：永历七年（1653年）五月，"行在遣兵部主事万年英，赍敕晋赐姓漳国公封延平王"。从之。]七月，成功使林察、周瑞等率五镇官兵、战舰百余艘南下援潮州，并特书知会李定国。[7]甫至澳而潮已破，郝尚久父子战死。成功复还海上。十二月，张名振与清兵战于海门之平阳沙，胜之，清兵万余无一还者。

定国年三十三岁

沅州之约，定国中书龚铭适在黔，知可望谋，遣急足由间道告变。[8]定国得书犹疑。三昼夜，可望书七至，定国不得已西行，将见之。至紫阳渡，刘文秀子密遣人走报定国，言可望俟其至即收杀之。[9]定国涕泣曰，可望"终不可与共事也！然我仍以君子长者之心待之"。乃致书可望云："今虽大局稍有转机，而敌势方张，成败尚未逆睹，正吾侪同心协力，共策兴复之秋，不宜妄听谗言，自相残害，以败坏国家，愿明公深长思之！耿耿寸心，指天为誓！"[10]可望得书怒，将攻定国。定国谓其下曰："今甫得斩名王，奏大捷，而猜忌四起；且我与抚南弟同起云南，一旦结误，辄遭废弃，忌我当必尤甚，我妻子俱在云南，我岂得已而奔哉。"遂率众五万人，南奔兴安、全州。[11]诸将闻之，有引军从者，其不从者亦咨嗟叹息不已。[12]清兵知孙、李内哄，遣贝勒屯齐（《滇南纪略》作"齐吞"，疑为"吞齐"之误）再入湖南，连败定国部张霖于岳州、马进忠于益阳、冯双礼于衡州。于是衡、永、武、靖、辰、沅、黎平诸州郡，复陷于清，民死者百万人。定国精锐亦挫伤殆半。[13]

二月，定国以兵五万（一作四万）下永州。二十八日，永州复陷于清，定国移驻龙虎关。[14]

三月，定国以粤东义师罗锦㻁为导，东破开建、德庆。[15]抵肇庆，连营据北山，别将趋四会、广宁，前临三水。岑溪宋国相出击罗定、东安、西宁；"海盗"战舰二百，由新会、顺德诸港入九江口；清远义兵声言导定国渡河走从化，袭广州，水陆大震。会潮州叛将郝尚久等反正抗清，自称新泰侯，驰檄南韶、漳、惠，以应定国；清遣哈哈木及汉奸耿继茂会师攻潮。是月（一作四月）二十六日，定国乘隙围肇庆，泄其濠，三面急攻，用布囊盛土为墙，置木栅、挨牌，藏鸟枪以拒内兵，阴穿地道。城中大惧，守将许尔显堑壕城中以待，缒城夺梯，设死守，月余不克。清虑定国或从木绵头渡河，会城危，且无北归路，乃令耿继茂发铁骑守三水东南，凿侧门出，夺地道，兵多死，不能出者焚死地道中。定国退军五里，清兵潜出西南二门，夺龙顶冈营，用镰钩长枪，获兵百余人，殉于城下，定国撤围还。洪承畴闻其败也，遣人持檄招之，定国不理。[16]

六月，定国致书郑成功云："国姓大将军麾下：从来天下豪杰必予其时之可为，具可为之资者必凭其势之可借，当今之世，之二者惟公有焉。慨自三百年深仁厚泽，匹夫匹妇，莫不子若孙以承之；至其旷典之奇荣，则元勋之锡，止于茅土，固未有以臣民而上侔天祧者，言及斯遇，终纲目几千百年间，终不数数见也。夫恩重则报称必宏，宠隆则休戚愈切，艰兹国步，孤嫠犹伤周室之衰；恤此人心，父老犹仰汉宫之旧。吾知公厥衷，必有大不自安者。枕戈待旦，此其时乎！不谷惭以薄材，谬膺巨任，成命授以讨虏，简书载在专征，所得与四方勋镇通联纠合者，天子之灵也。客岁西粤，诛逋奸之孔酋；仲冬衡阳，枭敬谨之真虏，举九年腥浊以来为朝廷彰挞伐者，仅兹两役。然今皇应运，庇孚攻取，固未敢谓其谋之允臧，要亦见虏之无难扑灭耳。兹以怀、志两酋，东南鼾卧，曾拟长驱建业，不容肘腋无疑。况其局力，自不可与桂林、湖南同日以语，又何惮而不芟荆削棘，续通周道也哉。用以孟夏薄端城，困其残孽，乃狡虏凛前车之戒，婴城甘

巾帼之遗，兼以霖雨环江，致我战攻少需时日，调饥方惄。而水师义旅，同口揄扬：谓公青省黄龙，如飞如翰，时一凭虚而至，虏胆殊寒，牙樯遗韵，只今在潮、惠之间。不谷闻之，不觉望洋起舞，知公畴昔之愆期，若有俟不谷今兹之少选，诚有待也。缘托一鸿，敬邀并驾，君诚念君思孔厚，父恨深长，则五羊赤海，伫睹扬帆；半壁长城，中心是贶！否则，中兴告成，京观胜纪，而云台香字，千古传流，国姓不预，其何以仰副殊眷，而慰此可为之时势乎？予日望之，匆言幸照！”[17]［按：此书，《海上见闻录》谓收于永历七年（1653 年）六月，是。书中明言“孟夏薄端城”，是发书在围肇庆以后不久事。《延平王户官杨英从征实录》作永历八年（1654 年）九月收书，时间疑误。］

闰六月初九日，定国出师广东，再攻肇庆。二十六日，以总兵周金汤攻复遂溪，降其守将陈琪。[18]

七月，定国复取化州、吴川、信宜、石城，以施尚礼守化州。十三日，遣兵入贺县、平乐。二十一日，率兵二万再攻广西［按：桂林之围，《桂林田海记》作八月十五日，今从《广西巡抚陈维新题本》］，七昼夜不克。定国扎营西街古尧山，四下挖窑以攻城，从西城外铁马柱头旁边挖入，以右军都督管理其事。窑已挖成，放入火药，被城内发觉，却从内放火，右军尚在窑内安置未完，火发城崩，死于窑中。［按：《永历实录》云：“骁将王国仁死隧中。”］定国大痛，遂不复攻。又闻清援兵至，次早起营，从阳朔大路而去。[19]［按：桂林之围，说者异词，《天香阁随笔》云：广西之圈，定国以象攻城，“城门为象坐开，城中惶急，以火御之，得不破。军营城下，城中寂然无声，明日铳三声，师尽撤矣，城中犹不知。二日发马往探，始知在象州歇马”。以上二说，未知孰是。］是月，擒斩清巡抚王荃可。定国总兵王之邦、卜宁没于阳朔。[20]

明军另部分攻广西各地，亦屡奏功。六月十三日，庞太监、李水师、总兵陆秉宣、廖凤等，以战船二百余号，直冲梧州清兵湾船所，用哨船数十号守住河口。旋为清将马雄所败，退往藤县一带。八月十四日，都督李昌率龙四、龙五、李可奇、韦镜等，

以兵五千恢取昭平，为清兵所败，李昌战死。[21]

斯时，柳州一带州县，仍为定国所有。永宁、义宁至近之处，仍还隔断，分作两朝。永宁通沙圹、融县，为入云南一条大路，故定国仍着总兵高争畦来此坐镇。其都狼岭，只隔两江一水，不过三里，渡河即为清兵，亦是云南薛参将把守。[22]别部出没于平乐一带，联络傜、僮义民，以谋复举。[23]

定国驻军柳州，孙可望命冯双礼以兵袭之。定国伏兵柳州江口芦荻中，纵其众过迁江、来宾等县，乃出精锐逆战。冯双礼知泄事，急退，伏兵起，前后击杀，双礼自投于水。定国传令勿杀双礼，使其还报。自是双礼倾心定国。[24]

是秋，明桂王使臣林青阳、周官至定国营。先是，正月，林青阳自定国营回安龙复命，虑事泄，止田州不行，暗遣心腹刘吉至安龙，密奏桂王。桂王令吴贞毓再敕定国，“寿、翔表里为奸，将谋不利于朕，着令藩臣为朕剪除，俟朕与将军握手时，即行告庙晋封之典”云云。并发金三十两为西藩铸印。张毓拟篆“屏翰亲臣”四字，交刘吉带与青阳。青阳接敕东去，与桂王另一使臣周官（六月派出）相遇，始将空敕书写好及“屏翰亲臣”四字样铸成，十月，送达高州李定国营。定国因系密敕，不便复奏，只云：“俟恢复粤东，即来迎驾。”时马吉翔奉命往粤西祭陵，探知青阳赍密敕往定国营，私差汪锡元至营探听。未几，刘议新回自行营，途遇吉翔，不知吉翔不与谋，对吉翔云：“上有密敕与西藩，先差林青阳，后差周官，西藩接敕感泣，不日前往安龙迎驾。”言翔逼令刘议新具启报可望，可望益忌定国。[25]

是年，汉奸洪承畴抵长沙，莅任未几，闻李定国攻围肇庆，林、李、刘、谢四将出兵辰州，大惧，使游击彭世鳌、知府范云龙修造长沙城，加高数尺，督促至再。俟闻定国兵败，始下令罢其役。[26]

定国东收楚、粤，明军旧将及明室官吏来归者甚众，兹录其著者如次：

马进忠，延安人，原为农民起义军头领之一，号“混十万”。后降明，以麻河抗清功晋鄂国公。定国出黔，与偕下黎、靖，进

复宝庆、桂林。桂林之役，孔有德城守不下，进忠呼王允成凭堞语，允成射箭传书，登陴示路，城遂破。衡州既下，复与冯双礼拔长沙、破岳州。定国与尼堪战于衡州，可望调进忠入黔。[27]

王允成，辽东人，封岳阳伯，降清，随孔有德陷桂林，清封二等阿思哈哈番。定国破桂林，允成降附（一作启西门纳之人），定国拨兵保护其家，后入定国军。允成无一卒，隶定国供使令，定国颇轻狎之。允成郁郁不得志，唯马进忠时收恤焉，衡州之役，允成死乱兵中。[28]

汪大捷、雷兆圣、欧正福，皆明永国公曹志建旧部，志建死，拥众自保。定国复湖南，以师附之，后随入滇。[29]

张光翠，原为李自成部将，后随何腾蛟抗清。湖南兵败，光翠自衡州西走，壁沅、黔间。定国下湖南，光翠亦出宁乡相应。[30]

刘克安，武冈人，明太仆寺少卿。定国下湖南，从定国为幕属，未几病卒。[31]

刘远生，陕西富平人，明兵部尚书。定国攻复桂林，远生自山中出见之，定国专征自大，倨见文武诸臣，远生至，肃然起迎，远生与抗礼，无所诎。从容劝定国尽忠戴上，定国尤钦信焉。定国下湖南，留远生守桂林，激励士兵，控扼平、柳，抗清全、线、马三将之兵，屡击却之，定国战于衡州不利，线国安复陷桂林。远生退入傜洞，忧恚成疾卒。[32]

管嗣裘，衡阳人，明中书舍人。定国复桂林，嗣裘应招出见，定国优礼之。嗣裘怂恿定国遣使兴隆候驾，定国犹豫未遣。嗣裘大恚曰："吾立身十余年，濒死者数四，更从人作贼耶！"弃定国军去。[33]

朱昌时，广平人，明兵部主事。定国复桂林，昌时同刘远生守桂林。桂林复陷，益走傜中，愤恚饥病以卒。[34]

万翱，南昌人，明兵部尚书，降清为马蛟麟幕宾。定国下衡州，翱往见之，定国以其曾屈节，待之甚倨。翱自陈主封秦王功，定国甚恶之，言于庭曰："万尚书朝廷大臣，宜加优礼，然曾絓误，未闻明旨复职，故不便与之抗礼。"闻者咋舌。定国兵

退，翱复降于清。[35]

严云从，分宜人，明清江伯。定国收粤、楚，云从致书馈求见，定国知其茸陋，不之答。[36]

郑云锦，蒲田人，明知州，定国再复南宁，贺九仪檄云锦署横州知州。其后戊戌，城陷被执，不屈死。[37]

是时东南各地，望风附义者亦夥，有沈士柱者，芜湖世家子，能为诗古文词，南京既失，破家结客，座上言兵者尝十数人。是年，以通西宁王李定国，牵连被执，寻得脱归。丁酉年(1657 年)，复被执，囚于南京者三年，作故宫词以见意。己亥年（1659 年)，郑成功率舟师至南京，清以士柱与通，杀之。[38]

【注释】

[1] 参见黄宗羲：《永历纪年》；冯甦：《见闻随笔》卷下；古滇罗谦本：《残明纪事》。

[2] 参见黄宗羲：《永历纪年》；王先谦：《十朝东华录》卷四。

[3] 参见王夫之：《永历实录》卷十四。

[4] 清国史馆：《贰臣传・洪承畴传》。

[5] 参见沈荀蔚：《蜀难叙略》。

[6] 参见《明清史料》丙编第十本，“四川巡抚张所志揭帖”。

[7] 参见鹭岛道人：《海上见闻录》。

[8] 参见古滇罗谦本：《残明纪事》。

[9] 参见王夫之：《永历实录》卷十四。

[10] 刘彬：《晋王李定国列传》。

[11] 参见徐鼒：《小腆纪年》卷十八。

[12] 参见黄宗羲：《永历纪年》。

[13] 参见刘彬：《晋王李定国列传》；蒋良骐：《东华录》卷二。

[14] 参见刘湘客：《行在阳秋》卷下。

[15] 参见《明清史料》丙编第九本，“广东德庆、开建州县等官弃城案残件”。

[16] 参见邵廷寀：《西南纪事》卷十；李寄：《天香阁随笔》卷一。

[17] 杨英：《延平王户官杨英从征实录》。

[18] 参见刘湘客：《行在阳秋》卷下。

[19] 参见雷亮功：《桂林田海记》。

[20] 参见刘湘客：《行在阳秋》卷下。

[21] 参见《明清史料》丙编第九本，“兵部题本”。

[22] 参见雷亮功：《桂林田海记》。

[23] 参见《明清史料》丙编第九本，“兵部残题本”。

[24] 参见古滇罗谦本：《残明纪事》。

[25] 参见王之春：《安龙纪事》；屈大均：《安龙逸史》。

[26] 参见李寄：《天香阁随笔》卷一。

[27] [28] 参见王夫之：《永历实录》卷九；《明清史料》丙编第九本，“定南王下死难各官详情残揭帖”。

[29] 参见王夫之：《永历实录》卷十。

[30] 参见王夫之：《永历实录》卷十三。

[31] 参见王夫之：《永历实录》卷十一。

[32] [33] [34] 参见王夫之：《永历实录》卷十七。

[35] 参见王夫之：《永历实录》卷二十。

[36] 参见王夫之：《永历实录》卷二十四。

[37] 参见徐鼒：《小腆纪传》卷五十。

[38] 参见屈大均：《皇明四朝成仁录》卷十二。

甲午年（1654年）

明永历八年（清顺治十一年）

正月，秦王改云南为云兴，辰州为沅州府，沅州为黔兴府。时可望统兵三十七万[1]，以刘文秀为大招讨都督诸军，出师东伐。

春，秦王开科。可望令蜀士乡试于贵州，两省合取，中式者四十人，拔贡二十人。[2]又命学道孙顺考试滇南士子，随即开科。以西寺为贡院，命盐税司史文为监临，减三场为二场，减七篇为五篇。头场：三书，二经。二场：策、论、表并诗二首。其题“官柳连云”、“滇南纪胜”。取解元高应雷等三十二名，照给头巾、青袍，与明例埒。自是滇南士子，书声不辍。[3]（《爝火录》云：“八月，孙可望设科取士，以慧光寺为棘闱，取中陈士基等五十四人。”《云南府志》说同。）

是时，滇、黔境内秩序安定，官署、学宫岁有修建。永历三年，阿迷州知州刘誉重建州署；六年，阿迷州知州方逢圣、学正王爱民重建学宫。[4]其他各州县亦多有建置。

三月，孙可望愤明臣吴贞毓等以“密敕”挑拨孙、李是非，诉之桂王，其疏有云：“兹跸安龙三年矣，才获宁宇，又起风波，

岂有一防城、一元胤可以再陷圣躬乎？臣累世力农，未叨一命之荣、升斗之禄，亦非原无位号不能自雄者也。沙定洲以云南叛，臣灭定洲而有之，又非无屯兵难于进攻退守者也……臣关西布衣，据弹丸以供驻跸，愿皇上卧薪尝胆，毋忘濑湍之危。如皇上以安隆僻隅，钱粮不敷，欲移幸外地，惟听睿断；自当备办夫马钱粮，护送驾行，断不敢阻，以蒙要挟之名。”疏入，桂王不得已，杀吴贞毓等十八人以谢。其诏有云：“阅今八载，险阻备尝，朝夕焦劳，罔有攸济。自武、衡、肇、梧以至邕、新，播迁不定，兹（前）冬濑湍，仓卒西巡，苗截于前，虏追于后，赖秦王严兵迎扈，得以出险，定跸安隆，获有宁宇，数月间捷音迭至，西蜀、三湘以及八桂，洊归版图。忆昔封拜者紥紥若若，类皆身图自便，任事竟无一人。惟秦王力任安攘，毗予一人，二年以来，渐有成绪，朕实赖之。乃有罪臣吴贞毓、张镌（一作镐）、张福禄、全为国、徐极、郑允元、蔡宿、赵赓禹、周元吉、易士佳、杨锺、任斗枢、朱东旦、李颀、蒋乾昌、朱仪昶、李元开、胡士瑞（《云南府志》任斗枢作任斗墟，朱仪昶作朱仪昃。《黔中杂记》：蔡宿作蔡缜，朱东旦作朱东日），包藏祸心，内外连结，盗宝，矫敕，擅行封赏，胎祸封疆，赖祖宗之灵，奸谋发觉，随命朝廷审鞫，除赐辅臣吴贞毓死外，其张镌、张福禄等同谋不法，蒙蔽朝廷，五分首从，宜加伏诛。”[5]

四月，刘文秀自滇至黔，率军东出。可望谕云南城守王尚礼，令籍定国宫眷并文武兵丁妇女，欲分配各营。时四川败后不久，滇民惶然，尚礼虑大营分散，将滋内乱，乃三启止之，惟裁汰安西大营粮饷。尚礼密以金币致定国夫人，安西大营赖以得济。[6]八月，使祁三升镇嘉定，撤狄三品等还滇。[7]

是岁正月，明海上张名振率海舰数百艘，溯江而西，号称“接济秦藩”[8]。入京口，破仪真，泊舟金山，遥祭明孝陵。四月，复以海艘入镇江，破仪真；以沙船六十艘入山东登、莱等处，直抵高丽。二月，郑成功遣兵攻崇明，败绩；旋攻吴淞，俘战船二百只。十月十九日，成功始遣师南下与定国会师，委左军辅明侯林察为水陆总督，提调军中一切机宜，率周瑞、王秀奇、

苏茂、林文灿等官兵数万，战舰百只，剋日南征。另委忠振伯先到铜山拨船议粮，遣户科杨英同忠振伯炤议，又差效用官林云瑺，赍勤王师表赴安龙，并持书会晋王（西宁王），其复定国书云："季秋幸接尊使，请翰教谆谆，修茅戟而奏肤功，大符夙愿；又重以婚姻之约，情谊绸缪，虽隔在一方，而神交不啻面谈矣。窃闻方召并驾，而猃狁于襄；秦晋缔盟，而周邦咸赖，古人美绩，何多让欤！弟十年京营，十年攻战，正欲得一同袍同气者，共灭丑类而朝夕，兹叠承大教，宁忍濡滞以自失事机。奈尊使到敝营时，值南风盛发，利于北伐，而未利于南征。故再发舟师，令定西侯张名振、忠靖伯陈辉等复出长江，水陆并进，规取金陵，使彼胸腹受创，则手足自乱。即欲遣师南下，与贵部共取五羊，缘风信非时，未便发师，尤恐久悬尊虑，先遣敝员林祚、李景等赍小函奉复，谅达台览矣。兹届□冬，北风飙起，即令辅明侯林察、闽安侯周瑞等统领，扬帆东指，虽愧非顺昌旗帜，然勉效一臂之力，水师攻其三回（面），陆师尽其一网，则粤酋可不战而擒矣。至于连姻一议，闻命欣惬，惟有祗承。第小女长者已先许人，兹有兄弟之女，欲以托茑萝。弟性笃天伦，虽兄弟之女，不殊己女，但事须光明，不敢不以实告，惟在裁择焉。未订朱陈之诺，本未敢遽附姻称，但尊谊山重，意气之雅，犹金石也，敬托姻末，谅无唐突之诮否？辱承厚贶，如捧琼瑶，对使拜登玲珑金顶、㡇绒大帽、碧鞓带、蜜蜡金珠四色，铭谢曷既！另附戋戋，匪云抒报，聊申豁毛之荐，冀达明信之忱，伏惟崇慈，俯垂鉴茹！余情缕缕，恨未能会飞，促膝面罄，尊使回日，自能代悉。"[9]十二月朔，克漳州，漳属十县而降者九。[10]是夏，清遣使两次招成功，成功不理。

定国年三十四岁

孙可望以定国出走，憾之益甚。定国亦恐其来袭，出师廉、雷以避之。[11]盖欲经此取东粤，与郑鸿逵、郑成功合兵，自闽、浙图南京也。[12]

先是，定国以癸巳冬入粤，所至闻风倒戈，浔、梧、高、雷、肇庆等地皆清兵驻守，悉通款来附，约恢复广城日会兵。[13]汉奸尚可喜惧，疏请敕洪承畴率满、汉兵合趋南宁，以断定国归路。值海上告急，兵无可发，清廷且拟调耿继茂移镇福建。可喜益惧，疏请与耿继茂共镇粤东，以壮声势。

三月（一作四月），定国带兵数万，象十三（一作十二）骑，徬徬兵数千，突自柳、横出灵山，略廉州。清青头营总兵郭虎闻风遁回高明，雷州总兵先启玉降于定国。高镇陈、李二总等，为定国象兵追逐，逃遁入山，或自刎，或走死，远近大震。定国分兵恢复罗定、新兴、石城、电白、阳江、阳春等县。[14]复遣人携书赴海上，约郑成功共取广州。使者携带厚礼四色，议与成功联姻。三月二日，定国到高，委侯守应镇守高州，委钟爵知吴川县。改府堂为王殿，大兴土木。四月，定国病便结，延医诊治。五月，召医生陈舜系面询，发剂颇效。[15]是月，定国发廉州，原已降清之故将张月以高州来归，杀清游击陈武。[按：《西南纪事》、《皇明四朝成仁录》均谓定国遣“总兵陈武渡海拔临高、昌化”。《乱离见闻录》则称“平藩（尚可喜）标下副总陈武”。是陈武为清将证。据《清两广总督李率泰揭帖》云：“逆贼李定国自廉犯高，张月内应逆贼，游击陈武以兵寡不能抵敌，被贼杀死。”从之。] 汉奸岭西道周公轼、学道钱学鼎，皆就戮。[16]六月，定国再攻梧州，前锋从河埠地方出头，约马步千余，突至戎墟并独冈地方，距梧城只二十里，俱系明盔明甲，口称“安西兵马”。因清兵有备，不克。一时贺县廖笃增，怀集、开建罗锦䨒，并永安州等地义师，纷起响应，限百姓三日内尽裹网巾，昼夜放炮呐喊，以作疑兵。[17]定国师复东进，黎、岐震动，水陆响应，儋崖路断，清琼州守将高进库告急于广州，广州应援不及。定国进复阳春、阳江、恩平，前锋抵肇庆。欲大举发郴、桂兵出韶州，江楚界上兵入岭海，约闽海国姓攻惠、潮，清廷大震。定国尝一试其所有地，题用“一匡天下”，自负以为仲父复出云。[18]

定国善用象，象十三，俱命以名，封大将军，所向必碎。[19]

明虎贲将军王兴据兴平拒清，以其众降定国，定国依为导。[20]六月围顺德，以王兴分围水门，而自营三门。清平南（尚可喜）、靖南（耿继茂）二王援师出，不见定国一兵，惊曰："彼四面下子矣！且退。"有副将对曰："此退必尽于江，不如死仗。"果死仗得脱，死者几半，自是数月不接一矢。之后，清兵来援，定国故匿上骑，用步卒进。清兵驰之，卒左右避，突出象，蹴踏腾越，敌骑惊仆，大军乘之，死伤遍野，获器械无数。所得资重，尽以犒军。城中饥，垂破者数，清师又至，以精骑间出定国后，后阵乱，定国少却。尚、耿二王以书招定国，答书凛凛动人听，有"大王中国旧人，倘同心相与，共猎中原，得地分王，遥护共主可出"等语。[21]［按：《粤徼语》载定国攻顺德，与围新会时同，事亦类，两城并围欤？抑《粤徼语》误以新会为顺德欤？志以待考。］

六月，定国遣兵薄新会[22]，清将尚可喜困守广州，畏定国，不敢战。又虑兵分则弱，谓继茂曰："以旁县饵之。"于是清督李率泰檄总兵郭虎、副将杜豹守高明。可喜遣甲喇章京田云龙守新会。九月三日，定国围新会，可喜令右翼总兵吴进功助云龙守。定国以舟师扼江门，筑炮台于陆遏援兵。可喜、继茂亲赴江门争，水陆并进，十七日战于江门。因江门河路浅窄，河下下有木桩数层，清兵大船不能进港，止挑小哨船拔桩而进。定国战不利，损兵三百余名，失大船五只，大炮十二，小炮五十三，军少却。清阿达哈哈番刘秉功得入新会。[23]定国兵薄城，阅十三日而去。[24]

是年夏秋间，定国常在病中。六月，上吐下闭，中脘疼痛。医生用盐汤探吐，出痰盆许，复以药条引导，解其热毒。八月初病仍未愈，医以归脾和独参汤投之，提省其脾而愈。[25]秋，驻师兴邑，遣官赍书，随郑成功差官李景赴海上，约郑成功共谋新会。书云："孟夏遣使，帆海诣铃阁，悉机务并候兴居，拟阅月可得旋，不图至今尚栖迟贵壁。今差员李景至，始知前此鼍使林祚者，固不知所下落也。不谷驻师高凉（《野史无文》云：高凉山在高州境），秣励养锐，惟候贵爵芳信，即会辔长驱，以成合

击，盖不欲俾虏有只蹄□□耳。乃七月中旬，又接皇上敕书，切切以恢东为计。君命不俟驾，宁敢迟迟吾行哉。爰遣水陆二师，齐发新、肇，托祉有初，两见成绩，盖殄虏于长洋，败李酋于端水，而会城两酋，恃海樱城，尚稽戎索。兹不谷已驻兴邑，刻日直捣五羊；然逆虏以新会为锁钥枢牖，储粮攸资，是用悉所精神，援饷不绝。不谷之意，欲就其地以芟除，庶省城可不劳而下，故亦合力于斯。在彼望风屏息，遵陆知难，遂恃长舸舰，堵我舟师，非借贵爵星言发夕，其谁收此一捷也。企慕甚殷，宜有关切。至于粤东水师官义，抗虏降虏者，莫不密遣告劳。然详所举止，多伦观望，不思羊城底定后，虽频年抗节而不千里勤王，亦何夙绩之足道哉！惟贵爵为此宣意，以怂恿各部，则五等上□□□国恩只报在兹，而不谓不谷之功罪可混也。至援虏之来，向亦略闻其概，然□□□虏，再无敬谨之强且精者，今安在哉！诚来，当尽缚以报知己。其楚、豫之间，侦使颇繁，大略粤事谐，而闽、浙直争传一檄，所谓张侯爵鼓楫而前，要知亦缓于今日发粤之举，时乘其所急，名高于易收，执事宁忍置之？差员称贵爵从潮、惠脂车，则当以初冬为的，其水部必以速临新邑为限，均希。相要旦旦，足纽至诚，云台虚左，不谷实厚冀于公也。暂复不备。”又书云：“圣跸艰危，不可言喻，敕中怆怛之语，不谷读之痛心，五月至今，所待贵爵相应耳。倘确不能来，即示以的，不谷便另议舟师，以图进取。甚勿然诺浮沈，致贻耽搁！要知十月望后，恐无济于机宜矣。”[26]

九月廿日，定国复围高明，掘地道急攻，城坏二十余丈。将陷，可喜往救，望见定国军甚盛，遽退。定国自率步骑万余追之，选精骑五百人急蹑可喜，遇伏不利，失总兵武君禧、游击王天才等十六人。可喜退。晦，克高明，擒郭虎，斩杜豹[27]；清同知白崇周、守备陶以宁等降。降官孙国宝、纪大良等讲功于定国之前，定国赏纪大良以袍，吕得胜以帽。设总镇，以武乾知县胡必誉驻扎城内，劝士民出饷，定国自率兵数万往新会。[28]

十月十四日，定国围攻新会城。先是，新会自崇祯元年以来，义军迭起，盛时众至十余万。清兵陷广州，义军纷起抗清。

定国自高明东进，联络水陆义师王兴、陈奇策等共谋新会，分兵出三洲、金利、富湾、罗屈诸口，距广州百里，军声大振。[29]

定国围新会，兵号二十万，重围密布，炮声不绝。越十余日，掘地道攻城，发如震雷，西山城陷，为清兵拒却。十一月攻愈急，以大炮击，务进，前城崩十余丈，死士尽锐奋登；然阻于城壕，飞箭鸟枪如雨，定国前锋死伤过半，卒不得人。乃伐木填壕，逼累城下，谓之"捆青"，欲令木与城齐，履之而登。城中以膏沃薪，纵火焚之，惟葵树不坏。定国乃多伐葵，城中凿堑出民，彼从外投，此从内运，遂不能累。定国顿兵坚城几两月，计无所出，会谍者言城中粮尽，定国遂罢攻，连营分守重围，建造行宫，署置官曹，征发米盐，为持久计。而新会城内，自五月防兵一至，悉处民房，官给月粮，为其私有；日用供需，责之居停；贫民日设酒饷兵办，刍豆饲马，少不丰赡，鞭挞随之。仍以糗粮不给为辞，搜粟民家，子女玉帛，恣其卷掠。自是民皆绝食，掘鼠罗雀，食及浮萍革履，至腊月初，兵又略人为餔腊，残骼委地，不啻万余，举人莫定莲，贡生李龄昌，生员余浩、鲁鳌、李炅等皆为砧上肉。清兵困守广州，莫敢来援。十二月十四日，清援兵至，围解。时城中马有余粟，兵有余粮，所遗民鸡骨不支；而悍卒不顾，犹勒城中子女，质取金帛，不能办者尽俘而去。新会被围半载，饥死者半，杀食者半，子女被采者半[30]，清兵残暴率如此。

时有新会人李尔龙者，年少性杰烈，誓欲歼敌。一日，奉定国命侦广州，值诸官有事江浒，尔龙短衣跣足，奋刀前斩，士卒死伤者数人，侍卫溃乱，人大骇走。尔龙大呼曰："我天兵数万在此！"城将闭，尔龙夺马驰入城中，至平南王府，门者丛枪击之，策马复驰去，追及演武场，身负数十枪，被执。平南王尚可喜诘之，曰："我天朝义士也，奉李定国令旨，潜兵人城，今夜一鼓当发，我性躁不能待，故至此。"遂瘐死狱中。[31]

十二月（一作乙未四月），清靖南将军朱马喇靠章京东邦，率满、汉兵援新会。先是，朱马喇统兵而南，原议在赣州养马三月；朱老将，知兵，至赣州声言养马，而阴选勇士兼程抵新

会。[32]会尚可喜、耿继茂于三水，同趋冈城，十日至三洲。会定国军中瘟疫盛行，士气颓萎，死病枕藉[33]；接战不利，失副将梁大勋。十四日清兵抵新会，定国严阵城北，集步骑四万，分据山峪，列象、炮拒战。可喜遣尚之智、盛登科先击峡左山兵；定国出兵四千，自山巅驰下，横击清师，不利；清兵夺其山，峡口兵望阵动，连得成、田云龙、栗养志统步兵合战，象惊炮还走，定国军乱。清出骑兵从两翼纵击，定国败走，干戈弃载道，死者无算，亡十三象，清兵追奔三五里。[34]是时，定国师在牂牁江北，周金汤、高文贵合师营江南。金汤见定国败，烧营夜遁，定国之师，全线崩溃。[35]初，定国有马三千，将战，遣厮养先牵去，从者二百骑，步兵四万，得脱者半。[36]定国尽撤肇庆对河原扎象二只，马兵一千八百名，步兵二千二百名；守高明县马兵二百名，步兵人百名；原留在高州府象一只，马兵四百，步兵一千；至郁林州，又将苦途力小子内，挑选马兵者共计万余，兵象三只[37]，自新兴南走高州，民间男妇老幼、饥兵病卒，从之者六七十万人。[38]

定国部总兵孙际昌、中书杨琳等叛，带领马二十余匹，逃往土司何美璜砦内，定国使都督吴三省、总兵杨成、王三才带马兵四百、步兵一千二百、象一只追取之，与清兵遇于兴业，战败，象亦失。东邦留尚之智驻兴业，自与敖拜、来塔等追及定国后军，后军溃，老营妻子被冲散。蒙古、满洲兵追定国及于横州江岸，定国部亡象二、马二百六十八匹。[39]定国抚难民，哭号失声[40]，烧浮桥，由宾州夜走南宁。由是广东高、雷、廉三府，肇庆、罗定属三州一十八县，广西横、郁林二州，北流、兴业、容、岑溪四县，悉陷。琼州抗清义师，虽已归定国，力屈不能复出，两粤之业至是衰。[41]

【注释】

[1] 参见奈村农夫：《野史无文》卷七。

[2] 参见沈荀蔚：《蜀难叙略》。

[3] 参见佚名：《滇南纪略》。

[4] 参见《阿迷州志》卷八。

[5] 刘湘客：《行在阳秋》卷下。

[6] 参见屈大均：《安龙逸史》卷下。

[7] 参见沈荀蔚：《蜀难叙略》。

[8] 参见徐鼒：《小腆纪年》卷十八。

[9] 杨英：《延平王户官杨英从征实录》。

[10] 参见南沙三余氏：《南明野史》卷中。

[11] 参见温睿临：《南疆逸史》卷三。

[12] 参见王夫之：《永历实录》卷十四。

[13] 参见古滇罗谦本：《残明纪事》。

[14] 参见刘湘客：《行在阳秋》卷下；陈舜系：《乱离见闻录》。

[15] 参见杨英：《延平王户官杨英从征实录》；陈舜系：《乱离见闻录》。

[16] 参见邵廷寀：《西南纪事》卷十。

[17] 参见《明清史料》丙编第二本，“经略洪承畴密揭贴”。

[18] 参见邵廷寀：《西南纪事》卷十；查继佐：《罪惟录》传卷九。

[19] 参见查继佐：《罪惟录》传卷九。

[20] 参见梅村野史：《鹿樵纪闻》卷下。

[21] 参见查东山：《东山国语·粤徼语》。

[22] 参见《新会县志》。

[23] 参见《明清史料》丙编第九本，“平、靖两王援剿新会高明残件”；邵廷寀：《西南纪事》卷十。

[24] 参见《新会县志》。

[25] 参见《乱离见闻录》。

[26] 参见杨英：《延平王户官杨英从征实录》。

[27] 参见邵廷寀：《西南纪事》卷十。

[28] 参见《明清史料》丙编第九本，“平、靖两王援剿新会高明残件”；《高明县志》。

[29] 参见邵廷寀：《西南纪事》卷十；《新会县志》。

[30] 参见《新会县志》卷十三。

[31] 参见温睿临：《南疆逸史》卷三十八。

[32] 参见李寄：《天香阁随笔》卷一。

[33] 参见刘彬：《晋王李定国列传》。

[34] 参见邵廷寀：《西南纪事》卷十；《清史稿》列传卷四。

[35] 参见李寄：《天香阁随笔》卷一。

[36] 参见邵廷寀：《西南纪事》卷十。

[37]《明清史料》丙编第九本，“平南王揭帖”。

[38] 刘彬：《晋王李定国列传》。

[39]《明清史料》丙编第九本，“平南王揭帖”。

[40] 刘彬：《晋王李定国列传》。

[41] 邵廷寀：《西南纪事》卷十。

乙未年（1655年）

明永历九年（清顺治十二年）

二月，秦王孙可望颁仪注，轻文重武，无所不至。又颁“忠孝经”，令士子研读，列为兼试内容。[1]

三月，孙可望派其家族孙自英与总兵白继佐等，扮商贩货，前往陕西一带，打听清兵消息（后为清兵破获）。[2]

五月，刘文秀奉可望令出征，率众六万，战舰千余，出川峡，遣卢名臣、冯双礼分略岳州、武昌，为清兵所扼，不得进。回舟攻常德，遇伏，大败，名臣赴水死，文秀及双礼退还贵阳。[3]

可望在贵阳大兴土木，建立宫殿楼观，甚伟美。又作行宫十余所于滇、黔孔道，以备巡幸。为防定国还滇，使刘镇国、关有才屯田州以御之。凡定国必过地，尽焚刍粮以绝其归路。[4]

是岁正月，郑成功取仙游，改中左所为思明州，分所部为七十二镇。其时郑成功方与清廷议和，援粤之师，一再愆期。林察率水师抵粤时，定国已败退南宁，海上犹不知也。正月，成功与清军门佟国器书云：“自去岁议和之后，不佞遂按兵不动，即江淮截运之师，亦暂吊回；遣进浙西之旅，亦戒安辑；孙、李请援

之兵，亦停未举。此示信于清朝，不可为不炤矣……湖广为天下腹心，前敬谨之兵，精而且多，全军覆没；今洪承畴乌合之众，战败固其宜也，其腹心之决坏如此者。广东为天下手足，现今西宁王攻破肇庆，羊城下在旦夕，清朝应援之兵，披甲不满三千，是驱犬羊而赴虎群，稍饱其腹耳，其手足之决坏如此者……台台若自度德量力，能与我战，则可速来决一雌雄；不能与我战，则宜早从吾言，将地方可静，钱粮可输，百姓可安。”佟国器复书强硬，和议卒不成。四月，明封郑成功为潮王，成功辞不受。五月（《海上见闻录》作甲申年五月），援粤之师失利，退回思明。成功集文武，吊林察等责之曰：“勤王入援，君命原无俟驾，逗留观望而回，朝典何在？尔等合心规避，当尽正罪。”以罪在周端，削职夺爵，永不叙用；总督林察，统领王秀奇、苏茂以下，降级示惩。[5]九月，成功南征，破揭阳、海澄、普宁三县。[6]十一月，张名振卒，张煌言代有其军。

定国年三十五岁

三洲败后，原随定国东进之明军将领，如标将王成、张士禄，岭西道陆士瑞，□道李升，安东知县罗大经等均降清。[7]二月，定国以残兵千余退保南宁，后天威营高文贵、扈卫靳统武等率溃众来会，合之仅得六千人。孙可望令关有才总统十三营之师凡四万人屯田州[8]，定国处境甚危。

定国部署略定，复遣高文贵、仁安将军李永爵、水师忠明将军李先芳等东下浔州、横州，谋恢复两粤，于年末败归南宁。[9]

定国营中，有昆明人金公趾者［按：《爝火录》云：壬辰年(1652 年）四月，金公趾病卒，误欤？抑说三国者为滇人金维新欤？近人李根源《曲石诗录》谓“金公趾，名维新”。不知何据］，知定国为人勇敢刚直，欲说之还滇。因取世俗所传《三国志演义》，时时为之诵说，定国乐闻之。已而，明斥孙可望为董卓、曹操，而期定国以诸葛武侯。定国谓公趾曰：“孔明何敢望，关、张、伯约之所为，不敢不勉。”[10]自是有入滇意。

明桂王复遣兵部侍郎萧尹赍血字诏赴南宁，封定国为晋王，

述可望“僭逼”状，请定国速率部还黔，定国辞不受王封。[11]［按：萧尹赴南宁事，《永历实录》系于永历八年，是年定国东围新会，未回南宁。《晋王李定国列传》谓萧尹至南宁在定国兵败新会、退保南宁之后，其时当为永历九年，故录于此。］

是冬，汉奸洪承畴以定国兵败势危，遂献“两粤合剿”之策，调兵运饷，集中全力压缩南宁。[12]

定国东下广东，明军旧将及粤东义师，应之者甚多，兹录其知名者如次：

郝尚久，本李成栋部将，封新泰侯，永历四年降清。定国兵临肇庆，尚久与为声援，改署官府，执敌知县薛信辰，囚之。后兵败投井死。[13]

王兴，恩平人，短小精悍，人呼为“绣花针”，为明虎贲将军。永历八年九月，定国兵下高凉，兴为前锋，从攻新会，先登。定国败绩，兴乃驻军文安砦，筑垒建仓廒，为持久计。永历在云南，出入海上，诏使往来，借兴为东道主。兴又数使任茂公与黄钰假道交趾，贡金银布帛诸物。永历十二年，兵败自焚死。[14]

萧国龙，阳江人，初为王兴部将，以功授骠骑将军。定国师至，国龙请为前锋，力攻新会不克。既退，奉兴令分驻永丰砦，与文安犄角，兵败死。[15]

陈奇策，南海人，永历初，击敌虎门、羊山寺之间，拜凌海将军。七年春，定国攻占肇庆，分攻四会、广宁，并克之。奇策率舟师应援，将直抵三水渡军，以趋广州。敌以戈船扼大路峡口，奇策攻之，斩级千余，退还下川，定国解去。明年五月，定国复至，攻下高、雷、廉三郡，岭西尽复。九月进围新会，奇策率舟师先大军袭击，斩敌将盖一鲲于江门，焚其大舰数十，又擒副将梁大力，槛至军前，定国大喜，使为水师都统，屯江门栅，筑炮台，以绝声援。会清朝救兵至，定国战败，奇策仍还下川。后与驻扎钦州龙门岛之邓耀合兵，思西附定国，东通成功，以张声势。因与邓耀不合，往依广国公贺九仪于南宁。敌犯云南，九仪退援滇南，奇策以孤军难支，仍返上思，入十万山中，后兵败被执死。[16]

邓耀，高州人，为明李明忠部将，明忠死，率所部退保龙门岛。定国败，余兵走岛中，军声日振，治舟缮甲，煮海屯田，为恢复计。后兵败被执死。[17]

陈瑾，湖州人，明兵部尚书督师，兵败，自杀未死，遁迹迁隆十万山中。定国兵败新会，退还迁隆，招之出见，瑾长揖不拜，定国怒，瑾曰："大明会典，大臣无拜二字王之礼。"定国谢过，请为监军，瑾辞，后病死。[18]

朱盛浓，明部院，与弟盛添聚众富川，联络当地义师王心、蒋乾相等，及八、九两都傜、僮，为定国声援。清兵进犯，盛浓、盛添均被擒，九国（团）两都一百九十二砦，均陷。[19]

此外，丰城侯李茂先、义师总兵龚瑞据富川，总兵廖笃增据玉版巢，李先善、廖凤等据藤县遥为定国声援，后皆败。[20]

定国东出两粤，所派侦察甚多，利用客商，伪作买卖，深入东南沿海及内地各处，以觇虚实。在梧州派出者有刘八、张九、赵文学、徐有功等多人，刘八曾由定国亲自引见；授张九千总，到浙江娶妻住下；赵文学、徐有功前往福建打听消息；刘八则以寻兄为名去浙江，在杭州与张九相会。永历八年二月，刘八回广西定国营，授把总。张九在浙住了半年，因不见赵文学回来，恐赵被执连累，携眷回江西。三月间，弃妻奔定国于罗定山中。时赵文学已回营，领兵四五百人，号称三千人，驻浔州，张九依居之。数月后，定国写一龙票，内签刘八与张九名字，领金七锭（每锭重十两）、大珠一百颗、小珠四十颗到赵文学处，着赵文学打发苏木一船，今刘八、张九到江西、山东、北京等地探听消息。到了龙树滩，阻于清兵，刘八取金三锭并珠子龙票，带在身边，下船到广东省城小心街等处住着，张九在船工作。不多几日，清兵攻上龙树滩，张九弃苏木船，带着金子回浔州，向赵文学请示。次年，张九到广东寻着刘八，二人同住了半年，清朝又发广东兵马下广西，刘八同张九买了些盐菜麦面，装载一船，随清兵西进。半月，到达广西南宁府。兵马已过南宁府，刘八与张九在南宁府船上卖菜与面。住了两日，罗某、顾某等三人前来联系，告诉他们说，安西王兵马已退进土司去了。刘八叫罗某代写

书一封，着他三人回土司投递安西王。分手时，罗某送金三锭，每锭重十两，又银二百两，给刘八两人作盘费，继续活动。刘八与张九在清朝兵马营中，买了些苏木、茴香、纸张、线麻，又拾了些麻饼、牛皮，用船装载，并刘八在官仆人小禄、小元，从南宁府离开清兵营，来到江西赣州，又到梧城镇。随路卖了些银子，就在梧城镇搭了吉安粮帮船，带着货，一路来到济宁卖了些，天津卫卖了些，到扬州雇小船，于永历十年九月内到通州。张九在哥张六家里住着，刘八在哥刘七家里住着，或在通州，或在京师活动。后于永历十一年事露被获。[21]

【注释】

[1] 参见沈荀蔚：《蜀难叙略》。

[2] 参见《明清史料》丙编第十本，"陕川总督致仕金砺揭帖"。

[3] 参见徐鼒：《小腆纪年》卷十八。

[4] 参见李天根：《爝火录》卷二十五；《云南府志》卷五。

[5] 参见杨英：《延平王户官杨英从征实录》。

[6] 参见黄宗羲：《赐姓始末》。

[7] 参见刘湘客：《行在阳秋》卷下。

[8] 参见古滇罗谦本：《残明纪事》。

[9] 参见《明清史料》丙编第十本，"两广总督李率泰揭帖"。

[10] 刘健：《庭闻录》卷三。

[11] 参见王夫之：《永历实录》卷十四；刘彬：《晋王李定国列传》。

[12] 参见《明清史料》丙编第二本，"经略洪承畴密揭贴"。

[13] 参见屈大均：《皇明四朝成仁录》卷十一。

[14] [15] [16] [17] 参见屈大均：《皇明四朝成仁录》卷十二。

[18] 参见屈大均：《皇明四朝成仁录》卷九。

[19] 参见《清世祖实录》卷九；王先谦：《十朝东华录》卷五。

[20] 参见《清世祖实录》卷八八；清国史馆：《贰臣传》卷三。

[21] 参见《明清史料》丙编第十本，"刑部等衙门残题本"。

丙申年（1656年）

明永历十年（清顺治十三年）

明桂王在安龙，知府范应旭岁造开销银米清册报秦王，称“皇帝一员，月支米若干；太子一口，宫眷八口，月支米若干”[1]，处境甚窘。

正月，孙可望闻李定国将抵安龙，乃命白文选迁桂王入黔（一作滇）。文选通于定国，四月，定国、文选共奉桂王入云南，对有功诸人，均加封赏，文安侯马吉翔入阁办事，钱粮归所司；兵马事悉付定国主之。[2]

五月，可望经营川东，加升前达州知州王家修为川东兵备道，于闰五月二十三日到忠州，布置进攻达州、西里等地方。又加驻方斗砦都督徐邦定及杨秉胤等敕印，以为接应。徐、杨团练附近砦硐，设立内外五营，相为掎角，以作外护。王家砦头人牟大盈、长垭砦罗尚凡、东岳砦符敕、桃坝溪王仁行、大城砦牟学南等，各给总兵符札，逐日操点精练，共有三千之名，扬言攻打达州。原已降清之龙爪砦，亦称暗袭清兵。[3]

七月，明义宁伯龙韬驻柳州，因应援李定国，被执死。[4]龙韬，原阳山人，武举出身。永历初起义，从何腾蛟恢复柳州、南

宁、庆远、太平四府，封义宁伯，寻晋侯。(《爝火录》云：戊子年［1648 年］十一月封龙韬洛容伯，十二月晋洛容侯。)孔有德陷广西，韬独守庆远不下，单骑入黔乞师，孙可望使从李定国还战严关，复桂林，诛有德，定国使提兵东守梧州。定国入滇，韬兵败被执死。[5]（《皇明四朝成仁录》作死于庆远。)

十二月，定国遣蜀王文秀略川南。十五日，文秀至洪雅西南之天生城，平丘垄，毁室庐，伐大木，烧绿瓦，建造行宫及百司府署，各营划地而居。[6]是时，川南、川西一带仍为定国守，定国有保境惠民之政，居民德之，多立“李晋王庙”以礼。[7]

是岁正月，郑成功援粤之师败于揭阳；四月，御清兵于金门、厦门；七月取闽安，进攻福州；十二月，与清兵战于护国岭，大败清兵。

定国年三十六岁

定国居南宁，深受清兵威胁，正月初七日，安仁将军李永爵、忠明将军李先芳撤出浔州；十五日失贵县；十八日，清兵陷横州，严捷将军高文贵及施尚义等闻敌至，漏夜撤兵走。[8]又闻可望部关有才、张明志、刘镇国等扼田州，进退维谷，计无所出。中书金维新、曹延生曰：“明志等兵虽多，皆帅主旧部下，安敢相敌？今以奇兵袭之，彼不虞我之至也，且惊而溃。”[9]定国然其议，于正月二十二日，率靳统武、高文贵等集兵兼程疾进。田州去南宁十日程，定国三昼夜直抵城下，入关营，有才以为本营取粮之军；既见衣甲皆皂，非定国旧制，又有“捷取”字号，不知为何兵，遂同刘镇国等跨马而逃。定国后至，不令远追，惟分兵二三百人为一队，按队布列，传报“西府驾至”。有才守隘之卒，或换班，或取粮始回，皆不知有才所在，但闻“西府驾至”，皆胆落跪迎；定国慰谕归营，明晨颁赏；两军相遇，如家人父子，喜慰交庆。次日，定国谓有才之众曰：“本藩与秦王兄弟也，为小人所间，彼此情不自通，将来相见，兄弟之好如故，岂有令尔等杀戮之理乎？本藩围西粤时，已分兵下贵州；今下云南，兵马众多，尔等且宜歇息，俟本藩会晤秦王，另调尔等

出兵。"遂发银二万两犒之，诸营皆呼千岁。[10]二月九日，定国部留粤西之师，败于濑湍，将军李先芳，总兵欧霖猷、陈应凤等被擒，参将杜纪续（一作杜纪）等战死，粤西复陷于清。[11]

先是，孙可望使白文选来安龙，促桂王移黔，文选不直可望所为，以"舆徒不集"为辞，故迟迟不行。[12]正月，定国遣传宣参将杨祥来安龙，行抵坂屯河（去安龙五十里），为刘镇国部营卒所获，见衣甲有"捷取"字样，知为安西之卒，缚送白文选，文选款以酒食。祥乘间入城，谒司礼庞天寿，于衣甲后心复拆密疏，署云"藩臣李定国谨奏"，而加以"屏翰亲臣"之赐章。天寿以闻，桂王阅，疏云："臣今统兵迎扈，不日至行畿，先遣万安，勿轻信奸逆，辄行移跸。"十六日，可望部叶应祯再逼桂王起行，文选说应祯曰："国主恐安西归清，所以迎驾者，恐陷不测也……今我往探，若安西果通清兵前来，移跸未晚；倘只是安西还兵，彼乃一家人，我等何得过为逼迫，自取罪戾。"文选率百余骑出城去，伪为侦视定国者，只从远山放鹰犬，不由大路侦视也。应祯以文选语，亦暂缓其行。[13]

二十一日，可望遣驻镇周自贞募夫三百人抵安龙，促桂王行。夜方半，白文选与刘镇国等率步骑至城下，大呼曰："城内守门军人速报朝内，不得轻自开门出去，安西兵马即至矣，城中切须谨慎！"言毕，奔马而去。城中闻者皆大喜，登城而望。比天明，大雾四塞，咫尺不辨，忽闻有叩门者曰："我西府长随夏太监也。"遂令入朝面奏，曰："定国即至矣，遣臣先奏驰闻，因冰冻难行，秦兵又倒树塞路，马不能前，所以稍迟耳。"于是君臣皆额手称庆。俄而周城炮起马嘶，声震数里，结砦遍九山头。定国率骑入朝陛见，午刻还营。知文选去未远，遣传宣夏太监四人追留之，及于普平寺，文选乃还，同定国入朝密计移滇。[14]

二十六日，定国、文选偕桂王，由安龙进抵普安，遣兵守盘江以御可望。定国发前导卒三千，后卫三千，而亲与白文选居中，自新城、普安西行，二月十一日抵曲靖；置桂王于曲靖，自率精兵入云南。时云南有抚南刘文秀及抚标各营镇，扈卫固原侯

王尚礼并各标营镇留守，兵数千；而将军王自奇骑兵五千驻于楚雄；贺九仪驻兵五千于武定，合之可得五万人。闻定国入安龙，方议往侦虚实，俄报桂王已至曲靖，于是抚南、尚礼聚谋：有议以兵迎拒者，有言调集王、贺等营前御者，有议坚守不令定国入城者，纷纷未定。定国长驱已抵杨林（一作松林，误），调兵战守，俱不暇计。惟先遣黔国公沐天波远迎，抚南、尚礼俱候迓于城东归化寺。定国既至，并辔入城，兵民安堵如故。其后始知定国只有步骑六千。定国与抚南、天波及各镇营联络，合兵三万人，惟尚礼有异志，然所部只千人，不能摇动矣。[15]

三月（一作四月）一日，定国遣靳统武迎桂王入滇，居之可望旧第，即五华山地也，号“滇都”。[16]

三月，定国受封为晋王，文秀为蜀王。[17] [按：《安龙逸史》云：“七月封定国为晋王。”《行在阳秋》云：“十一年正月，晋李定国为晋王。”皆误。定国还自南宁，犹称“西府”；“晋王令旨”六月已达广西，晋王之封，当在三四月间。今从《小腆纪年》。] 六月，桂王与定国、文秀议：封可望旧部白文选为巩国公，固原侯王尚礼为保国公，将军王自奇为夔国公，贺九仪为广国公，秦王扈卫张虎为淳化伯，水军都督李本高为崇信伯，艾能奇子承业为镇国将军，管延安王事，以定国办事官金维新为吏部侍郎兼都察院，龚彝为兵部侍郎。[18]余各升赏有差。

六月，定国遣总兵吴之凤赍专敕及令旨赴广西镇安等地联络，声称永历已移驻云南省城，定国锡封为晋王，即领大兵恢复两粤等[19]；一时粤西义师响应者甚多。

定国欲与可望息兵，合谋下黔、楚，桂王使刘文秀和解之。[按：《永历实录》云：“帝欲息兵，合谋下黔、楚，以命定国，定国听命。”桂王以可望杀十八先生，“无人臣礼”，方恨可望，当无令文秀和解理。和解之议，疑出之李定国。] 文秀刺血书告可望。可望复书狂嫚，和议卒不成。[20] 八月，定国遣人送可望宫人等归黔，并遣可望旧部总兵王麟护行，定国亲饯之于郊外。十一日，桂王亲为定国、文秀割襟订二姓之盟。[21]

十月，定国旧标龙骧营祁三升归滇，封为威宁伯。初，定国

旧标有龙骧、天威二营，为左右翼，祁三升令龙骧，最骁悍。及定国入粤，三升在川奉秦王可望令，调镇遵义。定国还滇，遣使调其兵，适可望调遣之使亦至。三升集其众谓曰："王与西府皆旧主也，今西府尊奉永历帝，我等做官做事，方有实效，我当遵西府之调为正，诸君以为何如?"众皆曰："惟将军令。"遂却可望。使急之，三升将杀之，使者逃。可望发数营袭三升，三升且战且走，得率兵入滇。[22]

定国初至云南，即捕马吉翔及其家人，令步将靳统武收系，将杀之。吉翔日媚靳统武，定国客谄统武，吉翔复媚之，因相与誉吉翔于定国，而微辩其冤。定国召吉翔，吉翔入谒，叩头言："王再造功千古无二，吉翔幸望见颜色，死且不朽，他是非何足辨也。"[23]定国惑而释之，吉翔与庞天寿得入阁办事如故。定国与文秀偶出入二人家，明臣高勣、邬昌期合疏言："二王功高望重，不当往来权佞之门，恐滋奸弊，蹈秦王故辙。"吉翔以二人激王怒，命各杖一百五十，除名。维新走告定国，定国偕文秀入救，乃复二人官。[24]（《云南府志》作"高勣已死，复昌期原官"。）

是岁，定国、文秀均有书致郑成功。定国书云："曩者高凉遣候，极目惠风，约不如期，顿成睽阻，许大机宜，徒深怅望！嗣驻朗（南）宁，复通密耗，乃于秋爽始审兴居，所荷远贻，仅仅得之海上传闻，求其并缆连樯，再续五羊之役，弗可得□（矣）。今春楚虏、粤酋合师狂逞，将欲震我行畿，维时声援掎角，落落难呼。因计圣跸未宁，即空两粤以长驱，而瞻就弗及，引安龙局蹶，远迩楸心，先事迎銮，君子宜有同心也。此月陛见，天语谆详，廷议兹举，允符宸断；即日六飞夙驾，以四月如溟（滇），时广宣圣泽，丕畅皇灵，潜跃依光，鼠狐改步，三百年兴感人怀，于斯可振，而庙谟乾断，焕然纪纲，社稷灵长，无容龟卜矣。惟念圣恩广大，赏格逾涯，如不谷者，不督其长年之徒劳，□酬□一日之蹇负，甚而桂衡薄绩，册以丹书，顾此非赏，益增悚亥！公将何以为报塞训□，然嘉猷茂伐，频达朝廷，奚烦饶舌；惟东事辅车之谊，潮、惠叠奏之勋，是固不容已于对

扬者。上每召问，附髀久之，用特专敕遥颁，冀公于咫尺天颜，枕戈靡懈耳。宸居巩定，挞伐亟申，拜成命以将天威，分谊攸笃；先内安而即外攘，时势维宜。公其整帆饬旅，布号宣威，待我于长洋，把臂击楫论心，一偿夙愿，不亦快哉！惟兹尺鲤，愿得传告，勿惮用答，不尽。”[25]［按：此书，《延平王户官杨英从征实录》作海上于永历八年二月收，误。书中明言“以四月如滇”，“上每召见”，当为定国由南宁入安龙以后事。由安龙（或由滇）发书至海上，道途阻梗，非数月不办，宜为永历十一年二月收。］

【注释】

［1］参见梅村野史：《鹿樵纪闻》卷下。

［2］参见查继佐：《罪惟录》传卷九。

［3］参见《明清史料》丙编第十本，“四川巡按高民瞻揭帖”。

［4］参见刘湘客：《行在阳秋》卷下。

［5］参见屈大均：《皇明四朝成仁录》卷十一。

［6］参见沈荀蔚：《蜀难叙略》。

［7］参见张澍：《蜀典》卷一。

［8］参见《明清史料》丙编第十本，“两广总督李率泰揭帖”。

［9］参见徐鼒：《小腆纪年》卷十八。

［10］参见屈大均：《安龙逸史》卷下；《明清史料》丙编第十本，“两广总督李率泰揭帖”；《云南府志》卷五。

［11］参见《明清史料》丙编第十本，“两广总督李率泰揭帖”；蒋良骐：《东华录》卷二。

［12］参见珠江旧史：《劫灰录》卷一。

［13］［14］［15］参见屈大均：《安龙逸史》卷下。

［16］参见古滇罗谦本：《残明纪事》；李天根：《爝火录》卷二十六。

［17］参见查继佐：《罪惟录》传卷九。

［18］参见屈大均：《安龙逸史》卷下；李天根：《爝火录》卷二十六。

［19］参见《明清史料》丙编第二本，“经略洪承畴揭帖”。

［20］参见王夫之：《永历实录》卷十四。

［21］参见屈大均：《安龙逸史》卷下。

［22］参见古滇罗谦本：《残明纪事》。

[23]《明史》卷二七九。

[24] 参见西亭凌雪：《南天痕》卷十三；李天根：《爝火录》卷二十六。

[25] 杨英：《延平王户官杨英从征实录》。

丁酉年（1657年）

明永历十一年

（清顺治十四年）

正月，孙可望遣程万里赴滇都，请遣还其旧标之在滇者，许之，仍给夫马送之。[1]定国锐意经营川、滇，力图再举。正月（一作是冬），议开缅甸为省，以沅江土府为总督，不果。[2]二月，命刘文秀由建昌回云南，留其将杨国明守嘉定。五月，遣白文选入黔议和，时可望攻滇之意已决，拒言和，拘文选而夺其兵。定国复遣可望旧部东昌侯张虎赴黔说可望，虎行，桂王脱金簪与之曰："惟卿善开导。"虎至黔，出簪，诡称桂王令虎微行刺。[3]可望怒，反意益坚，差通政司朱运久入滇，联络旧部王自奇、王尚礼、关有才等为内应，积极作攻滇准备。[4]

七月，王自奇谋叛，率张明志、关有才二镇营兵，自楚雄西奔永昌。[5]

孙可望谋犯云南，人心多不直其所为。马进忠、马宝、马惟兴以同姓相密，又与白文选交，皆密谋助定国，而可望不知也。诸将先从容言于可望，使还文选兵，可望从之。八月朔，以白文选为征逆招讨大将军，总统诸军前行；以马宝为先锋，合兵十四万（一作十六万）入滇[6]，名"清君侧"；令冯双礼守黔，而自

率一军随其后。[7]八月十八日渡盘江，滇中大震。是月，云南仍举乡试，以教场为贡院，取中王肇兴、何蔚文、刘联声等五十四人。此为乡试，后乃开科。[8]九月，明削孙可望秦王称号，以李定国、刘文秀合师进讨。定国约白文选为内应，十九日战于交水，可望大败东逃，其部将冯双礼亦弃之而归定国，可望势益窘。十月，率数十骑东走长沙，依汉奸洪承畴降于清。清封可望为义王，后随出猎，被射死。[9]

十一月，定国部贺九仪以兵破横州，还守南宁。[10]

是岁二月，定国书至海上。郑成功遣效用官李景与来使同赴云南，复书往会。成功书云："数遣信使，只候好音，山川修阻，或达或否，计在老亲翁炤中。前粤东之役，不佞立调水师，期会五羊，进止相左，深用扼腕！然疆场之事，一彼一此，桑榆想非遥矣。□□□滇，狐鼠改步，东西南北，共带宗周，此社稷之灵，而实老亲翁撑持之勋，不佞□驿□间，歼虏灭丑者数矣，拜聆鸿猷，殊深喜慕！今宸居既云巩□，而帝业未可偏安，况中原有可乘之机，胡运值将尽之时，宜速乘势，并力齐举。兹不佞现提水陆精锐，收复闽、浙，熏风盛发，指日北向。愿老亲翁卷甲长驱，鼓行迅击，首尾交攻，共焚济河之舟；表里合应，立洗腥膻之穴，然后扫清宫阙，□盟畿辅，岂不大符夙愿哉！"[11][按：此书《延平王户官杨英从征实录》原作永历八年二月，误。永历于十年春入滇，海上得讯当为本年二月。]七月，成功攻兴化，取台州，复攻天台、太平、海门卫，清守兵降。旋清兵陷闽安，成功退还厦门。

是时，粤西义师称公侯分据郡县者：郁林则李胜、李乔华，怀阜则何奎豹、李盛功，富川、贺县则马宝、梁忠，太平则贺九仪、曹友，并依险据守，四出攻略。僮族义师罗法达、房仁伦等复略临桂、永福、荔浦、修仁诸县。后皆为清兵所败，所复城邑均陷。[12]

定国年三十七岁

可望反状报至滇都，定国决计迎战。时可望部至强，诸将自

楚、粤至者，皆聚于黔。定国所部虽云五万人，然多由可望旧部王自奇、关有才等率领，一部已叛逃滇西。斯时从定国者不过败卒数千人，文秀所将留滇者亦少，忽有此变，上下皆震恐。然同室操戈，人多不直可望，定国遂留沐天波、靳统武等守滇都，以李本高、高文贵为前锋，自督诸军出战。[13]

定国军至三岔，令诸将列营于新桥之西山、双河一带，定国与文秀驻曲靖城中调遣。先于曲靖城外添设木城一道，以为死守之计。时可望之兵屯交水，列阵三十六营，可望自营于龙华寺左山阜之上，各营安于左右，势如连珠。[14]两军相去仅三十里，兵力悬殊，人心浮动。白文选单骑见定国，具言："诸将已有约，宜出兵决战，稍迟则谋泄不可为。"定国然其议，遣文选率铁骑五千回冲马惟兴营，惟兴不放一矢，开阵迎文选入，合兵抄可望阵后，所向披靡，连破数营。[15]定国、文秀见可望阵乱，麾兵大进，战方合，惟兴等将士大呼曰："迎晋王！迎晋王！"可望军遂瓦解。定国驰奏大捷，收抚可望诸营溃兵。马进忠、白文选先反正，于是诸部相率降。[16]定国令文秀、文选东追可望，自还师救滇都。

先是，可望令张胜、马宝等以劲旅七千由寻甸间道出嵩明，潜入云南，欲使定国首尾不能相顾。[17]马宝因与定国通，故迟其行；复写密书，差心腹送入定国营，定国觉其谋，故速反师。张胜等兵至滇都，值内应王自奇避兵永昌，王尚礼亦为沐天波监视，不得发，胜围攻滇都，不得逞，会交水捷闻，滇都将捷报旗插于金马碧鸡坊下，胜军大惊，拔营回窜。九月十二日（一作十九日），定国还击张胜于横水塘，马宝跪迎于道，张胜与定国大战，杀伤各千余人。胜有骑卒，先入晋师，将刺定国，左右有觉者，急呼而击之，犹发矢中定国盔顶，旋为兵士攒杀之。定国怒，奋击胜，胜大败，奔亦佐县（今罗平）山谷中，馁甚求食，为逻卒所获，磔于市。王简礼仰药死。[18]

定国凯旋，诸臣郊迎，入朝庆贺，复至晋王第启贺。刘文秀擒张虎于水西，械送省城，系之狱。[19]冯双礼亦自贵州来归。定国以滇、黔、辰、沅镇将皆可望所设，悉调赴云南核功罪：论

功封冯双礼庆阳王，马进忠汉阳王，马惟兴叙国公，马宝淮国公，贺九仪广国公；附可望者德安侯狄三品、岐山侯王会、荆江伯张光翠等降谪有差。[20]将所收可望诸军，编为“新军”（一作秦军），己部谓之“旧军”（一作晋军）；而滇军宿将如赵印选、胡一青等均罢置不用。[21]定国素以勇猛称，性伉直，与人无私曲，对桂王有礼节，待遇极丰，不以威凌士类，人以此多之。[22]

定国在滇，对粮政多所改革。先是，“四将军”入滇，置“营庄”，以营弁征租赋。并制扁斗高五六寸，稍高之，即盛粟两倍，民病之，以无田为庆。武定知府谢秉铉以状上，毁斗弛禁。定国更访全滇，得其尤者七人诛之，滇民称快。定国发金两千征民夫五百，挽运乌撒。他郡应夫，仍归金于定国，惟武定悉散之。定国怒，逮秉铉及和、禄两州牧，令凡五下，人多危之。既至，定国声色俱厉。秉铉从容对曰：“方今卧薪尝胆之时，非信义无以激发人心，将军重金而轻信义以失人心，非计也。且守诚不才，负厥职，罪之当矣，若散金非罪也，罪独在守，非诸人之罪也。”定国善而释之。自是籴米必以价。[23]

十一月，定国以书下海，约郑成功（一作鸿逵，误）以明年夏会师南都；驰檄荆西，约王光兴、李来亨等会荆州，号召四出，期大举出楚。[24]李来亨亦遣使诣定国相结纳，定国报馈殷勤，承制晋来亨、光兴、体纯、永忠皆上公。[25]惟诸将吏民见可望北降，知虚实，险易尽输于敌，颇以为虑。[26]加以孙、李交恶，连年构兵，猛将劲兵，十捐六七，定国锐气亦少衰。[27]

【注释】

[1] 参见屈大均：《安龙逸史》卷下。

[2] 参见黄宗羲：《永历纪年》。

[3] 参见查继佐：《罪惟录》传卷三十一；沈荀蔚：《蜀难叙略》。

[4] 参见徐鼒：《小腆纪年》卷十九。

[5] 参见屈大均：《安龙逸史》卷下。

[6] 参见温睿临：《南疆逸史》五十二；冯甦：《见闻随笔》卷下。

[7] 参见查继佐：《罪惟录》传卷九。

[8] 参见屈大均：《安龙逸史》卷下；秦光玉：《明季滇南遗民录》，《新纂云南通志》卷六。

[9] 参见刘湘客：《行在阳秋》卷下。

[10] 参见查继佐：《罪惟录》传卷二十一。

[11] 杨英：《延平王户官杨英从征实录》。

[12] 参见《清史稿》传卷二十七。

[13] 参见珠江旧史：《劫灰录》卷一；《云南府志》卷五。

[14] 参见冯甦：《见闻随笔》卷下；佚名：《滇南纪略》。

[15] 参见计六奇：《明季南略》卷十六。

[16] 参见屈大均：《安龙逸史》卷下；李天根：《爝火录》卷二十七。

[17] 参见叶梦珠：《续绥寇纪略》卷三。

[18] 参见屈大均：《安龙逸史》卷下；南沙三余氏：《南明野史》卷下。

[19] 参见屈大均：《安龙逸史》卷下。

[20] 参见邵廷寀：《西南纪事》卷一。

[21] 参见西亭凌雪：《南天痕》卷二十三。

[22] 参见温睿临：《南疆逸史》卷五十二。

[23] 参见秦光玉：《明季滇南遗民录》。

[24] 参见王夫之：《永历实录》卷十四。

[25] 参见王夫之：《永历实录》卷十五。

[26] 参见王夫之：《永历实录》卷十四。

[27] 参见梅村野史：《鹿樵纪闻》卷下。

戊戌年（1658年）

明永历十二年

（清顺治十五年）

正月，滇都仍然一片太平景象，元宵放灯火花炮。二月，令调来大小各官，咸就汛操练兵马，一应旗帜号令，俱要鲜明，听候调遣。晋王不时亲下教场，看验马匹什物。[1]民困少苏，清兵已部署入滇矣。

孙可望降清之后，尽泄滇、黔虚实，汉奸洪承畴、吴三桂等疏请进军云南。疏入，清决计三路入滇，敕吴三桂云："今贼李定国与孙可望互相攻战，可望来降，乘此贼党内乱，人心未定之际，特命王为平西将军，同侍卫李国翰统兵进讨。"[2]清以李定国骁勇，三路兵须有统帅，三月，遣贝子洛托为宁南绥寇大将军（一作安远大将军），都督三路军入黔。洛托偕洪承畴自湖南进，吴三桂偕墨尔根虾自四川进，卓（一作赵）布太偕线国安自广西进，期于二月二十五日共取贵州。洪承畴复就孙可望降官内，查有熟谙湖南、广西、四川、云南、贵州地利者十九员，分拨各路作为攻滇乡导。[3]

吴三桂一路，三月取合州，四月陷重庆。是时川、湖间，如房、竹、归、巴、大昌、大宁则有塔天宝、郝摇旗、李来亨、袁

宗第、党守素、贺珍，施州卫则有王光兴，长寿县则有刘体纯、谭诣、谭宏、谭文、向希尧，达东则有杨秉允、徐邦定等，结连互守。三桂以重兵守重庆，径趋遵义。三桂抵三坡，李定国部刘正国退守安庄（今镇宁），遂陷三坡、遵义。五月，败杨武于开州之倒流水，于是水西、酉阳、蔺州均陷。[4]洛托一路，四月抵贵阳，守军马进忠遁，贵阳陷。卓布太一路，七月陷独山州，自是，清兵三路均集贵州。

清遣信郡王铎尼统摄三路兵，窥取云南。九月，铎尼至贵州，十月至平越，会吴三桂、洪承畴于杨老堡，议分路进取云南：铎尼自贵阳取道关岭，为中路；三桂自遵义取道水西，辏七星关，为北路；卓布太自广西之永顺出安隆，趋黄草坝，为南路；洪承畴偕洛托驻守贵阳，期以十二月会师云南省。[5]羽檄纷传，云南属府告急。

十二月，吴三桂发遵义，败白文选于七星关，进抵乌撒军民府（今镇雄、威宁县境）；铎尼败冯双礼、祁三升于鸡公背，进抵曲靖；卓布太败李定国于盘江，由普安州入滇。

前军既败，滇都震动。九日，定国内使自战所兼程三昼夜达滇都，夜半叩宫门报急，桂王意动，彻夜未安寝。平明，城外皆哗噪，为之罢市。扈卫广昌侯高文贵执斩以徇，旁午稍定，定国内使复至，报警如前，劝桂王出走，以避清兵凶锋；然众议纷纷，未得所向。[6]及定国自前线奔还，桂王从吉翔、天波议，十五日发滇都，百官扈从男妇马步数十万人，日不过三十里。国势既摇，人心思变，兵士乏食，取之民间，庶僚贫病离次不前，沿途逃散，极为狼狈。[7]

是岁，春夏间，广西南宁一带仍为定国部将贺九仪驻守，二月初七日，九仪部再破横州，旋即退出。二月二十二日，清将马雄奉命遣效用官沈辨之前往南宁招抚九仪，三月初十日，又差官李翼龙前往招抚。九仪不受抚，将沈辨之捆打四十，锁禁营中，杀其随行小子二人。李翼龙不敢前往而还。[8]

三月，定国旧部阎维龙、曹延生等下横州，清防守都司赵连城等退守贵县，总兵官马雄驰援，阎、曹弃城走，横州复失。[9]

五月间，定国调九仪还滇，自是粤西复陷于清。[10]

夏，江西好汉谋应定国者皆败。初，可望、定国有志东出，遣任国玺赍永历专敕一道，西、秦二王令谕多张［按：此处所指“西王”，当指定国旧称“安西王”，定国于永历八年六月进攻梧州时，犹称“安西兵马”而不称“西宁王兵马”，足见旧称比新封更有号召力。因此，可望、定国等遣任国玺东出江西，应在定国东下桂林、衡州以前，后此则西、秦二王已决裂，定国迫走两粤，当不至与可望同遣任国玺赍令谕东出矣］，将军方印及总兵铜关防等多颗，前往湖南、江西一带联络。国玺至江西，先以恢剿总兵铜关防一颗，公敕一道，西、秦二藩令谕二张，授与故湖南总兵王祐，复经王祐联络临江、永新、吉安、南昌、安仁、吴城等地明军旧将，密谋响应。[11]故定国部北取长沙、东复吉安时，明军旧将及地方义师应之者甚多。及后，定国还滇，国玺仍在江西一带活动。永历八年，伪为小贩，东至樟树镇，遇明宗室朱功铉，次日往访，挑一担茶，其篓底下多藏札符。说功铉曰：“我是秦、西二王委来江西按院，号召好汉……如今有三股兵马，一股上陕西，一股下湖广，一股由江西到徽州，往江宁。你既是宗室，可乘此机会共成大事。”当与功铉总兵咨文一张，空头札符五张，令招好汉散给。之后，国玺又往广西联络。本年四月，遇其弟子永历兵部主事黄应泰，令其赴江西丰城活动，并嘱咐云：“你师母在丰城，租蒋交泰房子居住，你可探望，到丰城务要小心仔细，不得泄露事机。”六月十三日，朱功铉事败被执；七月十三日，黄应泰亦在丰城被执，任国玺在江西一带联络，皆败。清官集讯黄应泰，应泰自称明臣，坚不屈膝。[12]

是岁七月，明郑成功与张煌言合师，大举北上，拟攻南京援滇。至羊山，飓风覆舟，漂没士卒八千余人，被迫还舟山。八月，成功取象山。[13]

秋，明副将陈良鼎奉桂王旨及定国指授，随带太监五名，催督川东十三家兵及嘉定、叙府一带明军会攻重庆以牵制清兵。七月，谭、刘诸部略渝城，为清兵杀退。十二月初一日，明涪侯谭文、镇北将军牟胜、监视军门潘太监、阁部文安之会合

袁、刘、马、塔等一十三家，战舰二百余只，部卒七千人，蔽江而西，三江四面，会攻渝城。水陆围攻一十五日，不克。旋因“三谭”内哄，谭诣杀谭文降清。十五日，清兵反击，十三家兵败回川东。[14]

定国年三十八岁

定国自败孙可望后，颇弛武备，明官高勣、金简疏谏之，略云：“今内难虽除，外忧方大，伺我者方顿兵以待两虎毙而制之刃，而我酣歌漏舟之中，熟寝积薪之上，一旦疆场不虞，何以善后耶？二王老于兵事，何泄泄若此。”[15]定国初不听，及闻清兵三路窥黔，始逡巡谢罪。

二月（一作四月），定国虑可望熟悉险隘，而各汛守皆可望旧人，悉更调之。使其将刘正国、杨武守三坡（《播雅》云：三坡有二：一为桐梓北六十里，一在酉阳。此处当指后者）、红关诸险要，以防蜀；使马进忠驻兵贵州，以御粤、楚[16]，自率大军留滇备战。

四月，孙可望旧部王自奇、关有才、张明志反于永昌，定国以患在腹心，自将讨之。一路军民迎送，称赞败可望大功：“滇黔百姓，悉叨再造。”定国喜，纪律倍严，鸡犬不惊。师至永昌，遣使招之，自奇不应，令关有才出拒，定国阵擒之；自奇败走腾越，势穷自刎死。张明志请降，定国令其集溃兵自赎（一作丁酉十月事）。传令安抚，百姓俱安堵如故。时清兵洛托自镇远，卓布太自黎平、独山攻贵阳，迤西虽平而贵阳已不守。[17]

六月十九日，定国登滇西鸡足山，令谕云：“晋王李令谕：照得鸡足名山，滇西形胜，本藩西征既捷，便道进香，蓬蘢跻巅，游览已悉。惟是峰壑幽深，刹院不无倾圮，询之僧众，咸称近苦差徭。因念其供奉香灯，出于常住，寺僧别无活计，杂派宜于从宽；即或增加田粮，有司当为减豁。至于本山度牒，援纳已经通免，自后或有奸胥、积棍，播害滋端，过往官兵，搜求践踏，许尔各寺僧人，指名启究，永为遵守，俱勿违！此谕。”[18]

蜀王刘文秀卒。先是，文秀还自黔，以未获孙可望，不自

慊。及定国灭王自奇，声誉益肆。复闻籍籍有议其负恩怀二心者，愤而疾，定国率医疗治，然痈发于肺，不可治。既笃，上遗表云："清师日逼，国势日危，请入蜀以就十三家之众，出营陕、洛，庶几转败为功。"[19]文秀死后，葬于安宁曹溪寺右山。[20]定国势益孤。[按：刘文秀之死，各书均系于四月，《爝火录》及《小腆纪年》且定为四月二十四日。《滇南纪略》则作平定王自奇以后事，系于戊戌六月。定国率医疗治，当系返自鸡足山以后，故系于此。]

七月，明以李定国为招讨大元帅，加黄钺，积极部署迎敌。定国书告李来亨、郝摇旗等十三家兵，从川东围攻重庆，以牵制湘、楚。使冯双礼、祁三升扼盘江东岸，据鸡公背（距贵阳数十里），经营贵州，拒中路；今李承爵壁普安之黄草坝，拒左路；别遣白文选拒右路，率众四万出七星关，抵生界（即孙家坝，东距遵义数十里），佯攻遵义，以牵制吴三桂之师；而定国居中策应。及闻刘正国兵败三坡，乃益正国兵，使守安庄；资土司罗大顺粮，使绕水西，为游奕之兵。斯时，清兵吴三桂屯遵义；铎尼驻武陵，卓布太驻独山州，惟洛托一路驻贵阳。大军未集，其势可乘，若集中攻破其一路，大局或可挽转。惜定国观望不前，此杨老堡期戒，始悉众出拒，且中路鸡公背之绝顶，粮少运艰，士不宿饱；右路之生界，孤悬滇、蜀之表，声援不及，识者俱以为忧。[21]

先是，清兵入贵州，冯双礼请兵援黔，定国亦欲进兵，俄得洪承畴书略曰："某本待罪先朝，志切同舟，惟候吴王之至，合兵以听指挥，无烦王师远出也。"定国信其言，遂缓师期。及清兵三道入犯，报至，定国始悔堕承畴术中。[22]又有妖人贾自明者，自言识天文地理、阴阳象纬遁甲之事，能制木牛流马、火攻器具及驱遣风雷诸术，明桂王惑之，以之为"雷击将军"。令制遮牌、档木等战守具，广伐大木，运送昆明，百姓苦于夫役，道路怨咨。后悉贾自明系洪承畴所遣为缓兵之策者，靳统武遣人杀之。[23]

八月，定国率师东进，离滇都后，阻雨不前，日行只二三十

里，人心惶惑。至关岭，刑牲祭汉前将军祠，定国沥酒誓曰："定国奉命兴师，不以身殉社稷、佐中兴者，神威当截其头。"因顾谓诸将曰："诸公皆受国恩，可不于神前自明忠赤乎？"于是诸将皆跪告于神曰："某等有不与晋殿下戮力同心报君父之恩者，神明殛之。"既盟，饮酒还营。[24]

十一月，清兵西犯，中路铎尼遣别部败罗大顺于水西，以主力趋安庄，刘正国战死，安庄陷。清兵进抵鸡公背，冯双礼、祁三升战不利：三升走毕节，败于响水河，奔白文选军；冯双礼败于松岭卫，北走建昌卫。十二月清兵遂陷曲靖。[25]

清北路兵发遵义，为白文选阻于七星关不得前，关极险峻，两山壁立，水势汹涌，号天生桥。吴三桂在遵义时，细询土人，已得间道，十二月初二日，宿于水西苗倮（一作稞）中，不言所向。次日，忽由天生桥小路，抄乌撒军民府，扼七星关大路。时清兵达克萨哈、张勇一股，追祁三升已抵关下；而另一股科尔昆、马尔赛部，亦取道罗平径达七星关。文选因腹背受敌，遂弃关走可渡桥；守桥者马宝已先走，乃焚桥走沾益。三桂兵遂陷乌撒军民府。[26]

清南路兵进逼凉水井（今册亨西），李承爵（一作蛟）败死。定国闻左路告急，率部逾石关，营于遮炎河。先是，卓布太兵抵罗炎渡口，定国使总兵王德祖扼之，据险沉船，清不得渡。会泗城土府岑继禄降清，献策从下流十里取所沉船，乘夜潜师而济[27]，陷安龙，定国部总兵张祺（嵩明人）死之。定国使副将张成均、参将吴子圣救援不及，成均战死，子圣败走。[28]定国以主力三万，扼清兵于河之右，初战告捷，疏于设备，清兵骤至，压其营而垒。明日决战，南兵枪炮，北兵弓矢，日中不决，忽大风北来，金枪失火，其地山茅野草，烟焰燎天，北兵乘风驰射，定国部战不利。适有传清兵前导为孙可望扈卫康国臣者，始交相疑畏；盖军中多可望旧将，虑生内变也。[29]军心既散，全线俱溃，定国连败于罗炎、凉水井，部将刘世德、王康福、萧翊赞、李远、龙鸣凤、李世勋、刘隶元、聂玉顺、邱子馨、倪凯、包有爵、王琏、阎天锡等三十余人皆战死。李远，定国义子，毕

节卫人。罗炎、凉水井大营亦陷，定国妻子家属被卓布太执获，杀之。定国撤砦易服走，留副将李永成，总兵李春铭、陈玺断后，亦战死。[30]清兵自普安州入滇。自是，清兵三路会于曲靖。是役，定国部兵民死难者不下三四十万人，皆十一年来湘、桂、川、滇、黔之精锐，百战所义成之者也。[31]

十二月十三日，定国入滇都（《云南府志》作六月，误），军民稍定。时朝中战守之议，相持未下。行人任国玺请死守，定国曰："行人议是，但我自立国以来，遇难则徙，故虽危急频仍，仍犹延至今。若仅守死，一跌不复，悔不可追。不如暂且移跸，再图恢复。"[32]及议所向，众议纷然：刘文秀旧部，奉文秀遗表，请出蜀；普府中书金维新（一作公趾，误）极言入蜀不利，时文武臣僚，滇人居多（金亦滇人），皆思保妻子，不欲迁。[33]而权臣马吉翔、勋臣沐天波等，坚主退守滇西，事急则逃入缅甸。定国坚主南走，缓入粤西，急入交趾。其说曰："蕞尔建昌，何当十万人之至，不如入湖南之峒，乌车里、里角诸（蛮）不相统摄，我今临之，必无所拒。安跸峒内，诸将设御于峒口，胜则六诏复为我有，不胜则入交趾，召针罗诸船，航海至厦门，与延平王合师进讨。"[34]议未决，警报迭至，临沅、广南、河西俱陷，沾益、马龙已屠，清兵进逼宜良、嵩明、通海、昆阳一带，四处难民负父母、携妻子奔赴会城者，哭声震天地，道为之阻。[35]天波仍力争出缅，定国见势无可挽，乃谓天波曰："公其努力，愿无生后悔而终忆余言也。"[36]

定国谕民远避，略云："本藩在滇多年，与尔人民情均父子，今国事颠危，朝廷移跸，势难同尔等偕行。恐清兵一至，杀掠淫污，猝难逃避，尔等宜乘本藩未行时，各速远遁，毋致自误！"时已征贮秋粮，定国谕大小营镇，不得焚毁，恐清师索食不得，重累百姓也。[37]

定国启行之先，令总兵王惠以兵三千守草铺，总兵潘融以兵三千守禄丰，左路将军窦名望以兵五千留昆明待机，右路将军齐三省以兵五千接应白文选，前路将军马士良以兵五千沿途催趱钱粮，副将王镇带侦兵五百刺探消息并联络各部。定国以重兵殿

后，并收抚难民。[38]时艾承业（能奇子）不欲西行，以兵千余伏大寺中，谋劫定国北走建昌。定国侦者知其谋，以告。十八日晡时，定国遽率兵千余，严队西走，承业不敢追。[39]庆阳王冯双礼谓定国曰："公辅帝西行，图谋再举，为其难者；某愿死守会城，与共存亡。"定国涕泣留之。[40]清兵陷昆明，双礼同狄三品等走四川建昌卫。吴三桂招降，双礼不应，狄三品等用计执之献于吴三桂。[41]

【注释】

[1] 参见佚名：《滇南纪略》。

[2]《清世祖实录》卷一一三。

[3] 参见《明清史料》丙编第二本，"经略洪承畴揭帖"。

[4] 参见叶梦珠：《续绥寇纪略》卷四。

[5] 参见《清世祖实录》卷一一三；《安顺府志》卷三一；清国史馆：《贰臣传》卷三。

[6] 参见刘菹：《狩缅纪事》。

[7] 参见徐鼒：《小腆纪年》卷十九。

[8] 参见《明清史料》丙编第十本，"两广总督王国光揭帖"。

[9] 参见《清世祖实录》卷一一五。

[10] 参见《明清史料》丙编第十本，"两广总督王国光揭帖"。

[11] 参见《明清史料》丙编第十本，"江西巡抚残件"。

[12] 参见《明清史料》丙编第十本，"废宗朱功铉号召江西好汉残件"。

[13] 参见徐鼒：《小腆纪年》卷十九。

[14] 参见《明清史料》丙编第十本，"陕川总督李国英揭帖"。

[15] 邓凯：《求野录》。

[16] 参见李天根：《爝火录》卷二十八。

[17] 参见佚名：《滇南纪略》；古滇罗谦本：《残明纪事》。

[18]《鸡足山志补遗》卷四。

[19] 屈大均：《安龙逸史》卷下。

[20] 佚名：《滇南纪略》。

[21] 参见邓凯：《求野录》；《安顺府志》卷二三；李天根：《爝火录》卷二十八。

[22] [23] [24] 参见屈大均：《安龙逸史》卷下。
[25] [26] 参见叶梦珠：《续绥寇纪略》卷四；《安顺府志》卷三一。
[27] 参见《清世祖实录》卷一二三；《安顺府志》卷三一。
[28] 参见刘彬：《晋王李定国列传》。
[29] 参见邓凯：《求野录》。
[30] 参见古滇罗谦本：《残明纪事》。
[31] 参见刘彬：《晋王李定国列传》。
[32] 刘彬：《晋王李定国列传》；温睿临：《南疆逸史》卷二十七。
[33] 参见刘湘客：《行在阳秋》卷下；《云南府志》卷五。
[34] 徐鼒：《小腆纪年》卷十九。
[35] 参见刘彬：《晋王李定国列传》；《云南府志》卷五。
[36] 徐鼒：《小腆纪年》卷十九。
[37] 参见屈大均：《安龙逸史》卷下；古滇罗谦本：《残明纪事》。
[38] 参见杨德泽：《杨监笔记》；刘彬：《晋王李定国列传》。
[39] 参见邓凯：《求野录》。
[40] 参见刘彬：《晋王李定国列传》。
[41] 参见王先谦：《十朝东华录》卷七。

李定国纪年

己亥年（1659年）

明永历十三年

（清顺治十六年）

明桂王西奔，正月四日抵永昌，翰林刘菃、吏科给事胡显等力主坚守永昌，反对出缅，与马吉翔争论不下。桂王下诏罪己。旋以清兵迫近，十五日奔腾越，从官胡显、龚彝等潜逃入山。二十一日由腾越西走，二十五日抵盏达，二十六日抵布岭，扈卫孙崇雅兵变，大掠桂王及其从官。二十七日抵缅甸之囊木河，十里即为缅关。从将靳统武因不满桂王入缅，率部扎铜壁关不前。时随桂王文武官两千余骑，并无一旅相随。二十八日，入铜壁关，应土司之请，尽去戎备。二十九日，逾关走蛮漠，土官思线（一作绵）来迎。沐天波拟引桂王太子走茶山，因中宫犹豫不允，不果。三十日即行至河（《也是录》作大金沙江。《滇系》云：金沙江在阿瓦城东北，其上流即大盈江也）。二月初二日（一作三月初一日），缅人以客舟四只来迎。[1]桂王浮江而下，从者尚一千四百七十八人；自买舟者六百四十六人，故岷王世子及总兵潘世荣、内监江国泰等九百人，马九百四十余匹，陆行纡道入，期会于缅都阿瓦。[2]

清铎尼、吴三桂、卓布太三路兵于正月初三日会师云南（昆

明）。二月初二日，吴三桂自罗次出，多罗（《续绥寇纪略》云：多罗铎尼留驻省城，平郡王多罗贝勒尚善代领其众）、卓布太自昆明出，三路进兵，初九日陷镇南州，定国部总兵王国勋战死普朋（一作明，误），阻击之师，节节失利。[3]白文选原奉定国命断后，度不支，率张光翠、陈盛、潘正龙、秦斗金、张斗麟、吕三贵等西走。距玉龙关二十里，为清兵追及，战败，失总兵吕三贵及“巩昌王”金印一，孔雀尾、绿销金龙伞（一作孔雀尾伞、销金龙伞）各一，象三，马一百四十匹。[4]文选由沙木和（《滇系》云：沙木和，在永昌东北沙木河侧，自永平七亭而畸，达沙木和）走右甸，寻走镇康人木邦（《清朝文献通考》云：木邦，在耿马、孟定等土司之外，明永乐间置木邦宣慰司）。偃师侯郑文雄率骁将劲卒千人逆战，自晨至夕，千人战死，无一存者。文雄重伤死，妻子俱自刎死。文选别部张光翠、陈盛之师皆败。[5]清兵追至澜沧江，定国使人烧断铁锁桥，吴三桂督诸军编筏以渡。十八日陷永昌，二十一日编筏渡潞江。李定国设伏磨盘山，不胜。清兵追至南甸以西，云南迤西界，引还。[6]

明军撤出永昌，原大西军老弱死难者甚多。肤施人王应龙，善制弓，从献忠军，目不识字而戆直勤朴，献忠甚爱之，用为工部尚书。献忠死，随“四将军”人云南，仍为工部尚书。桂王西奔，应龙偕子扈从不及，追至永昌，而桂王又复西；应龙老不能驰驱，自缢死。其子曰：“父殉国，子可不殉父乎！”亦自缢死。[7]

明桂王进入缅境后，二月十八日至井梗，谋与白文选部联络，不果。三月，沐天波与蒲缨、定国部总兵王启隆等谋奉桂王出户腊二撒（今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属户腊撒），奔定国军，为马吉翔所阻，亦不果。[8]人缅官兵困顿井梗，处境日恶。

李定国部援救桂王，竭尽心力。二月，白文选间道渡陇川、潞江，寻桂王所在。时天气亢热，师次磨整雍会，皆卸甲解鞍休息各树下，遣人赴缅述明来意，均为缅人获杀；文选又遣十骑往，缅又杀之中途。缅人渐以一二百骑闯人文选营抢马，文选怒，掌号勒兵，追及河干，缅骑皆溺水死。时缅师数十万人，皆

列阵对江，文选为木筏以渡，大败缅军，缅人大恐，收兵入城。文选师薄城下，缅人尽焚城外房舍民户坚守，文选兵溺水死者亦十之三四，无结果而还。二月十七日，明从官之陆行者抵阿瓦，不知有文选构兵事，离城五六里而营，为缅兵绐杀者八百余人，其中总兵向鼎、潘世荣（一作潘世荣降缅）、范崇礼、郑文藻，俱系定国旧部。余九十余人（一作八十人），由岷王世子及温如珍等率领，偕逃暹罗。[9]

四月，祁三升又以兵迎桂王于缅甸，马吉翔使丁调鼎、杨生芳持诏止之，曰："朕已航闽，将军等自为计。"三升痛哭撤师。[10]吉翔复与缅守者敕曰："后有一切官兵，都与截杀。"盖吉翔欲拒定国、文选于外，且以结欢于缅王也。[11]

五月初四日，缅王差官备二龙舟，鼓乐来迎。初五日桂王发井梗，初七日到阿瓦对江，初八日进至赭硁（赭硁，或作者梗、吉根、鹧鸪，皆音译，去阿瓦城五六里。《云南府志》云："在缅城西面，江对岸"），草房十六间，以编竹为城，为桂王宫垣；文武官自备竹木，结茅为屋，每日百余兵更番护守。[12]

吴三桂还师云南后，分兵蹂躏各地。三月十一日陷姚安，明东阁大学士张佐宸、户部尚书龚彝、兵部尚书孙顺、侍郎万年策、兵科胡显等一百五十九人皆降。已而将军马宝、马惟兴等亦先后降清。清兵军纪败坏，"戎车所至，狐兔不存"，过苗、彝地区，遍索妇女，行歌侑酒，民人深恨之。其所掠夺妇女，后虽有"旨"释放，然而官兵隐匿，上下相蒙，求其奉行者绝少，而淫掠如故。[13]

沅江土知府那嵩，受李定国敕为总督，密为传布。各土司及明降官有听命者，有两可观望者，有不听而自首于吴三桂者。三桂大恐，上疏云："沅江土知府那嵩、那焘父子，主盟勾连各土司，歃血钻刀，真真作叛，若不剿除，则地方震动。且李定国将子妻送往沅江府土官为质，将金银财物抬送沅江土官，叫沅江并普洱土官由临安出兵，候大兵出边进剿，就来抢云南。"[14]清廷命吴三桂出兵。十月，三桂率兵围沅江，嵩固守不下，时定国方有事于孟艮，不及援。十一月初六日，沅江破，那嵩自北门驰

归，与妻妾登楼，举火自焚。那焘、沐忠亮（天波子）亦各赴其室自焚。那岬、许名臣、许世勋、许甲贵俱自杀。其众十余万（一作二十余万）皆巷战死。[15]［按：《明清史料》丁编《平西王册稿》，对沅江之役，只言“剿杀沅江逆首那松等”，“又剿杀伪将军那伦等，获马二百余匹”。不言那氏官兵有降者。沅江兵民死难之说，可信。］

清兵既陷云南，兵部令洪承畴“速进缅甸，以靖根株”。八月，洪承畴上疏云：“兵部密咨大兵宜速进缅甸，以靖根株，令臣相机布置。臣受任经略，目击凋敝景象及土司降卒观望情节，不可谋迫，须先安内，乃可剿外。李定国等窜孟艮等处，山川皆极险远，兼瘴气为害，必霜降后方消。明年二月，青草将生，瘴即复起，计自出兵、驻兵、回兵，仅阅四月，恐亦未能穷追远剿。况屡闻李定国等勾连土司，觊由景东、沅江复入广西，各土司私授札印，歃血为盟，伺隙起衅，若一闻大兵西进，势必共思狂逞，避实突虚；大兵相隔已远，不能回顾，而留驻省城之兵，亦未及堵御，致定国等纵逸，所关匪细。臣审度时势，枚量轻重，谓今年秋冬，宜暂停进兵，俾云南迤西残黎稍藉秋收以延残喘，尽力春耕，以图生聚，而数万大兵，又得养锐蓄威，居中制外，俾定国等不能窥动静以潜逃，土司不能伺衅隙以狂逞，绝残兵之勾连，断降兵之反侧，则饥饱劳逸，胜算皆在于我，料定国等潜藏边界，无居无食，瘴疠受病，内变易生，机有可俟。是时兵饷刍粮辏备，土司苗蛮渐服，残兵降卒已安，并调拨将兵，次第齐集，责成防御，然后进剿，庶为一劳永逸、固内剿外长计。”[16]疏上，如所请，暂停进兵。

定国部留守川南者内部不和，自相攻杀。五月（一作三月），雅州守将咸宁侯高承恩谋并杨国明于嘉定，国明弃城走，高承恩遂据之。旋承恩又为其部将郝承裔、杜学所杀；郝、杜出降，川南遂不守。[17]

四川因连年丧乱，人口大减；最严重者为川北、川西各地，邑民之存者仅十之二三。［按：川南、川西、川北各县县志均载：“经‘献贼’之乱，民之存者仅十之一”，或“十之二三”。其实

川民减少最多时期，多在张献忠阵亡以后。〕其原因：一曰连年战争，饥荒严重；二曰清兵入川，虐杀川民；三曰外来移民，逃奔他乡。兹列举数例如次：

川中兵事频仍，灾害连年，田亩荒芜，宿粮无积；清兵入川以后，饥荒更为严重。丁亥年（1647 年）间，米皆仰食于土司雅州及大渡河所越雟卫，斗米价十金，嘉定斗米三十金，成都、重庆斗米五十金，保宁一带斗米竟达六十金，成都人多逃入雅州采野菜而食，亦多流入土司者，死亡满路，人相食。“官兵”无食，亦略人为餔。居民离散，饿虎成群，村野市廛，任其出没，荥昌令懋赏主仆八人赴任，日暮群虎拦至，攫食五人。是时，大西军新败，明军将领据地自雄，十一月清兵退出成都，清将梁一训复驱残民北走，至绵州尽杀之，川中民无孑遗矣。[18]

川北一地，清兵盘踞最久，人民受害尤惨。据清四川巡抚张所志揭帖云：“自奉命西巡入境之时，三川未附，入我版图者，惟川北一隅。而保宁即为省会之区，抚按驻扎于兹焉，藩臬驻扎于兹焉，而各镇兵马亦咸集于兹焉，军民杂处，实繁调剂。奈夔门未开，蜀喉尚梗，惟此一线羊肠，竟作三巴孔道，昔称僻壤，今作通衢。且因伪逆盘踞东南，时繁征剿，调兵运饷，日无宁晷。而广元为秦、蜀接壤，阆中系省会要区，首当其冲，南部苍溪次之，昭化又次之，陆有供应夫马之扰，水有轮派水手之累，寥寥孑遗，兽奔鸟散。职竭意调停，有司勉力支持，虽保无误军机，其如民之骨髓已尽何！……川北二府一州，所辖州县二十有七，地方不为不广；自开复至今，十有余载，入版不为不久，而凋敝难起、荒残如故者，总由羽檄交驰，夫役之累，十居八九，所以流徙观望不归，见在者役重而力竭，此疮痍之所以难起也。”[19]

“流徙观望不归”之民，除逃入深山以外，必有流离他省、遁还祖籍者。据清户部尚书马希纳等题奏云：“查川省现在孑遗，祖籍多系湖广人氏，及访问乡老，俱言川中自昔每遭劫难，亦必至有土无人，无奈迁移外省人民填实地方。所以现存之民，祖籍湖广麻城者更多。”[20]其他如随可望、定国、文秀等入滇、黔者为数亦夥。

[按：川民大减，除上述诸原因外，吴三桂乱蜀，亦为重要原因。陈奕禧云："自张献忠之乱，疮痍未苏，复遭吴逆，孑遗之民，非数十年生聚休养，蜀地难即富庶矣。"[21]后人不察，将川民大减归罪于张献忠，殊不公平。]

是岁五月，明郑成功闻云南告急，与张煌言会师，大举北上，耀兵江上，以图牵制清师。十九日经江阴，六月八日抵丹徒，十三日泊焦山，祭天地、明陵。十七日克瓜州，二十四日下镇江，七月下江南北四府三州二十四县。[22]煌言自至芜湖，分军四出：一军出溧阳，窥广德；一军镇池州，截上流；一军据和州以固采石；一军入宁国以图徽州。江、楚、鲁、卫人士诣军门受约束，归、许起兵相应，东南大震。二十三日郑成功兵败江宁，将军甘煇等战死，成功退入海，所得沿江诸州县尽失。九月，郑成功部再败于温州。回师厦门，上表请罪，自贬王爵。遣使间道达云南，留于白文选营。[23]

定国年三十九岁

滇都撤退之后，定国以师断后并收抚难民。至楚雄，留王国勋守之，清兵追及，国勋战死于普朋，楚雄陷。定国至大理，自请坚守以为后备。数日后，白文选以孙家坝溃兵至，列阵下关，众尚万余人。定国以数百骑赴之，文选以兵败先走责定国，定国逊谢之，以断后任付文选，自赴永昌，谒桂王自陈十罪，请还钺削秩。桂王不许。闰正月十六日，定国遣靳统武以兵四千，扈桂王入腾越，自留永昌观变。[24]

二十日，大理之败报至，定国率兵西渡潞江。江水深且急，多瘴气，越江二十里有磨盘山（今名磨盘石，属高黎贡山），径隘箐深，屈曲仅容单骑。定国度三桂累胜穷追，必不戒，立栅数重，设伏其间：以窦名望为初伏，高文贵为二伏，王国玺（一作王玺）为三伏。且埋地雷谷中，令曰："敌尽入初伏，乃发燃地雷，二伏齐出，首尾横击之，片甲不令其逃也。"三桂逐北数百里，无一夫守者，以为定国已走远，乃渡江上山，队伍散乱，将入伏中。叛徒卢桂生（明光禄寺少卿）自定国军中潜出，以有伏

告，而前驱已入二伏。三桂即退，以精甲蹂伏兵，名望不得已出战，二伏亦趋下应之，战于山间，短刀相搏，清将固山额真沙里布等数人阵亡，而窦名望、王国玺等亦战死。[按：李根源《曲石诗录》磨盘石战死诸将墓，只列广昌侯高文贵、挂印都督王玺、总兵张天宠、副总兵段有荣，无窦名望、王国玺。] 前军溃，定国愤甚，发后军决死战，清兵败绩。时定国伏兵仅六千人，清兵上山者已万两千余，及搜伏兵，大炮雨发，伏兵不得号不敢发，死于林箐中者三之二，而清兵之上山者亦无一免。定国虽胜，度前军已溃，且奸人在敌输情，恐生不测，势孤莫支，遂整旅出腾越。[25]

初，靳统武不满桂王已入缅，护定国大营扎营铜壁关，以桂王入缅事告定国，定国曰："吾焉从？从帝而追者及之，君臣俱死无益也，姑他往以图再举。"[26] 遣岳阳伯高允臣入缅联络，为缅人执杀，不得达。[27] 定国度缅情莫测，若遽以兵临之，恐激而生变，且各营妻子辎重四散，诸将士亦四散，寻觅兵，难骤集。乃令定朔右将军吴三省断后收兵，自率大兵取道至孟艮[按：孟艮，《南疆逸史》作孟定，是。据《清朝文献通考》云：孟艮土司，在车里宣抚司之外，处九龙江之西，明永乐间置孟艮羁縻土府，后为木邦所并。其城今为缅甸景东，在木邦以南数日程。孟定在木邦之东，与木邦地相接]，三月（从《爝火录》），与白文选会于木邦。议所向，定国曰："缅小邦也，猝见大军必惊惧，惧而思逞必拒战，战则是与其为仇也，何以置我主？不如择近境险要地，休兵息士，修军实，招溃散，两军相为犄角；缅外惮吾军，必不敢无礼于主上矣。且云南瘴暑，敌骑不敢久驻；及其敝也，吾可联结诸土司以为后图。"文选以两军在外，鞭长莫及，自请入缅。定国许之，遂遣文选渡潞江入缅，探视桂王消息，自经耿马北上，至缅宁（一作勐缅，即今临沧）屯驻。[28]

四月，定国闻叛官卢桂生降清后，授大理府知府，遣应奇说卢桂生归正。应奇被执送吴三桂，不屈死。[29]

潞江败后，定国余众不过数千，檄调诸将，亦难骤集，势甚窘迫。旋贺九仪以精兵万人，自广南全师来会。[30] 咸阳侯祁三

升、孟津伯魏勇从云南逃出，从驻耿马。[31]定国又召白文选故镇张国用、赵得胜等，均以所部来归[32]，军势稍振。

定国移营孟连（《滇系》云：孟连长官司，在永昌东一千五百六十里，东界车里，西界木邦，南界孟艮，北界威远。今澜沧拉祜族自治县地），祁三升不欲从，矫定国令转龙川、虎喇（今户拉撒）；诱魏勇连兵，道遇吴三省，并诱之行。初，吴三省护大营妻子，将奔定国，遇怀仁侯吴子圣、将军杨武于途，胁之同降吴三桂。三省佯诺，出不意径走怒江（一作大杀于怒江），弃大营妻子，以兵奔定国。中途又为祁三升所诱，卒不得与定国合师。

定国多造印敕，遍结土司，约为己用。以沅江土知府那嵩兵强地广，可以借力，七月，署嵩为巡抚云南总督部院，其弟仑为左明将军，岵怀明将军，子焘监军道，许名臣赞明将军，龙赞阳兴明将军。原已降清之延长伯朱养恩、将军高应风等皆许为内应。内外结连，攻陷石屏州。十月，吴三桂犯沅江，兵抵石屏，土司龙世荣率其婿沐忠显（天波子）拒战，告急于定国。初，高应风请约李定国兵至永昌，俟吴三桂往御，然后合迤东土司以袭其后，则三桂腹背受敌，滇城可得，嵩不从，及遣报定国，定国方以孟艮土司纠众为梗，患在肘腋，发兵往讨。得沅江报，跌足叹曰："何不稍待耶！"孟艮平而沅江已不守。定国度各土司疑惧难合，且休兵孟艮，招安少数民族头人，耕种纳粮如郡县例。[33]

【注释】

[1] 参见刘茝：《狩缅纪事》；佘村农夫：《野史无文》卷六。

[2] 参见刘茝：《狩缅纪事》；徐鼒：《小腆纪年》卷十九。

[3] 参见叶梦珠：《续绥寇纪略》卷四；《云南府志》卷五。

[4] 参见刘健：《庭闻录》卷三。

[5] 参见佘村农夫：《野史无文》卷九；李天根：《爝火录》卷二十九。

[6] 参见叶梦珠：《续绥寇纪略》卷四；李天根：《爝火录》卷二十九。

[7] 参见温睿临：《南疆逸史》卷二十七；沈荀蔚：《蜀难叙略》。

[8] 参见刘茝：《狩缅纪事》；佘村农夫：《野史无文》卷六、卷七；李

天根：《爝火录》卷二十九。

[9] 参见刘茝：《狩缅纪事》；奈村农夫：《野史无文》卷六、卷七。

[10] 参见邓凯：《求野录》。

[11] 参见叶梦珠：《续绥寇纪略》卷四；徐鼒：《小腆纪年》卷十九。

[12] 参见刘茝：《狩缅纪事》。

[13] 参见叶梦珠：《续绥寇纪略》卷四；徐鼒：《小腆纪年》卷十九、卷二十；李天根：《爝火录》卷二十九。

[14] 参见《明清史料》丙编第二本，"户部题本"；李天根：《爝火录》卷二十九。

[15] 参见刘健：《庭闻录》卷三；叶梦珠：《续绥寇纪略》卷四；李天根：《爝火录》卷二十九。

[16] 清国史馆：《贰臣传·洪承畴传》。

[17] 参见沈荀蔚：《蜀难叙略》；李天根：《爝火录》卷二十九。

[18] 参见叶梦珠：《续绥寇纪略》卷一。

[19]《明清史料》丙编第十本，"四川巡抚张所志揭帖"。

[20]《明清史料》丙编第十本，"户部题本"。

[21] 陈奕禧：《益州于役记》。

[22] 参见黄宗羲：《赐姓始末》；王之春：《国朝柔远记》卷一。

[23] 参见邵廷寀：《西南纪事》卷十；徐鼒：《小腆纪年》卷十九。

[24] 参见邓凯：《求野录》；杨德泽：《杨监笔记》；叶梦珠：《续绥寇纪略》卷四。

[25] 参见叶梦珠：《续绥寇纪略》卷四；刘健：《庭闻录》卷三。

[26] 参见刘彬：《晋王李定国列传》；叶梦珠：《续绥寇纪略》卷四。

[27] 参见刘茝：《狩缅纪事》。

[28] 参见温睿临：《南疆逸史》卷五十二；邵廷寀：《西南纪事》卷十；叶梦珠：《续绥寇纪略》卷四。

[29] 参见刘湘客：《行在阳秋》卷下。

[30] 参见邓凯：《求野录》。

[31] [32] 参见邵廷寀：《西南纪事》卷十。

[33] 参见叶梦珠：《续绥寇纪略》卷四；刘健：《庭闻录》卷三；庄士敏：《滇事总录》卷上；《云南府志》卷五。

庚子年（1660 年）

明永历十四年

（清顺治十七年）

七月初一日，白文选从木邦进兵，薄阿瓦。阿瓦有新旧二城，缅王居新城，隔一江为旧城赭硁，即桂王所居也。文选至河上，谕缅人假道迎桂王，不许。文选遽攻之，垂克矣，缅人惧，求桂王以敕止之。文选不奉诏，谓使者曰："前者祁将军来，诏云已航闽，若前诏为真，则今诏为赝；使今敕为真，则航闽之后，何自而来？"急攻新城。缅人以书给之曰："三日后出新城让王。"文选信之，却兵十里，城得固备，既三日，文选引兵攻之，反为所败。文选不得已，引兵赴孟艮。[1]

是时，明从官之在缅甸者，漫无体统，每日入市，坐地谐谑，见菜果之新者，争相夺取。复各结伴侣，携棋牌双陆，张灯设宴，终日嬉游，全不以逊荒为耻。权臣马吉翔、李国泰等相与唇齿，牢笼文武，廷臣多因之以求进，任国玺欲转御史，自称"门生"。定国部下长沙知府王祖望等交章劾翔、泰，不报。吉翔与国泰尝上言："大臣已三日不举火。"桂王不信。次日，复合奏，桂王怒，掷传国金玺，命碎之分给各官。[2]

是岁五月，郑成功大败清兵于厦门。八月，定国留川部将郝

承裔反正抗清，退邛、雅一带自守。

定国年四十岁

定国部将贺九仪妻子在滇，吴三桂令其妻作血书，并遗貂裘等物，密使九仪图定国，许以显爵。九仪得书秘之，家人语泄，定国伏甲招九仪饮，试以言，出不逊语，定国杖杀九仪，仍哭而葬之。[3]自是无敢言降者。

定国驻孟艮，消息阻梗。初，定国派总兵唐尧宗（一作宗尧）驻磨乃（今澜沧），招纳降附，使探外事也。尧宗违令杀客商，夺其货转售孟艮，获利倍价；有志士投孟艮者，诱收麾下，皆引逃，无人孟艮，故滇中事机绝不闻。而孟艮去缅都阿瓦远，亦不知阿瓦事，定国惟日夕练兵觊恢复而已。[4]七月，定国致书桂王有“前后三十余疏，未知曾达御览否？今与缅定约，议于何处迎銮，伏候指示！而诸臣在内，燕雀自安，全无以出险为念者”等语。[5]及文选攻阿瓦不克，还走孟艮，定国始悉缅甸真象，自是乃与文选合兵入缅。九月八日，定国由西道，文选由东道，张国用、赵得胜以其所部从文选，期会洞乌。[6]

定国去后，部将吴三省率部来孟艮寻定国，不得。先是，三省随祁三升转户喇，始觉三升意，及魏勇病死，三升遂收勇兵，约三省同出降，三省复阳许。十月，以吴三桂令移驻腾越，三省出不意，返兵由孟定出孟艮奔定国。迨次磨乃，定国去孟艮已一月。唐尧宗不奉定国调，逡巡谋降清，三省觉而收杀之，流孟定、耿马间为游徼。[7]

【注释】

[1] 参见邓凯：《求野录》；李天根：《爝火录》卷三十。

[2] 参见叶梦珠：《续绥寇纪略》卷四；奈村农夫：《野史无文》卷六。

[3] 参见叶梦珠：《续绥寇纪略》卷四。

[4] 参见邵廷寀：《西南纪事》卷十。

[5] 参见叶梦珠：《续绥寇纪略》卷四。

[6] 参见邵廷寀：《西南纪事》卷十；冯甦：《见闻随笔》卷下。

[7] 参见邵廷寀：《西南纪事》卷十。

辛丑年（1661年）
明永历十五年
（清顺治十八年）

二月，吴三桂以兵攻磨乃，土司龙吉兆、龙吉佐等因与那嵩有约，坚不降，守城七十余日，栅破被执不屈死。[1]

三月，沐天波与定国部总兵王启隆见缅人禁守桂王，愤吉翔、国泰之奸，乃歃血密谋，欲以死士数十人，先杀吉翔、国泰，劫太子斩关而出，奔赴晋、蜀两王。谋泄，不成。[2]

三桂虑定国在滇南结土司为患，先于庚子年（1660年）四月上“三患二难”疏，有云：“逆渠李定国等挟永历遁在边外，滇土虽收，滇局未结，边患一日不息，兵马一日不宁。臣叨列维藩，何忍以此贻忧君父。臣再三筹划，窃以为有‘三患二难’。李定国、白文选等，分驻三宣六慰，以拥戴为名，引溃众肆扰，其患在门户；土司反复，惟利是趋，一被煽惑，遍地烽起，其患在肘腋；投诚将士，尚未革心，万一边关有警，若辈乘隙而起，其患在腠理。且兵粮取之民间，无论各省饷运愆期，即到滇省招买，民方悬罄，米价日增，公私交困，措粮之难如此；又年年招买，岁岁输将，民力既尽，势必逃亡，培养之难又如此……臣用是彻底筹划，惟有及时进兵，早收全局，诚使外孽一净，则边境

无伺隙之处，土司无簧惑之端，降人无观望之志，地方稍得更生息，民力略可宽纾，一举而数利存焉。”［按：吴三桂“三患二难”疏，《庭闻录》、《逆臣传》、《滇事总录》、《小腆纪年》各书均载，以王氏《十朝东华录》为最详。《庭闻录》及《滇事总录》均作十七年二月二十日。今本《清世祖实录》一三四卷、《清史稿·吴三桂传》。］及至本年正月，缅王莽达喇遣使乞援，并愿“送出永历”，吴三桂又上疏云：“春深非用兵之时，宜许以应援，遣永昌、大理边防兵，裹粮出边作声势，巡行蛮疆，促缅人备船，称大兵即至，应之以术，然后可责缅人送永历也。”[3]

四月，定国部留川将领郝承裔溃于竹箐关，败至荣经，被擒见害。

七月，清兵大举入缅，缅人恐，大杀明从官以邀清好。初，桂王入缅，吴三桂使人造缅王曰：“速缚伪主来，不然我且屠阿瓦！”缅本小国，兵力寡弱，大惧，即欲杀明从官。以沐天波等常侍左右，恐力不能制；又恐李定国等握重兵在外，俟其献桂王出境，要于路而夺之；且三桂亦以道险而远，未即进兵，故久不决。及闻清兵已临缅境，杀明官之计遂决。时明从官之在缅者，大小尚三百余人。十六日，缅人请明从官往新城吃咒水（即盟誓）；十九日明从官皆往，惟邓凯以病足不与。缅人以兵围而杀之，大臣、内监被杀者四十二人，沐天波、马吉翔等皆死；定国部总兵王启隆、王升等力杀数人而死；吉王偕妃自缢死；宫人令妇自缢者百余人，从桂王者无噍类。二十一日，缅人复治天波所居室，移桂王及其宫眷二十五人入居之，大小二百四十余人［按：《明史》云：“存者桂王与其属二十五人。”误］恰住一楼，母子啼哭，声闻里外。[4]

九月，清兵十万人由大理、腾越出边。三桂自将五万人，出南甸、陇川、猛卯；分兵二万，令总兵马宁、马宝将之出姚关、镇康、孟定，期会师木邦。十一月，三桂使马宁、马宝等追白文选于茶山，迫降之。十二月，清兵抵缅甸之旧晚坡（阿瓦城东六十里），缅人执桂王以献，清兵北还。[5]

是岁正月，清帝福临死，玄烨立，以明年为康熙元年。三

月，郑成功进兵台湾，大败荷兰兵，克赤嵌城。十二月，成功占有台湾全部，改为东都，以赤嵌城为承天府；置天兴、万年二县。

定国年四十一岁

定国、文选合兵而西，直趋阿瓦。二月二十八日，文选疏报桂王云："臣所以不敢速破缅者，恐缅未破，而害先及于皇上尔。为今之计，宜多方委婉，使缅送驾出来为稳着。"[6]旋得桂王玺书云："当以奇兵来，切嘱切嘱！"时相去六七十里，沿河搭浮桥，为奉迎计。缅人急斩断浮桥。文选候诏不得，撤营去。[7]

先是庚子年（1660 年）十月，定国至洞乌，见沿江多船，议遣别将分渡，赴赭硁迎桂王，而自率师攻阿瓦以制缅，使不得出师争。靳统武谋曰："我兵少，分之力愈弱，不如全军攻缅，缅破，必送主上至军以求和。"乃进师，败缅军于瑞羊岳。（《野史无文》云：在阿瓦城西百余里。）阿瓦，缅王城也，三面阻江，一面通陆，自文选兵去后，缅人并凿之，引水为湖，留堤三匝，置木城其上。定国从南噶剌江为浮桥以济，使人谕曰："苟送上出，则我罢兵。"且责缅人供应象马粮糗，为入边计。[8]缅人复云："你王避难来我国，我是恩人。前有一野王子来，反将仇报……你主在我家尚如此，若还你主，更不知如何做出来。你要攻城也不妨，二年三年皆可，只是你们水土不服，兵亦有减无增，我不怕。"[9]定国度缅人不听，春，进屯洞帕，离缅城八十里；文选屯象腿，离缅城百十里。缅人先守木城，趁两军未逼，乃更于外立木城，出兵以守；明日，兵复前，更立木城。如是数四，渐逼定国营，乃大出兵与定国战。[10]缅人以边牙鲊、边牙猓为大将，集众十五万人，临战，巨象千余，夹以枪炮，阵横二十里，鸣鼓震天，大噪而进。[11]定国、文选兵不及缅兵十之一，且戎装耗失，所操惟长刀、手槊、白棒而已。缅军前队皆象，中有花象善突阵，为群象先。定国视战地，当象来处有石桥，桥下水深，恐不测；象将及桥，自持长刃迎之，象鼻卷定国，定国跃

起避之，象鼻方反卷，迎刃鼻断，负痛反奔，群象俱走，定国与文选鼓噪击之。[12]大败缅兵，僵死万计，杀其将边牙倮，缅兵溃走；而边牙鲊犹收余众，栅大榕树林中，荫可百里，其夕鸣鼓竟夜如列阵，此晓竟走还，无一存者。二王遂渡锡箔江，临金沙江以窥缅城。[13]阵获缅将如国老等，善待之，仍遣使告缅王，俾送桂王出，不听。定国乃决策渡江。[14]

定国谋渡江，苦无舟。访之缅中耆老，曰："上流有大居江，地饶材木，居民数百家，烧矿冶铁，舟可立具也。"[15]四月十二日，定国遣靳统武造舟于马得狼江，遣彭应伯造舟于井角（《云南府志》云：马得狼、井角，俱缅江名）。定国时驻碎实杂（一作碎赛雍），为浮桥于南噶剌江，游骑时至缅木城外。五月初八日，定国遣将军王天才、徐继泰、丁仲柳以兵三百人守江桥；十八日又遣长宁伯雷朝圣、副将黄朝用、高三天以兵五百往马得狼江造船，调靳统武还。[16]缅人发兵捣船厂，复退守木城。定国闻黄、丁失利，船俱被焚，乃发兵四出扫粮，为围困计。凡三月，粒米不入，水陆难通，缅众饥窘，至煮皮盔以食。定国谍知，又遣使谕送桂王出，自不为难。缅人则请先退兵，然后送桂王出。[17]是时，定国军中携眷行，老幼累累，为累不堪；疫作军饥，死亡相继。不得已，移驻亦渺赖山下。[18]

八月，定国、文选闻缅人杀明从宫，分兵进至洞乌，以十六舟攻缅，不胜，覆五舟。十八日，与文选还师洞乌。凡行营例，定国、文选各前先行三日，时文选军在后，张国用、赵得胜等窃语："此地烟瘴，已伤多人，今再深入，气候更热，非尽死不止，宁出云南，无作缅鬼。"部兵闻其语皆喜。夜束载定，二将披甲入卧帐，请文选行，文选惊起，皆曰："大事知不成，今更深入瘴地，空死无名，殿下必随晋王，是续贺九仪也。"文选曰："尔等今欲何往？"国用曰："以此人马出云南，何向不重？"遂发，抱挟文选上马。[19]文选度不能禁，遂上马行，夜退走七十里。比明，定国觉，曰："巩殿下欲何往耶？"令其子嗣兴率兵尾其后，诫弗与战，定国亦缓随之。文选前行，张、赵断后，行五日至黑门限（坎），议曰："晋世子带兵蹑后，连日行急，人马俱

困，今就此山势与之一战，使其回辙，我等方可前行。”张、赵遂阻山上。嗣兴引兵上山，见矢石交下，怒，驰战。定国已到，飞檄其子罢兵[20]，曰：“吾昔同事者数十人，今皆尽矣，存者我与文选耳，何忍更相残？且彼既他出，欲自为计，念已绝矣！吾所以使尔随之者，冀其生悔心，或为并力，今大谊已乖，任彼所之，吾自尽吾事耳。”[21]邀得文选兵四十余人，悉令放还。仍率所部独进洞乌。[22]

文选行三日，遇吴三省自孟定来，营马尽死，军皆步，将入缅。以大义责文选，文选流涕曰：“我负桂王与晋殿下矣。将军能帅兵至此，使我有太山之助乎？”三省度文选众皆有背意，乃扬言：“云南降者皆怨恨，不得所，人心思明，故我辈咸愿步来到此。”文选部兵见三省并有踊跃状，闻此言各鼓舞。国用、得胜亦复转虑，不复言适云南。会徽人汪公福携海上郑成功约师表来，文选遂屯锡箔，遣苏总兵出木邦，会定国进兵。留待月余，报书未至。清吴三桂知其情，使降将马宝、祁三升等追文选至茶山（一作孟养。《永昌府文征》云：孟养、木邦、勐密、蛮漠，即今所谓掸人——缅掸邦地），文选降。[23]时文选尚有兵一万一千七百四十九人，马三千二百六十四，象十二只。[24]自清兵入黔以来，只吴三桂一路，即俘、降定国部官兵、家口八万三千四百三十八人，马二万零三十三匹，象三十二只。铎尼、卓布太两路所俘及死亡逃散者，尚未计算在内，定国兵力大衰。[25]

九月十八日，黎维祚抵定国营，定国使之西入赭硁。黎维祚，江津人，字名远，遭乱徙居遵义。己亥年（1659年）冬，桂王走滇西，时诸爵镇将多拥兵自守。维祚愤惋号泣，遍走告以大义。皆忻幸，密草迎“銮”奏，付达。维祚乃合若干本，窍木棒三尺许，藏其中，用荷筱铛等物，挟木以行。至是谒晋王李定国，述其艰苦及诸勋志，定国色动。维祚就破棒出诸奏相示，定国大义之。十月初六日，给以令箭一道，中云：“今皇上入缅，势已危急，若能走通消息，茂建奇功，决不负若。”当即为之转奏。时桂王在赭硁城，左右夹河，洪波浩渺。相距五六日程，只声息通，主臣不相见。旋奉敕云：“皇帝密敕沥胆将军黎维祚，

据晋藩奏，尔忠旰贯日，义胆浑身，穿虎豹，趋辰极，烈风劲草，殊轸朕怀！兹授尔沥胆将军，督理滇、黔、楚、蜀，励诸军将士、山林隐逸等，谨慎固防，枕戈以俟，候晋、巩两藩举师，四路策应，旦夕是图，勿迟勿怠!”十月十五日，黎维祚接敕，复收空旨百道，印三颗，造复底小舟密藏之，木刊诸神象，击小钲锣，肩唱以行。定国大喜，以旌甲拥至通界，始改装返报诸营。冬十月，复入缅复命，比至腾越，而缅人已送桂王出矣。[按：此说见《播雅》，陈启相《沥胆遗事》原作“辛丑九月十八日，至孟艮府，谒晋藩李定国”。其时定国在洞乌或九龙江（孟艮属）一带，与桂王声息不通已久，代为转奏之说，当不可信。录之以见当时士民对定国之期望。]

【注释】

[1] 参见徐鼒：《小腆纪年》卷二十。

[2] 参见刘茝：《狩缅纪事》。

[3] 庄士敏：《滇事总录》卷上。

[4] 参见刘湘客：《行在阳秋》卷下；佘村农夫：《野史无文》卷六；叶梦珠：《续绥寇纪略》卷四。

[5] 参见计六奇：《明季南略》卷十七；清国史馆：《逆臣传》卷一。

[6] 刘茝：《狩缅纪事》。

[7] 参见叶梦珠：《续绥寇纪略》卷四；李天根：《爝火录》卷三十一。

[8] 参见冯甦：《见闻随笔》卷下；邓凯：《求野录》。

[9] 叶梦珠：《续绥寇纪略》卷四。

[10] 参见温睿临：《南疆逸史》卷五十二；佘村农夫：《野史无文》卷五。

[11] 参见邓凯：《求野录》。

[12] 参见刘健：《庭闻录》卷三。

[13] 参见邓凯：《求野录》。

[14] 参见叶梦珠：《续绥寇纪略》卷四。

[15] 徐鼒：《小腆纪年》卷二十。

[16] 参见刘健：《庭闻录》卷三。

[17] 参见叶梦珠：《续绥寇纪略》卷四。

[18] 参见邓凯：《求野录》。

[19] 参见邵廷寀：《西南纪事》卷十。

[20] 参见叶梦珠：《续绥寇纪略》卷四。

[21] 温睿临：《南疆逸史》卷五十二。

[22] [23] 参见邵廷寀：《西南纪事》卷十。

[24] 参见刘健：《庭闻录》卷三。

[25] 参见《明清史料》丁编，“平西王册稿”；《滇事总录》。

壬寅年（1662年）

（清康熙元年）

二月初五日，清吴三桂还至腾越，寻奏曰："提督张永报称：李定国兵马五六千，在景线［按：《清朝文献通考》云：古八百媳妇地，名小八百。其所属有十猛地，周一千八百余里，乾隆三十一年内附，授宣抚司职。景线，现属泰国，位泰国、缅甸、老挝交境，城依澜沧江，东面即为老挝地，去允景洪约四百里。泰语称景线为"清线"，西双版纳傣语称"景先"，亦有译为"整欠"、"清盛"者，皆为一地］砍竹木搭浮桥过江，此通南掌走交趾之路。臣思定国若从车里（今景洪——引者注）出普洱、沅江边界走交冈（今广西西部——引者注），则调兵迎头截杀；若由老挝走交趾，则去边甚远，此时边外瘴生，非复用兵之日，未宜劳师远涉，以期难必之功，惟有用间招携。已重赏土人，赍谕招安，又行间，使之相疑。"[1]

又，《云南府志》所载吴三桂疏，与上述略同，惟更为详细。兹转录如次：

李定国未知大兵进剿之前，已奔景线，但景线有路可由

车里出普洱、沅江以达交冈；又一路，可由老挝以达交趾。臣恐李“逆”闻永历、白文选尽为我得，自揣势孤，窜走交趾，或谋犯广，或图航海，皆未可知。臣于班师之日，确行侦探，侦者言：定国兵马五六千，在景线造浮桥渡江，此系通南掌走交趾之路。臣思行师以应变就机为利，如定国由普洱走交冈，我兵截剿或可奏效；倘由老挝走交趾，离内地甚远，此时边外瘴生，非用兵之日，未宜劳师远涉，以期难必之功，惟行间招携为可图耳。

三月，吴三桂以桂王还滇都，四月，三桂绞死桂王父子于昆明之篦子坡（坡在昆明城内）。

是岁五月，明招讨大将军延平郡王郑成功卒于台湾。

定国年四十二岁

先是，定国在洞乌，侦得阿瓦军情，知吴三桂入缅，获桂王，乃自九龙江（即澜沧江下游）移营景线。本年正月移营猛勇，三月十六日又移营，欲就粮于猛心。四月（一作五用）抵勐腊（今西双版纳自治州勐腊县），欲由交冈入广东。[按：《滇纪》云：“自景线渡江出猛乌（勐乌土司，今属老挝，在勐腊东——引者注），又越黑江，走沙仁、孟乃，乃更渡江，便可达交冈，入交趾。”定国由九龙江东走，疑即此路。由景线而东，有路二：一经交冈入广东，一经老挝入交趾。《庭闻录》云“欲由交冈走交趾入广东”，误。][2]驻军勐腊，遣官入车里送礼借兵，图复云南。车里、暹罗俱使人请入计用兵事宜，尊礼甚殷。[3]先是，有礼部侍郎江国泰者，随桂王入缅，道阻，绕道流入暹罗，说暹罗与定国联姻，效顺助兵，并助金银粮币。（《小腆纪年》云：“暹罗以女为定国妃，间道通殷勤。”）[4]五月，暹罗差六十余人来通定国，欲定国移师景线城休兵养马，然后助以象、马恢滇，馈赠甚厚。又出神宗时所与敕书勘合，自称“偏藩”，且云：“前者八十二人流落我国，王子厚待，每人每日米二升，银三钱。”定国厚礼之而归，仍遣办事主事张心和等十余人报之。[5]又有蜀人马

九功者，前随桂王入缅，被阻转古剌，自是亦自古剌遣使至，云已集得四千人，愿互为掎角。[6]会定国营人马病死益甚，定国乃斋戒修表告天，自陈一生素行，凡所作为，皆本至诚，何苍穹不祐，至有今日？……如果大数已尽，乞赐定国一人早死，无害此军民。五月十五日焚表，六月十一日定国诞辰病作，复闻桂王凶耗，益愤懑。病革，谓其子嗣兴及部将靳统武、总提调马思良曰："宁死荒外（一作"宁死徼外"，"宁死荒徼"），勿降也！"二十七日夜，定国卒[7]，时年四十二岁。[按：定国之死，《野史无文》、《劫灰录》、《见闻随笔》、《庭闻录》、《续绥寇纪略》诸书均作六月二十七日，卒于勐腊。《行在阳秋》则云七月二十九日，卒于景线。冯甦、刘健居云南甚久，其说当较可信，从之。又，《腾越州志》云："葬于景线。"殆定国死于勐腊，葬于景线欤？定国遗嘱，各书多无异词，惟《平寇志》云：定国病革，集诸将语之曰："若辈出万死一生，流离百战以奉主，矢不二，今已矣！我死急散去，慎毋从吾子，吾子非统御才，不足有为也。"呼其子语之曰："携妻子，变姓名，力耕山谷以自活，毋复拥众。"此类颓丧语，在定国史料中属仅见，姑存之。]

定国有子三人：长子溥兴，遮炎河之败为清兵执获杀之；少子润兴尚在抱，传闻为其部将许姓者潜奉之入腾越，改姓段氏。[按：西藩李室人刘氏刊印佛经，只言"同男嗣兴，女海岳"，不及溥兴、润兴。]其次子嗣兴及蜀王刘文秀子震并诸将之眷属共万三千余丁口（一作数万人）悉被拘之入会城（他书均作嗣兴、震等率部降）。逾年，昆明张锜，大理张义泰，梅阿四，腾越尹士镳，武定张发祥，安宁鲁家柱等于会城起兵，不克，死之。又逾年，嵋峨王扬祖、王朔，新兴王耀祖，罗平诸生周羲，蒙自李世藩、李日森、李世屏，八砦李成林，枯木龙元庆，倘甸叶向阳、叶正昌，石屏龙飞扬、龙韬，弥勒沈应麟、昂复祖、王承祖、王先任、王先伦，陆凉资洪，沾益诸生秦家鼎，潞（路）南诸生秦祖根，平彝诸生刘汝襄等大举起兵，众至十一万人，复临安、蒙自、嵋峨、宁州、易门、弥勒、邱北、通海、石屏、宜良、沾益、平彝十余州县，仍不克死之。康熙三年（1664 年），

水西土司安坤与常金印等举义，称“晋王李定国尚在，谕令起兵”。坤聚众数万，以叔如鼎为总统，通贵州土司罗大顺等，约共取云南，九月败，被执不屈死。要皆定国忠义所感召之余波云。[8]

定国死后，其部下不降者仍数千人，于阿瓦河东百余里处，聚族而居，与当地民人一起垦荒开矿发展而成一部落，自称“桂家”。[按：“桂家”一作“贵家”，其说有二：一作定国遗部；一作随永历入缅遗民。《永昌府文征・吴尚贤宫里雁传》云：“宫里雁者，其先江宁人，随明永历帝入缅，缅执永历帝，诸人散处沙洲，‘蛮’不之逐，谓水至将尽漂。已而水至，洲不没，‘蛮’共神之。百余年生聚日盛，称‘桂家’。”查随永历入缅诸臣，经“咒水”之祸，余已无几，当以前说为正。] 名其地曰“望乡台”，岁时凭眺，瞻望中国。[9]其逃散他地或被劫持入会城者，亦多不愿为官，回乡务农。兹举其知名者如次：

王应举，合肥人，定国副总兵。被挟至会城，不受世袭，亦不愿为官，辞归乡里，逍遥于湖畔水涯，布衣终身。[10]

高明宇，郾州人，定国裨将。滇南事败，自滇入楚，年八十三岁，闲居武汉江干晴川阁下，娓娓道入缅轶事。[11]

高应雷，昆明人，定国至滇，应雷应举（丁酉年乡贡）受官，从军至黔、楚，己亥年（1657年），溃于辰州，归隐溆浦。[12]

袁润，石屏人，临安府学廪生，随许名臣任军械。那嵩应定国，名臣附之，兵败，润遁易武茶山，以隐逸终。[13]

谢秉铉，山阴人，明末举人，仕永历为户部郎中。定国入滇，以铉易贺九仪守武定，既至阅城，有营卒犯法，立治之，一时肃然。永历奔缅，中途隐去。[14]

屈士熼，番禺人，隆武举人。永历八年甲午年（1654年），定国兵下高、雷、廉三府，士熼与弟士煌往从定国军。未至，定国以攻新会失利，撤兵还黔。士熼兄弟赴龙门从邓耀。后闻定国入滇，往从之，任礼部仪制清吏司主事。永历十一年丁酉年（1657年）八月，充云南同考试官；将典试四川，未果行。是

冬，册封漳国公郑成功为延平王，内议士熻持节，晋王不许。晋王为人苛细，虑诸道督学使者贪墨，每出行部较士，奏遣一都司随行，谓之“监试”，士熻言其非仪，罢之。永历十二年（1658年）冬，永历西走，日夜冒雨雪行，凡七日始至楚雄。士熻病，伏枕山寺旬余，六军已入腾越。永历十三年（1659年）应那嵩，将赴之，未行而那嵩败。又欲往从郑成功，还至粤，病死。其弟士煌亦自滇还粤，病死。[15]

定国死后，勐腊一带各族人民，奉定国为神，过其墓者皆膜拜，复建“汉王庙”于勐腊后山，岁时致祭，礼极隆重。[16]

【注释】

[1] 刘健：《庭闻录》卷三。

[2] 参见刘健：《庭闻录》卷三。

[3] 参见邵廷寀：《西南纪事》卷十。

[4] 刘彬：《晋王李定国列传》。

[5] 参见刘茝：《狩缅纪事》。

[6] 参见刘彬：《晋王李定国列传》。

[7] 参见叶梦珠：《续绥寇纪略》卷四。

[8] 参见刘彬：《晋王李定国列传》。

[9] 参见王之春：《国朝柔远纪》卷五；温雄飞：《南洋华侨通史》。

[10] [11] 参见奈村农夫：《野史无文》卷七。

[12] [13] [14] 参见秦光玉：《明季滇南遗民录》。

[15] 参见屈大均：《翁山文外》。

[16] 参见本书《序言》。

附录

一、李定国传

李定国列传

王夫之

李定国，字宁宇，陕西榆林人，本农家子。十岁为张献忠所掠，喜其貌度不恒，养以为己子。献忠养子四：孙可望为长，定国次之，刘文秀、艾云枝次之。可望狡谲鸷忍，常为献忠掌老营，号“一堵墙”。献忠之降也，左良玉固欲杀之，可望为通赂于熊文灿，馈文灿碧玉长尺余者二，径寸珠二，可望陈说诡媚，得文灿欢心，保献忠逸去；繇是尤为献忠所信倚，威亚于献忠，定国等皆为之下。定国长八尺，眉目修阔，躯干洪伟，举动有仪度，于群盗中独以宽慈著；喜接文士，通兵法纬象，读《通鉴纲目》，略通大义。不乐为盗，以幼鞠于献忠，莫能自拔，所部将两万人，随献忠驰突豫、楚。崇祯十七年破四川，献忠惑其客汪公子言，日务屠毒，猜忍暴噬，可望、定国皆重足立。永历元

年，献忠僭大号，建伪都于成都，分遣可望、定国、文秀、云枝攻贵州，遂窥云南。献忠猜杀益剧，可望等不敢北归，掠东川乌、蒙间。会黔国公沐天波，以年少轻倨，侵虐土、汉，巡抚吴文瀛媕阿不能裁正。土司沙定洲举兵反，攻云南府，天波弃城走，定洲据云南。时上方播越，威令不能及，天波势蹙，澜沧道副使杨畏知迎天波居腾越，檄土、汉郡县讨定洲，兵未集，可望探知滇乱状，乃倍道趋攻云南，定洲迎战大败走，被擒见杀。可望既定滇，驰报献忠，献忠益媢之，可望乃与定国、文秀、云枝相结约，屯滇自保。献忠孤立成都，清兵乘虚来攻，献忠兵溃自刎。沐天波闻沙定洲败死，意稍安，可望因遣使诱天波令附己，与合兵定诸土司，而还天波邸第庄田。天波既童騃，为所惑；畏知亦力弱，不能抗，遂与偕诣可望。可望羁縻之，使居民舍，月给粟以赡之，门置兵锢其往还，而胁畏知为己用。己乃自称平东王，而定国为安西将军，文秀为抚南将军，云枝为定北将军，犹仍献忠所伪署号。詹事雷跃龙出降，以为伪相，绅士皆伪署司道府州县吏，以甲子纪年。既灭沙厌，益攻诸猓猓部，收其军，有众二十余万，厚敛民田租以赡之。定国所部汉、猓猓兵，亦逾五万。献忠之死也，可望欲臣属诸部，而与定国辈素相颉颃不能，讽令尊己。定国倦于为盗，思自洗濯归正。可望知其情，念所以笼制之，乃与定国等谋归附朝廷，定国欣跃，从其议。可望之欲归附也，意假王命自尊，雄长三部；定国揣知其奸，亦姑因之以自达。永历三年夏，可望修书称平东王孙可望、安西将军李定国、抚南将军刘文秀、定北将军艾云枝献书大明皇帝阙下，求封王爵；献金百两，马十匹，请出兵击清，词多桀骜，名而不臣。遣杨畏知与前行人龚彝赍诣肇庆。畏知、彝入见，上稍奖慰之，下廷臣议。大学士严起恒，给事中丁时魁、金堡，以为不可听，乃封可望景国公，定国以下皆侯爵，遣给事中赵昱、司礼太监杨起春赍敕印冠带袍笏往。可望念不得王，无以摄服三部，遂止昱、起春于驿舍，不与相见，而令部将来相恫喝，探昱、起春意。昱、起春相抱而泣。可望知状，乃遣合归，要易王爵。昱、起春狼狈而返。昱留南宁不入朝，起春归奏可望言："不得王封，

当出广南，趋行在，劫车驾。”严起恒曰：“可望若欲犯顺者，何所忌惮而不前，彼方畏清，资我为外御，以徐养其羽翼，岂敢效李自成速毙乎？朝廷但当讲自强之术，姑置可望，迟之且摇尾复来矣。”可望果不敢动，但寄怨于杨畏知而杀之。陈邦傅患高、李娼李元胤，而怨金堡与朱天麟，谋挟可望并忠贞营及元胤军，劫天子以杀堡；乃诱堵胤锡龙旗往调可望，而令胡执恭偕往，阴纳降款。会胤锡卒，执恭遂报邦傅，使诈作敕册，铸藩王宝，制龙袍翼善冠，琢龙玉带，封可望为秦王，总录天下文武将吏兵马钱粮、专征四方行大元帅事，公侯阁部以下皆称臣，启旨行事不必关奏朝廷。时艾云枝已死，封定国为安西王，刘文秀为抚南王，各授册宝。可望大喜，受命，而朝廷初未知也。可望遣使诣阙谢，执恭为他词缓之，密报邦傅，遣执恭子钦华赍金航粟，赂王化澄、夏国祥、程源、万翱，请封可望如亲王，以实其诈。朱天麟属吴贞毓为之主，言可望必欲得秦王，则旦夕可复南都，不然即引兵出南太犯车驾矣。化澄、翱力为之请，严起恒固执不可，夏国祥居中两解之。奏上，以朱敕付内阁，封可望荆郡王，定国、文秀各国公。化澄、翱但以谢钦华之赂，亦不知其必得秦王之何意也，唯贞毓知之，密约给事中朱士鲲等具“称臣”启，因钦华赴可望所，纳款，诉起恒亢执状。荆郡封使至广南，与可望使遇，执恭奸尽露，可望怒，杀执恭，而据伪敕宝，称秦王专征如故。驰金龙牌，抄敕册文遍调土、汉官军，皆为之下，众益强盛。遂出黔、蜀，收杨展、王祥、马进忠、王进才、张先壁、张登贵、莫宗文之军为己属，祥、展不屈，皆遇害。自是天子自扈从外，无一卒一民为朝廷有矣。永历五年，上在南宁，可望使其将吴都督率兵两千人至行在，击杀大学士严起恒及给事中吴霖等三十人，胁上求加敕实封秦王，令百官皆称臣；上不得已，皆从之。未几，清兵攻南太急，上走泗城州，适可望逻骑至，侦知上所在，遂拥上入其营，驰报可望。可望令上居于兴隆卫，月进膳金二十两、米十石，宫眷内臣皆啜薄粥，内臣负薪汲水，宫婢自炊之。可望自构宫殿于云南，黄屋双阙，出入皆建葆羽、日月旗、孔雀扇、曲柄幢盖，乘金龙步辇，名其亲军曰“扈卫”，铸

印仍献忠式，作七迭篆，帝制自大，岁遣军戍兴隆，谕禁从宫出入。定国大恶之，其幕客金维新，忠谅有志略，从容称大义，说定国尽忠本朝，特以方见挟持，故犹佯奉可望。永历六年春，可望乃分遣刘文秀自成都攻川北，白文选、张先壁副之；定国自贵州出黎、靖，马进忠、冯双鲤副之。定国以进忠为朝廷宿将，加意结纳，合军十万，战象五十，四月驰攻黎平，克之。五月至靖州，清将张国柱合许、魏二将之兵迎战；急击大破之，斩馘五千余级，国柱弃马走，两日夕驰下武冈。清续顺公弃宝庆走，定国收宝庆，遂自东安南攻孔有德于桂林。有德遣其将孙龙、李虾头拒守严关，定国大败之，斩孙龙，虾头中箭死。有德大惊，自将迎战于大榕江，复大破之，弃甲断骼遍于溪谷。有德走，闭城守，遂围之，肉薄登城，王允成开门纳兵入，有德自焚死。执陈邦傅，数其矫诏、怀奸、叛主、迎降之罪，并其子磔杀之。七月收平乐、梧州，马雄、线国安走广东，遂复柳州、南宁。时刘文秀出川北，亦复潼川，进攻保宁，吴三桂驰救之，迎战，大败，退师川南。定国既平西粤，整饬军政，于民一无所犯。招兵部尚书刘远生、中书舍人管嗣裘、兵部主事朱昌时于山中，与议兴复，共奖王室。尝置酒七星岩，酒酣，谓远生曰："君读史以曹操、司马懿为何如人？奸耶？愚耶？"远生踟蹰未对，定国曰："操、懿有勘乱之才，蹀血百战，摧大敌，扶弱主，以垂令名于后世，如探囊取物，而顾以此博万世笑骂，犹持黄金换死铁，农夫樵竖之所不为，而操、懿为之，非至愚而何？"八月，举兵出楚，复永州，遂下衡州。出马宝军于连阳，收曹志建故部于贺县，遣马进忠、冯双鲤北取长沙，召张光翠出宁乡，进复常德。十月，进忠略地岳州，所至披靡；别遣军攻永新、安福，下之，遂围吉安。兵出凡七月，复郡十六，州二，辟地将三千里，军声大振。定国至衡州，下令所司，粪除端皇帝潜邸宫殿，为望幸地。今上以十月十九日诞辰，定国率绅吏、将佐、耆民，诣邸宫班朝拜贺。届冬至，复趋宫行礼，郡吏设可望位于学宫，将导群官往拜，定国大言曰："文武官非秦王选授者，既拜圣上，不当复拜秦王。"时可望遣其腹心杨中书者，来觇定国，即尽以驰报

可望。可望怒且惧，遂自贵阳帅兵出，将至湖南，欲夺定国兵柄。凡可望发兵，胜败进止，一切皆不遣上知，闻定国收复粤、楚，乃草奏遣赴兴隆报捷，并令马进忠、马宝及故从官寓行营者，通奏起居。杨中书者归，遇可望于沅州，尽以告。会清敬谨王率三贝勒、八固山大举兵向湖南，时定国屯衡州，马进忠、冯双鲤屯长沙，前军下岳州，定国知清至，与进忠、双鲤谋，令弃长沙，诱敌渡湘江，进忠、双鲤退伏白杲市，须敌过衡山，乃绕出敌后反蹑之；定国夹蒸水拒之，须蹑兵至夹击，当尽歼之。议定，进忠、双鲤退，可望至武冈，知状，不欲定国之成功，而思陷之败死，密令双鲤径退宝庆。双鲤至湘潭之花石，得可望令，即走湘乡向宝庆；马进忠不知所为，随之而西，秘不遣一人报定国以误之。十一月己丑，有彗星出天街间，清兵薄衡州，定国夹蒸水而军，接战，自日晡达庚寅旦，数十合，斩首清千余级，定国军亦颇有杀伤。敬谨王者，素以骁勇闻，冠七宝金兜、牟揭金顶、交龙绣纛，率铁骑二十余，登蒸水旁小山觇定国军，山下僧进茗饮，方啜，伏兵从山后竹筱中出，挥刃击之，自顶达项分为二，从骑皆歼，清兵不知敬谨王死，犹殊死斗。马宝骑出掠阵，流矢中颊伤宝，军遂却。定国方待进忠、双鲤不至，颇疑怵，俄而侦骑返自白杲市，言二将已走湘乡，定国大惊，遂收兵走邵阳，敌亦不敢追，湖南复陷。定国既屯宝庆，侦知清兵放牧湘东岸，将间道往夺其马。将发，可望驰召定国返武冈会议，三昼夜书七至。定国不得已，西行，将见可望。至紫阳渡，刘文秀之子密遣人走报定国，言可望俟其至即收杀之。定国大惊，遽引兵东走，缚筏为桥，渡湘水，渡已桥绝。可望追兵趋永州。遂自永明走平乐，下梧州，进围肇庆，计欲取东粤，与郑鸿逵、朱成功合迎驾，自闽、浙图南京。肇庆城小而坚，清将许□□死守不下，围三月不克，师渐老，援兵大至，定国乃退，自平乐屯永安州。定国之自紫阳东走也，可望良久乃知之，遣骑追之不及，清兵亦方自衡州西南进，可望遂举兵下宝庆拒之。可望耻定国有杀两王之功，而己不逮；抑见定国之杀两王，而谓敌易与也，遂欲独战以求多。清兵自祁阳舍宝庆，将斜趋武冈，出可望后；可望乃自

宝庆旋师迎战，遇于岔路口。可望骄媢，自倚必胜，令白文选、冯双鲤、马进忠各将其军，因山为垒，戒不得动，动者斩；而自率其所谓"扈卫军"者，仿戚继光法，用藤牌间长矛前搏战。战浃时，雁行不进，敌铁骑四合，横蹂可望军，阵乱，可望遽单骑走，遂大败，积尸塞野。双鲤、文选、进忠坚壁候令，令不至，不敢发，可望走浃日，三将乃引退。是役也，精锐挫衄濒尽，退守武冈。可望归贵阳，不敢议北出矣。清兵遂陷武、靖、辰、沅、黎平，大掠千里，民死者将百万人。可望以是愧憾，益忌定国，然知其不定国若也，稍思羁縻之，复遣使持刘文秀书劝定国，令修好如初，定国亦姑应之。永历八年，定国复攻桂林，穴隧道，瘗火药碎其城，骁将王国仁入隧视，火遽发，死隧中。定国惊惋大恸，兵遂乱，引归南宁。遂从土司假道，密遣使具方物，诣兴隆候上起居。上遣兵部侍郎萧尹赍血字诏诣定国，述可望僭逼状。定国奉诏，伏地恸哭不能起，遣使贡上服御物，并奏："臣誓死先为陛下除逆臣，后议恢复。"已而，可望微知其状，遣人至兴隆，以不逊语胁上，取从官萧尹、雷德复等杀之。可望据贵阳，前军守镇远，扼险自固，清调其贝勒等北归，以洪承畴经略湖南，承畴议守永、宝，以困可望；可望因复下靖、武，相持于紫阳，贵州粗安，可望遂治宫殿于贵阳，开科取士，涂饰以欺黔人。永历九年，定国遂举兵自泗城州入滇，袭云南府据之，治城郭，缮甲兵，迎上于兴隆，奉居可望所筑宫；具卤簿，立朝仪，建置侍从文武官吏，军行进止，一以诏敕从事。驰敕召可望入朝，可望大惊，自率其军与冯双鲤、白文选、马维兴攻云南；而别遣骁将张胜率骑二千，繇间道直抵昆明城下，李定国起兵御之于高山寺。胜先至，纵火大噪，定国自军中率铁骑潜还，击胜，大破之，擒胜献于上，诏磔之于市。定国持胜首示可望，可望恇惧，定国大呼告诸军曰："天子在是，可望欲行弑逆，汝等何所利，而为逆贼受恶名反天道耶?"文选等皆趑趄不进，可望军遂溃，反走归贵阳。上欲息兵，合谋下黔、楚，以命定国，定国听命，诏刘文秀和解之。文秀刺血书告可望，可望复书狂嫚，文秀泣曰："自作不靖，以召外寇之侮，吾死无日矣。"遂

仰药死。可望频岁侵云南不已。永历十一年，定国乃奉诏数可望罪，举兵出毕节，讨可望，可望帅双鲤、文选、维兴拒战。定国奉诏谕三将令归顺，各封郡王，文选、维兴皆举军降。可望与双鲤军皆惊溃，定国兵蹑之，兵士家口皆居云南，定国入滇，悉予存恤，至是皆反走，赴定国，双鲤不得已，亦降。可望入贵阳，不敢留，携妻子宝玉及亲信二百余人北走，十一月至武冈，遂降于清。定国定贵州，归云南，安插诸军。萧尹之至南宁也，上封定国晋王，定国辞不受命；及是，白文选等皆爵郡王，上乃固命定国，定国始受晋王之命。间道遣使赍黄绫小诏及定国书下海，约郑鸿逵以明年夏会南都；驰檄荆西，约王光兴、李来亨等会荆州。号召四出，期大举出楚，而诸将吏兵民，见可望北降，知虚实险易尽输于敌，皆摇摇无固志。可望之降也，因洪承畴请兵取云、贵，画图山川迂曲及诸将情形、兵食多寡献之，清封可望为义王，如其策，大发满汉兵二十余万：一繇川南东川入，直冲大理；一繇建昌入，攻腾越；一繇广西庆远入，捣平越；一繇泗城州袭广南。而洪承畴率大军从黎、靖先入，诱定国出黔应敌，乃使奇兵绕出反攻之。永历十三年，承畴兵薄贵阳，定国保毕节，扼关索岭，沿箐涧设伏，连战二十余日，杀清兵万计，而泗城兵已达临安；川南兵侵腾越、大理，定国三面受敌。可望又遣人赍手书招诸将帅，言已受王封，视亲王，恩宠无比，诸将降者皆得予厚爵，非他降将比，惟定国一人不赦。刘文秀之子及马维兴、马宝等皆为所诱，先后举兵降。定国大溃，乃退师，奉上奔永昌。追兵益至，定国奉上奔缅甸。上至缅甸，定国自出收兵，缅甸人叛，逼上送诣吴三桂所，三桂犯顺，上崩于云南府。是日，烈风黑雾大集，飘屋瓦翔空如鸟，满、汉兵十余万，皆震悼悲号，三桂杀数百人乃定。定国闻变，还兵至缅甸已无及，因缟素发哀。定国披发徒跣，号踊抢地，吐血数升，遂杀妻子，焚辎重，举兵攻缅甸，屠之，率其军居徼外两年，愤恚呕血卒。

（录自《永历实录》卷十四）

晋王李定国列传

刘　彬

定国，字霖宇，云南贫家子。幼失怙恃无所依，关中贾人亦李姓者携之入陕，居榆林。稍长，从张献忠作贼，称安西将军。定国体干长大，眉目修伟，举动有仪度，于群贼中独以宽仁著。喜敬礼文士，通兵法纬象，读《通鉴》诸书，略通大义。永历元年，□兵攻成都，献忠兵溃，自刎死，定国偕其党孙可望、刘文秀、白文选、艾奇能、冯双礼等败走重庆，入黔。会云南土弄山土司沙定洲作乱，逐云南世守黔国公沐天波，盘踞会城，连陷西南州县，全滇震动。定国与可望率师返滇，先破其部目李阿楚，继攻围沙逆，其土目杨嘉械定洲及其妻万氏数百人出降，定国剥沙逆皮于市，人心称快。沙乱平，定国说可望曰："闯、献两帝辛苦二十年，蹂躏遍天下，至今身死业隳，究无寸土，而□□坐享渔人之利，甚可悲也。吾辈本大明臣民，中国沦陷于外寇，则当严辨华夷之界，以中国为重，今挈滇、黔、蜀归就明室，诚心辅佐，恢复旧京，荡清海内，则半生流贼之耻辱可雪，将来竹帛之垂名可图也。"可望不听，且疑其有异心，惟刘文秀、白文选极赞同之。未几，可望妄以干支纪年，铸"兴朝通宝"钱，定国曰："肇庆已有君，永历其年号也，不度德量力，妄自尊大，其欲自取灭亡乎!"可望衔之甚，然终内惧于杨畏知，外怯于定国、文秀、文选，乃去其尊号，一面遣杨畏知赴肇庆求封，一面以定国将兵赴黔，与总督云贵军务范钅广，共伸倡义扶明逐□之约。钅广见定国喜曰："真天与公赐大明恢复宗社也，惟可望心怀叵测，未敢深信，一旦渝盟，奈何?"定国曰："可望扶明，我则与之共事；若其渝盟，我则杀之无难也，恢复中原之责，有定国在，乞勿念。"遂屯兵贵州。未几，督师何腾蛟、留守瞿式耜相继死国，肇庆、高州、梧州、平乐、柳州、桂林诸郡俱陷，帝奔广南，遣使封可望冀王，定国西宁王，命定国分兵复湘、蜀、武汉、桂、

粤诸省。定国以马进忠为朝廷宿将，加意结纳，邀其由镇远出沅州，会于武冈，以图桂林，而直趋肇庆；以冯双礼出靖州，刘文秀、张先壁由永宁出叙州，白文选由遵义出重庆，以图成都，而直向武汉。定国部署定，乃先自率精锐攻黎平，克之。五月至靖州，□将张国柱迎战，定国急击大破之，斩首五千余级，两日夕驰下武冈。□续顺公弃宝庆走，定国收宝庆，遂复永州。□定南王孔有德败走广西，定国督师追击，斩馘八万余，虏获骆驼军仗无算，由西延大埠疾驱追击，至全州，有德援兵至，定国奋勇攻击，援兵不能支，溃走桂林。定国乘胜围桂林，肉薄登城，王允成开门纳兵入，生缚孔有德及其家属，并陈邦傅、邦傅子曾禹等，下令曰："□军两次屠戮桂、粤，今其报仇时也，凡遇□军杀无赦，不容招降。"是役也，先后共斩首□军二十余万人，桂林城中尸如山积。一时□兵称滇、黔人为"蛮兵"，遇见即逃，湘、桂人亦以"蛮兵"呼之，以其善战嗜杀也，即定国军中变以"蛮兵"自诩。定国素敬慕瞿留守之精忠，留守系害于有德，乃于桂林署中设留守及总督张同敞灵，以有德生祭之，磔其首而剥其皮；陈邦傅父子，则以其矫诏怀奸、叛主迎降之罪，碎磔之，传首安隆。帝遣大学士吴贞毓至定国营劳师，曰："自□兵入关以来，所未有之创举也，公之功于国家大矣哉。"于是定国再分兵徇广西郡县，浔州、郁林、梧州、柳州等郡，定国军尚未至，居民已乘胜驱除□军净尽，广西全省遂复。定国既平西粤，整肃军政，于民一无犯，招兵部尚书刘远生、兵部员外郎朱昌时、中书舍人管嗣裘参赞军务，共议兴复。日者置酒七星岩，酒酣谓远生曰："君读史以曹操、司马懿为何如人，奸耶？愚耶？"远生方踟蹰间，定国曰："操、懿有勘乱之才，蹀血百战，摧大敌，扶弱主，以垂令名于后世如探囊取物，而顾以此博万世笑骂，犹持黄金换锈铁，农夫樵竖之所不为，而操、懿为之，非至愚而何？"又顾谓远生曰："方令之世，一宋末之局也，君艳羡文文山、陆秀夫、张世杰诸前哲乎？"远生顾之微笑。定国曰："文、陆、张诸公，其精忠浩气，固足以光昭青史，为天地生色，然吾侪之对于国家，窃不愿有此结果也。"两人相对欷歔者久之。七月，定

国至梧州，前粤人大学士陈子壮、兵部尚书张家玉旧部奔定国，请移师广州为粤民复仇。定国遣其将马宝由怀庆进广东，先攻平东，下之，杀□府江道周永绪、平乐知府尹明庭等；又攻肇庆、高州、廉州、雷州诸郡，俱克，南雄、连州、韶州、连平等处士民，亦响应起兵，逐□守将，附于定国。是时，辰州尚未下，定国遣白文选往攻，杀□总兵徐勇，其众降。逾月，刘文秀之师亦击败□军，□吴三桂驰救之，亦败走，文秀遂进据成都，夔州、绥安、潼川诸郡亦相继恢复。□兵退保保宁，文秀追击之，斩俘四万余级。八月，定国举兵出楚，遣马进忠、冯双礼北取长沙，召张光翠出宁乡，进复常德。十月，进忠略地岳州，及嘉鱼、咸宁，所至披靡；别遣军克袁州、瑞州、临江，攻永新、安福，下之，遂围吉安。兵出凡七月，复郡十九，州五，辟地将三千里，军声大振。定国驻衡州，下令所司粪除端皇帝潜邸宫殿，为望幸地，今上以十月十九日诞辰，定国率绅吏、将佐、耆民诣邸宫班朝拜贺；届冬至，复趋宫行礼。未几，□定远大将军敬谨亲王尼堪率八贝勒、三固山，精锐十五万，声称三十万，犯湖南。岳州守将马进忠、长沙守将张鹤松俱败于□兵，定国趋援不及，军衡州。□兵压至，乃设伏蒸水，遇□兵佯败走，尼堪自率军追之，伏起，斩尼堪于阵。获尼堪七宝金兜、牟揭金顶、交龙绣纛等，□兵溃乱，定国乘势追杀。□军之暴淫，楚人已怨恨刻骨，乘其败走，沿途截杀，先后共斩首三十余万人，定国追至岳州而止。传尼堪首于安隆，表请献馘告庙，帝嘉其功，勅授招讨大元帅，总督各省军务。□君臣闻警，上下震动，闻定国名，股慄战惧，有弃湘、粤、桂、赣、川、滇、黔七省，与帝媾和之议。是时，白文选自辰州至武冈，定国轻骑返武冈会之，筹进攻武汉、会师应天、接通七闽之策；而孙可望以定国擒斩两王，连复楚、粤诸郡，兵力益强，功驾己上，忌之，乃托辞邀赴沅州议事，将图杀之。三昼夜书七至，定国意将行，忽刘文秀之子密遣人告其谋，定国遂止，涕泣曰："盗贼终不可以共事也，然我仍以君子长者之心待之。"乃致书可望曰："天下为吾辈扰乱之，自吾辈恢复之，己功不抵罪，今虽大局稍有转机，而敌势方张，成败尚未可

逆睹，正吾侪同心协力，共策兴复之秋，不宜妄听谗言，自相残害以败坏国家，愿明公深长思之。耿耿寸衷，指天为誓！”可望得书怒曰：“滇蛮其以忠臣义士自居，而致我于何地耶？”乃进兵攻定国。定国由靖州次宝庆。□兵侦知其自相内乱，遣贝勒齐吞等率师入湖南，定国以张霖御之于岳州，败绩；遣马进忠御之于益阳，不利，败走辰州；冯双礼御之于衡州，再败，退保武冈。孙可望亦为□兵击败于周家坡，遁还贵州，尽杀宗室之在黔者。□兵遂陷衡、永、武、靖、辰、沅、黎平诸郡，民死者将百万人，定国精锐亦挫丧殆半，退屯柳州。适马宝自高州遣使求援，定国乃命冯双礼、卢明臣等再振师出常德，攻长沙；刘文秀出江西，攻吉安；自率师援广东，出肇庆，克高明。围□平南王尚可喜于新（会）城，城中粮尽，杀马为食；□靖南王耿继茂率师救援，定国袭击之，退走三水。次日，帝遣使至，持敕制“屏翰亲臣”金印锡之，令定国统兵入卫，以清君侧之恶。定国接敕感泣，告使者曰：“此役战胜，则迎跸于肇庆或广州；不胜，则退保广西，迎跸于柳州或南宁。”使臣方返安隆，忽警报传至，□兵已陷桂林，屠戮一空，柳州亦戒严。定国哭曰：“真天不欲佑中国以兴也！”未几，珠玛喇等率兵十余万骤至，与耿继茂合兵攻击，会定国军中瘟疫盛行，士气颓萎，死病枕藉；方与珠玛喇军接，总兵李炳战殁。炳，贵阳人，何督师旧部也，从定国转战数省，所著战功最多。前军既覆，定国军亦溃乱，弃新会败走，民间男妇老幼、饥兵病卒共六七十万人从之，及于兴业县境，□兵追及，又失利于横州江。定国抚难民哀号失声，焚桥而去。□兵蹑之，定国率残众自宾州走南宁。于是广东南雄、韶州、肇庆、高、雷、廉六府三州二十七县及广西岑溪、横州等二州九县悉陷，俱被再屠。□珠玛喇下令“凡遇滇、黔军及附从定国者，杀无赦”，报桂林之役也。定国驻南宁，收集溃众，再作卷土之计。帝再遣兵部侍郎萧尹赍血诏命定国远入卫，定国号泣奉诏。先是，孙可望使白文选促帝移黔，文选以情告帝曰：“姑迟行，俟招讨至。”招讨，指定国也。定国自南宁入觐，晋定国晋王，定国辞不受，曰：“百败之余，已无颜见君父，对天下士民，何敢

滥膺国家宠锡乎!”帝强之，始拜受命。未几，□兵陷南宁，竟逼安隆，时守滇者为刘文秀，文秀遣使请定国迎帝入滇。定国乃与白文选奉帝自安隆卫走云南，以可望署为行宫，奉帝居之。具卤簿，立朝仪，建置侍从文武官吏，封文秀蜀王，文选巩昌王，贺九仪、王尚礼、王自奇等皆封公。定国请遣密使诏封郑鸿逵为定王，以明年夏会师南都；再遣使进王光兴、李来亨、刘体纯爵皆上公，期明年春会师荆州。李来亨等奉命自竹山出攻襄阳，复之，已而败走，退屯巫山。郑鸿逵、朱成功、刘孔昭由海道攻镇江，破之，遂围南京，不克，走入海。踰月，孙可望举兵反，犯云南，定国曰：“早不杀此獠，贻误到今，我姑息之过，百喙不能辞也。”乃与文秀帅师御之，至三岔河，战方合，其将马维兴先奔，归定国，一军瓦解，可望狼狈窜回。定国恐会城有失，遣文秀、文选追之，自引兵先还，遇可望将张胜于浑水塘，擒斩之。可望奔至贵阳，知人心已散，遂挈其妻子至长沙，降于□洪承畴军前。洪承畴得可望为向导，奏封可望义王，请□兵大举攻云贵。□遣宗室罗托等由湖南，吴三桂墨勒根等由四川，固山卓布太由广西，满汉兵共三十余万，分三路犯云、贵，洪承畴则自率大军殿后。时蜀王刘文秀已薨，定国使刘正国、杨武守三坡、红关诸要隘以防蜀；马进忠守贵州。会王自奇、关有才叛，定国自将击之。罗托自镇远攻入，连陷黄平、清平等州县，定国不及援，卓布太遂破黎平、南丹、那地、独山诸州，进逼贵阳，进忠大败，贵州遂陷。吴三桂至三坡，刘正国拒战亦失利，□兵陷遵义，屠之；再陷铜仁，屠之。时□军三路俱于贵州。□信郡王铎尼之军亦至，会于平越府之杨老堡，戒期犯滇。定国自与冯双礼扼鸡公背，图复贵州；使白文选守七星关立营，图复遵义，以牵制吴三桂。三桂出遵义趋天生桥，由水西直捣乌撒，文选兵大败，退保沾益州。卓布太至盘江，定国遣总兵王德祖扼之不得渡，泗城土府岑继禄叛，诱□军从下流潜师宵济，遂陷安隆，总兵张骐死之。骐，嵩明人，定国军中骁将也。定国使副将张成均、参将吴子圣救援不及，成均战死，子圣败走，定国自据双河口，亦大败，部将刘世德、王康福、萧翊赞、李远、龙鸣凤、李

世助、刘隶元、聂玉顺、邱子馨、倪凯、包有爵、王琏、阎天锡等三十余人俱战死。远，定国义子，毕节卫人。罗炎凉水井大营亦陷，定国妻子家属被卓布太执获杀之。定国撤寨易服走，留总兵李永成，副将李春铭、陈玺断后，亦战死，僵尸遍野，腥血成渠，兵民死事不下三四十万人，皆十一年来湘、桂、川、滇、黔之精锐，百战所义成之者也。定国入会城，请帝出奔，行人任国玺请死守，定国曰："行人议是，但前途尚宽，今暂移跸，卷土重来，再图恢复未晚也。"于是川将陈建猷等举蜀王文秀遗表请幸蜀，定国曰："蕞尔建昌，何当十万人之至，不如南走，缓出粤西，急入交趾。"议尚未决，警报迭至，临沅、广南、河西俱陷，沾益、马龙已屠，□近逼宜良、嵩明、通海、昆阳一带，四处难民负父母、携妻子奔赴会城者，哭声震天地，道为之阻。沐天波献议曰："事急矣，自迤西达缅甸，其地粮糗可资，据大理两关，犹不失为蒙段。"帝可其议，遂发滇，时永历十四年十二月十五日也。兵民男妇老幼马步从者百余万人，自古奔播，未有若斯之众且惨者。庆阳王冯双礼谓定国曰："某与公俱生于滇，公辅帝西行，图后再举，为其难者；某愿死守会城，与城存亡。"定国涕泣遂留之，□兵陷会城，双礼被执，械送北京。时定国以重师殿后，并收抚难民，至楚雄，留王国勋守之，□兵追至，国勋战殁于普溯，楚雄全郡遂陷。定国至大理，请自坚守以为后备，许之；未数日，白文选率其部下溃兵至，愤涕叱定国曰："人主以全国全师恢复宗社之重任付托于公，一旦至于此，谁执其咎？公于遮炎河固先走矣，其见无数万人民，怆天呼地，悉莅锋刃之惨戮乎？"定国恸哭曰："事既如此，夫复何言，惟本此孤忠，死而后已——以报君父，以结此残局。"文选曰："帝行矣，请公先行。"文选留后，定国遂行。□追兵至，文选御战于龙尾关，又战于叮咀山，大败，死四千余人，由右甸入木邦，大理、蒙化、云龙诸郡县悉陷。□兵尾之，永平、永昌亦陷。定国渡潞江，设三伏于磨盘山，以泰安伯窦民望为初伏，广昌侯高文贵为二伏，总兵王国栋、李玉炳为三伏。□兵侦觉之，潜分兵先躁（蹂）伏处，民望举炮出战，三伏亦发炮趋下救之，战于山上，

短兵相接，自卯迄午，僵尸堵叠，民望死之；定国自督溃众据险以守，相持接战，斩□固山额真沙里布，并歼灭其军三千余人。无何，铎尼、爱兴阿大军续至；定国军死伤殆尽，力不能支，遂踰险走。问帝安在？知者曰："帝已由腾越西行，走入缅甸。"定国曰："吾焉从？从帝而追者及之，君臣俱死无益也，姑他往以图再举。"遂奔孟定。过耿马、猛缅，孟艮不附，移兵灭之据其地，檄调诸将，稍稍定。广国公贺九仪以全师自广南渡九龙江赴之，军声复震。定国乃遣咸阳侯祁三升入缅迎帝，不克济而返。白文选在木邦，闻定国抚有孟艮诸地，并得九仪之众，乃为书邀之，定国遂西，会文选于邦弄，同入缅迎帝。缅人集兵十余万，御于锡波江，定国谕之曰："闻汝酋长已投诚于吴三桂，吾特为迎帝而来，帝出即无事矣。"缅人不从，反兵相向，定国怒，誓众横击之，大败缅兵，遂渡锡波江，临大金沙江以袭缅城。缅人据险以守，月余，军饥疫作，死亡相继，不得已还军，返景线。有蜀人马九功者，自古剌遣使至，云已集众得四千余人，愿相为掎角；又有礼部员外郎江国泰者，陕西人，从帝奔缅，已入缅界，途遇□军截击，绕道流入暹罗，说暹罗遣使达定国，愿与定国连姻，效顺助兵，并助金银粮币。定国喜曰："天其尚欲吾成大事耶！"乃遣副将刘子远率八百人赴锡波江沿岸，伺察缅人动静，以遥卫车跸；自则决计率师出滇、桂，乃传檄远近士民，号入（徼）外诸土司，并遣密使由海道通朱成功。有总兵许名臣、沅江土府那嵩及沐忠显等十余起应之。忠显，天波子也。永历十六年十二月初二日为帝被执之日，是日景线一带地方，烈日正中，忽暴风黑雾大集，飘屋瓦翻空如鸟状，移时霹雳动荡，天地昏沉。定国已知为不祥兆，逆料上驾必有变，未十日刘子远警报至，白文选骤染瘴疠暴卒，其众为□兵胁降；吴三桂兵抵晚香坡，帝已被执之去。定国闻之，叫绝大哭曰："恢复事尚可为乎？负国负君，何以对天下万世！"披发徒跣，号踊抢地，两目皆血泪，不食七日而薨，时年四十有九，明亡。古剌、暹罗之兵，亦失望而返。遗骸葬景线。未几，吴三桂遣兵至孟艮，收其妻子。定国长子溥兴，遮炎河之败，已为□兵执获杀之；少子润兴，尚在

抱，传闻为其部将许姓者，潜奉之入腾越，改姓段氏；其次子嗣兴，蜀王刘文秀少子震并诸将士之眷属，共万三千余丁口，悉被拘之入会城。踰年，昆明张锜，大理张义泰、梅阿四，腾越尹士镳，武定张发祥，安宁鲁家柱等于会城起兵，不克，死之。又踰年，嶍峨王扬祖、王朔，新兴王耀祖，罗平诸生周羲，蒙自李世藩、李日森、李世屏，八寨李成林，枯木龙元庆，倘甸叶向阳、叶正昌，石屏龙飞扬、龙韬，弥勒沈应麟、昂复祖、王承祖、王先任、王先伦，陆凉资洪，沾益诸生秦家鼎，潞南诸生秦祖根，平彝贡生刘汝襄等大举起兵，众至十一万人，复临安、蒙自、嶍峨、宁州、易门、弥勒、邱北、通海、石屏、宜良、沾益、平彝十余州县，乃不克，死之。要皆定国忠义所感召之余波云。

按：刘彬先生，旧志载彬字玉章，云南永北人。父如冰，官总兵，从永明帝出奔，帝被执，遁塞外，彬往返数万里奉之以归。彬隐居，苦力著述，年八十余始卒。彬兄范，字正木，亦工诗文云云。

李定国　刘文秀　白文选

查继佐

李定国，伪西张献忠义子也。长身，有文儒气象，谦恭下士，兵律精。甲申，献忠陷蜀，僭号；迄丙戌，拒北师于西充县，大败凤凰山，阵死。献忠义儿十：其一为平东将军孙可望，最枭；定国次之，为安西将军；而抚南将军刘文秀，定北将军艾能奇，又次之，合效献忠不解。可望势张，常走使三将军，时令其都督白文选、冯双鲤等南陷重庆，遂由遵义陷贵州。会云南土司沙定洲与其妻万氏猝叛，据省城，走黔国公天波于雄、洱，天波与海道杨畏知合力拒守。可望诡称援师，释贵州，兼程进，解定洲之围，定洲遁守佴革龙。可望据有云南，令定国分攻缅甸及

小西天等国，凯归，可望乃自称平东王，铸“兴朝通宝”，建宫殿，设府部各衙门。原御史任僎，拥戴力，立授礼、兵二部尚书。三将军以素俦伍，亦率自主，不相下。可望尝以事缚定国挞之演武场，定国更心恨，以所部出捣叛贼沙定洲，平之，势稍振。杨畏知初攻可望，败见掳，说可望翼赞明室，可以詟众。时越、闽连复，桂藩永明王建号肇庆矣。可望遣畏知等入觐，稍露内款之意，会武康伯胡执恭以桂命屯泗城州，西防黔，内震，辄便宜招抚，竟矫作册命封可望为秦王。册中有云：“秦王总统天下兵马钱粮，节制诸文武，以监国亲王体统行事，朕尊礼如古仲父。”仍铸秦王印以给之。乃密疏以请，可望迎受，亦颇知非真，故令礼部誊黄，始用永历年号，自称监国秦王臣，表谢修贡；复布告云、贵、楚、粤诸勋贵。畏知意，善用可望，毋内自树敌，度情势不能不如前封。廷臣袁彭年、金堡等执不可，督师堵胤锡更苦口，遂改封可望为平辽王，赐名朝宗，定国、文秀等皆公爵。可望耻再命降封，不受，并挟定国等不得受公爵。廷论逮执恭坐以擅制之罪，执恭沮泗城不至。时定北能奇死，可望并有其军，益张。庚寅冬，可望北陷遵义，复据贵州，督师何腾蛟、瞿式耜、堵胤锡诸兵屡蹶，主奔南宁，可望遣其部贺九义、张明志赴南宁护驾，必胁秦封。阁臣严起恒，督臣杨鼎和，科臣刘尧珍、吴森、张载志等，抗疏不许，九义使盗杀鼎和，私击起恒水死，并杀尧珍等。主不得已，乃真封可望为秦王。畏知廷论九义擅贼杀大臣，方办事东阁，可望袭执至黔中，杀之。壬辰，定国以其所部五万人出靖州，可望恐定国挟主而东，使冯双鲤、马进忠，名曰共事，实相制，定国涕泣感之，咸愿执鞭从。可望使定（郑）国迁主安龙府，钱粮兵马，咸簿主之。定国至湖南，连破靖、沅、武冈诸州，战北师黄沙，尽掩其众。可望心忌之，疏请封定国西宁王，文秀南安王自功；定国以可望请，谢不受。可望阴令双鲤猝击定国，早为定国所觉，可望乃善护定国家口于云南，修好。秋，定国乘胜指粤西，北师定南王孔有德迎战严关，箭洞李鰕，死，有德退保会城。城破，王闭宝玉妻妾焚之，因自刭。遂下广西，获金印一，金册十，掳有德子庭训。时北帅平西

王三桂已尽收川南郡县，南安王文秀同白文选攻保宁，不利，单骑还，可望请夺文秀王爵示罚。九月，定国取衡州，时号令所及，方数千里，不复奉可望约束。可望出沅，取辰州，檄定国北追，不听；复令刘文秀攻常德，不利，文秀归守云南。冬，北帅敬谨王攻衡州，定国败；王追之，中流矢，死，兵五千溃。定南既无嗣，王姑护军，师大至，定国单，弃衡州保永，复退保武冈。癸巳，定国走援广西，可望战北师花街子，败，不进，定国势亦沮。桂林守者空城走去，北将线国安坐有之，可望召定国不至，退守贵州。时主行在安龙，大困，宗室被残几尽。主与阁臣吴贞毓等暨内监张福禄、全为国，密议驰封定国为晋王，俾疾以师迎驾。文安侯马吉翔故与可望昵，出之南宁祭陵。吉翔微知迎驾事，走报可望，可望忌，令郑国併缚吉翔就安龙讯，勇索建议首事，主讳之，曰："内诸臣必不敢，或外伪为之。"国擅械系贞毓，以兵入宫，执二监酷拷，贞毓声数可望不臣，身秉衡，走约定国讨逆是实，他何与？于是罗织十八人姓名勒决。科臣张镌，内监福禄、为国，坐凌迟；词臣蒋乾昌等，台臣李欣等，部臣徐极等，皆弃市；贞毓以大臣，赐自裁；咸慷慨赋诗尽。定国以桂林不守，觊立功自赎，疾捣东粤，直薄清远，移屯七星岩，颇怀内顾，粮尽而归。力援平乐，复攻桂林，不利，退保南隘。乙未，定国克浔州，冯双鲤以可望指，且阴图定国。定国曰："我尔总以效死明，果不失初意，从我入粤东，功不朽；必欲相逼，定国愿自沉以明志。"众感激，双鲤遂以三千人为先锋，东破高、雷、廉三府，败北将郭虎，尽歼其众。虎单身走广州，复领兵守高明，定国分兵二道：一天威营，攻肇庆不下；一义胡营，破高明，执虎，亲解缚与之盟，虎诺，复叛去。三月，身率大师破杨春，六月围顺德，守严，不得入。常一试其所有地，题用"一匡天下"，自负以为仲父复出。善用象战，象十三，俱命名，封以大将军，所向必碎。王兴者，壁文村，以其众降定国，乃分困顺德水门，而定国自营三门。北平南、靖南二王援师至，不见定国一兵，惊曰："四面下子矣，且退。"有副将语王："此退必尽于江，不如死仗。"果死仗得脱。自是数月不接一矢。城中饥，垂

破者数。十二月，满兵来援，故匿上骑，令步卒突象，象进而骑间出定国阵后，定国败，弃象走还阵。是日，兵初出，象受酒犒，不谢而哭，顾已知不利。北师尽驱诸象入城，一象悲鸣不肯就食，数日死。两王乃以书招定国，答书凛凛忠义动人听，有云："大夫同心相与共猎中原可也。"还南宁，遵密敕奔护安龙，马叩府不进，箠之，必不进，三易马，率如是，定国异之。有金中书者告曰："此真主国门也，人臣不得骑入。"定国憬，遂入行宫。主与后及太子等尚以为可望所遣，令勋卫马见明下阶迎之，定国俯伏谢曰："臣非从秦王来。"主喜，赐绣墩，坐定国，语次欷歔。定国密誓，必诛可望以效命，背出所镌"尽忠报国"四字示廷臣，咸啧啧忠臣。可望疾令白文选伺安龙，迫驾移黔，合宫恸哭不行，文选亦为泣下，遂善报可望定国无他志。已，定国扶主西奔入滇，文选又奉可望檄促邀驾曲靖，不得身与俱西。时刘文秀暨都督王尚礼、王自奇、贺九义等，咸为可望守云南。文秀私出见定国，微语："吾辈以秦王为董卓，但恐诛卓之后，又有曹瞒。"定国指天为誓，乃合计，倡言迎驾本秦王意，宣一力为之。桂王入云南，定国躬为御舆，主即可望所营宫室居之，尽收其护卫。于是封定国为晋王，文秀为蜀王，艾能奇子承业为镇国将军，管延安王事，文选为巩国公，尚礼为保国公，九义为保康侯，文安侯吉翔入阁办事，钱粮归所司，兵马事悉付定国主之，更定各隘居守。可望以妻子在云南，隐忍未发。主遣文选往黔招之，不至，随令东昌侯张虎送可望妻子赴黔。可望无内顾，遂大言定国、文秀谋反，追文选巩国公敕印，决意攻滇。列侯马宝、马惟兴等为文选曲解，受封云南非其意，不如重用之，必感恩勿二。可望信之，擅封文选为征逆招讨郡王，总统兵马，名"清君侧"，令双鲤守黔，而亲押阵。次交水，文选不战，走归定国，定国请进封文选巩昌王，遣内阁马吉翔视师。丁酉九月，定国、文秀师至三岔，距交水二十里，可望以总统中变，拟还黔，马惟兴语可望，公自将当定国，而惟兴与宝及汉川侯张胜由寻甸间道袭云南，可得志。已大战交水，惟兴内应，可望兵溃，遁还黔。时秦王所部率枭健，定国涕泣语之，明造颠越，实自吾家，至此

犹不悔，天必尽殒之矣。则可望所遣马宝亦降，众尽贴。独张胜孤军，突云南不备，保国尚礼思开门入之，为黔国沐天波所觉，不得发。定国以胜兵还救，掳胜，□□□□□尚礼饮鸩死。主封冯双鲤庆阳王，马进忠汉阳王，马惟兴、马善、贺九义俱进封公爵。德安侯狄三品，岐山侯王会，荆江伯张光翠，以党附可望，降罚有差。戊戌，刘文秀病卒，夔国公自奇以永昌伯关有才叛，定国率兵诛自奇于永昌。可望微通北师，以兵三千捣武冈，为部将刘甲反攻，歼殆尽。戊戌四月，可望遂同陈总兵满兵五万，身为导，入贵州，定国弃城走。可望遂因陈总兵北降，得封义王。十月，北师从贵阳睨滇，妖人贾自明者有幻术，定国恃以无恐，与双鲤等扼守盘江沙，而白文选守七星关，咸败绩。十二月，奉主走永昌。己亥正月之二日，北师入云南。二月，主走腾越，定国先护宫眷出三宣入缅，还督兵扼磨盘山，力战，颇有摧陷，然人心已散，竟不能支。逃入孟艮、茶山各土司中，奉表请跸者数，阁部吉翔重迁留缅。辛丑，桂主及难，白文选遁木邦，久，北归。定国卒于徼外。明年，定国子嗣兴、文秀子震咸北归。

论曰：李晋国归命后，战功较周宁武、尤榆林等胜势十倍，复严关，殒定南；恢粤西，摧敬谨；一再难东粤，无与衡。护安龙，定内难，□□穷地促，挟空名而偷息天外，较中湘又十倍难矣。□□定国与巩昌□文选，以所部屯孟艮，疏请主幸其营者数十上，至令部将祁通武以兵逆驾，而主惑阁部马吉翔之言，不果发，至辛亥，□康王以番众窥边，岂犹其遗旅乎？抑北平西吴诡此以自重乎？

（录自《罪惟录》传卷九下）

李定国

查东山笔　沈墨庵阅

李定国，不详其原籍。初与孙可望、刘文秀、艾能奇并为流贼张献忠义子。甲申，献忠陷蜀，迄丙戌，拒北师于西充县，大

败凤凰山下，阵死。定国虽在贼中，不轻杀戮，绅士常被俘，每曲全之；以不合献贼意，故精锐尽属可望，雄于三家，咸听约束。可望令其部白文选、冯双鲤南陷重庆，由遵义略取贵州，遂据有云南。令定国率所部攻取缅甸及小西天等国，凯归，可望乃自称平东王。尝以事辱定国，鞭之演武场，定国更抱隐痛，以所部出捣叛寇沙定洲，取之，势稍振。当是时，诸营各相雄长，初无心于明室。值越、闽连复，桂藩建号于肇庆，改元永历，定国中有感动，语其下曰："我等倡乱，图自全计，初非妄度天命；不意明室因是复亡，以今观之，即当翼赞明藩，复盖前过，无为后人所讥。"顾未得其会。适雄洱道杨畏知为可望所拘，因说可望曰："王与三将军比肩并起，不借虚名，无以耆众，昔曹孟德奉迎许都，挟天子以令诸侯，由是得志，今桂藩在肇庆，王其无意乎?"盖欲借可望以为用也。遂遣畏知入觐，稍露内款之意。庚寅冬，北师入楚，楚督何腾蛟、粤西留守瞿式耜、粤东阁部堵胤锡三路师徒屡蹶，国主奔南宁，可望遣贺九义至南宁必要秦封，廷臣不许，九义擅杀诸大臣，卒邀秦封而去。壬辰，定国以其所部五万人出靖州，与众约，不得劫夺民间财物，部伍始肃。可望恐定国挟主而东，使冯双鲤、马进忠名曰共事，实相制，定国泣涕语二人曰："某志在扶明，非徒假借名义，倘彼此嫌疑，将军其何以自立?"双鲤、进忠咸感其义，曰："我二人愿执鞭以从。"定国至湖南，连破靖、沅、武冈诸州，与北师战于黄沙，尽掩其众。可望益忌之，疏请封定国西宁王、文秀南安王，自为功；定国以可望请，谢不受。可望阴令双鲤猝击定国，双鲤阳听之，不即发，早为定国所觉，可望乃善护定国家口于云南，修好。秋，定国乘胜指粤西，北师定南孔有德迎战严关，□□李虾箭洞死，有德败，精锐略尽，退保会城，定国引师围之，城破，定南急闭妻妾宝玉焚之，因自刭。遂下广西，获金印一、金册十，掳有德子庭训，诛之。噫！有德自北归后，引满师渡海，入登莱，破济南，抚按以下，残杀过当，晏然而去，普天痛愤饮泣，计戊寅迄壬辰，逾十五年始得伸积愤于李王也。时平西王三桂北师，已尽收川南郡县，南安刘文秀同白文选攻保宁，不利，

单骑还。九月，定国由粤西入楚，取衡州、永州，时号令所及，方数千里，远近响风，无不引领，不复奉可望约束。冬，北师敬谨王来攻衡州，定国邀伏于险，大胜，敌急退，追之，王中流矢死，溃师五千尽歼焉。孔有德既绝嗣，王姑护军，率师大至；定国单，无援，弃衡州，保永州，复退保武冈。癸巳，定国走援广西，可望战北师花街子，败，不进，定国势亦阻。桂林守者空城去，北将线国安坐有之。时主在安龙，大困，宗室被残几尽。廷议欲封定国为晋王，俾疾以师迎驾。语泄，主议者为可望所杀。定国以桂林不守，冀立功以自见，疾捣东粤，直薄清远，辄得小胜，移屯七星岩，颇怀内顾，粮尽自归。复力援平乐，攻桂林，不利，退保南隘，敌亦不敢迫。乙未，定国克浔州，冯双鲤以可望指，且阴图定国，定国曰："我尔总以效死明室，果不失初意，从我入粤东，功且不朽。必欲相逼，定国且死，公独能北御得保首领乎?"众闻之，皆感激。双鲤遂以三千人为先锋，东破高、雷、廉三郡，败北将郭虎，尽歼其众。虎单身走广州，复领兵守高明。定国分兵二道：一天威营，攻肇庆，不下；一义□营，执虎，亲解缚与之盟。虎诺，复叛去。三月，身率大军破杨春，六月围顺德，守严，不得入。分略属邑，皆下之。尝一试其所有地，题用"一匡天下"，自负以为仲父复出。仿昔者滇南象战法，象十三，俱命以名，封大将军，所向必碎。有王兴者，壁文村，以其众降定国，乃分困顺德水门，定国自营三门。北平南、靖南二王援师至，不见定国一兵，大惊曰："彼四面下子矣，且退。"有副将对曰："此退必尽于江，不如死仗。"(北以战为仗)果死仗脱，死者几半。自是月余不接一矢。俄而两王复调重兵至，其势甚盛，定国故匿上骑，用步卒进。北师驰之，卒左右避，突出象，蹴踏腾越，敌骑惊仆，大军乘之，死伤遍野，获器械无数，所得辎重，尽以犒军。自三月出师，六月围顺德，九月释围，与援师相持，城中久饥，垂破者数。十二月满师又至，我军骑象而前，敌不战退，猝以精骑间出我军后，后阵乱。定国弃象走，还阵，虽所伤不多，按兵不动，顾失象。是日兵初出，象受酒犒，不谢而哭，已知不利。北师尽驱诸象入城，一象悲鸣不肯就食，

数日死。二王乃以书招定国，答书溧溧，有云："大王中国旧人，倘同心相与共猎中原，得地分王，遥护共主可也。"乃还南宁。遵密敕奔护安龙，控马行在门，马不进，箠之，必不进，三易马，率如是，定国异之。有金中书者告曰："此真主国门也，人臣不得骑入。"定国憬然，逐步入行宫，主与后及太子等尚以为可望所遣，令勋卫马见明下阶迎之。定国俯伏谢曰："臣力战粤东，以致失觐，非从秦王来。"主喜，赐绣墩，坐定国，语次欷歔。定国密誓效命，背出所镌"尽忠报国"四字示廷臣，咸感叹其义。可望令白文选疾赴安龙，迫驾移黔，合宫恸哭不肯行。定国扶主西奔入滇，文选亦与俱西。时刘文秀等守云南，闻驾至，文秀私出见定国，潜语："吾辈以秦王为董卓，但恐诛卓之后，又有曹瞒。"定国指天为誓，乃合计，倡言迎驾桂主，遂入云南。定国躬为御舆，主即于可望所营室居之，尽收其护卫。于是封定国为晋王，文秀为蜀王，封能奇子承业为镇国将军，管延安王事，文选为巩国公，王尚礼为保国公，贺九义为保康侯；交安侯马吉翔入阁办事，钱粮归所司，兵马事悉付定国主之，更定各隘居守。可望以妻子在云南，隐忍未发。主遣文选往黔通于可望，以释其忿，随令东昌侯张虎送其妻子赴黔。可望既得家属，无内顾，遂大言定国、文秀叛逆，追夺文选巩国公敕印，决意攻滇。列侯马宝、马维兴等为文选曲解："不如重用之。"可望遂擅封文选为征逆招讨郡王，总统兵马，名"清君侧"。令冯双鲤守黔，而亲督阵。次交水，文选不战，率所部走归定国，悉得可望阴谋。定国请进封文选为巩昌王。丁酉九月，定国、文秀师至三坌，距交水二十里，可望以总统兵变，失势，拟还黔。马维兴诡语可望："公自将当定国，某与宝及汉川侯张胜，由寻甸间道袭云南，可得志。"已，大战交水，维兴复内应，合于定国。可望兵大溃，遁还黔，维兴所部率枭健，定国涕泣语之："明造颠越，实自吾家，凡首难者不终，今犹不悔，天必尽殒之矣。"于是马宝亦归附，众尽贴。独张胜孤军突云南不备，王尚礼思开门入之，为黔国沐天波所觉，不得发。晋王以重兵还救，擄胜库水塘，斩之，尚礼饮鸩死。时冯双鲤舍黔来归，封庆阳王，马进忠

汉阳王，马维兴等俱进封公爵。戊戌，蜀王刘文秀病卒，夔国公□自奇，以永昌伯关有才叛，晋王率兵诛自奇于永昌。可望畏逼，潜通满营，以兵三千捣武冈，为部将刘甲反攻，尽歼其众以应晋，单骑得脱。四月，可望以北陈总兵盟，以满师五万，身为导，入贵州，晋王弃城走，可望遂因陈总兵北降，得封义王。十月，北师从贵阳睨滇，妖人贾自明者有幻术，在军中，晋王恃以无恐，与双鲤等扼守盘江沙，而白文选守七星关，相持三旬，力竭败绩，晋王奉主走永昌。己亥正月之二日，北师入云南。二月，主走腾越，晋王先护宫眷出三宣入缅，还督兵扼磨盘山，力战，颇有摧陷。然人心已散，竟不能支，避入孟艮、茶山各土司中，负险自守，奉表请跸者数，为逆臣所阻，竟留缅。辛丑，桂主及难，白文选遁木邦，吴平西遣使招之，遂北归。晋王李定国卒于徼外。壬寅，晋王子嗣兴、蜀王子震咸北归。

论曰：李晋王未归命时，已注心皇家，思返天物；及归命后，武功赫濯，胜势十倍。复严关，殒定南；恢粤西，摧敬谨；一再难东粤，无与衡；护安龙，定内难，足以经略中原，而大功未集，以可望内残，外款大敌，左支右折，天也；至势穷力促，挟空名而偷息天外，百世之后，犹想见其为人，岂以成败论哉。方其部屯孟艮，令部将祁通武以兵迎驾，而且沮于马吉翔，永历正朔终于辛丑，越十年辛亥，有康王以番众临边，岂孟艮犹有遗旅乎？抑平西诡此以自重乎？

（录自《东山国语·粤徼语》）

李定国

屈大均

李定国，字一人，初名如靖，绥德人。少为流贼张献忠所掠，献忠爱其骁勇，使与孙可望、刘若锜、艾能奇并为义子。献忠破陷四川，僭号，因号定国安西将军，可望平东，若锜抚南，

能奇定北，为四将军；与伪都督白文选、冯双礼、王尚礼、王自奇分统贼军为八营。隆武二年，清肃王帅兵至西充，袭杀献忠；定国等率溃众夺重庆江，平蜀侯曾英与战，败死之。永历元年，遂由遵义攻入贵州。会云南土司沙定洲与妻万氏叛，陷据云南，黔国公沐天波脱走迤西；定国等诡称援师，进屠交水及曲靖，定洲逆战于蛇花口，大败，定国等遂入云南。诸伪将欲推定国为主，尚礼不从，乃推可望，号为平东王，定国安西王，若锜抚南王，能奇定北王。建四藩府，毁呈贡、昆阳二城为之，而定国号曰西府云。可望既为主，乃自尊大，使定国等皆从掖门而入，执人臣礼。定国不能堪，倔强有言，每事与之扞格。可望与若锜等遂执定国于演武场，数其罪，杖之八十；既复相与抱持而哭，命定国取沙定洲以赎罪。定国心虽憾之，念相推奉已久，无能抗也。二年春，与若锜率兵至洱革龙，围之，生得定洲、万氏，磔于市。可望大喜，然阴忌其功，时加裁抑，定国由此与可望有隙。可望僭据云南，胁执天波，勒诸土司出兵输饷，兵势张甚。乃为黄屋左纛，铸“兴朝通宝”伪钱，造七曲篆印，设六部、九卿、科道等官，称“国主”。然亦嫌名号不正，无以厌服人心，故洱海道佥事杨畏知者，与可望善，因导之归命本朝，为桓、文事业。明年春，可望遣焦光启，定国遣潘世荣，偕畏知驰赴行在，献南金、文马，请得册封亲王。奏下廷臣议，大学士严起恒等固执不可，上乃封可望景国公，赐名朝宗；定国康侯，赐名如靖；若锜泰侯，赐名文秀；能奇信侯，赐名策勋。畏知固争弗能得。六年二月，定国自率所部五万余人出靖州，时上在南宁，可望恐定国拥上而东，使冯双礼、马进忠等与俱，因以制之。更使郑国迁上于安隆所，改所为府，以范应旭知府事，岁以银八千两、米百石进御，上及随行文武口粮皆请于可望而后发。应旭与提塘章应科造册内称：“皇帝一员，支粮若干；皇后一口，支粮若干。”其大逆无道多此类。定国至湖南，连拔靖、沅、武冈诸州，败清总兵张国柱于欧阳，尽降其众。宝庆既复，可望心嫉恶之，双礼等与争虏获，益相构。可望疏请封定国为西宁王，刘文秀为南安王（《明纪》作南康王）。定国不受，可望阴使双礼率兵

擒之，不胜，反为所擒。可望恐，仍善养定国家口于云南。七月，定国乘胜入广西，禅王孔有德迎战于严关，大败，桂林下，有德焚死。文秀亦率所部与白文选入四川，禅王吴三桂同固山额真侯墨勒根虾闻报，还守保宁；文秀与战，大败，单骑遁还，可望夺其王爵。九月，定国取衡州，楚、粤间残兵旧将皆起而应之，定国号令所及，方数千里，不复奉可望约束矣。可望率文选、张虎等出沅州，攻下辰州，使人催促定国进兵。定国不听，遣高文贵乘胜东下，敌将线国安、马雄、全节等溃走至梧州，三战皆败，复走封川。定国尽得其兵，西粤全复。安定侯马宝、永国公曹志建分攻临武、连山，皆复之；郧国公高必正率兵继至，攻复阳山；定国又复永川，遣偏师潜至吉安，亦复之，江西大震。方为下湖北计，禅王号敬谨王尼堪者，与战于衡州城下三日，定国伏而败之；马宝鏖战甚力，尼堪死焉。已而定国亦败，退守武冈。可望再招之，不听。明年二月（《明纪》作三月），定国复走广西，可望亲追之，遇敌兵于花街子，为固山佟图赖所败。文选攻常德亦败，可望乃命之还镇云南，而自扼守贵州，诛戮宗室遗臣，一时殆尽。三月（《明纪》作夏，《行在阳秋》同此），定国复从梧州东下，遂围肇庆，四十日而城不拔；会桂林、衡、永复陷，定国乃还，与敌战于桂林，总兵王之邦阵没，乃退保柳州。可望又招之，不听，遣兵从古泥怀远追之，八年三月（《行在阳秋》作二月），定国走至灵山，还军拒战，大破可望兵，因复廉州。至高州，故博兴侯张月开城应之，逐复阳春、阳江、恩平、东安、西宁五县；从罗旁、连滩，出屯端江西岸，别遣陈武渡琼州，攻复昌化、临高。九月（《明纪》作十月），定国至，擒敌将郭虎、杜豹，遂围新会。久之，城中食尽，略人为脯，死者男女七万余人，谓旦夕必降，按兵以待。十二月，清靖南将军朱马喇纛章京东拜等率兵大至，时定国分屯诸山，于峡口列巨象、红夷炮为阵，别以劲兵屯左山，为乘高骤下之势。敌惮其严整，挥骑上之，左山兵败走，炮喑不发，敌遂据左山，挥步兵分攻峡口，与禅王尚可喜、耿继茂分两翼进，群象惊走，自蹴踏营中，阵遂乱。定国走高州。九年正月（《明纪》作三月，《行在阳秋》作二月），退保横州，敌追

之复走南宁。是时，上在安龙已久，日益穷蹙，密敕召定国封为晋王（《行在阳秋》云：十一年正月，驾驻滇都，进李定国为晋王）。定国遂发南宁。可望使关有才御之泗城州，大败。定国未至，可望又遣叶应祯、白文选疾趋安龙，将移车驾入贵州，上未即行。明年春，文选阳为催促，而阴遣人迎定国，定国既至，上及两宫相庆再生，举朝欢跃。既陛见，呜咽流涕，伏哭不能起。留一二日，将奉车驾入云南。文选阳请小驻贵州，上曰："曲靖，滇、黔之交也，朕姑先移曲靖，庶于滇、黔可东西兼顾。"于是，文选先随定国至云南，守将王尚礼将拒之；刘文秀患之，阳与尚礼及王自奇、贺九义等（义，《明纪》作仪）密议守城，自以数骑驰见定国曰："我辈以秦王为董卓，但恐诛卓之后，又有曹操。"定国指天为誓，文秀乃迎上入云南。倡言："秦王尊上，我辈当尊秦王。"上因封文秀为蜀王，艾能奇子承业为镇国将军，管延安王事，文选巩国公，尚礼保国公，自奇夔国公，九义保康侯，马吉翔仍以文安侯入阁办事。遣文选赍敕贵州，慰谕可望；又封其所亲张虎东昌侯，使送可望妻子，赐虎金簪，令从中开导。虎见可望，乃言："上赐金簪，令我密行刺也。"明年，可望既得妻子，无复顾忌，遂大言皇上负义，定国、文秀谋反，因追文选巩国公敕印，絷之。其伪署列侯马宝、马惟兴等与文选谋反正，言于可望曰："文选受恩有年，在云南受封，屡辞不允，势不得已，今国主重加爵赏，用为总统，必然感恩图报。"可望信之，命伪兴国侯冯双礼守贵州，而封文选为征逆招讨郡王，总统兵马，可望亲赴交永，进围曲靖。上命定国、文秀御之。王师始至，文选夜以数骑来归，尽输情实，且言旧勋马宝、马惟兴等咸为内应。师至三岔，距交水二十余里，对垒未战；可望意云南空虚，乃使伪临潼侯武大定、汉川侯张胜及马宝，夜以精锐四千，从寻甸间道，猝袭行在。可望自将击定国，九月十九日接战，惟兴等果为内应，可望兵尽披靡，逃还贵州，全军尽降，马宝亦来归。惟张胜率兵直抵云南，已焚南关碧鸡坊，尚礼复为内应，闻可望溃败，将走楚雄与自奇合，沐天波觉之，携与入朝不得发。定国闻报，亟还，遇张胜于浑水塘，大战竟日，擒胜，磔之；尚礼服毒而死。时文

秀、文选追可望于贵州，未至，双礼给可望言兵已垂及，可望急挈妻子奔赴长沙，双礼断后，尽得子女玉帛以归。上封双礼庆阳王，文选巩昌王，马进忠汉阳王，惟兴叙园公，宝淮国公，九义广国公。其伪德安侯狄三品、岐山侯王会、荆江伯张光翠等，以党附可望，降爵有差。已而文秀病死，夔国公王自奇、永昌伯关有才等遂据永昌以叛，定国率兵诛之。可望既降清，得封义王，因以滇、黔地图为献，请为满、汉兵先导。十二年二月，吴三桂挂平西大将军印，偕定西将军固山额真侯墨勒根虾，由四川入；宁南靖寇大将军罗托，由湖广入；征南将军固山额真赵布太，由广西入；安远靖寇大将军信亲王多罗铎尼、我叛臣洪承畴等攻贵州，留守马进忠弃贵阳走。九月五日（《明纪》作七月），上命定国以招讨元帅同郡王公侯伯将军等出师，其衔曰："钦命专征、节制郡勋文武、提调官义兵马，赐黄钺、上方剑，便宜行事。"师至安顺，扼盘江，屯鸡公背，示攻贵阳；文选出七星关，屯生界，示攻遵义，以牵制之。十一月，三桂及沈应时、马宁等自遵义出，文选还守七星关，三桂于水西得奇道，由天生桥抄乌撒军民府，断我归路；文选疾弃关，焚可渡桥走沾益。定国以鸡公背战败，闻多罗铎尼中路兵大至，亦还守盘江。布太以奇兵自泗城突出安龙，抄我师之背，定国御之于罗炎河，大战三日，诸军悉溃败，遂失盘江。敌于是三路合兵，收我余军及战象，所至摧陷。定国奔还，奉上西幸永昌，百官仓促悉随幸，是时十二月之望也。上命文选留守玉龙关，扼永昌要路。敌入云南，开国公赵印选、卫国公胡一清、土司总兵龙世荣等皆降。十三年正月，驾至永昌。二月，敌会兵镇南，我总兵王国勋与战，胜之；文选与战，又胜之；已而皆败，国勋走死普洱（洱疑为洱之讹）。文选奔至澜沧江，烧铁索桥，敌编竹排以渡，永昌遂陷。上幸腾越，敌渡江急追，江瘴险恶，水气毒淫，敌多饮水死者。定国扼磨盘山，为栅数重，节节分伏，使平阳伯靳统武护驾出三宣、六慰以入缅甸。布太等以全军来追，及磨盘山麓，遇伏而败；益进兵，又遇伏败，死者万余。我泰安伯窦名望战死。定国复为火雷四十里诱敌，有卢桂生者泄其谋，敌遂有备。定国乃整军而去，腾越以陷。敌逾

南甸追之，军至孟村，为云南迤西尽界乃还。上遂入缅。定国与文选合谋恢复，承制概加土司勋爵，使为内应。九月，沅江土知府那嵩兵起，复维摩州，围临安府，全滇响应。嵩为定国密传敕印于诸土司，于是延长伯朱养恩与将军高应凤、总兵许名世、土司总兵龙赞阳等以次反正，与嵩合。三桂统满、汉兵，至石屏州攻嵩，土司总兵龙世荣率婿沐忠显出迎，尽以嵩谋告之，遂围沅江，逾月而城陷，嵩与子那岩阖宝自焚，敌屠其城，死者十万余人。嵩死，定国势孤，遂走木邦，文选亦走茶山。上在缅既久，定国拥兵在外，屡疏迎驾，乃马吉翔等苟安旦夕，且苦跋涉从军，请诏止之。定国不得命，兵至缅境，去而复来者数数，缅亦盛兵御之。十五年二月，文选疏至，谓："诸军不敢速进者，恐开衅惊驾，必诸臣奉上而出，势始万全。已作浮桥，必渡河矣。"诏又止之。九月（《明纪》及《行在阳秋》均作五月），缅酋弑兄自立，以计诱我文武诸臣，自嵩滋王以下至皇亲、公、侯、伯、部寺诸曹、内监尽杀之，死者五十二人（《明纪》作四十二人，《行在阳秋》作三十余人）。十二月三日，缅头目数人忽拥上及太子三宫，出关献敌，敌奉上还云南。十六年四月，上崩，太子亦遇害。定国闻之，日夜哭，移屯葫芦山口，将分东、西二军以屠缅甸，而兵少粮空，诸将校率俘降且尽，疽发于背，恸哭曰："万古君臣之变，至斯极矣！予能出皇上于安龙，而不能出皇上于缅甸，岂非天哉！岂非天战！予之罪无可赎矣。"吐血数升而死。子嗣兴与刘震、白文选遂出降敌。（《明纪》作十五年十一月白文选自木邦降。）敌封嗣兴归命侯，震归义侯。震，文秀之子也。

（录自《皇明四朝成仁录》卷十二）

李定国传

淝水奈村农夫

李定国，延安人，与孙可望、刘文秀、艾能奇，俱少从八大

王张献忠为流贼，献忠儿畜之，冒姓张氏。献忠僭号于蜀（称大西国龙凤元年），置平东、安西、抚南、定北四将军，而定国以安西为号。八贼死，可望等至重庆，杀曾英，南走綦江，众无主欲散，始相与尊可望受约束。可望为人狡猾多术，饰智以御侪伍，众咸推其能。丁亥正月陷贵州，云南有沙定洲之乱，龙在田、许名臣（楚人）迎可望兵入曲靖，自昆明迤西、迤东，悉分师略地。闻清师下闽，隆武皇帝被执，在籍御史任僎倡议，尊可望为“国主”，设六卿，以干支纪年，铸“兴朝通宝”钱，可望欣然欲帝制自为矣。群盗本起等夷，以一时无主，权相统属，非心服也。李定国为人忠直，赋性精悍，尤倔强。多不悦可望所为，每事相抵忤，可望阴怒之，假以他故，执定国于演武场，杖之，既起持而哭曰：“我以大义辱吾弟，此后改之，相与共济大业，勿相戕也！”定国谢之，请往擒沙定洲以赎罪，由是恨可望。己丑，杨畏知说可望归肇庆，朝永历皇帝，请封王以镇滇、黔。定国曰：“我自为王，安用所请？”可望曰：“封爵出自朝廷为真，今皆假号尔。”定国曰：“果尔受封，便为朱家臣子，不可又复作贼也。”胡执恭自思恩入滇，矫封可望为秦王，可望始奉正朔。未几肇庆败，永历走南宁，可望以秦封非真，归怨执政，使贺九义贼杀严起恒等于南宁。庚寅，迁帝于安隆所，以兵守之，凌逼百端，无复人臣礼。可望骄蹇，上帝书云：“人或谓臣挟天子令诸侯，不知彼时尚有诸侯，诸侯亦尚知有天子，今天子已不能自令，臣要挟天子之令以令于何地？令于何人也？”其放纵无君类如此。定国见其强横，益深恶之。壬辰，定国出兵东攻靖州、武冈，皆克之，败清兵于严关，斩定南王孔有德，擒叛将陈邦传（傅），送行在诛之，复地至桂林府，诏封定国为西宁王。北取衡州，胡一清、赵印选、马宝、曹志建相率来归，军声大振。冬，清帅敬谨王战定国于衡州城下，定国败，敬谨王自率锐骑追之，去大军十里，遇伏兵发，以火器杀王，取其首去。定国次武冈，不受可望约束，可望怒，自至沅州，使人邀之议事，将杀之。定国知其诈，不赴会。定国回广西，可望率兵追之，不及，途遇清帅佟国赖，与战，可望败，引还。其冬，帝遣林青阳、周官赍诏

定国入卫，封为晋王，锡以银章，文曰“屏翰亲臣”，定国受诏，读之流涕，军中皆奋臂泣下。定国念与可望昔为兄弟，不忍轻发。可望闻之，怒。明年，可望使人杀大学士吴贞毓等十八人，责其矫诏封定国也，定国深恨之。其冬出师，高、雷、廉皆复；攻阳春江，下之，进围新会，攻之八阅月，城中粮尽，守将屠居民食之，定国不能拔。会平南王尚可喜救之，定国与战，自午至夕，城中兵鼓噪出，败绩，收兵回南宁，闻可望跋扈日益甚。可望遣白文选迎帝入滇，文选陳（陈）兵于安隆，列十三营，兵万人，上及从官皆惶急，日夜望定国至。定国驰来，去安隆五里而驻军，望见文选营垒曰：“我兵少，当以计取之。”选壮士十三人趋营前，诈其出迎曰：“王来！”营校不知，但见一人呼王来，急趋出，尽挟十三校而回。城中尚有白文选，定国曰：“文选强，武人，我自当之。”文选立雉堞间，遥呼曰：“西府不畏我箭邪？”控弦矢发，矢无镞。定国笑曰：“吾奉大义来，公若以不义杀我，我何畏焉！”文选曰：“我岂不义者！”乃迎定国入，帝左右尽欢呼。上垂泪曰：“朕忍死待王来久矣！”遂奉帝入滇。刘文秀来谒帝，诸将谓定国曰：“今秦王董卓也，王为义举，我辈来从，尤恐董卓之后，复有曹瞒！”曰：“公等视我肯作操者乎？”指天自誓。诸将士迎帝入云南城，帝遣张虎送孙可望妻子于黔。明年秋，可望自黔举兵内向，其下白文选、马惟兴、马宝皆归定国，可望遂奔长沙经略洪承畴军前投降。于是定国、文秀并居云南，而事权悉归定国。而定国于“四将军”中与能奇并以勇猛称，而能奇已先死。楚、粤之役，连陷十数城，杀两藩王，其党亦严惮之。定国性伉直，与人无私，回滇大矫可望之失，事帝尽礼，供帝极丰，不以威凌士类，人以此重之，然计虑筹画少次可望。既柄国，记室金维新，滇人也，官少宰，为定国所信任，群小争趋之，旧人失望多怨咨，于是王自奇等俱叛，诛戮频行，势亦渐衰矣。戊戌年，刘文秀亦死，大兵三路入云南，定国拒之，战于安隆之凉水井等处，败归，遂西走永昌。狄三品、张志明（明志）诱冯双礼，执之降清。顺治十六年己亥春，二月，清信郡王铎尼率师至潞江，定国伏兵于磨盘山，铎

尼兵至，前军入山，走盘道，遇伏尽死于火。洪承畴使人走间道，招得降者，知定国计，密白王，遣人缘山蹂其伏地，遇天雨，盘道不能纵火，清兵踰山及定国战，定国大败，走铜壁关结营，使高允臣报帝，为缅人所杀，不得达。定国再及清兵战，窦名望与王玺二人俱力战死之。定国走腾越，趋孟定，移军孟艮。吴三桂入七星关，文选与战溃走，三桂追之，又战玉龙关，郑文雄力战死之。文选走杉木河，出右甸，入镇康州，移军木邦司之南岛，不与磨槃山之战。初，定国约文选以兵来会，失期不至，至是定国、文选两军相邻，文选来谒，定国诘问失约故，颇尤之。文选曰："我非不来并力，因失道后期尔，王何责之深邪?"定国长吁曰："天也!"议及所向，定国曰："我兵入缅，彼苦供馈，必相拒于境，击之祸结，恐酿不测。不如择近边险要之地，暂息士马，益招集散亡，两人相为犄角，缅外惮吾两人，在内者则无恐；且得觇滇中动静，结连诸土司以为后图。"文选曰："两人俱在外，则在内者危，不如我入缅护卫，在外事，王自任之。"文选率所部由锡泊磨整入缅。定国知不与同心，移屯猛系（缅）数日，兵稍集。沅江土司那岜，与降将朱养恩、许名臣、高应凤等谋应之，事露，守滇者率兵围沅江，定国方与孟艮构兵，不能救，俱被杀。贺九义自南宁从间道奔至孟艮，妻子在滇，吴三桂使其妻作血书，付家人李启云至孟艮招之，九义受之，未告定国。定国势已败，见其党多降，益怀猜忌，金维新等皆杖死。有以九义事告者，因伏甲召九义饮，执而杖杀之，散其兵。于斯时也，人多犹豫，卒尽疲倦，众多怨之。裨将何起龙率之走至蔓谷河，入滇降。白文选抵拥会江，使人谕缅，皆被杀；因渡江击之，大败缅众。缅使人伪约许移城给之，阴召兵，兵既集，以大炮击文选营，文选不能支，且粮尽，乃回见定国于孟艮。定国曰："曩不用吾言，今仇怨已结，在彼者危矣。"庚子九月八日，与文选俱发自孟艮，分道入缅。定国自右，文选由左，期以冬会于洞武。道乏粮，士马死亡者相续。十月中至洞武，见沿江多船，意欲分兵渡江，赴者梗迎帝，自率兵攻阿瓦以制缅。靳统

武曰："分兵力单，不如全力攻之，缅破，自送还吾主矣。"乃俱向阿瓦而进，遇缅兵于瑞羊岳，击败之。缅城三面阻江，一面通陆，白文选还后，并凿之，引水为湖，留堤三匝，置木城其上。定国抵南噶喇江，为浮桥以济，使人谕缅："出帝，即回兵。"缅酋不听，乃进屯洞柏，离缅八十里；文选屯象腿，离缅城百里。缅人于木城外更立木城，出兵守之；明日，木城兵复前，另立木城以守，城内复出兵守旧木城，步步而前，渐与定国营相近，乃大出兵与定国战。前队皆象，定国战不利，促文选赴援，合力死战，大败缅兵。天炎士渴，不能追，缅仍入城以守。定国获缅目不杀，善待之，谕令还皇帝，终不听。谋渡江向者梗，前洞武船皆已藏匿，使其下赴马得狼、井角造船，其下自相攻杀，出降。复使人守江桥，亦皆焚桥走。定国计益穷。五月，缅酋以弟杀其兄自立，尽杀从官马吉翔等四十二人。定国以十六舟渡江击缅，不胜，覆其五舟。八月十八日，与白文选俱引兵还洞武，五月（日）至黑门坎，文选军在后，其下劝之分道出云南，且以贺九义事动之，文选遂引兵而北。定国觉，使其子嗣兴随之以观去向，文选部下勒兵回向嗣兴，嗣兴怒，亦勒兵迎之。定国遽使召嗣兴还曰："吾兄弟数十人，今惟存若与吾尔，何忍更相戕！吾前所以使尔随之者，冀其悔而复回，仍与吾并力也；既勒兵相向，念已绝矣，任彼所之，吾自尽吾事可尔。"遂率所部东向九龙江而进。文选北行，遇吴三省，留屯锡泊。大清兵至，复走茶山，马宝等追及之，遂出降。缅酋亦献永历帝于军前。定国在九龙江闻报，东走景线，壬寅年五月至猛腊，士马死亡日众。定国乃置醮，乃自述所以矢志恢复，履危蹈险，恒期一篑障江河，皇天不我眷佑，罪在定国；如天命已绝，惟愿速死，无徒苦众人。未几而云南四月二十五日之信亦至，定国仰天大恸，殒绝于地，遂病，以六月二十七日薨于军中。八月，其子嗣兴自慢怯降，与刘文秀子刘震、艾能奇子艾承业俱入京受官，今俱在旗下。

（录自《野史无文》卷九）

李定国

珠江旧史

李定国（安西监十六营），延安人，与孙可望（平东十六营）、刘文选（抚南十五营）、艾能奇（定北二十营）俱少从张献忠为贼，献忠儿畜之，因冒姓张。献忠僭号于蜀，置平东、安西、抚南、定北四将军，而定国以安西为号。[乙酉，谋袭西安，尽杀川人，以绝顾望，命一杀男子一百，女倍之，以手足为纪，不及数者坐大逆。于九月十五夜起，会各路所杀，除家口不计外，杀卫军七千（十）五万，兵二十三万。又杀诸生、释道、堪兴与有才技者，凡三十余万。然后挨户杀，名“草杀”。自成都起，七十余里，尸如丘山。丙戌之日，命“四将军”分路草杀，五月回上功：平东杀男五千九百八十余万，女八千八百余万；抚南杀男九千九百六十余万，女八千八百余万；安西杀男九千九百余万，女八千八百余万；定北杀男七千六百余万，女九千四百余万。其余各营总兵，以报功数少，坐纵逆剥皮。草杀既尽，分共烧毁城郭、庐舍、积众（粟），不尽者剥皮。] 献忠死，可望等至重庆杀曾英，南走綦江。众无主，欲散，始相与尊可望听受约束。[长沙赵某，能倒拽两水牛，起崇祯武进士，兄向杀响马数人于途，献忠攻长沙，兵出却（劫）粮，为赵所扑。以币聘至，与孙可望角力，胜之，以赵为二王，孙为三王，李定国四王。入川，久之献忠发狂疾，召赵令跪，使四人刻其背为棋枰以死，诸将皆不自安，献忠知人心已散，传位可望，遂为所鸩云。] 丁亥正月陷贵州，三月入云南，定国、可望分兵略定滇东西，回省。（四月初一日。）在籍御史任僎，倡议尊可望为“国主”，设六卿，铸“兴朝通宝”钱，以干支纪年，可望欣然欲帝制自为矣。群贼起等夷，一时无主，权相统属，非心服也。定国尤倔强，每事抵忤。可望怒，因他事执定国于演武场，杖之百，复起持定国，泣曰：“吾以大义辱吾弟，愿弟改心共济大业，勿相戕也。”定国再

拜谢，请擒沙定洲以赎罪，由是恨可望。乙丑，杨畏知说可望归肇庆，请王封，而胡执恭自思恩入滇，矫制封秦王，可望始奉明朔。会肇庆败，争虏获，益相构，可望恶之。其在武冈也，使人召之赴沅议事，将因败以为罪而杀之，定国觉其意，辞不行，率残兵五万走东安、全州入粤，可望追之。我师虽失大帅，固山佟图赖等仍进兵宝庆，与可望遇于花街子。可望将中军，冯双礼军左，白文选军右，杨武、冯万宝在后；我师望见可望龙旗，尽力攻之，杀伤相当，可望忽走入杨武军，诸营见龙旗走，遂溃，惟双礼一军不动。我军鉴衡州之败亦不追，各引还，以武宝之间为界。定国得据有广西，与马宝等由怀集东攻肇庆，围之。平南王尚可喜率师来援，相持不能克。永明在安隆，日益穷促，谓内监张福禄、全为国曰："秦王现待（朕）无人臣礼，安危不可知，得西府以兵迎，庶脱于险。""西府"谓定国也。时中外多为可望耳目者，惟吴贞毓以吏侍入内阁，素怀忠愤。福禄等与之谋，约内翰蒋乾昌、李元开，给事张镌，御史李颀、胡士瑞，部郎徐极、杨钟、赵赓禹、蔡绅、郑允之、周元吉、朱议昶、朱东旦、任斗墟、易士佳等，以马吉翔与内监庞天寿素附可望，恐泄其谋，乃议移天寿于外，使古翔省墓。（可望立太庙。改官卫。）永明走南宁，可望以秦封非真，怒执政，使贺九仪贼杀严起恒等，迎永明至安隆，以兵守之，无臣礼，疏有云："人或谓臣欲挟天子令诸侯，不知彼时尚有诸侯，诸侯亦尚知有天子；今天子已不能自令，臣更挟天子之令以令于何地，令于何人?"其放纵无君类如此。壬辰，定国受封为西宁王。（三月出师，五月复沅州靖州，六月至全州。）东攻靖州、武冈，皆克之，遂陷广西，败定南王，执陈邦傅等；北取永明（州）、衡州，楚、粤之间，归附者日众。八月，永、郴望风降附，兵至江西吉安，十月，张虎复辰州。不复受可望约束。可望怒，自至沅州，使人邀与计事，将杀之，定国率兵回广西。永明使使封定国为晋王，召令入卫，定国感激，誓以身报。可望闻之益怒，杀安隆与谋者吴贞毓等一十八人。丙申十二月（一云三月），定国败于新会，驰回安隆，奉永明入滇，刘文秀纳之。明年秋，孙可望自黔举兵内向，其下白

文选、马惟兴、马宝皆叛归定国，可望败走长沙，降于我。于是定国与蜀王文秀居云南，而事权专归定国。定国于“四将军”中，与艾能奇并以勇猛称，而能奇先死，楚、粤之役，连陷十数城，害二王子，其党益严惮。定国性伉直，与人无私曲，回滇矫可望之失，事永明尽礼，进奉极丰，不以威凌士类，人以此多之，然计虑筹划不能及可望。既柄国，记室金维新者，滇人，官少宰，为定国信任，群小争趋之，旧人失职者，多怨望，王自奇等俱叛，诛戮频行，势亦渐衰。戊戌，刘文秀亦死，大兵三路入云南，定国战败于安隆之凉水井，西走永昌，永明入缅甸。定国伏兵于磨盘山（原名高黎贡山），大战不胜，走铜壁关，结营招集散亡，使高允臣驰报永明，为缅所杀，不得达。定国率众驻孟定土府，闻白文选在木邦，移兵南岛与之会。先是，定国败于安隆，文选在七星关溃归，留大理之玉龙关断后，追兵至，文选自沙木和出右甸、镇康，不与磨盘山之战，定国见之，颇以相尤，文选不悦。议所向，定国曰：“吾兵入缅，缅苦供馈，必见拒；击之祸结，恐酿不测，不如择近边险要地暂息士马，招集散亡，两人相为犄角，缅惮我两人，在（内）地者可无恐，且得觇云南动静，连结诸土司为后图。”文选曰：“两人俱在外，则在内者危，我入缅护卫，在外事，王自任之。”文选竟率所部由锡泊、磨盘入缅。定国知文选不与同心，亦移屯孟艮，数月稍集。沅江土司那岧与降将朱养恩、许名臣、高应凤等谋应之，事露，守云南者率师围九（沅）江，定国方与孟艮构兵，不能救，那岧等诛死。贺九仪自南宁间道奔孟艮，妻子在云南，守者使其妻血书付家人李启云招九仪，九仪受之不以告。定国势已败，其党多降，益猜忌，金维新等皆杖死。有以九仪事告者，伏甲召九仪，饮而杖杀之，散其兵，兵皆怨，裨将何起龙率之走蔓谷河，入滇降。白文选抵雍会江，使人谕缅，皆被杀，因渡江击之，大败缅众。缅使人伪约许移城给之，阴召兵，兵既集，以巨炮击文选营，不能支，粮且匮，乃回见定国于孟艮，定国曰：“曩不用吾言，今怨已结，在内者危矣。”庚子九月初八日，与文选发自孟艮，分道入缅，定国由右，文选由左，期以冬会于洞武。道乏粮，士马

死亡相续。十月，定国至洞武，沿江多船，欲分兵乘船渡江，赴赭硁迎永明，自率兵次阿瓦以制缅。其下靳统武曰："兵分力单，不如全力攻缅，缅破，吾主自还矣。"乃进，遇缅兵于瑞羊岳，击败之。缅城三面阻江，惟一面通陆，文选还后并凿之，引水为河，留堤三匝，置木城其上。定国抵南噶喇江，为浮桥以济。使人谕缅，出永明即回兵，缅酋不听，进屯洞泊，离缅城八十里；文选屯象縋，离缅城百十里。缅人于木城之外更立木城，出兵守之，明日，木城兵复前，另立木城以守，城内出兵守旧木城，步步而前，渐进定国营，乃大出兵与定国战。前队皆象，□□定国战不利，促召文选赴援，合力死战，大败缅兵。天炎士渴不能追，缅仍入城以守。定国获缅头目，不杀，善待之，谕令还永明，终不听。谋渡江向赭硁，前洞武船已匿，使其下赴马得狼、井角造船，自相攻杀，出降。复使人守江桥，皆焚桥走，定国计益穷。五月，缅酋弟弑其兄自立，尽杀从官马吉翔等四十二人。定国以十六舟渡江击缅，不胜，覆其五舟。八月十八日，与白文选俱引还洞武，五日至黑门坎，文选军在后，其下劝之分道出云南，且以贺九仪事动之，文选遂引兵北。定国觉，使其子嗣兴随文选以观去向，文选部下勒兵向嗣兴，嗣兴怒，亦勒兵迎之，定国遽使召还曰："吾弟兄数十人，今惟存若与吾耳，何忍更相戕？吾使尔随之者，冀其悔而复回，仍与吾并力也，既勒兵相向，念已绝矣，任彼所之，吾自尽吾事耳。"遂率所部东走九龙江，文选北行遇吴三省，留屯锡泊。大兵至，走茶山，马宝等追及之，遂出降。而缅亦竟送永明于军前。定国闻报，东走景线。壬寅五月走猛腊，士马死亡日众，定国乃置醮自述平生所为，如天命已绝，愿速死，毋苦众人。未几，云南四月二十五日之信至，定国遂病，六月二十七日卒于军。八月，嗣兴自慢怯降于吴三桂，文秀子震、能奇子承业俱入京受世职。孙可望死，其子袭王封，一代后亦降为公。

（录自《劫灰录》卷六）

李定国

冯　甦

李定国，延安人，与孙可望、刘文秀、艾能奇俱少从张献忠为贼；献忠儿畜之，因冒张氏。献忠僭号于蜀，置平东、抚南、安西、定北四将军，而定国以安西为号。献忠死，可望等至重庆，杀曾英，南走綦江，众无主，欲散，始相与尊可望受约束。丁亥正月，陷贵州，三月入云南。定国、可望分兵略定迤东西。回省在籍御史任僎倡议称可望为“国主”，设六卿，铸“兴朝通宝”钱，以干支纪年。可望欣然欲帝制自为矣。定国心非之，每事相龃龉。可望怒，因他事执定国于演武场，杖之百，既服，起，持定国而哭曰：“吾以大义辱吾弟，愿弟改心与共济大业，勿相戕也。”定国再拜谢，请自擒沙定洲以赎罪，由是憾可望。己丑，胡执恭自思恩入滇，矫封可望为秦王，可望始奉明朔。已而知秦封非真，归怨执政，使贺九义贼杀严起恒等于南宁，迎永明王，置之安隆所，以兵守之，凌逼百端，无复人臣礼。相传其疏词云：“人或谓臣欲挟天子令诸侯，不知彼时尚有诸侯，诸侯亦尚知有天子；今天子已不能自令，臣更挟天子之令以令于何地，令于何人?”其恣肆无君类如此。庚寅，定国受封为西宁王，东攻靖州、武冈，皆克之，遂陷广西，杀孔有德，执陈邦傅等。北取永州、衡州，楚、粤之间归附者日众，不复受可望约束。可望益怒，自至沅州，使人邀与计事，将杀之。定国率兵回广西，永明王使密使封定国为晋王，召之入卫，定国感激，誓以身报。可望闻之，杀安隆与谋者吴贞毓等一十八人，定国愈憾可望。丙申十二月，定国败于新会，驰回安隆，奉永明王入滇，刘文秀纳之。明年秋，孙可望自黔举兵内向，其下白文选、马宝、马惟兴皆叛之归定国，可望遂败，走长沙归诚。于是定国与蜀王文秀并居云南，而事权专归定国。定国于“四将军”中，与艾能奇尤以勇猛称，而能奇先死，楚、粤之役，定国连陷十数城，害两王

子，其党益严惮定国。定国性伉直，与人无私，回滇矫可望之失，事永明王尽礼，进奉极丰，不以威凌士类，人以此多之；然计虑筹划不能及可望。既柄国，记室金维新者，滇人也，官少宰，为定国所信任，群小争趋之，旧人失职多怨望，于是王自奇等俱叛，诛戮频行，势亦渐衰矣。戊戌，刘文秀亦死。大清兵三路入云南，定国拒战于安隆之凉水井等处，败归，遂西走永昌。永明王入缅甸。定国伏兵于磨盘山——原名高黎贡山，大战竟日，为有泄其谋者，大兵有备，不能胜，走至铜壁关结营，招集散失士马。使高允臣先行驰报王，为缅人所杀，不得达。定国率众驻孟定土府，闻白文选在木邦，移兵南岛与之会。先是定国败于安隆，文选在七星关亦溃归，留大理之玉龙关断后，追兵至，文选自沙木和出右甸、镇康，不与磨盘山之战，定国见之，颇以相尤，文选不悦。及议所向，定国曰："我兵入缅，缅人苦供馈，必相拒于境，击之祸结，恐酿不测。不如择近边险要地，暂息士马，益招集散亡，两人相为掎角，缅外惮吾两人，在内者可无恐；且得觇云南动静，结连诸土司为后图。"文选曰："两人俱在外，则在内者危；不如我入缅护卫，在外事，王自任之。"文选竟率所部由锡泊磨整入缅。定国知文选不与同心，亦移屯猛缅，数月兵稍集。沅江土司那岧与降将朱养恩、许明臣、高应凤等谋应之，事露，吴三桂率师围沅江，定国方与孟艮构兵，不能救，那岧等俱诛死。贺九义自南宁间道奔至孟艮，妻子在云南，三桂使其妻作血书付家人李启云，至孟艮招九义，九义受之，不以告定国。定国势已败，见其党多出降，益怀猜忌，金维新等皆杖死。有以九义事告者，因伏甲召九义饮，执而杖杀之；散其兵，兵皆怨，裨将何起龙率之走至蔓谷河，入滇降。白文选抵雍会江，使人谕缅，皆被杀；因渡江击之，大败缅众。缅使人伪约许移城给之，阴召兵，兵既集，以巨炮击文选营，文选不能支，且粮匮，乃回见定国于孟艮。定国曰："曩不用吾言，今仇怨已结，在内者危矣。"庚子九月八日，与文选俱发自孟艮，分道入缅。定国由右，文选由左，期以冬会于洞武。道乏粮，士马死亡相续。十月中，定国至洞武，见沿江多船，议欲分兵乘船渡江，赴

赭硁迎永明王，自率兵攻阿瓦以制缅，使毋来争。其下靳统武曰："分兵力单，不如全力攻缅，缅破，自送还吾主矣。"乃俱望阿瓦而进，遇缅兵于瑞羊岳，击败之。缅城三面阻江，惟一面通陆，自文选还后，并凿之，引水为湖，留堤三匝，置木城其上。定国抵南噶喇江，为浮桥以济，使人谕缅："出永明王，即回兵。"缅酋不听，乃进屯洞武，离缅城八十里；文选屯象腿，离缅城百一十里。缅人于木城之外，更立木城，出兵守之；明日木城兵复前，另立木城以守，城内复出兵守旧木城，步步而前，渐与定国营相近，乃大出兵与定国战。前队皆象，定国战不利，趣文选赴援，合力死战，大败缅兵。天炎士渴，不能追，缅仍入城以守。定国获缅目不杀，善待之，谕令还永明王，终不听。谋渡江向赭硁，前洞武船皆已藏匿；使其下赴马得狼、井角造船，其下自相攻杀，俱出降。复使人守江桥，亦皆焚桥走。定国计益穷。五月，缅酋弟弑其兄自立，尽杀从官马吉翔等四十二人。定国以十六舟渡江击缅，不胜，覆其五舟。八月十八日，与白文选俱引还洞武，五日至黑门坎。文选军在后，其下劝之分兵出云南，且以贺九义事动文选，遂引而北。定国觉，使其子嗣兴随文选以观去向，文选部下勒兵回向嗣兴，嗣兴怒，欲勒兵迎之。定国遽使召嗣兴还曰："吾弟兄数十人，今惟存若与吾耳，何忍更相戕！吾前所以使尔随之者，冀其悔而复回，仍与吾并力也。既勒兵相向，念已绝矣，任彼所之，吾自尽吾事可耳。"遂率所部，东向九龙江而进。文选北行，遇吴三省，留屯锡泊。大兵至，复走茶山，马宝等追及之，遂出降。而缅亦竟献永明王于军前。定国在九龙江闻报，东走景线，壬寅五月，至猛腊，士马死亡日众，定国乃置醮自述生平所为，如天命已绝，愿速死，毋徒苦众人。未几，而云南四月二十五日之信亦至，定国遂病，以六月二十七日卒于军。八月，子嗣兴自慢怯降，与刘文秀子震、艾能奇子承业俱入京受世职。孙可望死，其子袭王封，一代后亦降为公。

（录自《见闻随笔》卷下）

李定国传

温睿临

李定国，延安人，少与孙可望、刘文秀、艾能奇俱从张献忠为盗，献忠儿畜之，因冒其姓。献忠僭号于蜀，置四将军，可望曰平东，文秀曰抚南，能奇曰定北，而定国则安西也。献忠死，可望等溃至重庆，杀曾英，南走綦江，入贵州，破定番。四人相与谋曰："明德入人心久矣，李闯入京称帝而不终，今蜀事又不成，是天未厌明德也，我等何可踵败辙？盍相与反正扶明，洗去贼名乎？"乃为坛而盟，复本姓，尊可望受约束。闻黔国公为沙定洲所逐，诈称焦夫人弟所请兵，为黔国公复仇，破曲靖，至楚雄，败杨畏知，释而礼之。畏知说以禁淫掠，止屠戮，招沐天波归，宾礼士大夫，听朝廷命，可望皆许之。发兵擒诛沙定洲，略定迤东西。是时永历帝新立国，受兵，故可望等得于旬月间据有滇、黔二省，入居云南，兵势大振。故御史任僎，滇人也，倡议尊可望为"国主"，设六部，铸"兴朝通宝"钱，以干支纪年，可望大悦。群盗本起等夷，以一时无主，权相统属，非心服也。定国尤倔强，心非任僎议，每事相牴牾，可望怒，因他事执定国于演武场，杖之百，既服，起，持定国哭曰："吾以大义辱吾弟，愿弟改心共济大事，勿相戕也。"定国再拜谢，由是恨可望。己丑，畏知说可望归朝受封爵，庶可服众。可望因遣畏知奉表请王封。廷臣执不予，久之，始封可望景国公，赐名朝宗；封定国康侯，赐名如靖；文秀宁侯，名若锜；能奇某侯，名时泰，遣大理卿赵昱往滇。而浔镇中军胡执恭已先矫诏封可望秦王，可望大喜，俨然以秦王临其下矣。畏知还，始知其伪，耻之，复遣御史瞿鸣丰入朝，欲实得秦王封，而遥以兵威挟制朝廷。大学士严起恒等执议如故，可望恨甚。辛卯，遣部将贺九仪贼杀严起恒等于南宁，上下震骇。是时粤东西已失，瞿、何诸公皆死，陈邦傅等出降，国事愈不支，乃真封可望为秦王，可望既受其封，迎上入

安隆府，以兵守之，岁给银八千、米百石而已。锦衣卫马吉翔、内侍庞天寿私通款可望，议受禅，可望度众心未附而止。乃驻贵州，大造宫殿，署百官，以明臣雷跃龙、范矿、任僎、程源、龚彝、朱运久、张重任、方于宣等为宰相、九卿、科道、翰林等官。跃龙等皆起家进士，受朝廷显秩，至是皆导可望以僭逆。而方于宣尤谄谀，为可望起朝仪，易印章，立四庙，制卤簿，九奏万舞之乐。其撰伪史，称献忠太祖，颂为汤武，而指怀宗为桀纣，可望览之曰："是亦太甚!"于宣曰："不如是，不足以纪开创之勋。"闻者骇焉。上之未入安隆也，可望已袭执皮熊，杀王祥；而张先璧、马进忠等，皆由湖南入黔归可望矣。至是由遵义北击于大海、李占春于重庆，败之，遂有川东；遣王自奇、刘文秀分道取黎州及嘉定，走袁韬，擒武大定，而留兵守川西。其明年壬辰，清兵入蜀，白文选遁回云南。可望乃使李定国、冯双礼由黎平出靖州，马进忠由镇远出沅州，会于武冈以图桂林，步骑八万；刘文秀与张先璧由永宁取叙州，白文选由遵义取重庆，会嘉定以图成都，步骑五万。疏请封定国西宁王，文秀南康王，时能奇已前死，余各加公侯。五月，定国进攻靖、沅、武冈，皆下之，由西延大埠疾趋广西，遂陷桂林，孔有德自焚死，执陈邦傅等送贵州。刘文秀、白文选亦陷叙州、重庆，清兵还救，文秀全军俱复，可望夺其王爵，令回守云南。九月，定国北取永州、衡州，楚、粤之间，旧将胡一青、赵印选、马宝、曹志建等屯聚粤西山谷间者，皆相率来归，民间亦多啸聚以应之，不复受可望节制。可望怒，乃自至沅州，使白文选、张虎攻陷辰州，杀总兵徐勇，湖南猝不意兵至，郡县皆奔溃。十一月三日，定国与清兵战于衡州城下，不利，会主帅遇伏死，定国收兵退屯武冈。可望闻其败，将因以为罪而杀之，召至沅议事，定国辞不行，明年春径回广西。可望愈怒，自率兵追之。清兵闻可望退，进兵宝庆，与可望遇于花街子，望见可望龙旗，尽锐攻之，杀伤相当，可望忽退，诸营见龙旗走，遂溃，惟双礼一军不动。清兵鉴衡州之失，亦不追，各引还，以武、宝之间为界。上时在安隆困甚，闻定国据有广西，忠勇，且与可望有隙，与大学士吴贞毓等十八人谋密

召定国入卫，以制可望，许封晋王，赐以“屏翰亲臣”图章，遣使敕谕定国，情辞哀切。定国读之感泣，军中皆流涕，顾念兄事可望久，且其兵尚强，未敢轻举也。可望闻之，遣将至安隆尽杀与谋者，以定国方将兵在外，愈厚抚其妻子，冀收其用；定国亦防可望袭之，出兵由宾州南掠廉、雷。五月，陷高州及阳春、阳江、恩平诸邑，进围新会，明年，清兵合击之，定国败走，退守南宁。文秀在云南，诏召为大招讨都督，督诸军出师东伐，文秀具疏辞，不许，乃出按沅、靖诸营，慰劳军旅，十日而毕。文秀于诸人稍恭顺，慕文雅，亲礼儒士，尝曰：“皇上犹佛也，吾侪当构玉宇安之。”乙未十二月，可望闻定国在南宁势不振，遣总兵张明志、关有才等袭之，定国大惧，其记室金维新曰：“王无患焉，明志等虽盛，皆王旧部卒，必不敢相敌，今我疾引兵从间道出其后，彼必惊溃，我乘胜入安隆，迎天子入云南，大势在我，秦王无如我何也。”定国然之。丙申二月，率其将高文贵自归朝趋田州，出关有才军后，猝乘之，有才跳身逃，军士悉降，定国疾走安隆。可望侦知之，亦遣白文选至安隆，移上入黔，太后闻之哭，从官皆哭，文选不忍，乃迟引以俟定国。数日，定国至，即奉上由安南卫西入云南，可望遣兵邀之，定国已抵曲靖。时文秀与王尚礼、王自奇同守滇，文秀亦素怨可望，闻定国将至，佯与尚礼守城，而私以数骑驰迓定国曰：“我辈以秦王为董卓，尤恐卓后复有曹瞒。”定国指天誓，文秀与定国、文选同奉上入云南，居可望府中。封定国晋王，文秀蜀王，文选巩国公，余将吏俱升赏有差。使文选还慰可望，可望夺文选兵，然以妻子在滇，未敢公为逆也。复遣文选入朝与定国议和。明年五月，上使张虎送可望妻子赴贵州。张虎，可望私人也，定国欲远之，故遣之去。临行，上召见，劳之曰：“秦晋和好，借卿之力，还当爵卿以公。”因拔金簪赐之曰：“以是为信。”虎至黔，即劝可望内犯，且曰：“上命以金簪刺国主。”可望既无内顾忧，又闻虎言，方于宣等复赞之，遂发兵反。是时廷臣大半仕于可望者，而可望腹心将王尚礼亦在滇，与龚彝等许为内应；诸将从定国至者，皆伤残之卒，而文秀所留滇兵亦少。然人心不直可望，马进

忠、马惟兴、马宝以同姓相密，又与白文选交，皆密谋助定国，而可望不知也。诸将先从容说可望，使还文选兵，可望信之。八月朔，乃以文选为征逆招讨大将军，总统诸将前行，马宝为先锋，自率大军随其后，合兵十四万人。留冯双礼守贵州，马进忠以病留安顺。定国、文秀亦自将至三坌拒之。八月，诏削可望爵。九月朔，可望至交水，列三十六营，去曲靖三十里。定国、文秀相顾失色，文秀欲走交趾避之，定国欲由沅江、景东取土司，议未决。初四日，文选拔营抵三坌，轻骑奔定国军，具言人心内向，可一战走也。定国大喜，请封文选为巩昌王，可望闻变欲还，马宝佯怒曰："吾乃为跛贼所欺，要当手缚之，生食其肉！"文选为贼时常战伤足，故云。乃进曰："一人去，何足轻重，而以废大事耶?"可望乃止，曰："两酋齐出，会城必虚。"令宝与张胜、武大定选精骑七千间道袭云南，而身与定国决战。宝阴告定国，促令速战，而身徐行，使城中得为备。十九日，定国会战，兵既交，文秀骑将李本高马蹶被杀，文秀欲退，文选怒曰："张胜已前往，我若退，腹背受敌，蹂为肉泥，与其死于走，孰若死于阵乎！"率所部五千驰之，马惟兴勒兵不动，开阵以迎，文选合军反攻。可望在高阜见之，大惊曰："诸将皆叛乎?"遂走。定国率诸营乘其后，可望大败，奔贵州。定国令文秀追可望，而身还师。张胜至云南，王尚礼已为天波所拘，不得发，胜知有备，又闻可望已败，驰还；至浑水塘，遇定国兵，殊死战，马宝倒戈促之，遂被擒。十月朔，可望至贵州，冯双礼试之，言追兵将至，可望入城，挈妻子北走，双礼断后，尽掩其子女辎重。至偏桥，随行止二十余人，所过镇将，皆闭门不纳，乃走长沙降于经略。论功封双礼庆阳王，进忠汉阳王，惟兴、宝等封国公。其党附孙可望者皆降级，诛张胜、张虎，王尚礼自缢。于是定国与文秀并居云南，而事权专归定国。定国素以勇猛称，其出兵楚、粤也，连陷十数城，害二王子，其党益严惮之。定国性伉直，与人无私曲，回滇矫可望失，事上尽礼，进奉极丰，不以威凌士类，人以此多之，然计虑筹划不及可望。既柄国，任用记室金维新，官至吏部右侍郎，马吉翔复以谄佞入内阁，群小争趋

之，旧人失职多怨望，于是王自奇、关有才等相率叛，诛戮频行，势亦渐衰矣。可望既降，封为义王，欲借清兵以报怨，因献滇、黔舆地图，并陈其进取状。戊戌春二月，清兵分蜀、楚、粤三路入黔，定国使刘正国、杨武等守三坡、红关。初，定国所收可望诸军，谓之“新军”，而己所部，谓之“旧军”，赏赉独渥，赵印选、胡一青，滇宿将也，亦罢闲不用，以故新军不附，及清兵至，尽退守。四月二十四日，文秀病卒，贵州陷，清兵遂入云南。七月，定国受黄钺，与冯双鲤等守盘江，扼鸡公背，文选将四万人守七星关。其冬，蜀兵出遵义，由水西入乌撒，文选惧，弃关走沾益。而广西土司之降大军者，导以入安隆，袭盘江之后，定国拒战于罗炎、凉水井，连败，遂遁走永昌。报至，上出走。己亥春正月三日，清兵陷云南府，镇将胡一清等降。上至永昌，下诏罪己；定国还黄钺待罪，自请削秩，不许。二月，文选败于玉龙关，上入缅甸，定国伏兵于磨盘山。磨盘山者，越潞江二十里，山谷峻险，林木茂密，仄径屈曲，仅容单骑，清兵穷追二千里不见一兵，以为定国已去远矣。及过潞江，前驱遇伏，不利；有俘卒泄定国谋，乃分精甲先蹂伏卒。定国出兵大战，不能胜，走至铜壁关，结营招集散亡；使高允臣先驰报上，为缅人所杀，不得达，定国率众驻孟定土府。磨盘山之战，定国本期文选前后夹击，而文选自玉龙关败后，由沙木河出右甸、镇康，道远，不及与战；至是闻文选在木邦，定国移兵南岛与之会，见文选而相尤，文选不悦。及议所向，定国曰：“缅小邦也，猝见大军必惊惧，惧而思逞必拒战，战则是与彼为仇也，何以托我主？不如择近境险要地休兵息士，修军实，招溃散，两军相为犄角，缅外惮吾军，必不敢无礼于主上矣。且云南瘴暑，敌骑不敢久驻，及其弊也，吾可结连诸土司以为后图。”文选曰：“主上望援久矣，若俱在外，则在其内者何所恃？不如我入护主，王任外事。”遂行，由锡箔、磨盘入缅。定国知文选之不和也，亦移屯猛缅，数月，兵稍集。沅江土司那岺与降将来养恩、许名臣、高应凤等起兵谋应定国，吴三桂移师灭之，定国方与孟艮构兵，不能救也。定国势已败，见其党多降，益怀猜忌。贺九仪自南宁间

道来孟艮，三桂拘其妻子以招之。事觉，定国伏甲召九仪饮，执而杖杀之，散其兵，兵皆怒，裨将何起龙率之入滇降。白文选抵雍会江，使人先谕缅，使者被杀，文选怒，因渡江击之，大败缅众。缅人伪约和而阴召兵，兵既集，以巨炮击文选营，文选不能支，且粮匮，乃回见定国。定国曰："惜也，前不用吾言，今仇怨已结，在彼者危矣。"乃与文选俱发自孟艮，分道入缅：定国由左，文选由右，时庚子九月也，期以冬会于洞武，道乏粮，士马死亡大半。定国至洞武，见沿江多船，议遣别将分兵渡江赴赭硁迎上，而自率师攻阿瓦以制缅，使不得出师争。靳统武曰："我兵少，分之力愈弱，不如全军攻缅，缅破，必送主上至军以求和。"乃进师，败缅兵于瑞羊岳。阿瓦，缅王城也，三面阻江，一面通陆，自文选兵至后，并凿之，引水为湖，留堤三匝，置本城其上。定国抵南噶喇江，为浮桥以济，使人谕曰："苟送上出，则我罢兵。"缅酋不听。辛丑二月，乃进屯洞怕，离缅城八十里；文选屯象腿，离缅城百十里。缅人先守木城，及两军未逼，乃更于外立木城，出兵以守；明日兵复前，更立木城；如是数四，渐逼定国营，乃大出兵与定国战，驱象为前队，定国战不利，文选赴之，两军合击，大败缅兵。然暑甚，士马渴，不能追，缅仍入城以守。定国优礼所俘缅目，令还谕送上出。缅酋计曰："彼兵疲食尽，无奈我何，不如留天子以为市。"终不听，乃谋渡江向赭硁，前洞武船皆已藏匿，使部卒入山伐木造船，复使人守江桥，其下饥疲，自相攻杀，遂散，定国计益穷。至八月而有咒永之祸，从官尽死，上亦几不免。定国闻之，以十六舟渡江击缅，不胜，覆其五舟，乃与白文选俱引还洞武。至黑门坎，文选军在后，其下劝之出降，且曰："晋王不可信，不见贺九仪事耶?"文选乃引而北。定国觉之，使其子嗣兴随文选以观去向，文选部下勒兵将战，定国遽使召嗣兴还，曰："吾昔同事者数十人，今皆尽矣，存者我与文选耳，何忍更相残！且彼既背主他出，欲自为计，念已绝矣。吾所以使尔随之者，冀其生悔心，或为并力，今大义已乖，任彼所之，吾自尽吾事耳。"遂率所部东向九龙江而进，而文选卒降于三桂。至十二月，缅人献永历帝于军前，定国

在九龙江，闻报东走景线，壬寅五月至孟腊，车里国境也。三桂恐其走交趾，遣提督张勇追之，而定国已病，乃置醮自述生平所为，且曰："如天已绝明命，尚速余死，毋徒苦军士!"未几而帝崩，问至，定国恸哭发丧，令军士缟素，然病愈不支，六月二十七日卒于军。其部将靳统武亦死，余皆散。子嗣兴不能军，八月亦自慢怯降，与刘文秀子震、艾能奇子承业俱入京受封焉。清兵之入云南也，诸将封公侯者多降，唯窦名望战死。

逸史曰：昔者管仲遇盗，取二人焉，上以为公臣，其后晋之戴渊，卒为忠义。至于草昧之际，自盗贼奋为名臣者，不可胜数，由此观之，草泽何尝无奇材哉！明之末也，以科目箝制天下士，士之俊雄桀骜不能自致富贵者，皆起为贼魁，既已毒痛天下、浊乱神州矣，迨其归附，又不能善抚而用之。夫可望始之请王封，其志何尝不愿为国用，而庸臣必阻格之，以激其怒而肆其噬，诸谄谀趋势利者，反导之以僭逆，考其人皆出自科甲，自附于儒雅者也。天厌其恶，定国起而反之，尊主礼士，足以有为矣；而朝无直臣，奸谀复出而用事，迄于不振。然其流离蛮貊之中，不忘故主，致于吁天自述其志，亦足悲矣。以视夫标榜声华、卖国以偷生者，论世之士，将何所取之哉？然则盗贼犹贤于科甲之标榜者也。

（录自《南疆逸史》卷五十二）

李定国

邵廷寀

李定国，字壹纯，陕西延安人。初从张献忠为盗，冒张氏。献忠养子四：孙可望年长知书，数位第一，定国以能次之，刘文秀、艾奇能又次之。所至破阵屠城，而定国骁勇超逸，更称万人敌。献忠僭号成都，定国为伪安西将军。既听汪兆龄谋，尽杀蜀人，令定国等四将军分道刈杀，以所杀多，报功最。大清兵斩献

忠西充，定国等帅溃众南陷重庆，杀如故。明年正月入遵义，始不杀。略贵州，趋云南，乃去伪号，称明将军。始，献忠死，其党有悔祸之意，艾奇能首数汪兆龄罪，杀之重庆。定国每静念："有明天下，自秦州煽乱，怙恶不抚，决裂至是。吾辈胆义素不后人，何惜此筋力不以恢廓疆宇，归复明朝。"刘文秀亦以为然。及入楚雄，得杨畏知，畏知为陈说忠义，指明邪正。时奇能已死，定国、文秀深悦服，独可望阴贼，外唯唯，内仿献忠所为。亡何，可望称国主，设六卿，用干支纪年，定国心非之。或龃龉，可望缚定国，棒之八十，抱其颈泣曰："吾以大义辱弟，幸同心力无虑疑。"定国顿首谢，请擒沙定洲报德，由是憾可望。其年十月，及文秀进讨佴革龙，斩定洲。己丑四月，桂王封可望为辽王，赐定国名如靖。可望拒命，定国因辞赐名，可望杀畏知，遂迁桂王于安龙，定国滋恨，然未敢入朝。壬辰四月，大清定南王孔有德逼贵州，可望承制命定国、文秀经略楚、蜀，以冯双礼副定国，步骑八万，出武冈、辰、沅，破大军，有德退守桂林，定国乃分道：自将出新宁，使双礼出祁阳，合趋全州；复遣西胜营张胜，铁骑右营郭有名，率精兵由西延大埠疾走严关，扼桂林要道，令曰："敌至传火，毋下关，须大军会战。"双礼帅前军都督高承恩、铁骑前营王会、武安营陈国能、天威营高文贵、坐营靳统武，合兵四万先进。至译湖猝遇大兵万余，逆战，斩骁将李四，乘胜遂薄全州。定国帅右军都督王之邦、金吾营刘之讲、左协营吴之圣、武英营廖鱼骠、骠骑北营卜宁，合兵六万继进。闻译湖捷传，令全州傅城者毋急攻，俱其奔逸并力于桂林。全州已下，定国至，令急过无人，双礼出城合进。有德遣数万众奔救全州，张胜已营严关，距大军十里，日且暮，大军引去，旦复至，胜传炮，大军蓐食而前，战于关下。象偾归，定国斩御象者，诸军奋进，象突阵，大军退。天大雷雨，横尸被野，追及大榕江，又告捷。有德急入桂林，大军三日而至，守陴者皆溃，援梯毕登，是为七月四日。定国下令屯城上。有德奔入府，怅然无语，久之曰："已矣！"其妻曰："无虑吾不死。"属女仆以一子出曰："苟得脱，度为沙弥。"遂与其妾共缢。有德举火，自刎投火

中。获其子廷训及陈邦傅、陈师禹。先是，有德使提督线国安略南宁，右翼总兵全节防柳州，左翼总兵马雄守梧州，重镇皆出；桂林守兵援全州，三战皆尽。定国行疾，是以速克。胡一清、赵应选、马宝、曹志建等，自南宁败后，尚留粤西，屯聚山谷。闻定国至，相率来归。民间亦多啸聚以应。于是定国进复柳州，斩守道金汉蕙，东下平乐，将攻梧州。雄告急广东，国安、全节及文武道府州县印官四十六人，皆逃于梧。尚可喜遣副将强世爵，以舟师大炮奔救。定国猝至，大军退，遂克梧州。雄等东走封川，寻走广州。可喜遣副将盖一鹏赴肇庆迎护其众，令世爵扼封川江，便宜战守。是时刘文秀入蜀无功，而定国克复广西，乘胜东下，岭南震动。而定国顾北取永州，强世爵因及马雄三镇，复取梧州，线国安、全节帅所部西行。是月，大清兵下琼州，杜永和、张月众犹数万，以全军降大清，二王得专意广西。九月，孙可望使白文选攻拔辰州。定国进至衡州，长沙、岳州从风溃，马宝、曹志建亦复连州，获守将茅生蕙，送定国，斩军前。十一月三日，大清敬谨亲王兵号十万，至衡州。定国遇河上，甫接少却，亲王恃勇，舍大军而追。定国设奇捣中坚，过险伏发，交枪起，害亲王，军遂溃。定国全师归武冈。可望忌定国，召赴沅州议事，将杀之。定国觉，引还广西。可望败于宝庆，湖南复陷。癸巳三月，定国帅马宝等自梧州破开建、德庆，抵肇庆，连营据北山，别将下四会、广宁，前距三水。于是岑溪宋国相出掠罗定、东安、西宁；海盗战舰二百由新会、顺德诸港入九江口；清远山寇并发，声言导定国渡河走从化袭广州，水陆大震。潮州郝尚久隙于郭虎、班志富，尚可喜以刘伯禄代之，调尚久水师。尚久怒，不受代，举兵称新泰侯，驰檄南韶、漳、惠，大清遣哈哈木会耿继茂攻之。是月廿六日，定国围肇庆，泄其濠，三面急攻。用布囊盛土为墙，置木栅，挨牌藏鸟枪以拒内兵，阴穿地道，城中大惧。许尔显堑濠城中以待，缒城夺梯，设死守，月余不克。大清两王谋：李定国或从木绵头度河，得合尚久，会城危，且无北归路矣。乃令继茂发铁骑守三水东南，凿侧门出，夺地道，兵多死；不能出者焚死地道中。定国退军五里。大清兵潜

出西、南二门，夺龙顶冈营，用镰钩长枪获兵数百人，徇于城下。于是定国解围还。而郝尚久将攻惠州，为黄应杰所扼不出。碣石苏利以舟师助继茂、吴六奇坚守程乡、饶平，待大清兵。秋八月，潮州破，尚久父子死。定国东行失利，由可望二心，无后援而顿兵坚城也。桂王自至安龙，受制可望，大学士吴贞毓、太监张福禄等言定国忠勇，虽出盗贼，实与可望异趋，为国之心，如青天白日。因手敕密使，封定国为晋王。使引兵入卫。词旨哀怆，定国叩头出血，曰："臣定国一日未死，宁令陛下久蒙幽辱，幸稍忍待之。臣兄事可望有年，宁负友必不负君。"致书贞毓曰："粤中未定，进退维艰，凡事须密，责在老先生。"事泄，贞毓等竟遇害。可望以是滋恨定国。甲午春，遣冯双礼、贺九仪以骑兵七千，步万余，从古泥、怀远追定国于柳州。定国奔宾南，东略雷、廉，双礼等遂击桂林。尚可喜虑可望与定国实合谋，阴益兵犄角以图两粤，惧甚，疏请敕湖南经略洪承畴，分发满军由衡、桂入乐昌，下广州；汉军由永州入桂林，与粤西兵合趋南宁，断定国归路，粤东兵从高州进夹攻之。大清不听益兵，而遣秘书学士郎廷佐移继茂镇福建。可喜愈惧，疏留继茂共镇。大清两王以定国在广，疲于奔命。五月，定国发廉州，故将张月以高州归。大清岭西道周公轼、学道钱朝鼎等皆死。秋，海北道陈武渡海攻拔临高、昌化，黎歧蠢动，水陆响应，儋崖路断，琼州守将高进库告急于广州。定国进复阳春、阳江、恩平，前锋抵肇庆，欲大举发郴、桂兵出韶州，江楚界上兵入海岭，约闽海国姓攻惠、潮。可喜畏定国，不敢战，又虑兵分则弱，谓继茂曰："以旁县饵之。"于是大清督李率泰，檄总兵郭虎、副将杜豹守高明；可喜遣甲喇章京田云龙守新会。三日，滇兵围新会，可喜令右翼总兵吴进功助云龙守。定国以舟师扼江门，筑炮台于陆，遏援兵。两王亲赴江门争，水陆并进，滇兵少却。阿达哈哈番刘秉功等得入新会。二十日，定国复至高明，掘地道急攻，城坏二十余丈，将陷，可喜来救，望见滇军盛，遽退。定国自帅步骑万余追之，选精锐五百人急蹑可喜，遇伏不利，失总兵武君禧、游击王天才等十六人。可喜退。晦，克高明，擒郭虎，斩杜豹，遂合围新

会。分兵出三洲、金利、富湾、罗屈诸口，距广州百里，军声大振。新会馕尽，食木根皮及犬马浮萍，百道并攻。吴进功等守益坚。朱成功遣黄梧道海应定国。十二月，大清靖南将军朱马喇纛章京东邦帅满、汉军会尚可喜、耿继茂于三水，同趋冈城。十日至三洲，南军接战不利，失副将梁大勋。十四日，至新会。定国严阵城北，驱战象，列炮两山峡口，以勍兵屯峡左山，将乘高驰下。可喜遣尚之智、盛登科先击左山兵，左山兵溃，峡口兵望阵动，连得成、田云龙、栗养志统步兵合战，象惊炮，还走，滇兵乱。八固山蒙古固山鸟金超哈藩下骑兵，两翼纵击，滇兵大崩，戈甲弃载道，死者无算，亡十三象。北军迫奔三五里。定国有马三千，将战，遣厮养先牵去，从者二百骑，步四万，得脱者半。定国尽撤肇庆、高明、高州马步兵战象，皆入郁林州，选厮养得万余人，自新兴南走高州。东邦追不及。总兵孙际昌叛奔土司何美璜寨，定国使都督吴三省，总兵杨成、王三才，以步骑千余、象一只，追取之，与东邦等遇于兴业，复败，获象以去。东邦留尚之智驻兴业，自与敖拜、来塔等追及定国后军，后军败，老营妻子冲散。蒙古、满洲兵追定国及于横州，南军亡象二，马二百八十。定国烧绝浮桥，由宾州夜走南宁。大清军以朱养恩镇南宁久，地连交趾，内接溪峒，不可卒拔，乃还。际昌及中书杨琳，诸将白长、王之臣等三十人，皆降。由是广东高、雷、廉三府，肇庆、罗定属三州一十八县，广西横、郁林二州，北流、兴业、容、岑溪四县，复归大清，琼州群盗皆降。定国力屈不能复出，西南之业衰矣。乙未正月，定国将朝桂王。可望惧，使白文选以兵逼王移驾贵州，宫中皆哭，文选感动，以定国本无他意还报。定国至，遂奉王西行。文选弃可望来归。至云南，盟刘文秀及王尚礼、王自奇等曰："同辅朱氏，背之者死。"诏以云南为滇都，命定国为辅民大将军，总滇、黔、楚、蜀兵，知行在大政。定国与沐天波、刘文秀同心明室，人心稍定。丙申秋，可望犯阙，上下震恐。时定国新败，文秀所将留滇兵不满万，行朝百事草创，诸镇自楚、粤至者皆聚于黔。定国、文秀以众寡不敌，疑惧。诏遣文选宣谕可望，可望拘文选，夺其兵。马进忠、马惟兴、马宝

以同姓相密，雅善文选，因说可望使文选将兵西进。至交水，距三岔二十里，轻骑奔定国军，具言人心向内，可一战定也。可望夺气。时进忠以病留安顺，冯双礼在贵州，可望乃遣宝与张胜袭滇都，自以重兵压交水，日夜索战，令定国不得还救。惟兴遣亲信夜告定国，令速战。是日引兵薄惟兴军，惟兴内应，其众大崩。可望奔湖南，降大清。定国还至浑水塘，宝来归，斩张胜。双礼举贵州降。定国以黔、蜀、辰、沅并可望故镇，悉调赴云南，核功罪。定国伉直，小心臣节，进奉极丰，不以威凌士类；然计虑擘划，实不及可望。记室金惟新，滇人也，官少宰，信任，而马吉翔工弥缝，复入阁；旧人失职多怨望。于是王自奇等俱叛，诛戮频行，内外惕息。丁酉春，大清兵三道南进。会文秀卒，定国东西独御，遂不支。冬十月，贵州破。命定国假黄钺，文选为副，出师恢复贵州。定国及双礼统大军扼盘江河，据鸡公背；文选及将军窦民望等别将四万人，守七星关，进屯生界，距遵义百里，牵制吴三桂兵。三桂自平越兼程还遵义。十一月，三桂帅总兵沈应时、马宁等复发遵义，文选自生界退保七星关。十二月二日，三桂自水西以烈趋天生桥，入乌撒，越险扼七星关大道，文选惧，弃关走可渡桥，寻焚桥走沾益。泗城州土官岑继禄导北军入安龙，定国由盘江还战，累败，遂回滇都，奉桂王奔永昌。文选留守玉龙关。戊戌正月三日，大清兵入滇都。四日，王至永昌，诏勤王。定国还黄钺待罪，请削秩，不许。闰月，大清吴三桂、赵布太陷大理，至玉龙关，文选帅张光翠、陈胜等与战而败，由沙木和走石甸、镇康。定国退至潞江，虑行在体重难行，遣护卫将军靳统武、黔国公沐天波奉跸先出腾越，而身留磨盘山当敌。磨盘陡立阻潞江，内箐深屈曲，仅容单马，定国筑栅数道，左右设伏，大营屯山后四十里橄榄坡，炊食馕伏，令毋见烟火。大清兵行缓持重，伏兵五日夜，山深食寒，锐气半销。二十一日，吴三桂、赵布太渡潞江，前驱遇伏大战竟日。中书卢桂生自伏中逃归，告为先备，分精甲御伏，而正兵由大路平行。南军扰乱，泰安伯窦民望、都督王玺皆战死。定国愤发，麾后军齐进，殊死战，大清死伤甚众，却三十里，而定国度前军既溃，奸

人有输敌情，恐孤军不支，遂整旅出腾越，追扈行在。行在已出铜壁关，入缅。缅人请敕铜壁关，毋纳汉兵，遣兵守关。靳统武奔告定国，定国虑缅情叵测，遽入恐激变，乃使高允臣驰报，为缅所杀。始未战时，诸营妻子辎重散逸，军士四出求妻子，未得猝集。定国令定朔右将军吴三省断后收兵，自率大军取道孟定，白文选自木邦来会，定国以文选不与磨盘之战，见而尤之，文选不悦。及议所向，定国曰："我若入缅，缅苦供馈，必见拒，击之祸结，盍择险要边土，休士马，相掎角，缅外惮吾二人，君在内可无忧；且得阴连诸土司，觇云南动静。"文选曰："并在外则内危，我入卫上，王任外事。"竟异议。别移锡薄，所至纵兵大掠。定国乃从孟定过耿马，至孟缅。屯数月，溃兵相续来归，军声稍振。咸阳侯祁三升、孟津伯魏勇自云南得出，从驻耿马。三省来护大营妻子，将赴定国，遇怀仁侯吴子圣，将军杨武，胁之同降吴三桂。三省佯诺，出不意走潞江，遂弃大营妻子，以兵奔定国。移营孟连，三升不欲从，矫定国令转龙川虎喇，诱魏勇连兵，道遇三省，并诱之行。定国召文选故镇张国用、赵得胜等，皆以所部来归，军势益振。沅江土官那岜与降将朱养恩、许名臣、高应凤等谋建义，事泄，三桂帅兵围沅江，岜告急，定国方赴援，会孟艮酋长患定国在孟连势肘腋，乃纠合众夷为梗。定国还战，平孟艮，沅江已陷，岜焚死。定国度诸土司疑惧不敢前，且休甲孟艮，令夷目耕田输粮如县例。广国公贺九义，自南宁间道来奔，三桂令其妻血书招之，九义受书不告定国。定国见势败，下多出降，益相疑，杖杀金维新等，复饮九义，杖杀之。九义裨将何起龙率部众至蔓谷河入滇降。定国使总兵唐尧宗驻磨乃，招纳降附。尧宗违令杀商客，取货转售孟艮，获倍价。有志士投孟艮者，诱收麾下，皆引去，无入孟艮，故滇中事机绝不闻；而孟艮去缅都阿瓦悬远，亦不知缅瓦事，定国惟日夕练兵觊恢复而已。庚子九月，文选抵雍会江，使使谕缅皆不返，乃谋攻阿瓦，阿瓦二城，大江出其中，缅王都新城，在江左；旧城名赭硁，安置行在，在江右。闻文选兵不戢，请行在旨谕文选毋进，且云："老皇帝避难我国，极尽主宾礼，乃蹂我地，谓我国无人

耶?”文选怒，渡江向新城，败缅兵，缅绐许移新城，用大炮击文选营，文选不支，还走孟艮。定国惊曰：“不用吾言，果致缅怨，今在内者危，若之何?”文选惭。九月八日，定国与文选合兵入缅，发孟艮，定国由西道，文选由东道，张国用、赵得胜仍以所部兵从文选，期会洞鸟。初，魏勇、吴三省连兵转虎喇，始觉三升意，然三升犹未有降志，闻定国处贺九义，而勇又病死，遂收勇兵，约三省同出降，三省复阳许。十月，以三桂令移驻腾越，三省出三升不意，返兵由孟定趋孟艮，诣定国。迨次磨乃，定国去孟艮已一月，唐尧宗不奉定国调，逡巡谋降大清，三省觉而收杀之，流孟定、耿马间为游徼。而定国等士马入缅者，粮乏道死亡。定国先至，见江干多船，议分兵渡江迎桂王于赭硁，身攻围新城。靳统武谋曰：“兵分力单，不如全力捣缅都，缅都破，上自出。”乃俱望新城进，败缅人瑞羊岳。缅都三面阻江，一通陆，文选还后并凿之，引水为湖，绕三堤，置水城其上。定国从南噶喇江为浮桥以济，驰谕缅王送行在讲好。缅复云：“汝老皇帝避难吾国，受吾供亿，前番一野王子来，反将仇报，汝主在我家尚然，今送出更何如?欲攻城亦唯汝，汝等水土不宜，坚守二三年无所畏。”定国度缅人不听，乃进屯洞怕，距城八十里，文选距百十里，屯象腿。缅人于木城外更立木城，以兵守之，明日复前，又立木城，逼定国营，乃大出兵搏战。前队皆象，定国不利，趣文选兵中间横击，皆殊死战，缅人大败。时五月炎暑，我兵渴甚，不能穷追，缅复入守木城。定国获缅目，善待之，谕送车驾，终不听。复谋渡江向赭硁，前洞鸟船皆藏匿，使人赴上流马得狼、井角造船，缅人焚船，定国又进击败之，四面绝其粮道，凡三月，缅人煮铠以食，要我军他徙乃出车驾。定国不得已，唯唯，军吏自相攻杀，多出降。使人守江桥，亦焚桥走，定国计竭。七月十六日，缅人杀我从官四十二人，沐天波死之。定国以十六舟渡江击缅，不胜，覆其五舟。八月十八日，及文选还洞鸟。凡行营例，定国、文选各前行三日，时文选军在后，张国用、赵得胜等窃语：“此地烟瘴已伤多人，今再深入，气候更热，非尽死不止，宁出云南，无作缅鬼。”部兵闻语皆喜，夜束载定，

二将披甲入卧帐，请文选行。文选惊起，皆曰："大事知不成，更深入瘴地，空死无名，殿下必随晋王，是续贺九义也。"文选曰："尔等今欲何往?"国用曰："以此人马出云南，何向不重。"曰："若皇上何?"国用曰："心力已尽，可见天意。"遂发，抱挟文选上马，文选不能禁，夜退走七十里。比明，定国觉，曰："巩殿下欲何往耶?"命子嗣兴尾文选，与同行止，定国亦缓随之。行五日至黑门限，国用、得胜断后，议曰："晋世子急蹑不去我，我军行疲为累，不若就此山势与决战，令彼还，方可前进。"遂阻山齐发矢石，嗣兴怒，麾兵奔而登。定国已至，亟呼嗣兴罢战，乃大恸曰："白文选强欲攻缅，激坏大事，致皇上不还，我竭心力勉迎皇上，彼忍舍去，冀彼初念可回，故令尔随行，今与我战，是其志决矣。当年同起兄弟，惟伊在，何必与彼相攻。"邀得文选兵四十余人，悉令放还，仍帅所部独进洞邬。文选行三日，遇吴三省自孟定来营，马尽死，军皆步，将入缅。文选见之流涕曰："我负皇上与晋殿下矣，将军能帅兵至此，使我有太山之助乎?"三省度文选众皆有背意，乃扬言云："南降者皆怨恨不得所，人心思明，故我辈咸愿步来到此。"文选部兵见三省并有踊跃状，闻此言各鼓舞，国用、得胜亦遂转虑，不复言适云南。会徽人汪公福携海上郑成功约师表来，文选遂屯锡薄，复遣苏总兵出木邦，会定国进兵。留待月余，报书未至，三桂统大兵急追，文选度不敌，间道西走孟养，三省在焉。三桂抵木邦，获降人，得文选情，知定国先入洞邬，文选不降，必疾走阿瓦，机不可失，乃速进兵抵锡薄，文选果行。遂分遣八都督马宁、马宝、马惟兴、祁三升、高启隆、沈应时、李贵等尾文选，令无战，附书招之，三桂自望阿瓦进发，传檄缅王，使送行在出城。时缅为晋藩所敝，适大清兵至，遂将桂王及宫眷送三桂军前，复城守。大清兵既得桂王，亦不攻缅，即班师还云南。文选过孟养，见马宁等追之不置，就山立营，欲与战，部下皆挺刃思奋，文选竟怯，不敢发词。追将有所善马宝，乃阴与宝语，宝持三桂书单骑入其军，文选遂降。十二月十八日，由孟密入云南，明年五月朝燕京，封承恩公。定国在洞邬，方议再举，已知三桂

入缅，行在蒙尘，愤懑欲绝，曰："势既不敌，追无能为。"乃由孟艮傍云南边，伺王动静。四月至猛蜡，遣官入车里送礼，借兵复云南救驾。车里、暹罗俱使人请入计用兵事宜，尊礼甚殷。会定国人马病死日甚，乃斋戒，作表告天，叙平生洎反正辅明，皆本至诚，何皇穹不祐，至有今日，若明祚未终，乞顺定国所为，军马无灾，俾同心力出滇救主；果历数既终，乞赐定国一人早死，无害此军民。五月十五日焚表，六月十一日定国生辰，病作，旋闻行在及太子遇害，仰天大恸，遂笃，托其子靳统武及马思良。廿七日夜，定国卒。未几，统武亦卒，思良举军降。嗣兴徘徊无所依，久之亦自慢怯出降，与刘文秀子震、艾奇能子承业俱入都受世职。

论曰：余闻有某妃者，亡其姓氏，当出边时，兵噪，诸营妇女窜奔，妃失行在所之，入白文选营，文选使内官及营中寡妇侍起居。自铁门限与定国辞决，每使人劝妃尽节，辞曰："有君上在，妾不敢死，非贪生也。"及文选降，桂王入滇，遂自缢，文选遣官葬之。呜呼！文选之为妃谋则得矣，邓凯《也是录》载入缅后，妇女死义有姓氏者九人，王妃二人，余姓氏未详者不下百人，为之抚卷凭吊。若定国之志，久而不渝，岂问所从来哉。

（录自《西南纪事》卷十）

李定国

涂 鸿

李定国，字鸿远，延安人，与孙可望、艾能奇、刘文秀同为献贼义子，赐张姓。献贼性喜杀，乱蜀时立赏格：凡部卒日得男壮手二百双者，授把总，女倍之，童稚不计，官以次进阶。寅出酉还以为常，可望辈遂皆至将军。岁丙戌，我大清兵戮献贼于西充之凤凰坡，定国时伪称抚南将军，与可望、能奇、文秀及伪都督白文选、冯双礼等招集残寇，由重庆南窜。明年，丁亥春，破

遵义，入贵州。可望赴云南救沙定洲之乱，令定国分兵袭临安。临安为沙部李阿楚驻守，拒战甚力。定国穴地置炮，崩其城，阿楚赴火死，城中士民悉被屠。遂围晋宁及昆阳、呈贡、归化，晋宁知州冷阳春、呈贡知县夏祖训等俱死之。江川知县周柔强率兵拒于抚仙湖，战败，一军尽歼。迤东诸郡屠戮之惨，不亚于蜀也。时永历帝立肇庆，诏令不及至滇，可望乃妄自尊，还至黔中，自称平东王，定国等亦皆自名为王，置四王府，尽撤昆阳、呈贡二城砖石为之。可望谋窃大号，然定国、能奇辈犹侪视之，定国尤倔强，遇事相抗。可望思所以示威，与文秀密为计，于己丑春以演武当场缚定国，声其罪，杖之百，已复相抱哭，令取沙定洲自赎。定国心憾之，念兄事久，未可造次发难，辄领所部驰至普洱讨定洲，围以木城，绝其水道，阅五旬，诸蛮惧，降者相续，乃擒定洲及其属数百人以出，回至省，剥其皮号令通衢。黔国公沐天波来，具礼谢雪不共仇，凡滇人之撄沙毒者，咸称快焉。定国既并蛮部，声势益强，可望遂无以为制，独霸之念，于是乎沮。会闻粤东有君，乃具表奉朔，求封爵，孙、李之隙自此始。永历帝初封定国为侯，寻进公。壬辰春，上居安龙。我大清遣定南王孔有德统师南伐，有德分重兵驻柳州为声援，已以七百骑趋河池州入黔。可望请以定国出楚，征虏将军冯双礼副之，率步骑八万，出楚，连复沅、靖，杀我总兵杨国勋，进攻湖南，我续顺公沈永忠弃宝庆，退保湘潭。定国时驻兵武冈，侦知桂林空虚，乃分遣西胜营张胜、铁骑右营郭有名率精兵由西延大埠头便道趋严关；而令双礼率前军都督高存恩、铁骑前营王会、武安营陈国能、天威营高文贵、坐营靳统武合兵先进，败王师于驿湖，斩骁将李四，进薄全州。定国自率右军都督王之邦、金吾营刘之讲、左协营吴子圣、武英营廖鱼、标骑左营卜宁合兵继进。途接驿湖之报，虑全州之众奔逸，并力于桂林也，传令全州傅城者无急攻。令未至而全州已下，乃令己军过全州者急过毋入，双礼诸军亦出城合进。时张胜、郭有名已至严关，与定国军相距十里。约曰："敌至则举炮传警。"薄暮闻炮，诸军欲赴之，定国曰："无庸！"俟之寂然，盖有德遣救全州之兵，见明兵已营关上，旋

退去也。明日王师至关下，胜传炮，定国令诸军蓐食传麾，甫交锋，象偾归，定国斩驭象者，诸军奋勇前进，象亦突阵，王师大奔，死亡不可胜计。天大雷雨，横尸遍野，追及于大榕江。有德急入桂林，定国昼夜环攻。七月癸酉，克之。有德自杀，叛将陈邦傅及其子曾禹、祖秘希、孔承先、孙龙、孙延世、曾盛、董英、袁道光等被执，并伏诛。庚辰，取永州，杀我守将纪国相、邓胤昌、姚杰等数十人，进复梧州。十一月辛巳，克衡州。我大清命敬谨亲王尼堪督师进讨，遇于衡州城下，大战竟日，定国不能支，败走。尼堪乘胜逐北，遇伏殁于阵，定国收兵屯武冈。方捷书发自桂林也，其人穷日夜易马而奔，既至贵阳，直入殿墀，下马卧地不能起，灌以汤药，乃甦，探怀中出捷书。于是大宴三日，可望题请封定国为西宁郡王兼行军都招讨，冯双礼为兴国侯，遣检讨方于宣、中书杨惺光赍敕犒军。行有日矣，而诸军之入楚也，独可望之护军称驾前军者不发。驾前军者，固选锋，闻桂林之捷，生妒心，曰："北兵本易杀，我辈独不得一当。"又定国多取金帛，上所虏获惟孔有德金印、金册、人参数捆，官库财物估价仅盈万。冯双礼以是不服，密启可望，言："定国专，后恐难制。"诸往来使命者又多增饰喜怒，谓："定国闻郡王封，滋不悦，曰：'封赏出自天子，奈何以王封王？'"于是可望益忌之。而是时，定国军威壮盛，不复可制，可望忿甚。已闻衡州之败，遣使召赴沅州议事，说者曰："此伪游云梦计耳。"龚彝亦致书定国曰："来必不免。"定国因止不行，率所部走广西，涕泣谓其下曰："不幸少陷军中，备尝险阻，思立尺寸功，匡扶王室，垂名不朽，今甫得斩名王，奏大捷，而猜忌四起，且我与抚南弟同起云南，一旦结误，辄遭废弃，忌我当必尤甚。我妻子俱在云南，岂得已而奔哉！"诸营闻之，有引军从者。明年，可望自将精骑追之，猝与大兵遇于宝庆，大败，大兵亦引还，定国遂据守粤西。时上在安龙，日就穷促，而可望逆谋益亟。上乃密与大学士吴贞毓，中官张福禄、全为国等谋，遣给事中林青阳赍勅赴定国营，进封晋王，令统兵入扈。定国奉诏感泣，许以身报。上复铸"屏翰亲臣"金印赐之。已而马吉群泄其谋，自贞毓而下十八人

俱被害。可望憾定国益深，定国亦恐其来袭，出掠廉、雷以避之；破高州，进攻新会，为大兵所败。可望闻定国败驻柳州，命冯双礼袭之，定国烧粮走。双礼谓其怯也，追之，遇伏被擒，定国礼而释之，由是双礼倾心于定国焉。明年，定国退驻南宁，衰弱不振，可望遣总兵张明志、关有才袭之。定国计无所出，中书金维新、曹延生曰："明志等兵虽多，皆帅主旧部下，安敢相敌！今以奇兵袭之，彼不虞我之至也，且惊而溃。我乘胜至安龙迎皇上入云南，美名厚实兼收之矣。"定国然之，率靳统武、高文贵等集兵万人，拔寨从小路行五日，出明志营后，猝冲之，明志军大乱，降其众三千人，进趋安龙。可望侦知，趣令白文选劫上赴黔，文选竟与定国连和，奉上由安南卫西趋云南。滇中守将刘文秀亦怨可望，共迎上入城，居可望第。定国亟令收吉翔，吉翔复媚事之，以免，详《吉翔传》。论功，封文秀为蜀王，文选巩昌王。文选还黔，可望怒其二于定国也，夺其众而靰之，然以家口在滇，未敢反。丁酉夏，上命张虎归其妻子，秋七月，遂举兵反。九月，定国、文秀御之交水，白文选暨马进忠、维兴等悉叛可望来归，贼狼狈入黔，挈妻子奔长沙，投我经略洪承畴军前以降，详《可望传》。双礼、进忠俱晋爵为王，其余诸将进秩有差。戊戌二月，王师自蜀、楚、粤三路会兵入黔，定国分遣其将刘正国、杨武等扼守三坡、红关诸险要，马进忠驻贵州。四月，王自奇、关有才反，定国自将讨平之。我楚师入镇远，贵州告急，不及救，自奇等诛，而贵州遂不守矣。蜀师至三坡，正国遁，遵义亦失。五月，蜀师破杨武兵于开州之倒流水。秋七月朔，上拜定国为招讨大元帅，赐黄钺。粤师抵独山州。十月，三路兵俱集，戒期入滇，定国与文选、双礼等亦分三路御之，连战皆败，大营、妻子俱散失，诸将北走不相顾，马宝等降。报至，上奔永昌。己亥正月三日，大兵入云南，上下诏罪己，定国还钺待罪，请削秩，不许。二月望日，大兵抵大理之玉龙关，文选战败，定国令总兵靳统武以兵四千扈上奔腾越，已乃伏兵磨盘山，即高黎贡山也。大理寺卿卢桂生叛降于我，泄其谋，复大败。报闻，上与马吉翔、李国泰等连夜走缅甸。定国收余众追扈，则上西行去

腾越已百里。念君臣俱死无益，闻文选屯兵木邦，就之谋曰："主上入缅，敕汉兵毋入关，我若深入，恐生不测祸。万一北兵有警，此地无险要可御，莫若妥择边境，屯集作后图。"而文选以上左右无重兵，请身入捍卫，意不合。定国遂自引所部从孟艮抵猛缅驻扎，前此溃众陆续至，势稍振。未几，移营孟连，贺九仪邀文选部将张国用、赵得胜等归之。孟艮有女酋长惧为所并，纠众抗拒，定国灭之，据其城。以敕印招土司，谋恢复，沅江土司那嵩受总督印，密为传布，各土司亦有听命者。会吴三桂破沅江，那嵩自焚死，事不果。九仪妻子在滇，为三桂所得，令作书招之，九仪将出降。定国杖杀之，国用、得胜皆怏怏有二志。总兵唐宗尧，奸弁也，守磨艿，凡告奋勇投孟艮者，已悉收隶麾下，商贾往来者财货悉被劫，由是南北道梗，滇中、阿瓦消息绝不通。已文选别由木邦举兵薄阿瓦，再举皆不克，乃还兵至孟艮会定国，合兵进逼锡箔江，即垌坮也。辛丑夏四月，定国遣使入城求上，不许。相持久，乃退屯三十里。缅人于郊外立木城，逼寨拒战，定国、文选大破之，决计渡河，驾浮桥济师，为缅所断。复遣都督丁仲柳等于上流造船，工将竣，缅出奇兵焚击，仲柳弃船走，复不果。初，定国屡购夷民具奏密请上速计出坎，且言："臣等兵不敢深入者，激则恐生内变也。必善谕缅人送之出境，方为上策，诸臣在内，何泄泄不以为意也！"上以玺书奖慰之。先后凡三十余疏。半为缅人所获，不得达。寻与文选议分兵进，次桐坞，以十六舟攻之，缅人凿沈其五，遂引还。而国用、得胜以九仪之死衔定国，挟文选北走，将出降。抵耿马，遇定国部将吴三省。三省于安龙之败，寻获定国家口，来诣孟艮，至则定国已移营。及至磨艿，知宗尧奸，杀之，兵弱不敢深入，流连孟定、耿马间。文选见三省，不言而涕，三省察有变，说以情，质以义，诸将心动，复合军屯于锡箔，吴三桂侦知之，亟令马宝率兵追文选，且招之，文选仓猝遂降。是冬，十二月朔，缅人执上及两宫献于三桂。明年，壬寅四月戊午，上殂于云南，明亡。自戊戌二月以后事，互详见《本纪》及《纪年》。上之舟行入缅也，从官云散，马九功入古剌江，国泰入暹罗。

二国与缅为世仇。暹罗以女为定国妃，令国泰间道通殷勤，谋连兵攻缅；九功亦为古剌招溃兵三千人，致书定国，相掎角。方克期进兵，而滇讣闻，定国擗踊号哭，自掷于地，不食三日，表于上帝以祈死，于六月十一日生辰病作，谓其子嗣兴、部将靳统武曰："任死荒徼，无降也!"越数日，定国卒。未几，统武亦卒，嗣兴竟以所部降，古剌、暹罗之师失望而返。后有自缅至者，曰：定国所葬地，至今春草不生，蛮人过之，辄跪拜而去云。

（录自《小腆纪传》卷三十七）

李定国传

《腾越州志》

李定国者，不知何处人。初，从为贼，献忠死，与其党孙可望、刘文秀、艾奇能、白文选、冯双礼等由蜀奔滇。既擒沙定洲，与孙可望迎永明王于粤，封定国为国公。后永明为可望所制，驻安笼，以定国为西宁王，不受，并不奉可望约束。永明急，密封定国为晋王，使来迎。时定国在广西屡败，以得王密勅，赴安笼，挟王西行至滇，与刘文秀共推戴焉。孙可望既投诚于长沙军营，进贵州，伐滇，定国败，奉王走永昌，时戊戌十二月十五日也。又走腾越，先令王宫眷出三宣入缅，定国督兵扼磨盘山，力战败绩。时（王）已入缅，定国曰："吾焉从？从帝而追及之，俱死无益也。"乃由顺云界入孟艮，屡举攻缅，不克。及王被执回滇，擗踊号哭，自掷于地百十次，不食者三日，越七日而死，葬景线。定国有子曰嗣兴，于吴三桂前投降。时泰安伯窦民望与定国扼守磨盘山，或言曰："窦人磨盘，其能久乎?"血战死。其死缅者甚众，可举者：吉王慈煃，吉简王见浚后，崇祯九年嗣封，邸在长沙。十六年，贼入湖南，同惠王奔粤依桂王，又随入缅，与妃张氏同死之。其被围自缢者，则叙国公马惟兴，

总兵姚文相、黄华宇、熊惟贤，宗室朱义漆，锦衣卫赵民鉴、王大雄、王国相、吴承胤、朱文魁，序班尹襄，千户郑文远、李既白、凌云、吴某，百户吴麻子十六人，内监一。排缢者陈德远等十八人。排缢又有通政朱蕴金，中军姜成德。王之入缅也，缅以四舟来迎，从官自觅舟随行者六百四十余人；陆行者，岷王子而下九百余人，朱蕴金、姜成德与焉。缅发兵截陆行者，岷王子率八十余人流入暹罗，有总兵潘世荣降于缅，余悉为所掠，蕴金、成德死之。其松滋王、瑞昌王俱死于缅，名失传，惟黔国公沐天波为著。当王之出亡也，蛮莫土司思绵告缅，缅迎之，出神宗玺书，索金玺合之，疑为伪；天波出己印，与先所檄合，始信。迎至缅赭硁地，以草屋居之。时缅弟杀兄自立，号莽猛白，欲尽杀文武诸臣，遣人来告曰："蛮俗贵诅盟，请与天朝诸公饮咒水。"至则以兵围之，凡杀四十二人，天波犹手刃酋，杀数人而死。而都督马雄飞者，马吉祥弟也，亦死焉。至于缅寺者，绥宁伯蒲缨，华亭侯王维恭，张宗伯，史部诗郎邓士廉，太常博士邓居诏，礼部侍郎杨载，河南道御史邬昌琦。其铮铮有声者，绍兴高绩，字无功，与邬昌琦合疏劾马吉翔、庞天寿，谓定国、文秀："功高望重，不当往来权幸之门，恐滋奸弊。"又郎官绍兴金简，字万藏，与高绩以定国武备废弛，合疏极谏，既而楚、蜀、广三路师至，定国等惭谢之。御史任国玺，谏王死守，不听，从王入缅，曾集宋末大臣贤奸事为一书以进，马吉祥深恨之，王览一日，中官李国泰窃之去。礼部侍郎杨载，与任国玺，因沐天波赴缅中秋会谐诸酋，椎髻跣足，劾之，天波泣曰："我所以屈辱者，惧惊忧主上耳。否则，彼将无礼于我，我罪益大。"至是亦皆死。他如礼部主客司王祖望，仪制司斐廷谟，兵部武选司郭璘，学录潘璜，典簿齐应选，靖东将军魏约，总兵王白金、安朝柱、王升、陈谦、王启隆、龚勋，旗鼓吴承爵，锦衣卫指挥任子信、张拱极、刘相、宋宗宰、刘广宁兄弟二人、宋国柱、丁调鼎、李茂芳、裼宗华、李崇国，又内监周某、卢某、曹某、沈某、杨某五人，俱失名，自沐天波而下，凡若干人，皆死于缅。时马吉祥为文安侯，并司礼庞天寿、李国泰，亦死于缅，不书者，以其奸邪

删之也。时存王之属二十五人，都督同知邓凯，以足疾不行，获免，时顺治十八年七月也。而入缅死难节烈十一人者，亦附记之焉。刘氏、杨氏，俱永明王妃，称贵人者，兵将乱，同缢死。松滋王妃，兵将乱，恐及于难，顾侍妾将产，令其自缢，候其气尽，自刎死。任国玺妻，自缢死。齐环妾，环为大理卿，病殁，妾遗腹生一子，所居草屋狭隘，且人众，妾求死不得，一日，给女伴河边观水，忽厉声曰："我去矣。"抱其子投水死。吴承爵妻，兵乱，一子一女，先令自缢，有劝之曰："何乃如此?"曰："此等小孩，我死谁见怜，与其留作蛮子，莫若与之俱死耳。"乃自缢死。以上姓氏俱失传矣。而吴氏，总兵王启龙妻，兵乱，与妾周氏将自缢，内臣李犹龙见而救之，吴氏正色曰："君与妾夫厚，宜速妾死，今反相救，岂欲妾等为蛮子妇耶?"竟同缢死。马氏，马吉翔之女，兵乱，自缢数次不死，终日哭不食，复缢死。以上诸烈女，皆在缅闻乱死节者。纪事者谓当时宫嫔及命妇妻女自缢死者，累累如瓜果之挂于树，不可胜纪，兹特其可认者十之一耳。呜呼！国破家亡，流离至于万里蛮夷之域，乃甘一死如饴，以全其身，亦云烈矣！可传者若而人，固已争光日月，即不幸姓氏无传，而其幽魂必不与蛮花野草同腐，百世后固有知死于缅者，有若而人在也。而缅酋之为祸亦烈矣哉！

（录自乾隆五十五年刻《腾越州志》卷八）

李定国传

《清史稿》

李定国，字鸿远，陕西延安人。初，张献忠为乱，与孙可望、刘文秀、艾能奇并为献忠养子。献忠入四川，遣诸将分道屠杀，定国为抚南将军。顺治三年，肃亲王豪格率师入四川，献忠死西充，可望与定国等，及白文选、冯双礼率残众自重庆而南。四年破遵义，入贵州。可望令定国袭破临安，屠其城，尽下迤东

诸郡县，定国等皆自号为王。居年余，可望用任僎议，自号为国主。时能奇已前卒，定国、文秀故侪辈，不相下，而定国尤崛强。六年春，可望密与文秀谋，借演武声定国罪，缚而杖之百，已，复相抱哭，令取沙定洲自赎。定国憾可望，念兄事久，未可遽发难，乃率所部攻定洲，定洲降，械以归，剥皮死。定国兵渐强，可望知不可制，乃通使桂王，思得封爵弹压诸将。桂王封可望公，寻进为王，定国与文秀亦自侯进公。八年，可望遣使迎桂王，九年劫迁安隆所。会定南王孔有德师出河池向贵州，可望令定国与冯双礼将八万人，自黎平出靖州；别遣马进忠自镇远出沅州，两军会武冈，图桂林。文秀亦出兵规取成都。可望言于桂王，进定国西宁王，文秀南康王。定国自靖州进陷沅州，再进陷宝庆，遂破武冈，与双礼兵合。有德引师还桂林，定国使张胜、郭有铭为前锋，趋严关；而令双礼与高文贵、靳统武继其后。有德遣兵逆战驿湖，败绩，陷全州。定国与王之邦、刘之讲、吴子圣、廖鱼、卜宁率所部自西延大埠疾驰向桂林，胜、有铭已破严关，有德率师出战，定国军中象阵略退，斩驭象者以徇，所部战甚力，驱象突阵，有德败绩，退保桂林。定国昼夜环攻，城陷，有德自杀。定国分兵徇广西诸郡县，梧州、柳州皆下。又遣白文选攻陷辰州。大将军敬谨亲王尼堪率师南征，次湘潭，马进忠引退，师从之，次衡州。定国赴援，两军同时至，战衡州城下，定国败走，敬谨亲王自率精骑追之，遇伏，没于阵，定国收兵屯武冈。定国转战广西、湖广，下数十城，兵屡胜，可望益嫉之，次沅州，召定国计事，将以衡州败为定国罪而杀之。定国察其意，辞不赴。十年，率进忠等犯永州，大将军贝勒屯齐率师自衡州赴之，未至，定国度龙虎关，复入广西，次柳州。可望会双礼追定国，自靖州进次宝庆，贝勒屯齐遣兵自永州要击，可望败走还贵阳。定国自柳州道怀集，攻肇庆，师自广州赴援，战四会河口，定国兵败，移军破长乐，行略高、雷、廉三府，悉属于定国。桂王在安隆，马吉翔为政，遥奉可望指。可望谋自帝甚急，王惧，与大学士吴贞毓谋，密遣林青阳勅定国统兵入卫，定国感泣，议奉迎。青阳密使报王，王复遣周官铸“屏翰亲臣”金印赐之，定

国拜受命。十一年，事为吉翔闻，启可望，可望怒，遣其将郑国按治，杀贞毓。青阳及诸与谋者凡十八人，独官走免。定国发兵陷高明，进围新城，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继茂赴援，次三水，将军珠玛喇以师会，战于珊洲，定国兵败，退保新会，师进击之，定国败走。十二年，师进次兴业，再进次横州江上，定国战屡败，乃道宾州走南宁。可喜等抚定高、雷、廉三府及广西横州。十三年，师进攻南宁，定国战复败，将道安隆入云南。可望诇知之，遣白文选移桂王贵阳，文选心不直可望，因密告王曰："姑迟行，候西府。"西府，谓定国也。定国至，文选与共奉王自安南卫入云南。文秀自四川还军，可望令与诸将王尚礼、王自奇守云南，亦不直可望，遂与沐天波迓王入居可望廨。进定国晋王，并封文秀、文选皆王，尚礼等公。令文选还贵阳喻意，可望夺文选兵，置之军中，定国舍靳统武收吉翔，将杀之。吉翔哀统武为言于定国，召入谒，叩头谄定国，定国荐于王，使入阁复用事。十四年，可望举兵反，攻定国，起文选为将，留双礼守贵阳。定国与文秀率师御之，遇于三岔河，两军夹河而陈，文选弃其军奔定国。可望遣张胜、马宝自寻甸间道袭云南，而自将当定国。战方合，其将马维兴先奔，兵尽溃，可望走还贵阳，定国遣文秀追可望，引军还云南，遇胜于浑水塘，获而杀之，宝降定国。可望至贵阳，双礼言追兵且至，可望乃诣经略洪承畴降。双礼尽取其子女玉帛从文秀归云南，桂王进双礼王，维兴等公。十五年，大将军罗托自湖南，吴三桂自四川，将军卓布泰自广西三道入贵州。文秀病卒，定国使刘正国、杨武守三坡、红关诸隘，御三桂；马进忠守贵州。会王自奇、关有才贰于定国，据永昌举兵，定国自将击之，罗托师自镇远入，定国不及援；卓布泰亦尽下南丹、那地、独山诸州，两军会贵阳，进忠遁去。三桂师后入，至三坡，正国拒战，大败，自水西奔还云南。师次开州，武迎战倒流水，亦败，遂取遵义。王拜定国招讨大元帅，赐黄钺，谋御敌。三桂亦入贵阳，大将军信郡王多尼至军，会师平越，戒期入云南。定国与双礼扼鸡公背，图复贵州；文选守七星关，三桂师自遵义趋天生桥，出水西，克乌撒，文选弃关走沾益。卓布

泰兵次盘江，自下流宵济，遂入安隆，定国将吴子圣拒战败走。定国以全军据双河口，卓布泰师进破象阵，迭战罗炎、凉水井，定国兵溃，妻子俱散失，诸将窜走不相顾。定国收兵还云南，奉桂王走永昌。十六年春，师自普安入云南会城，定国使靳统武护桂王走腾越。文选自沾益追及定国，定国使断后，屯玉龙关，师从之，文选战而败，自右甸走木邦，师遂克永昌，渡潞江，陟磨盘山。定国使其将窦民望、高文贵、王玺为三伏以待。师半度，以炮发其伏，伏起力战，自卯至午，短兵接，死者如堵墙，民望弹穿胁，犹持刀溃围出，乃死，玺亦死于阵。定国坐山巅督战，飞炮堕其前，土坌起扑面，遂奔，退走腾越。未至，马吉翔以桂王走南甸，统武还从定国。双礼渡金沙江走建昌，其部将执以出降。桂王入缅甸，定国次孟艮，如木邦，从文选谋，分屯边境。文选将入卫王，与定国意异，定国乃移驻猛缅，收残部，势稍振。未几，复移驻孟连，贺九仪招文秀将张国用、赵得胜归定国。孟艮酋惧定国兼并，攻定国，定国击破之，遂据其地，号召诸土司起兵。沅江土司那嵩应定国，三桂讨焉，嵩自焚死。三桂使招九仪，定国执而杀之，国用、得胜皆怏怏不为用。定国坐是终不竞。十七年，文选自木邦攻阿瓦，求出桂王，不克，引兵会定国孟艮。十八年，合兵复攻阿瓦，定国上三十余疏迎桂王，为吉翔所阻，不得达。文选使密启王，得报书。与缅人战，定国军稍却，文选引兵横击之，缅人大败，退城守，然终不肯出桂王。复议以舟师攻之，造船为缅人所焚，乃移兵次洞邬，国用、得胜挟文选北走，定国还孟艮。文选至耿马，遇定国将吴三省，方得定国妻子，将归诸定国，乃合军驻锡箔，凭江为险。三桂与将军爱星阿会木邦，倍道深入，文选降。师薄阿瓦，缅人执王归于我师。定国自景线走猛腊，遣将入车里、暹罗诸国乞师，皆不应，伺边上，求王消息。康熙元年，闻王凶问，号恸祈死，六月壬子，其生日也，病作，诫其子及靳统武曰："任死荒徼，毋降！"乙丑，定国卒。统武寻亦卒。嗣兴乃与文秀子震率所部出降。

（录自《清史稿》列传卷十一）

二、李定国论

一、黄宗羲

逮夫李定国桂林、衡阳之战，两蹶名王，天下震动，此万历戊午以来全盛天下所不能有，功垂成而物败之，可望之肉，其足食乎！屈原所以呵壁而问天也。

（录自《永历纪年》）

二、刘　菹

晋王之死，大有田横之风，不若白文选束甲来降，气节扫地。然二藩兵马一出，皆分隶各营，李嗣兴、刘震、白文选踽踽凉凉，随入京者不过数十人而已；随赵德胜、张国用、马士良、胡顺降为副参，发入各督镇标下效用，相随止小子十余，无不悔恨。向使经略初入黔，兵单马毙之时；晋王不受黄钺，不疑各

镇，听程源等泣请出师取黔之表，早提一旅，直捣贵阳，黔既复则蜀、楚、粤三路丧胆，满师不敢深入，何至失滇？向使不听马吉翔之言，不改幸蜀之策，则联镳合舰，直抵荆襄，而云南虽弃，久已得楚矣！向使马吉翔、孙崇雅不暮夜兼程，则车驾入缅，护兵不散，犹易于出险而会两藩；缅人不敢拘执，况敢献清乎？向使巩、晋协和，死守缅地，则缅人必不敢献车驾于清，自贻国破之虑，而清师亦无由长驱如入无人之境。向使两藩扎营，声援相近，则车驾被执，晋王告终，而巩藩尚在，犹能总统涣散之人心，或冲出粤，或冲出川，无不可以得志。乃计不出此而先撤楚戍，致清人陷黔，方犹豫滇省，使清兵四合，敌入堂奥，然后出师，一败涂地，此一失也。听奸臣之言，中途改幸蜀之策，窜伏夷荒，终于不振，此二失也。护驾不终，两雄不和，弃置君父为小夷所执献，定国死后，妻子俱俘，为天下笑，此三失也。嗟嗟！晋王误国之督，即一死但可赎其半尔。汉之亡，亡于天意；宋之亡，亡于兵弱；明之亡，非无将无兵，而亡于谋虑之不长，非时势之不然也。故曰：清之兴天也，非人也；明之败人也，非天也。悲夫！悲夫！

（录自《狩缅纪事》）

三、李　寄

明春予至楚长沙，人皆言定国兵律极严，驻师半载，居民不知有兵，入市输买。定国所将半为猡倮傜佬，虽其土官极难钤束，何定国御之有法也。予又闻：癸巳，定国复攻桂林、广南，出象古（队）以之战。定国以之攻城，城门为象坐开，城中皇急，以火御之，得不破，军营城下，营中寂然无声，明日铳三声，师尽撤矣，城中犹不知，二日发马往探，始知在象州歇马。纪律如此，可称节制之师。故能以三万众出入两广，长驱千里，□□□□□□，然恃其材武，连年攻战不休，有败道矣。此兵家所戒，而定国不知何欤？以古论之，定国其伯约之流亚也，天不

祚汉，伯约何为焉！

（录自《天香阁随笔》卷一）

四、金　钟

若夫仓皇入缅，本无定策，浪冀有成之保聚，竟等车驾之孤注；且自弃戈甲，徒手陷险，致李定国等外兵不得入，入而一河之阻，声息不通，遇难诸臣，相继殒命。即晋王孤军百战，岂能收虞渊捧日之功哉。

（录自《皇明末造录·金序》）

五、佚　名

嗟乎！晋王虽流寇发端，是一战将也。奈何勇有余而谋不足！战争原以取土地，晋王能得之而不能守之，取之何益？勇略所以制敌人也，当击而不击，勇何足道？要之，犯主骄民疲之病，而晋王不能知，安有不败者哉！昔魏文侯问李克吴之所以亡？克曰："数战数胜。"文侯曰："数战数胜，国之福也，何故亡？"克曰："数战则民疲，数胜则主骄，以骄主而御疲民，未有不亡者也！"晋王其似之。

（录自《滇南纪略》）

六、鹿　樵

再后，纪纲诸大臣扶永历于粤西，苟存朱氏之一脉，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之时，孰意东见逼于豺狼，西受制于孙逆？于呼！天下为家，立锥何地？赖晋王李定国奉之入滇，虽苟图存于丧败之余，尚可借资为兴复之举。何期孙逆肆鱼馁之谋，操戈同

室，称兵犯阙，死有余辜；幸脱天诛，复生他衅，致窜身于缅甸，是何异于赵氏之一块血肉苟延海表耶！及晋王以磨盘丧师，徬徨寻帝，缅酋狡计狯诈疑兵，奈何岚气熏天，人难存立，兼之缅酋援至，火炮交加，晋王只得东走孟艮，兴复再图。帝陷缅城，有谁护跸……幸沐氏之系存于遐陬之外，为帝同死患难；更喜晋王李定国以流寇之渠魁，洗心易辙，竭忠为帝，虽不能挽回天意，而其志足有可嘉，况甘心薨于编发文身之域，揆厥弃邪归正之始，克全忠孝之终，岂不为千秋之一鉴也夫。

（录自《滇南纪略·鹿樵序》）

七、计六奇

桂藩立粤东，僻处海隅，一逼于成栋，再逼于三王，三逼于孙可望，遁走不常，舟居靡定，是时君不君，国不国矣。虽有瞿桂林留守四载，无济时艰；至于杜允和、李定国辈，益难支矣。若成功、煌言，出没风涛，徒扰民耳，亦何益乎。

（录自《明季南略·自序》）

八、叶梦珠

若李定国拔身强寇，归附孱主，百折不回，誓死不二，虽以乱始，能以正终，亦人杰矣！传曰：能补过者君子也，岂特铁中铮铮已哉。

幸李定国出君于险，挟之而走云南；观其初未必不为曹操，而究其实乃远胜乎宇文。故同一挟主也，承胤挟之以居奇，邦傅挟之以市贿，成栋郊迎供顿，犹修人臣之乱。若可望者，直欲借皇家之命讨以鞭策群力，视君不啻如弁髦，斯真合董卓、朱温而兼其恶矣。定国与可望同起寇盗，独能以臣节终，虽皇威远播，率土悉臣，定国不能苟延明统于一线，然以视刘、陈、可望，其

得失如迳庭矣。

（录自《续绥寇纪略》卷三、卷四）

九、宋世荦

彼李定国者，本逆贼之爪牙，丑形天之面目，乃能幡然改正，蠹焉勤王，目不知书，心惟报国。岗崖已破，犹奉块肉于一君；怀愍不远，终效捐躯于九殒。填魑魅之乡而不悔，竭犬马之力而不辞，志节如申包胥，心迹如张世杰，亦可见桑榆之非晚，松柏之有节矣。

（录自《见闻随笔·宋序》）

十、南沙三余氏

东南人材，独萃粤西。论其尤者，如腾蛟殉国，式耜致身，十八之成仁，二张之遂志，非万里之长城耶！新兴连挫大敌，安西二蹶名王，亦中叶以来，未有之勋矣。乃文武忠烈，而君卒偷惰，虽无秦逆，终陷蛮乡耳。噫！竖子洵不足与谋哉。

（录自《南明野史》卷下）

十一、益元氏

南宁迎驾，仅同傕、汜之谋，可望、任僎罪可胜诛乎。幸而晋王以丧败之余，计无所出，乘虚夺驾，遂跸云南。交水之犯，省会之功（攻），岌岌乎且钊刃于二宫矣。一败涂地，狼狈降清，示瑕献图，兵端遂启，渔人之利，清实收之。况乎晋王既自撤其藩篱，维新且日弄其威福，三路外攻，逆党内应，晋王方仓皇于舟中之敌国，奚暇整戈御敌也。

（录自《也是录·桐山樵隐冥鸿子益元氏序》）

十二、李天根

李定国，真虎将也。倘有如诸葛武侯其人者，识之畴人之中，举而用之，遇之以国士，寄之以股肱，明赏罚以激其忠义，去文网以舒其手足，战必胜，攻必克，关、张、马、赵之功不足多也。而弃之于贼，半天下之民，遭其屠戮，是甚于借寇兵赍盗粮也。欲国之不亡，乌可得哉！

李定国秉虎狼之性，金公趾以《三国演义》开导之，一变而为忠臣义士。夺永历于虎口，驱可望若游魂，两蹶名王，连拔大郡，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读史者无不咤其事之异。永历君臣遭此，讵非大幸。倘稍有心肝，即当画战守之策，图久安之计。据守滇、黔，徐收两粤，文治其内，武备于外，亦可立国。何乃如饥极得食，鼓腹一饱，倒头磕睡，大清南来，一冲而散。呜呼！以道长之君，依流贼之帅，一闻烽警，走耳，何暇计及安身立命也。殊不知三宣、六慰之外，更无立锥之地也。

（录自《爝火录·论略》）

十三、全祖望

邓都督《也是录》，质实无虚语，但其责李定国似太苛，定国毕竟是流寇出身，故其罪在不能杀马吉翔耳。若欲其以一隅而抗王师，挽邓林之落日，是非所能也。要其始终为桂王，百折不降，至于旁皇交趾境上，祈死而竟得死，是则天鉴之矣。屈大均过李献武王祠曰：“从来赐姓者，只有晋王贤。”谓定国也。今《明史·桂王传》于王死后，大书曰“李定国卒，其子以所部降”，而后终卷。然则定国之卒，关于王者大矣。定国亦可以瞑目矣！

（录自《鲒埼亭集外编》卷二十九）

十四、剑　心

全谢山《鲒埼亭集外编》题《也是录》云："邓都督此录……定国亦可以瞑目矣！"今按《求野录》，每于定国有微词，而《也是录》无之。然其述晋王闻吴三桂执永历旋滇，不食三日以祈死；又述晋王所葬地，春草不生，"蛮"人过之，辄跪拜而去。是邓氏虽病其措置之乖方，未尝不谅其孤忠之尽瘁也。故因谢山说而论之如此。

（录自《也是录·剑心跋》）

十五、李慈铭

永历之李晋王，亦翻山鹞比也，而以一身结有明残局，与元之王保保等。邓凯身与其事，其著《求野录》，虽加诋谋，然于永历戕后，大书"晋王李定国薨"；又述其闻永历之耗，"擗踊号哭"；且言其墓"至今春草不生"。足见死重太山，公论不灭者矣。

（录自《越缦堂日记》）

十六、李　瑶

古高易氏曰：定国虽起家扰攘，而能辟党奉王，始终无间，百折不降。洎至天鉴其诚，祈死得死，可谓贤矣！推其晚节，惟不能杀一马吉翔，为有余憾。若欲其挽邓林之落日，以一隅而抗天兵，则太苛也。全氏曰："屈翁山大均题李献武王祠云'从来赐姓者，只有晋王贤'，谓定国也。《明史·桂王传》于王死后，大书曰'李定国卒，其子以所部降'，而后终卷，然则定国之卒，关于王者大矣。定国亦可以瞑目矣！"呜呼！李晋王之于永明，犹之黄靖南之于赧王，张司马之于鲁监国也。温氏于靖南则略，

于晋王、于司马则阙，故勘本南都下：以靖南之役，大书爵位；此粤中、浙东二纪，则于书后特表出之，是不背乎载笔者之旌善云尔。

（录自《南疆绎史》纪略五）

十七、徐　鼒

徐鼒曰：莼乡董氏言，定国拔身群盗之中，秉忠反正，尽瘁事国，乃至崎岖以死，呼天以明其心，亦古之烈丈夫哉！屈大均题李献武王祠云："从来赐姓者，只有晋王贤。"执鞭欣慕之情，溢于言词之表，全祖望谓《明史·桂王传》于王死后，大书李定国卒，其子嗣兴降，而后终卷，然则定国之关于明者大矣。定国亦可以瞑目夫！

（录自《小腆纪年》卷二十）

三、有关李定国的诗歌

一、至夜传王师出粤志喜

张煌言

土圭才见影初长，忽报天声出五羊！始信玄阴销北陆，悬知赤伏耀南荒，金鱼尚自唐分锡，铜马翻为汉辟疆。此日孤臣淹涨海，衣冠拂拭待从王。

（录自张煌言：《张苍水集》）

二、歌“一匡”[1]

查继佐

墨子叹息，以粤为国。晋王曰：不然，一匡天下，战胜数千里，檄试诸儒雅，并及天下流寓者。今日衡文昨跨马，倾国风流应独写！此时臣心最欢，可痛饮一石也！

（录自查继佐：《东山国语·墨语后序》）

三、唐晋王祠墓

屈大均

北伐威名著，飞扬射马鞭，长安回帝驾，天祐纪臣年。三矢山河启，千秋俎豆悬，“从来赐姓者，独有晋王贤！”[2]

（录自屈大均：《道援堂诗集》卷五）

四、李六处女

屈大均

六处女者，皆李氏，番禺茭塘都宏福乡人。癸巳，晋王帅师至新会，茭塘诸乡治战船应之。晋王败绩，敌攻宏福，六女登楼皆缢。

双燕归何处？楼台久不春，云疑飞髻女，月是弄珠人。玉佩捐湘浦，罗衣绝塞尘，琵琶弹马上，嗟彼去和亲。

小姑弹宝瑟，大姊织流黄，独立朝霞里，双流白日光，何曾窥宋玉，不肯作王嫱。一代红颜尽，当楼恨未央。

（录自屈大均：《道援堂诗集》卷四）

五、许二烈女

屈大均

二处女者皆许氏，番禺潭山乡人，父明宗，某县知县。癸巳，晋王帅师至，“兵”以潭山乡与晋王交通，攻之，二处女从母某氏及庶母某氏，投井死。

双雏随阿母，游戏在芝田，正鼓湘灵瑟，俄惊老土弦，银瓶齐坠井，玉镜不当天。百尺寒浆里，连枝产白莲。

雉子斑斑好，同楼春陇旁，一朝矜意气，双翼碎文章。蔡琰何能侠？明妃实不祥，可怜龙塞去，眉黛拂秋霜！

（录自屈大均：《道援堂诗集》卷六）

六、洗象行[3]

屈大均

玉河六月河水长，朝廷旧典赐洗象，昆明不见旧楼船，太液何来新甲仗？倾都观者皆欢娱，宣武门外铺氍毹，公子踏花红叱拨，佳人障日锦屠苏。须臾前导执金吾，二十四象天街趋，龙旗送出千门柳，羽骑迎过万岁湖。花牙润洁体雄诡，横行郁若近山徙，自是瑶光星降精，惟有神龙力可比。夜郎蛮奴驯习者，手握银钩左右下，骑入洪波走巨鱼，突出平沙惊万马。水花澒洞溅浮云，两边金鼓鸣虎贲，似逢光武昆阳战，如彼吴王水犀军。万人欢呼动城阙，一片红尘污冰雪，争道骅骝拥御桥，两行灯火侵宫月。白头中使偶相逢，三朝腰玉赐穿宫，谓予此象养天厩，当年捧（俸）与将军同。晓披璎珞朝皇极，秋驾銮舆出喜峰，去岁云南师败绩，象兮曾与沮渠敌。周王八骏去何之，夏后两龙归未得，可怜巇嵲虎豹姿，虽饱膏粱泪沾臆。

（录自屈大均：《道援堂诗集》卷三）

七、义象行[4]

屈大均

将军来从夜郎天，万里旌旗横海边，左右名王膏玉斧，西

南君长执长鞭。因之问罪尉佗国，兵胜由来骄气作，美女聊为歌舞欢，谋臣自有孙吴略。营中何物高嵯峨？十四雄象相荡摩。久向滇池习战斗，凭之触敌计长善，蛮奴一下紫金钩，蹴踏沙场山岳转。岂意中宵敌溃围，不诛庄贾损军威，至尊方有平城危，丞相频从泸水归。谁言不败由天幸，自是无功因数奇，神龙失水困蝼蚁，往日风雷嗟已矣！梅锖关上阵云崩，伏波祠前鼓声死。象兮尽入橐驰群，口衔苜蓿泪纷纷，蕃雏骑向天山道，汉使愁看黑水滨。中间一象独不驯，天子曾封为将军，势每奔腾蹂万马，声如喑哑废千人。曾击长沙城阙碎，如虎如熊谁不爱？皇天不欲兴神州，致使六军齐受害。由来犬马思报主，况乃瑶光星降汝，曾被雷惊花入牙，御前妙舞如鸾翥。唐朝不拜赤心儿，今日宁降老上师？几夜偷营多伤杀，田单火牛宁足奇！堪嗟巨炮争丛击，战场孤力终难支，皮可寝兮肉可食，死为雄鬼游八极，从来骥也称其德，人不如兽徒千亿！

（录自屈大均：《道援堂诗集》卷三）

八、读《残明遗事》漫记

刘　彬

凛凛孤忠志独坚，手持一木欲撑天，磨盘战地人犹识，燐火常同日色鲜。

（录自《腾越厅志》卷十九）

九、李安西定国

王思训

银河欲挽洗汙尘，吹烬烧天妄亦真，死荷圣朝宽斧钺，生教

乱世有君臣。青虫怙类亡人国，白虎离伥致厥身。历代尊贤兼养士，独余豪帅重人伦。

（录自《腾越厅志》卷十九）

十、李将军掷身歌

尹 艺

天下安有白头贼，失落无归为势迫，一朝不远如知复，此是豪杰岂易得，古今似此不胜述，听述将军李定国。将军昔事张献忠，屠伯讵足称英雄，贯中不用箫吹竹，四家养子溃之东。之东窜入云南地，诡言焦氏救兵至，杀戮何减川东西，金马碧鸡肆盘据。盘据开府自公侯，若孙若白、艾、冯、刘，破碎月瓯真乏主，萑苻欲老真悠悠。将军雄武尤奇绝，时有快心事可悦，木城擒磔沙定洲，桂林围逼孔有德。遂迎桂王驻安笼，孙家专制太怔忪，帝后报销以名计，将军愤不受王封。自挟王归滇海上，一战破走孙可望，矢志誓扶昆仑冈，私心窃附诸葛亮。无如运去不可为，忙忙西走几歔欷，磨盘一败无存局，侧身四海当安归？明知走缅非安宅，君臣同死亦何益，孟艮频兴攻缅师，欲借要荒延国脉。惊闻青盖入军前，君执何处更朝天，擗踊呼天天不应，孤臣安用此身全。一掷身轻如蝼蚁，再掷鹘落复兔起，三掷四掷石为开，数十百掷堦亦圮。蛮疆虽有首阳薇，不求暂生求速死，至今景线有孤坟，寸草不生土花紫。噫嘻乎！刘、白亦是同仇徒，不肯取义胡愚乎，东隅既失桑榆收，令人言之翻口汗。岂无绿林悔末路，反正卓卓有建树。将军自是可人儿，有此英风无此遇。君不见，无赖贼徐懋功，逢人便杀何残凶？归唐身有长城寄，像图凌烟爵上公。又不见，锦帆贼甘兴霸，铃声到处闻者怕，东归吴会献奇谋，艟舰长驱入江夏。

（录自《腾越厅志》卷十九）

十一、至景线[5]祭李晋王墓

李学诗[6]

君王血溅金蝉寺，荒外孤臣泪满衣。天不祚明非战罪，鬼能杀贼与心违。垄旁樵牧蛮吏禁，墓上松楸杜宇飞。知否中原已恢复？河山无恙去来归！

（录自李学诗：《罗生山馆诗集》卷三）

十二、云南金石十五首

李根源

马哈只儿功最奇（三保太监郑和父马哈只碑，在昆阳），晋王荒碣陷掸夷（晋王李定国墓碣，在我旧景线宣抚司地，即古八百媳妇地，今陷于英），摩挲永历窜皇字（永历年碑，有数百十通），玉纽玺文空尔思（永历玉玺，篆“敕命之宝”四字，光绪丁未在昆明五华山出土，今存云南博物馆）。

（录自李根源：《曲石诗录》）

十三、明贤崇报祠[7]

边城云气护精蓝，百四明贤共一龛，忠义德功同节烈，人伦标映壮天南。

（录自李根源：《曲石诗录》）

十四、磨盘石战死诸将墓

诸墓在腾越西山老草坡。碑刻正书：一、“皇明特晋荣禄大夫挂镇北将军印太子少傅广昌侯高公文贵墓”，额曰：“忠义常存”。一、“明挂印都督王玺墓”，额曰：“万古精忠”。一、“明钦命副总兵官张天宠墓”，额曰：“一腔天日”。一、“明钦命副总兵官殷有荣墓”，额曰：“万古忠义”。又“殉节广昌侯夫人万氏、妾吴氏墓”，共五墓。

老草坡前草树香，磨盘诸将墓堂堂，残碑读罢呼雄鬼，生死都从李晋王。

（录自李根源：《曲石诗录》）

十五、四月二十五日（四首之一）

柳亚子

闽越金陵蔓草荒，桂林灵气拥真皇。三忠戮力身先殉，半壁偏安事可伤。西粤存亡归阁部，南云惨淡话中湘。最怜日暮途穷后，犹有挥戈李晋王。

（录自《柳亚子诗词选》）

十六、赴师范学院史地学会讲明清之间史事（二首之一）

柳亚子

翻山鹞子惜无功（谓兴平伯高杰），刘、李巫山战血红（谓

皖国公刘体仁、临国公李来亨，皆大顺故将也）。赐姓延平开大业，孤忠定国亦英雄（晋王李定国，旧隶大西麾下者）。

（录自《柳亚子诗词选》）

【注释】

[1] 查继佐《李定国传》云：定国尝一试其所有，题为“一匡天下”，自负以为仲父复出云。

[2] 全祖望云：“‘从来赐姓者，只有晋王贤！’谓定国也。”

[3] 查继佐《李定国传》云：定国善用象，象十三，俱命以名，封大将军，所向辄碎。顺德战败，象俱失。

[4] 查继佐《李定国传》云：顺德之战，定国失象，清兵驱之入城，一象悲鸣不食而死。

[5] 原注云：景线距孟艮二日程，即我旧景线宣抚司，古八百媳妇地也。

[6]《永昌府文征》云：李学诗，腾冲人，其先世为李定国部下。

[7] 祠在腾冲城西隅，1912年赵樾村、李根源建，祀沐英、李定国等百四十一人。

四、李定国生平事业简表

敦影秋

一、明崇祯三年（1630 年），十岁，榆林农家子，从张献忠起义米脂。

二、明崇祯四年（1631 年），从张献忠转战山西。

三、明崇祯五年（1632 年），从张献忠转战晋、豫、畿南。

四、明崇祯六年（1633 年），从张献忠渡河而南，驰突豫、楚。

五、明崇祯七年（1634 年），从张献忠西入陕，破澄城，转略平凉、邠州。

六、明崇祯八年（1635 年），从张献忠会荥阳，破凤阳。复入陕，破澄城、咸阳。

七、明崇祯九年（1636 年），随张献忠战滁州，攻襄阳，拔应城。

八、明崇祯十年（1637 年），率所部将二万人，从张献忠趋淮、扬，袭安庆，威胁南京。

九、明崇祯十一年（1638 年），从张献忠养锐谷城。

十、明崇祯十二年（1639 年），从张献忠大败左良玉军，转

战川、楚。

十一、明崇祯十三年（1640年），从张献忠入川，破泸州，攻成都，粉碎明军“圆盘”围剿。

十二、明崇祯十四年（1641年），奉献忠令，以二十骑赚开襄阳城门，破襄阳。

十三、明崇祯十五年（1642年），从张献忠破庐州，复破太湖、黄梅。

十四、明崇祯十六年（1643年），从张献忠破武昌，赐张姓，称“四王”，进略湖南。

十五、大西大顺元年（1644年），从张献忠破成都，封安西将军，率部北略汉中。

十六、大西大顺二年（1645年），以兵三万援重庆，失利于多攻城。

十七、大西大顺三年（1646年），清兵入川，张献忠战死，与孙可望等南破重庆、綦江。

十八、明永历元年（1647年），复本姓，与孙可望等破贵阳，下昆明。率部平定云南迤东。

十九、明永历二年（1648年），南下开远，破佴革龙，擒沙定洲，东平镇雄。

二十、明永历三年（1649年），两使贵州，会诸镇于龙里。

二十一、明永历四年（1650年），东出贵州。破安顺，还镇云南。

二十二、明永历五年（1651年），谏留杨畏知。

二十三、明永历六年（1652年），率部东出粤楚，连下桂阳、衡州，杀清定南王孔有德、敬谨亲王尼堪，天下震动。封西宁王。

二十四、明永历七年（1653年），东围肇庆，再攻桂林，还屯柳州。

二十五、明永历八年（1654年），破高、雷、廉三府，东围新会，不克，败走南宁。

二十六、明永历九年（1655年），扼守南宁，分兵东出浔、

横，谋恢复两粤。

二十七、明永历十年（1656年），突破田州至安龙，偕桂王入滇，封晋王。

二十八、明永历十一年（1657年），大破孙可望于交水。遣刘文秀略川南，川中士民德之，多建“李晋王庙”以祀。

二十九、明永历十二年（1658年），西平永昌，登鸡足山。清兵三路入滇，（定国）兵败盘江，西走永昌。

三十、明永历十三年（1659年），设伏磨盘山，抗击清兵，败绩，南走孟定，会白文选于木邦，还驻缅宁。

三十一、明永历十四年（1660年），居孟艮，联络诸土司，谋恢复。秋，拔营入缅，报桂王，败缅军于瑞羊岳。

三十二、明永历十五年（1661年），败缅兵于洞帕。白文选出走，（定国）独进洞乌。

三十三、清康熙元年（1662年），清兵入缅，（定国）东走猛腊。六月二十七日病死，年四十二岁。

1959年9月

五、谈郑成功和李定国的关系

郭影秋

郑成功和李定国，同是明末坚持抗清斗争的杰出人物。弄清楚他们之间的关系，不只有助于对他们本人历史的研究，而且对研究整个南明的历史，也有好处。本文就是想从他们的来往书信中，对他们之间的关系及其对当时在军事斗争方面所发生的影响，做些初步的探索。

一

明自“南都”沦陷（1645 年）以后，一部南明的历史，基本上是由粤西、滇黔和海上三条支柱支撑着的。粤西失败比较早，永历四年（1650 年）大顺军旧部李来亨等自粤西退守川、湖，两粤及湖广均为清兵所占领，从全国范围来说，当时能够对清作战的劲旅，实际上只剩了滇黔及海上两大部。又过两年，大西军旧部李定国、刘文秀等自滇黔分兵出征，先后攻占了广西、湖南全部，四川、江西大部及广东一部，使西南数省连成一片。

从此，西南抗清的领导权，始渐为李定国所掌握，而海上抗清的领导权，则在前此数年已为郑成功所掌握。近人朱希祖先生称“西宁王李定国与延平王郑成功，实昭宗时代西南、东南之双柱”，这个论断是公允的。他们两人东西呼应，信使往还，约为姻亲，坚持作战，以有限的力量，支持西南、东南两大战场达 15 年之久，最后，虽以壮志未酬，于同一年内（1662 年）怏怏病死，然而他们领导广大人民坚持抗清斗争的英雄业绩，是值得肯定的。

郑成功和李定国的联络关系，究竟从什么时候开始，各书记载不一。鹭岛道人《海上见闻录》永历四年（1650 年）条下有这么一段话：

> 十一月，成功至潮阳，提塘黄文自行在来报，称有旨诏成功入援。时平南王、靖南王率满汉兵数万，来攻复广州，西宁王望海兵救援甚切。

有人根据这段记载，断定郑、李的直接联系始于永历四年十一月，这是值得商榷的。这一年，四将军“联明抗清”的主张，还未被明朝当局所接受，李定国当不会受封为“西宁王”（《劫灰录·李定国》和《南疆逸史·李定国传》都说李定国在这年封西宁王。疑误）；同时，这年的秋天，李定国还在用兵安顺，夺取安顺之后又回镇云南，也没有“望海兵救援甚切”之理。这里所说的“西宁王”，显然是误记。

旧籍一字之差，往往把人引入迷途。在杨英《从征实录》同一记载中写道“宁藩望我大师南下会剿甚切”，问题就弄清楚了。“宁藩”是指宁靖王朱术桂，他曾奉命“督鸿逵、成功师”，这时正随郑鸿逵住在揭阳一带。我们可以认定，希望郑成功南下会剿的正是这个宁靖王，而不是“西宁王”。（参见《南疆逸史·宁靖王术桂传》）

郑、李之间的正式联络，当在永历六年（1652 年）李定国攻下桂林以后。在此以前，他们的战功还不太显著，彼此之间还不太了解；而且一在海上，一在滇黔，中间隔着个粤西，也没有

直接联络的必要。在桂林战役以后，特别是李定国东进肇庆以后，这时，东西两大战场已密切相接，觅取领导上的团结合作，以便进一步协同对清作战，就成为有关战争成败的重大问题而受到双方的重视了。

在郑、李的有关交涉中，李定国一直居于主动地位，而郑成功则显得有些被动，这是由于他们所处的地位和条件的不同而造成的。李定国是孤军远征，前有强敌，后无救援，不得不积极争取友邻的援助，以谋打开一条生路。郑成功的情况则比定国有利得多。当时清兵的主力陷在西南，无力对付海上，只好用“和谈”的办法对他进行拉拢，而成功也乐于利用这个空隙取得在海上立足之地，所以他对于李定国“会师五羊”的要求，并不是那么热心。这一点，也许是他们两位老亲翁始终没能合兵作战的主要原因之一。

二

郑成功和李定国的信使往返，看来很频繁，自永历六年（1652 年）至永历十五年（1661 年）的十年间，几乎年年有联络，或一年内有数次联络。书信留传下来的不算太多，但从仅存的六封书信中，足可看出他们互相倾慕的热情，坚持抗清斗争的决心以及设想会师金陵的雄伟规划。朱希祖先生有《明晋王与延平王来往书札考证》一书，可惜至今未能读到。兹特将我所见到的郑、李的来往书信，按年月表列于次：

（一）永历六年十一月（1652 年 12 月），李定国收复广西的捷报到达海上，并约郑成功会师；成功遣效用官李景前往广西，约师会期。

这一次相约会师，估计双方都有书信，但不传，所有有关记载都很简单。杨英《从征实录》对这个问题只提了两句：“安西王李定国复广西，杀伪王孔有德，遣使会师。藩遣效用官李景往广西，约师会期。”《海上见闻录》比这多了几个字：“又有定

（安）西王李定国告示一张，其文云：西宁王奉秦王令旨，中间叙破广西，定南王孔有德焚死之捷……”但把日子记错了（作永历三年）。

（二）永历七年五月（1653 年 6 月），李定国有书达海上，成功有复书。

李定国的这封信载杨英《从征实录》第 47 页，长六百余字。书中一说“孟夏薄端城”，发书当在永历七年（1653 年）四月定国围攻肇庆以后，杨英系于永历八年（1654 年）九月，是把时间弄错了；再说“知公畴昔之愆期”，说明他们事先曾有约会，郑成功误期了。据《从征实录》载永历七年（1653 年）五月：“时晋王定国、蜀王文秀俱有书来会师，藩修书答之。”这个年月，可能就是李定国这封信到达海上的时间（《海上见闻录》谓书到海上的时间为本年六月），只是郑成功的复书看不到了。

（三）永历八年（1654 年）秋天，李定国致书郑成功，请出兵会攻新会，成功有复书，并于十一月出兵。

李定国的这封信载杨英《从征实录》第 46 页，长六百余字；成功复书载同书第 55 页，长五百余字，两信都还完整。

李定国的这一封信，海上是九月收到的。信中的主要内容是要成功出兵广东，先夺新会，后攻省城，十月半以前，无论如何要在新会会师。成功于十月间复信，十一月初才出兵，时间已经有一些耽搁，再加他所派遣的水师，畏缩不前，终于误了大事。

在这一次通信以前，他们之间好象还有书信往来。李定国在信中批评成功说：“所谓张侯爵鼓楫而前，要知亦缓于今日发粤之举。”可见这年二月间，成功派张名振出师长江，对李定国是有通知的。成功在复信中说收到“礼物四色”，并答应定国结为儿女姻亲的要求，也说明定国另外有信给他。不过这些信都看不到了。

（四）永历九年五月（1655 年 6 月），海上援粤水师林察等回闽，成功得悉援师失期，定国兵败新会，深自懊悔。这时他有一封信给李定国。信载夏琳《闽海纪要》，长四百五十余字。信的内容，下面当再作介绍。

这一年，定国退守南宁，曾有信给成功，不过得到回信很迟，海上送来的礼物也没有收到。后来定国复成功的信中曾提到这事件，说："嗣驻朗宁（即南宁），复通音耗，乃于秋爽始审兴居，所荷远贻，仅仅得之海上传闻……"（参见杨英：《从征实录》）可见他们这一年间的书信往还，不止上述一件。

（五）永历十年（1656 年）夏天，李定国有书致成功。书载杨英《从征实录》第 40 页，长四百余字。这封信的内容是叙述入滇经过，勉励成功"枕戈靡懈"、"待我于长洋"等等。因为这时西南和海上的交通已被隔绝，来往书信要经过"土司"或"龙门"转递，颇费时日，书到海上当在本年冬天或次年春天。杨英《从征实录》记载此书到达海上时间为本年二月，误记了一个年头。

（六）永历十一年二月（1657 年 3 月），成功得李定国书，有复书。同年十一月，李定国又致书海上。

成功的这封复信，载杨英《从征实录》第 41 页，长约二百余字，书中是说"熏风盛发，指日北向"，要李定国立即出兵，以便"扫清宫阙，会盟畿辅"。九月，成功又疏致桂王，自称："欲躬率舟师，从瓜州、镇江而入，直取金陵，请命李定国、孙可望领兵由楚泛洞庭，会合恢复，以迎圣驾。"（参见江日升：《台湾外纪》卷四）十一月，"定国以书下海，约郑鸿逵（其时鸿逵已死，当为成功——引者注）以明年夏会师南都，驰檄荆西，约王光兴、李来亨等会荆州，号召四出，期大举出楚"（参见王夫之：《永历实录》）。这和以后两年间成功两出长江，可能有一定联系。

（七）永历十五年（1661 年）秋，成功有书致李定国，时定国兵已入缅，书落白文选手中。

这年正月，明臣徐孚远绕道安南抵厦门，成功才知道桂王入缅（参见江日升：《台湾外纪》卷五），他写给李定国的信，大概是在这个时候发出的。同年秋，书抵缅甸，落白文选军中，据邵廷寀《西南纪事·李定国》说："会徽人汪公福，携海上郑成功约师表来，文选遂屯锡箔，复遣苏总兵出木邦，会定国出兵。"可惜李定国终于没看到这最后的一封信，此后不久，白文选即被迫降清，信不知下落。

三

自永历九年（1655年）起，即自新会战役失败以后起，郑、李之间的联络关系已经有一些不太自然。在此后的来往书信中，虽然还不时提出“会师南都”、“会盟畿辅”等激动人心的语句，但以力量所限，双方合兵作战的可能性已经越来越小了。李定国在围攻新会以前，对于郑成功的一再误期，几乎每封信都提出严厉批评，甚至有些挖苦；及至新会战败以后，对战败问题一字不提，也未向郑成功追究约师失期的责任。相反，郑成功在出师援粤以前，还有些东支西吾，反复解释没有立即出兵的理由；而在援粤失败以后，却敢于正视问题，公开承认自己“有罪”，并严格追查援粤致误的责任。他们两人对这个问题的态度，前后如此不同，这不能光从这两位英雄人物“严以责己，宽以待人”的政治风度来解释，重要的还是其中有使他们不得不然的客观因素在。这些因素，可以从成功在新会战役以后致李定国的信中看出来。信的原文不长，照录如下：

> 客岁蘧使遥来，同仇同袍之订，甚符夙心。用是敹干敹胄，大集楼船，方刻程期，而敝员李景复以台命至，展读再四，知殿下内急君父之忧，外切仇仇之痛，不佞恨不能征帆倏忽，直扫珠江，同挈故土，以迎乘舆。讵意船师未到，而大师先已班回数日，有贵部官兵自粤来投者，细讯其故，盖以骄兵致挫。胜负兵家之常，不足深忧，但敝船逗遛，既不能先期会师，又不能奋图后援，使丑虏长驱，实与有罪焉。已将水陆各将审定功罪，乃知依违不前者，闽安侯周瑞，已重行捆责，革职闲住，乃念其有功，不然已正法矣。尚有贵水师汪都督孙洎大鹏，甚非久计，不佞现遣将员，令其乘董（熏）抵鹭，待殿下捷音重至，向我舟师齐发，甚为两便。尔时腥气，在在而然，所恃血性男子，坚乃心肠。不佞于客冬十二月，一鼓而下漳、泉、兴各郡邑，虏束手莫措，竟无

> 敢逆我颜行者。兹已萃夺（集）满汉，悉其精锐，倾国而来；复移援粤两酋之师，以天下全力而来攻我土地，不佞秣马厉兵，静以破之，绰绰有余。此一战也，虏力既挫，必一败而不可收，不惟江南半壁，在吾目中，即天下大势，亦约略可审，此不佞所可自信者。今援广之精锐，已悉来闽，则粤东势必空虚，乘机袭取，正其时也。殿下幸迅师入粤，或取羊城，或取高、雷、廉，定有摧枯拉朽之势，从此长驱破竹，共抵金陵，聚首策勋，顾所愿也。（见夏琳：《闽海纪要》）

郑成功的这一封信，一方面对新会战役做了检讨，另一方面又对双方合作提出新的要求；从这一封书信中，基本上可以看出双方的愿望和关系，说它是郑、李关系史中的一份重要文件，当非过分。

新会战役的胜利和失败，其关系之大是不难理解的。这一个战役打胜了，东西两大战场连成一片的局面就会出现，敌人各个击破的阴谋就会受到阻碍，抗清军各部之间的团结合作也会有所增强；相反，这个战役失败了，东西两大战场就被隔绝，对敌人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的战术就无法抗拒，抗清军内部的问题也会多起来，甚至会出现像孙可望那样的败类。不容讳言，新会战役的失败，对郑、李双方都是一个严重的打击。

依据当时的情况，取得新会战役胜利的可能性并不是完全没有。其时困守广州的清兵，人数不过数千（一说两万），且屡经打击，已没有作战能力；新会被围三月，饿死的人数已达三分之一，守敌当然也很难打仗；及后虽有清将朱马剌远道来援，他的兵力也很难和“衡州之役”的尼堪相比。这时李定国的兵力号称“二十万”，如果谨慎从事，即使没有郑成功的援助，也不会失败得那样惨重，一步不停地退到南宁。郑成功批评他说是“骄兵致挫”，可以说是一针见血，击中要害；李定国对郑成功的援师失期没有提出责备，大概是感到自己有些愧赧吧。

郑成功对李定国的批评，往往是尖锐的、中肯的，除掉上述批评以外，还有“积粮饷，扼险阻”的问题，也可以说是击中了

要害。据江日升《台湾外纪》载：永历九年二月（1655 年 3 月），太监刘玉到了厦门，在成功面前说了孙可望和李定国的坏话，成功发表议论说：

> 当此之际，内无贤相匡其君，而运筹帷幄乏其人；外有骄将，兵无纪律，又不积粮储饷以足兵食，扼险阻以图恢复，而乃恃功互党，致使英雄失望，人心瓦解，将何以望中兴哉。

这个批评很重要。定国东进新会，转战千里，因地筹粮，没有作好长期打算；在开始，虽然能得到广大人民的支援，但旷日持久，粮械不继，毕竟是一种危险。新会失败以后，虽有“难民从之者数十万”，定国“抚难民嚎哭失声”那样良好的军民关系，但终因谋虑不周，措施失当，对于军事上的败局亦无所补益了。

当时的抗清战场虽然分为东西，然而整个战局究竟还是一盘，李定国在西南战场的失败，对海上战场不能不发生重大影响。郑成功在听到新会战败的消息以后，一破向时被动应付之例，主动致书李定国（夏琳记作“复书”，疑误），爽快地承认自己“实与有罪焉”，可能已经预感到海上孤军作战的严重性。

前面已经说过，清兵渡江以后的南明残局，基本上是由粤西、滇黔和海上三条支柱支撑着的。在粤西战争紧张的时候，滇黔及海上得到暂时的休息和发展；在西南战局紧张的时候，海上又乘机占领漳、泉、兴各郡邑；现在，敌人集中兵力进攻西南，西南的抗清战局开始逆转，机敏如郑成功，不能不预见到自己所处的地位及海上战局的发展趋势。他在这封信中严肃地谴责了自己，并希望李定国卷土重来，“或取羊城，或取高、雷、廉”，重新配合作战；为了挫败敌人“东和西战”的阴谋，他指挥所部积极活动，在此后的两年中，一出揭阳（战败了），两入长江（也战败了），虽然大局已定，无可挽回，也可以看出，在他接受新会失败的教训以后，对和李定国的联络已不像过去那样被动，而是深深感到这是一个有关战争成败的重大问题，用行动来弥补自己的疏失了。

四

在打通西南和海上联络的过程中，李定国做了重大贡献，也付出巨大牺牲，他和海上的联络很经常，例如捷报下海，请求会师，约为姻亲等等，都是由他主动提出的。依据当时的情况，一个是“国姓”，一个是“流寇余孽”；一个是退可自保，一个是急待外援，要成为相识，不由李定国主动也不可能。这是一。其次，郑成功这个人物，平时爱自比诸葛（参见杨英：《从征实录》)，和别人合作并不是那么容易。他跟海上的几位抗清老将如张名振、张煌言等，都弄得有点不够愉快，惟独对于李定国，却始终另眼相看。在他给定国的几封书信中，一则说“恨未能会飞，促膝面罄”；再则说“不佞恨不能征帆倏忽，横扫珠江”，字里行间，处处可以看出他对李定国的倾慕和热情。第三，李定国对郑成功的期望更是殷切的、至死不渝的。永历十二年（1658年）冬，清兵三路逼昆明，定国当时的主张是东出湖南，“胜则六诏复为我有，不胜则入交趾，召针罗诸船，航海至厦门，与延平王合师进讨”（参见徐鼒：《小腆纪年》卷十九)。直至清兵入缅，定国兵败途穷之时，还想假道交趾，东出两粤，以便沟通海上。总之，这两位英雄人物是互相倾慕的，自结识以来，虽然有时也向对方提出尖锐的批评，但他们却始终是相互关怀，相互信任。这种信任，当然不是建筑在几封书信漂亮言词的基础上，而是建筑在坚持抗清斗争的实践的基础上，正如郑成功的信中所说：“尔时腥气，在在而然，所恃血性男子，坚乃心肠。”只要他们的心肠是同样坚硬的，后虽一死台湾，一死滇南，他们的精神是永远联在一起的。

郑成功和李定国的友好联络，不只直接地鼓舞着东南和西南两大战场的战斗士气，而且，他们联合斗争的影响，对于内地各省的抗清武装也是一个精神上的支持；反过来，内地各省的武装斗争又直接（如夔东十三家）或间接（如鲁西榆园军）地支援着他们，这就出现了一个较长期的以他们的领导为主的抗清武装斗

争的局面。随着武装斗争的深入和发展，敌我之间的矛盾和敌我双方的内部矛盾暴露得日益深刻，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清王朝以至广大人民特别是那些坚不事清的遗民，都从斗争中吸取着有益的经验，这些经验，对于当时的生产关系起到了一定的调整作用，在颇大程度上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当然，这一切都取决于历史发展的一般原因，而不取决于某些英雄人物的个人意愿，但是，英雄人物的主观能动作用，对历史事变的局部后果也不是丝毫无能为力的，试看清兵入关以后，其追崩逐逐之势，使许多拥有重兵的老将都无所措手，偏偏是这两位年轻的将领弄得清王朝无可奈何，这正如普列汉诺夫所说，人类历史的发展，除掉“一般原因”和“特殊原因”而外，“还有个别原因底作用，即社会活动家个人特点及其‘偶然性’底作用”，我们对于那一些最能帮助解决当时历史任务的人物，就应当称之为“伟大人物”或“英雄人物”。顾炎武在《李克用墓》一诗的末尾写道：“敌人亦太息，如此孺子何，千载赐姓人，流汗难重过。”这几句话，与其说是歌颂唐晋（嗣位）王李存勗的，倒不如说是他借着这个题目歌颂另一个“孺子”、“赐姓”和“晋王”来得更为确切一些，尽管我对这个谜猜得可能不对，但是我认为，他们两人是可以当这个歌颂而毫无愧色的。

这篇文章就在这里结束，因所见不广，论述未必确当。现在有些史学工作者正在搜集整理有关郑成功的资料，也有的计划整理大西军和大顺军的资料，对于郑、李之间的联络关系，可能会有更多的发现。希望不久能够看到有关他们的新的研究成果。

［原载《新建设》，1961（12）］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
研究丛刊

李定国纪年

六、论李定国坚持西南抗清斗争的历史作用

郭影秋

一

抗清民族英雄李定国，为明末农民起义军著名将领之一，他在大西军中的地位仅次于张献忠和孙可望。1644 年清兵入关，大顺军连遭失败，张献忠看到民族危急，曾经和孙可望、李定国等商量过“归明（联明）抗清”的问题，并拟乘清兵南下追击李自成之际，直下陕西以捣清兵之后（参见《小腆纪叙》）。1646 年清兵入川，张献忠战死南充，大西军余部由“四将军”（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率领，攻占滇黔，“联明抗清”的旗帜日益鲜明，在抗清斗争中所起的作用也日益显著。1652 年至 1653 年间，是这支部队的大盛时期，李定国率兵八万，东出粤楚，桂林、衡州两役，大败清兵，连杀两王（清定南王孔有德、敬谨亲王尼堪），天下震动，先后打下广西、湖南全部，江西、广东大部分；刘文秀所部六万人，也一度攻占四川大部，把汉奸吴三桂压缩于保宁（阆中）一隅。这时，“四将军”的嫡系

部队几与清朝初入关时的部队（约二十万人）相等，西南军事，本来大有可为。不料就在这个重要关头，“四将军”的内部发生了分化，孙可望利令智昏，内受明臣手足相残的挑拨，外中汉奸洪承畴“以贼攻贼”的毒计，他把艾能奇（早死）的遗部全部并吞犹以为未足，复乘远征部队遭受暂时挫折之际，罢黜了刘文秀，切断了李定国归路。从顺治十年（1653 年）二月起，李定国在内无粮饷、外无应援的情况下，只身掮起“联明抗清”的大旗，孤军东出两粤，企图与郑成功会师五羊，直捣南京。1654 年，李定国联合明师义旅二十万人，东围新会，后以郑成功水师误期，孙可望后方掣肘，败走南宁，兵力只剩下六千人。但是他并没有灰心丧气，1656 年突破了孙可望的包围，西人昆明，联合刘文秀重整抗清旗鼓。1657 年，孙可望以兵十六万来攻，定国等粉碎了孙可望的攻势以后，将孙军大部改编成为抗清部队，保持滇、黔两省，继续抗清。1658 年清兵集中全国精锐，从川、楚、粤三路夹攻贵州、云南，盘江一战，定国部损失惨重，以后又连败于大理、怒江等地，不得已退驻缅宁（今临沧）、孟艮（今缅甸景栋），收集残部，联合当地少数民族，继续坚持抗清斗争。1661 年清兵十万入缅，定国率部东走，企图再出两粤，联合郑成功，以谋进取。1662 年病死勐腊（今云南勐腊县），临死时嘱咐他的部下说：“宁死徼外，不要投降。”

李定国出身于农民家庭，十岁（1630 年）参加农民军，二十六岁（1646 年）接受“联明抗清”的主张，连续打了三十二年的仗，四十二岁病死，他的智慧、知识与才能，可以说全部是在农民军中锻炼出来的。张献忠战死以后，他的个人才能得到充分发挥，在政治上、军事上都有卓越的成就，西南地区“联明抗清”的主张之所以能够贯彻，各少数民族人民之所以始终联合一致，都和他的个人作用分不开；至于战绩的辉煌，军民关系的融洽，战略眼光的远大，斗争意志的坚决，都有其特出之点。虽然他在某些具体问题上，特别是军事问题上，也有失策失机之处，致使西南人民的潜在力量，未能得到更为充分的发挥，但作为一个出身农民而又始终忠于人民的农民军领袖来说，是很难得的，

李定国的事业是不朽的。

二

清兵入关以后，全国各地掀起了规模宏大的抗清高潮。参加抗清斗争的武装，有的是农民军，有的是南明的残余“官军”；有的是久经战斗的武装组织，有的是新起的民兵义旅；有的是由封建统治阶级领导的，也有的是由人民自己的领袖领导的，情况比较复杂。各个抗清地区之间有着共同点，也各有着它的不同点。所谓共同点，就是他们都在抗击清兵，这是由于清兵入侵的非正义性质，以及满洲贵族除掉承接了明朝的阶级剥削制度以外，还实行了民族歧视的政策（包括圈地、投充、逃人、职官、刑狱、科举等不平等制度，满人和汉人的不平等地位等等）而形成的。所谓不同点，则是由于各个部队的性质不同、领导不同，各地区的具体条件不同，清兵进攻的重点与策略不同等等，从而使各个抗清地区和抗清部队之间存在着各不相同的个别外貌。我在这里所要论述的，是西南抗清斗争与其他地区的不同点，也就是它的个别外貌，从而研究一下李定国在这个个别外貌中所起的个别作用。

如所周知，清兵入关以后的攻击重点，首先是指向农民军，特别是李自成领导的大顺军，当大顺军的主力被击溃以后，它才分出一部分兵力去对付张献忠领导的大西军和南明王朝。之后，大西军的主力也被击溃了，大顺军的余部和南明王朝在粤西合作起来，清兵又把几个拳头集合起来重新把两粤击毁。到了1650年左右，南明的“官军”已被打得差不多了，大顺军的余部也因为联明抗清苦战几年形势不利退往川、湖，这时，清兵的精锐大部都压在大西军特别是李定国的头上，其负担之重，是当时任何其他抗清地区所不能比拟的。这是西南抗清斗争的主要矛盾，也是它的主要特点。

另一个特点是关于“联明抗清”的问题。农民军和明军原来

是对抗的，根据民族矛盾尖锐化的新情况，大西军作为一支曾被击溃的农民军队，要战胜清兵，“联明”是必须的。但是，实现这个主张并不是没有阻力的，这不只在自己的队伍中还有不明大义的反对派（一开始，孙可望就不赞成），也不只在腐朽的南明朝廷、军队以及封建统治集团中的大部分人对于农民军视若仇敌，同时，在广大人民群众中间也还对农民军抱有传统偏见。李定国用自己的抗清热诚和战斗实践，克服了种种阻力，终于形成了以大西军旧部为主力的抗清联合战线，而且当孙可望听信谗言、制造分裂的时候，他又排除一切困难，独立坚持“联明抗清”的旗帜，这是难能的。还不止此，更重要的是他不是“归明”、“降明”，也不是简单的“扶明”，而是确确实实在“联明”，关键性的问题在于他始终没有交出部队的领导权，始终没有用农民的军队去帮助南明王朝祸害农民，这是和当时所谓“反清扶明”的主张有根本区别的地方。正因为如此，他才能行动自主，指挥自如，远联海上（郑成功），近联川、湖（夔东十三家），既联民兵义旅，又联各省少数民族，坚持西南抗清斗争前后达二十年之久（包括他死后数年）。这一矛盾的正确处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应该说是很不平常的。

再一个特点是关于“军民相安”的问题。在阶级社会中军民水火是自然的（如官军对农民，农民军对地主），军民相安的现象是不多见的。以李定国为首的大西军旧部，坚持联合政策，做到了军民相安，这是西南抗清斗争的又一个重要特点。李定国的军纪，不只要比清兵好得多，而且要比同列的抗清部队要好一些。在当时，他自然不会意识到要坚持斗争必须依靠人民这个道理，但是在他的活动实践中却处处为人民的利益打算。首先，他进入云南以后，即注意减轻人民的负担，对官田，“差人踏看田地所出，与百姓平分”，或“括近省田地及盐井之利，俱以官四民六征收”；对民田，则实行“条编半征”。单从这一点来说，就比清朝顺治皇帝所宣布的“禁天下毋得正赋外再加火耗”的“善政”要进步得多。其次，他很注意劝导农民生产，当时人称“是时云南境内，外则土司敛迹，内则物阜民安，百姓扞莳恬熙，若

不知有交兵者”（《永历纪事》），直到定国退走滇西的时候，昆明、贵阳等地还丢下了大量的粮食；证以清兵占领云南以后，曾令投降官兵向剑川、穹浪等有粮地区“借食”，足见虽经十多年的战争，定国的后方——云南的生产并没有荒废。再次，他的“兵行五要”不杀人、不放火、不奸淫、不宰耕牛、不抢财货是始终坚持的，从他初入滇、黔直至最后失败，军行所到之处，始终是“公买平卖”、“秋毫无犯”、“鸡犬不惊”、“军民相安”。再次，他十分注意节约民力，即在行军打仗中也不例外，在他的军队中，“家室老弱，各为一营，皆有职事，凡士伍破衣敝絮，皆送入后营，纫织为衬甲及快鞋之用，无遗弃者”（《谀闻续笔》）。因为他是这样关心人民的，所以人民对于他也是拥护的，他东进两粤，连农村妇女也支援他，直至为他而死（参见《道援堂诗集》）；他从战地撤退时，常有数以几十万计的难民跟着他跑。做到这些很不容易，因为他自己的军队，在地主阶级心目中是“贼”；而和他并肩作战的部队（明军或义兵），在军纪上又不是那么得人心的，在那样一种气氛中，他能够独树一帜地保持着这样良好的军民关系，这也应该说是很不平常的。

还有一个特点是关于“各民族联合斗争”的问题。以李定国为首的西南各民族人民的联合斗争，其规模之大，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关系的密切，在西南的历史上是空前的。李定国所领导的抗清部队，是由汉族和俘、倮、瑶、佬等各族人民组成的；他的最拿手的战术——象战，是从少数民族那里学来的；他的部分军械是由土司供应的，“要枪则供枪，要马则供马”；他的粮秣是由后方运送的，在运粮的队伍中有“苗子成群”；他东进两粤的时候，各少数民族纷起响应，在军事失利的当儿，有时退入土司的地区去休整。更值得指出的是，他的主力撤退以后，各少数民族人民还能接受他的号令，同清兵展开游击战争。下边且举几个例子，以见他和少数民族关系的密切。

在广西方面：1656 年定国撤离广西以后，曾先后派遣总兵吴之风、锦衣百户袁应魁等前往广西联络，一时明军旧将朱盛浓及僮族领袖罗法达等曾联合瑶、僮、侗、水等各族人民起而响

应，按照清朝官员们的说法是"土宄附和，遗孽窜合"。义兵们以柳州、庆远两府为基地，把"游徼"之火烧及广西全省，后来且发展到贵州的黎平、永从以及楚省的沅州、靖州等地方。他们到处镇压投降官员（如潘志乾、蒋友赟等），围困并摧毁清兵据点，父死子继（如龙韬死，其子龙旗继之），斗争极为坚决，直至1659年才被镇压下去。（参见《明清史料》丙编第十本，《洪承畴奏文册汇辑》。）

在贵州方面：1656年秋，清兵三路攻入贵州，李定国从滇西前线赶回昆明，一面布置正面防御，同时复派遣总兵冯天裕、土司罗大顺等深入敌后，联合黔东各族人民，牵制敌人西犯兵力。根据汉奸洪承畴于顺治十五年（1658年）冬及十六年（1659年）夏的先后奏报，这次黔东人民对清兵的攻势确实很猛，在北起思南、东达铜仁、南抵独山的广大地区内，都有各族人民（其中包括大量苗民）的武装活动。他们对群众无所扰，只是团练、催粮，遇到阻挠也只是"赶散"，不事杀戮；相反，清兵对这些义民却进行残酷的镇压，在壮烈的"万佛山战斗"中，坚守砦栅的义民八百余人，除掉十余人力尽被俘以外，其余皆英勇战死或跳岩而死，可见他们斗争的坚决和战况的激烈。后来，虽被强大的清兵镇压下去了，可是直到李定国逝世以后，水西土司安坤等还借着"李晋王"的旗号，继续进行起义斗争。

在云南方面：1659年夏，定国在滇缅边境上广造印敕，遍结诸土司，继续进行斗争。沅江土司那嵩受定国敕为总督，广为传布，联合石屏土司龙世荣及原已降清之延长伯朱养恩、将军高应风等，伺机起兵。这年秋天，那嵩等攻陷石屏州，汉奸吴三桂大为惊慌，十月，清兵围沅江，十一月初六日城破，那嵩及其子那寿、婿沐忠亮等举家自焚，其部将那岬、许名臣、许世勋、许用贵等自杀，部众十余万皆巷战死。定国死后，迤东诸土司如宁州禄昌贤、石屏龙飞扬等又集众十一万人，攻复蒙自、临安、嶍峨、宁州、易门、弥勒、邱北、通海、石屏、宜良、沾益、平彝等十余州县，直到康熙三年（1664年）才被镇压下去。

以上几个例子，说明李定国联合各少数民族共同抗清的政策

是成功的。这是坚持西南抗清斗争的又一个特点。

李定国坚持西南抗清的特点还很多，例如他是遥奉永历为帝而又保持着自己的独立的；他是以云南为屯据地，分兵出击，主张战略进攻而不是单纯防御的（后来有失策之处）；他是以联合川湖及海上为手段，以“恢复南京”、“会盟畿辅”为己任，而不是孤军奋斗、甘于偏居一隅的等等。他的这些理想和做法是合理的、正确的，虽因内部、外部种种复杂原因，没有得到完全实现，也不能因此而贬低他在坚持西南斗争中的重大作用，把西南地区的诸矛盾努力转化为统一于“抗清”的诸特点，这正是他的个人才能得到充分发挥的表现。西南抗清斗争诸特点的形成，我认为和李定国的部队中保持着农民军的某些优良传统有一定关系，其中重要的一项是人与人的关系比较平等。远在大西军时期，部队的成员一般都是“兄弟相称”，禁止人民称他们为“老爷”。“四将军”进入滇、黔以后，还是“共坐议事”。对明朝的官制、军制、刑制都有很大的改革，等级制度似乎不是太严。这种关系反映在军民关系、民族关系以及友军关系等方面，都起了缓和内部矛盾的作用。当然，他们的这种关系，在阶级社会中不会坚持下去，但在共同对敌的情况下适当地保留一些农民军的传统是需要的，也是可能的。

三

恩格斯在《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文中说过：“人们总是这样创造历史的：各人都在追求自己的自觉抱定的目的，而这许多按不同方向行动的意向及其对外部世界发生的各种各样影响的总和，就是历史。”李定国的抗清活动，是有自觉目的的活动，它对外部世界确实发生了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社会历史的前进。下面就来探讨一下李定国的抗清活动对于社会历史的影响。

首先是对当时抗清斗争的影响。清军入关以后，抵抗清兵的

武装斗争，在全国各地普遍地开展起来。一开始，虽然各个地区的斗争是互相连属的，但是，他们的胜利、失败却是互相影响的，从而在无形中也是互相支持的，一个地区在斗争上取得了胜利，无疑就是为另一个地区的斗争创造了条件，取得胜利较大的地区，也就逐渐形成了众望所归的斗争重心。1650 年大顺军旧部在粤西失败以后，全国武装抗清的重心，分属西南与海上，而西南的胜利又大于海上，于是西南地区的抗清斗争很自然地也对各个抗清地区发生重大影响。其中最受实惠的应该说是“夔东十三家”，当他们由粤西退走川湖以后，能够得到较长时间从事休养生息，未始不是由于李定国吸引了强大的清兵之助。远一点的如海上的郑成功、鲁西南的榆园军等等，也有类似情况。自然，各个地区的斗争包括失败较早的粤西斗争在内，也支持了李定国的斗争，不过，支持的程度如何是各不相同的。这里因为篇幅的关系，只谈谈李定国的活动对于郑成功的影响。

郑成功是一个睥睨一世的英雄人物，他对于同时代的抗清将领，几乎都不放在眼下，惟独对于李定国却折服备至，在每一个紧要关头，总要提到他，并对李定国的活动予以一定配合。有如下事例证：

一、永历七年（1653 年）十月，成功遣辅明侯林察等统五镇官兵、战舰百余艘南下勤王，并特书知会西宁王。（参见《海上见闻录》）。

二、永历七年（1653 年），成功闻李定国师出东粤，乘机袭破漳、泉。

三、永历九年（1655 年）正月，成功致清将佟国器的信上说：“广东为天下手足，现今西宁王攻破肇庆，羊城危在旦夕，清朝应援之兵，披甲不满三千，是驱犬羊而赴虎群，稍饱其腹耳，其手足之决坏如此者。”（杨英：《从征实录》）

四、永历九年（1655 年）正月，成功给清吏韩尚亮的信上说：“今西虏悉有秦地，肇庆失守，李率太仅以身免，羊城危在旦夕，李西藩兵临南雄，南赣、南昌风鹤靡宁，此亡清之秋也。”（杨英：《从征实录》）

五、永历十三年（1659 年）五月，成功闻云南告急，出师长江，围南京，前锋抵芜湖。

六、永历十二年（1658 年）四月，成功闻云南败报，顿足曰："皇上何如此执迷，不从李定国之议。"（《台湾外纪》）

此外，成功给定国的书信中，屡有称扬，而他的得力部将如周全斌、潘庚钟、冯澄世等也往往劝说成功西联李定国。可见李定国的活动对海上有很大的影响，这对于他们的斗争，不能不是一个很大的支持。

其次是对当时及以后社会人心的影响。历史人物对于社会人心的影响，一般是通过他们的"道德、经济（事业）、文章"。李定国的道德是为了农民及中国民族的利益，鞠躬尽瘁，至死不屈；李定国的经济是参加农民战争十六年，坚持抗清斗争十六年，为人民群众扬眉吐气，战绩辉煌。这些都是可以称述的，至于文章，虽然无可称述。不过他有些议论，如不愿鹬蚌相持，使清人坐享渔人之利；不愿像文文山、陆秀夫、张世杰那样一死了之，而希望得到比他们更好结果；说到对敌斗争的态度时，他说"宁死徼外，不要投降"，虽仅寥寥数语，已足以彪炳史册，文章不显，似乎不能算是什么大病。正因为他确有可以称述之处，所以才有很多人怀念他，并以他的革命活动作为鼓舞后人继续斗争的力量。和他同时代的著名思想家、史学家王夫之、黄宗羲、查继佐、屈大均等，有的为他作传，有的对他做了很高的评价；比他后一些的史学家，在《明史·桂王传》里面，大书"李定国卒，其子以所部降"，而后终卷；直至清朝末年同盟会倡议"推翻满清"的时候，章太炎还在一篇宣言里提出："愿我滇人，毋忘李定国。"足可见公道自在人心，有功于人民的人，人民是不会忘记他们的。

这里有必要提一下李定国的斗争对于当时思想界的影响，也就是李定国的斗争实践对于推动思想、理论发展的作用。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因为"思想体系是由所谓思想家作成的过程"（恩格斯语），有些人只从思想家们的本身去找原因，或者只从世代相继的人们的头脑中去找原因，而不去从形成人们思想的周围环境主

要是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中去找原因，于是便停留在纯粹思维之中，看不清思想、理论发展的真正原因所在。我们认为任何新的思想的发展，都不能离开“实践论”的原则，从理论上来说，没有广大人民群众及其领袖人物的斗争，任何最伟大的人物也不能单凭他个人的头脑去创造理论，创造历史。李定国的知识虽然要比思想家们的知识要少得多，但是他的行为、他的行动方式，他在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中所揭露的社会矛盾，却为思想家们提供了大量的探索真理的材料。这不是说李定国的个人禀赋有什么特殊，而是说他和当时的思想家们处于不同的社会地位，“但是出身于群众的人的存在，使他的行动方式比知识分子在社会地位的支配下所采取的行动方式要明确得多”（列宁语）。客观形势发挥了他的才能，他的才能也改变着历史的局部面貌，由于他对清兵打得坚决，打得狠，打的时间比较长，这就逼使着统治与被统治双方的思想家们，不能不开动脑筋，用自己的知识去解释自己所偏爱的那一方面人们的行为，从而也就促进了思想、理论的发展。

在这里，我无意贬低思想家们在一定历史时期所提出的新思想、新理论对于历史运动的深刻作用。不可能设想，人们生活在一个没有理论、没有理想的荒漠中，会获得美好的生活。思想家们的历史作用，就在于他们不断总结人民群众的斗争经验，提出比较合理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揭示出向更高发展的一般趋向。这种新的思想和新的理论，在最初，可能只是一种理想或流于幻想，可是这种理想却会影响周围环境，“甚至能够对于产生它的诸原因发生反作用”（恩格斯语）。如果这样看问题，那就要承认“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这一真理。我们绝不可以只是口头上承认人民群众创造历史，而在实际上却把“人民群众”的内容抽空，当做一个没有灵魂的牌位来供养，而把创造历史的实绩都归之于个别英雄人物。那样做是不正确的。

第三是对封建统治阶级的政治和政策的影响。在中国历史上，出现过不少盛世，在所谓盛世里总有几位“英主”和“名臣”。这些“英主”和“名臣”，一般都善于采纳人民群众的意

见，适当地反映历史时代的要求。他们采纳人民群众的意见主要通过下列三条途径：

第一条途径是通过人民群众的直接斗争，主要的斗争形式之一是武装斗争。人民反对赋租太重，他们不能不适当地整顿田亩，减轻民负；人民反对徭役太繁，他们不能不适当地减免徭役，与民休息；人民反对民族之间的不平等，反对满人与汉人在人格上的不平等，他们不能不在不平等的实质上套上一个平等的外壳；人民接二连三地提出新要求，他们也不得不接二连三地推行新“善政”。这些“善政”，说它是“英明”也好，“怀柔”也好，反正不能不那么办，不那么办群众就不答应，江山就坐不稳，他们的“英明”之处也就在于还能够接受反面教训，改进自己的统治措施。有人说，他们的“善政”是从人民群众的利益出发的，不一定，因为他们和农民之间是一个对立的阶级。“善政”是人民群众斗争来的，不是封建统治者恩赐的。

第二条途径是通过思想家们的论著，经过一定转折把它嵌入统治者的政策。封建君主接受进步理论，有时是爽快的，但是多数是羞羞答答的。所谓是爽快的，就是选几个可靠的忠臣，让他们说几句戆直的话，用以加强自己的统治，事后并载入“纪要”或“实录”，要子孙们接受经验。所谓的羞羞答答的，就是用“犯上”的罪名把那些直言敢谏之士贬掉、杀掉，把某些遗民们揭示真理的著作禁掉、毁掉，然后再偷偷地摘取他们的政见改变自己的政策。经过这种折光反映，从表面上看来，一些名臣奏议或石匮藏书，好像只是某些思想家们的个人创见，实际上，这些创见的背后，却包含着人民群众的集体创作。

第三条途径是通过封建统治者的加工制造，通过统治者们的头脑的传统作用。历代的“英主”，他们往往善于从人民群众那里，从思想家们那里取得有益的材料，把自己的政见意图打扮成为使人民群众可以暂时接受的东西，“事情是这样的，每一个企图代替旧统治地位的新阶级，就是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成员全体利益……把它们描绘成惟一合理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德意志意识形态》）。因此，每一个新

兴帝王的政治措施，在一定条件和一定问题上，不得不比旧的统治者更多地考虑到人民群众的利益，有时甚至不得不违反自己阶级的传统偏见。在这里，“英主”们的个人性格起着很大作用，历史发展的加速和延缓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些偶然情况。但是，这些偶然性，当然本身是作为构成部分列入总的发展行程，而由其他偶然性均衡起来的（马克思语）。脱离总的发展行程而单单强调这种偶然性，是不恰当的。

以上可见，虽然封建统治阶级的本身是不会自动改变的，在接受新鲜事物上是比较顽固的；但是它在一定条件下也不能不有限度地接受人民群众的要求。这样，人民群众的血就没有白流，明末清初的农民战争和抗清斗争对于历史的发展就起了推动的作用，这也就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人民群众创造历史，以李定国、郑成功为代表的人民群众的目的、意志和行动，经过斗争之后，虽然和封建统治阶级的目的、意志和行动，逐步汇成一个总的合成力，例如人所艳称的“康熙之治”。在表面上看来，好像是康熙继承了李定国和郑成功的事业，其实康熙并没有这种自觉的努力，他本身仍然是作为偶然性而服从于历史的必然规律。虽然我们承认，封建统治阶级中的开明派比顽固派要好一些，康熙的历史作用，既不能抹杀，也不能由别人的作用来代替，但是，自觉的继承与历史的自然现象毕竟有区别，笼统地叫做“继承”，颇不易说明问题。

四

前面已经说过，历史是由人民群众创造的，英雄人物是由时势造成的，历史的偶然性只能服从于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因之我们不应该把历史上的伟大事件简单地挂在个别英雄人物的账上，这是一方面。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承认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历史是由活动家们的个别行动构成的。在说到历史的“一般规律”的时候，决不能否认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因为，

一定的历史条件虽然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否能正确运用这些历史条件则是通过个人的活动的，尽管在客观上存在着一切胜利和成功的可能性，但如果领导者没有看到或不善于利用这些可能性，结果也将是一事无成。当然，每一个历史人物的形成，都有他们的特定背景，只要时机成熟，历史人物就会登台，没有李定国还会出个张定国，但是张定国的个人活动绝不是李定国的个人活动。李定国在坚持西南抗清斗争中的重大作用，就在于他能够正确认识到他所碰到的条件，并且懂得怎样利用这些条件，懂得怎样把不利条件变为有利条件，从而改变了明清之际西南地区的局部面貌，并影响了其他地区的局部面貌。

李定国的个人特点很多，他的部下和历代史学家们对他都有过评论，例如：从仪度上说，有人推崇他为“小柴王”；从勇敢上说，军中称他为“小尉迟”；从军事指挥能力来说，有人称他为“小诸葛”。此外还有人说他志节如申包胥，心迹如张世杰，忠诚如姜伯约，慷慨死节如田横，结束有明残局如王保保，等等。当然，批评他的人、骂他的人也不少。我在这里只从他的几个主要特点提出一点个人的看法。

李定国是农民出身的，从小就参加了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他对于农民群众的疾苦和要求，必然会有深刻的体会，因之在他的一生中没有做过违背农民利益的事情。最难得的是，即使在战争遭受挫败的时候，他还能处处想到人民群众。如新会败退途中，“抚难民号哭失声”；撤离昆明时严禁烧毁粮食，深恐因此而加重人民负担。处处关心农民的利益，不忍他们遭受满洲贵族奴役的痛苦，这是他坚持抗清斗争的政治基础。这个基础不动摇，斗争必然坚决，在处理各方面的关系上也必然会从大局上着想，这是他个人特点的主要方面，他的其他特点，都是和这个主要特点有关的。

其次，如前所述，李定国自从接受了“联明抗清”的主张以后，曾经尽力促成联合明军及西南各民族共同抗清的联合战线。以后，在军事上虽然屡遭挫折，联合战线也出现过濒于破裂的危险，但他坚持既定方针，至死不渝。在他的全部活动中，从来没

有发生过同清兵“议和”的幻想，清兵大概也看到了这一点，从来也没有把李定国作为“招降”或“议和”的对象（洪承畴曾试探过，遭定国拒绝）。没有坚定的人民立场和百折不回的斗争勇气，是做不到的。

其三，李定国是一个宽厚正直而比较谦虚的人，远在农民战争时期，就有人称他“在军中独以宽慈著”；后来做了抗清军的统帅，还是“性亢直，与人无私曲”，“不以威凌士类”。他跟并肩作战的部队，一向处得很好，从来没有强编过别人的部队，也没有随便撤换或杀过别部的将领。他平时喜结文士，谦恭下人，一般地说，还能够听取反面意见，例如对谢秉铉、高勋、邬昌期、金简、白文选等的当面指责或书面弹劾，有的当面“逊谢”，有的事后认错，偏执己见的情况并不太多。正因为如此，所以明军、义师都乐于同他联系作战；他失败西走，还有很多人（如贺九仪、吴三省、朱养恩等等）不远千里地去投奔他。

其四，李定国在知人、用人方面，一般说来还是看得比较准的，例如他东出两粤，曾以王兴、肖国龙等为前锋，以龙韬、陈奇策等为将军、水师督统；对刘远生、陈瑾等亢直之士，则肃然起迎，对万翱、严云从等没有节操的人，则当众揭露或置诸不理。这些都是做得有分寸的。至于他一手培植起来的将领，如靳统武、高文贵、王得仁、李远等等，大多能裹尸疆场，在东出两粤及盘江、怒江诸役中，大批将领英勇牺牲，并不是一种偶然现象。这里有必要提一下他和他的得力助手金公趾的关系。金公趾，昆明人，原是一个怀才不遇、不肯出仕的名士，在崇祯十一年（1638年）间曾和江阴徐霞客有过诗酒往来。1646年“四将军”进入云南之后，他曾出来协调“四将军”与勋镇沐天波之间的关系，以后就做了定国的中书。从“金公趾说三国”这个故事来看，李定国对于他是言听计从的，他帮助李定国做出的决策（如突破孙可望的封锁）也是正确的。定国退回云南，金公趾已死，金维新和曹延生继任中书。这两个人用错了，对他的后半事业不无影响。

最后，李定国在抗清斗争中，曾经遭受过多次挫折和失败，他对待失败的态度是正确的，从来不畏缩，不悲观。新会失败，

他的二十万人都被冲散了，收集六千人继续再干；盘江之役，损失最重，据刘彬说“军民死者三十余万人，精锐殆尽”，他还是计划着东出楚粤，联合郑成功以谋再举；此计不成，他又拿出最后的力量组织了怒江之役；怒江再败，永历逃入缅甸，他率部退据滇南，联合诸土司谋恢复。他经常在没有条件的时候创造条件，在没有希望的时候怀有热烈的希望，“人定”虽然不能完全“胜天”，但是他从来没有依靠过天。他始终是勇往直前，死而无悔。

以上是李定国在抗清活动中几个较为显著的个人特点，这些特点的总和，构成了一个比较难得的英雄人物。如果和他同时期的抗清将领相比，包括早期死难的何腾蛟、史可法等等在内，他的个人活动都是杰出的。只有认识到这些，我们才能够理解：清兵为什么要把他看做主要的斗争对手？西南人民为什么对他那样热爱（川南有李晋王庙，保存百余年）？他对那么复杂的武装力量为什么能够统帅得了？他对那么多的而且相互歧视的少数民族为什么能够联合得起来？西南地区的抗清斗争为什么能够坚持到那么长久？这里，当然不能离开客现存在的有利条件，如人民、经济、地利等等，但在具备了一定条件的情况下，领袖人物的主观能动性便起着决定的作用。这不是把李定国捧为神仙，也并不是把他誉为天生的豪杰，而是认为他具有一种爱农民、抗清兵的基本立场，具有一种做主人而不做奴隶的明确目的，这样，他就本能地认识到联合各种力量共同进行斗争的必要性；以抗清斗争为基础把人民团结起来，把各方面的力量联合起来，蕴藏在人民群众间的斗争力量一得到适当发挥，斗争局面就必然大大改观。当然，李定国的个人才能，仍然是革命形势造成的，时代会挑选人才，也会培养它自身需要的人才，经得起时代的挑选与考验，他的才能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他自身仍然是作为偶然性而服从于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过分夸大他的个人作用，也是不正确的。我们研究这个问题，是要从特定的社会环境中分析出一个英雄人物的特出现象，并从中得出经验教训。虽然，弄清楚一个历史人物的个人特点和弄清它的时代背景相比，是次要的，但并不是多余的。

李定国的个人特点（优点），并不都是完整的，例如他爱护

农民是对的，留着粮食资敌则是不对的；待人宽厚是对的，“恶恶而不能去”则是有缺点的；善于和友军合作是对的，只合作而不改造他们则是难于持久的；注意联合少数民族是对的，只会使用而不会提高他们则是对联合有局限的。李定国的后期活动，可能沾染了明朝的一些传统习气，例如“祭孔庙”（未成）、“受祝贺”、“受黄钺”等等，在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还无力摆脱腐朽的南明小朝廷，结果使西南的军事斗争受到一定影响，顾全大局反而贻误了大局，这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历史人物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局限性。我们也知道，“大人物凭靠他们那种头脑和性格上的特点，虽然也能使各个事变的单个外貌以及某些事变的局部后果改变一个样子，但这些特点究竟不能改变事变的一般方向，因为这种方向是由别种因素决定的”（《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对李定国的个人活动虽不应做过多的苛求，然而，对于一个人的显著特点是应该做全面考察的。

五

我们在李定国、郑成功这两位英雄人物逝世三百周年的时候，举行学术讨论会，作为对他们逝世的纪念，这是有意义的。我认为对于历史人物的纪念，有的纪念他们的道德，有的纪念他们的事业，有的纪念他们的文章；有道德有文章的要纪念，有道德有事业而文章不显的也要纪念；成功的英雄要纪念，失败的英雄也要纪念。这样，才能逐步地把历史人物的地位给予合理的评价，从而为解决“人民群众在历史上是怎样起作用的”这一命题，也会有些帮助。当然，对于他们的评价是否恰当，他们是否有纪念的价值，还须要继续讨论。

我在这篇文章里对于李定国的评价可能有些片面，也可能有不少地方是用今人的看法去推测古人，作为引玉之砖，敢提出供大家参考，并请不吝指正。

[原载《南京大学学报》（人文），1962 (3)]

策划编辑⊙王 立 新
责任编辑⊙吕 鹏 军
装帧设计⊙奇文云海
版式设计⊙赵 星 华

ISBN 7-300-07035-3

9 787300 070353 >

ISBN 7-300-07035-3/K · 279
定价：22.00元